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二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5年 北京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22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2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2 年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二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7 $\frac{1}{4}$ · 插页 7 · 字数 640,000

1965 年 5 月第 1 版

196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632 定价(四) 3.45 元

目 录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	3—6
今后怎样呢？	7—1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3—57
一	15—24
二	25—34
三	35—57
論反犹太主义。(摘自一封寄往維也納的信)	58—60
“共产党宣言”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61—68
伦敦的 5 月 4 日	69—76
給“薩克森工人报”編輯部的答复的草稿	77—79
給“薩克森工人报”編輯部的答复	80—82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83—87
給“社会民主党人报”讀者的告別信	88—92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93—99
致“柏林人民报”編輯部	100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01—102
致“工人紀事周报”和“人民言論”編輯部(布达佩斯)	103—104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卡·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序言	105—106
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关于所謂捏造引文問題。	
事情的經過和文件	107—213
一	111—115
二	116—120
三	121—126
四	127—130
五	131—136
六	137—142
七	143—154
文件	155—213
一 被指控的引文	155—159
第 1 号 成立宣言	155—156
第 2 号 “資本論”。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第 3 版	157—159
二 布伦坦諾和馬克思	160—185
第 3 号 控告。1872 年 3 月 7 日“协和”杂志第 10 期	160—161
第 4 号 馬克思的答辯。1872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人民 国家报”第 44 号	162—166
第 5 号 匿名作者的反駁。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杂志 第 27 期	166—171
第 6 号 馬克思的第二篇答辯。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 国家报”第 63 号	172—181
第 7 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駁。1872 年 8 月 22 日“协和” 杂志第 34 期	181—185
三 塞德萊·泰勒和爱琳娜·馬克思	186—196
第 8 号 塞·泰勒的攻击。1883 年 11 月 29 日“泰晤士报”	186—187
第 9 号 爱琳娜·馬克思的答辯。1884 年 2 月“今日” 月刊	187—189

第 10 号 塞·泰勒的反駁。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189—191
第 11 号 爱琳娜·馬克思的第二篇答辯。1884 年 3 月 “今日”月刊 ……………	192—196
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諾 ……………	197—213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 写的序言 ……………	197—203
第 13 号 布伦坦諾的答复。“我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 ……	203—206
第 14 号 布伦坦諾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	206—210
第 15 号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报纸上的議會报道摘录 ……	210—211
第 16 号 格莱斯頓——布伦坦諾。1890 年 12 月 4 日 “德国周报”第 49 期……………	211—212
第 17 号 恩格斯对第 16 号的答复。1891 年“新时代” 第 13 期 ……………	212—213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給法国工人的賀信……………	214—215
卡·馬克思“法兰西內战”一书导言 ……………	216—229
*关于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給霍賽·梅薩的信) ……………	230—231
致負責在米兰組織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 委员会……………	232—233
卡·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 ……	234—24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 ……	244—245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 ……	246—259
給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賀信……………	260—261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	263—280
一 緒論部分(十段) ……………	265—272
二 政治要求 ……………	272—277

三 經濟要求·····	278
第一部分附件·····	279—280
关于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給保· 拉法格的信)·····	281—283
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281
欧洲局势·····	281—283
德国的社会主义·····	285—303
一·····	288—292
二·····	293—303
致“人民之友报”編輯部·····	304—305
致“每日紀事报”編者的声明的附函·····	306
关于已故的馬克思夫人。致“每日紀事报”編者·····	307—30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詠团 (托登楠街)·····	309—310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311—325
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維奧·····	326—328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329—330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給法国工人的賀信·····	331—332
对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語·····	33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334—361
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362
卡尔·肖萊馬·····	363—366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367—383
*关于英国的經濟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	384—385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386—387

美国的总统选举	388—391
馬克思, 亨利希·卡尔	392—404
致“柏林人民論壇”报編輯部	405—408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409—413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414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徑	415—417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馬	418—426
一	418—420
二	420—423
三	423—426
致意大利讀者。“共产党宣言”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429—431
欧洲能否裁軍?	433—467
序言	435—436
一	437—439
二	440—443
三	444—448
四	449—451
五	452—455
六	456—459
七	460—462
八	463—467
1893 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468—469
为庆祝 1893 年五一节給奥地利工人的賀信	470—471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們。1848 年回忆片断	472
尽管如此。为庆祝 1893 年五一节給法国工人的賀信	473—474
1893 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475—476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編輯部	477—478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的閉幕詞。記錄	479—480
1893年9月14日在維也納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 演說。報紙上的报道	481—482
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 演說。報紙上的报道	483—485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486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487
“‘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序	488—491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	492—493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跋	494—510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	511
*关于“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	512—513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514—518
为紀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 委员会	519
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520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 委员会	521—522
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523—552
一	525—530
二	531—540
三	541—552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組織	553—554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給卡·德拉 瓦勒的信)	555—556
給西西里島社会党人的賀信	557—558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給“社会評論”杂志 編輯部的信)	559—560
給“前进报”編輯部的信	561—562
法德农民問題	563—587
一	567—578
二	579—587
关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四卷	58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589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給奧地利工人的賀信	590
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 一书导言	591—612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613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	614

附 录

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閃电报”記者的 談話	617—623
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費加罗报”記 者的談話	624—630
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紀事报”記者 的談話	631—636
注释	639—772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73—822
人名索引	823—851
期刊索引	852—855
地名索引	856—861
譯后記	862—863

插 图

載有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 “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封面	16—17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的扉頁	65
弗·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手稿的 开头部分	267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第二版的第一頁和第二頁	328—329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的扉頁	335
弗·恩格斯开列的卡·馬克思著作的书单	395
弗·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的第一頁和第二頁	401—402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扉頁	427
“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俄国” (載有弗·恩格斯給“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一文写的跋)的扉頁	495

弗·恩格斯

1890年1月—1895年8月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¹

凡是注意观察近十年来德国政治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的普选中将获得巨大的胜利。1878 年德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严酷的非常法² 的迫害，根据非常法，他们的一切报刊被查封，会议被禁止或被解散，组织被破坏，而任何想恢复这些组织的企图都在这些组织是什么“秘密团体”的借口下遭到迫害；法庭判决的结果，党员总共被判处了一千多年的徒刑。尽管如此，社会党人仍然秘密地每周定期地把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大约一万份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³ 运进了德国，并分发出去，数千本小册子也是这样传播的；他们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德意志帝国国会（九个议员）和许多市政管理机关，其中包括柏林的市政管理机关。党的力量的增长，甚至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社会党人在 2 月 20 日获得的胜利，甚至连他们中间最乐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已经获得了二十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二十个选区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还要进行五十八次重新投票，这意味着，在五十八个选区里，社会党人在那些提出候选人的党派中不是力量最强大的，便是居第二位的党，而重新进行的选举将在两个得票最多但是都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的候选人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至于社会党人总共得到的票数，我们只能做大概的计算。1871 年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不超过

102 000 张；1877 年——493 000 张；1884 年——550 000 张；1887 年——763 000 张；1890 年他們可能得到不少于 1 250 000 张选票，也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党的力量三年来至少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 1887 年只有三个党的选民超过了 1 000 000 人：民族自由党——1 678 000 人，中央党即天主教党——1 516 000 人，保守党——1 147 000 人。⁴ 在这一次，中央党将保持住自己的陣地，保守党失掉了相当多选民，而民族自由党則失掉了非常多的选民。这样，社会党人在选民的人数上同中央党比起来仍然处于劣势，但是却完全比得上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甚至会超过它們两者了。

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中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它真正开創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結的开端。当前的局势就是这样。

年輕的威廉由于自己頒布了关于劳工保护法和关于国际劳工保护會議的詔令，摆脱了他的老师俾斯麦的监护。⁵ 俾斯麦认为，最明智的作法是給自己年輕的主子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并且安靜地等待威廉二世連同他的拿手好戏——扮演工人之友——陷入窘境；那时候俾斯麦就会得到以 *deus ex machina*^① 的資格出面干預的良机。这一次俾斯麦沒有对选举的进程表现出焦虑不安。一个当年輕的皇帝一察覺到自己的錯誤就要予以解散的不順从的帝国国会，甚至会对俾斯麦有利，而社会党人的巨大成功可能帮助他在帝国国会解散的时刻到来时献給国家一个适当的选举口号。狡猾的首相現在也真的得到了一个誰都不能駕御的帝国国会。威廉二

① 直譯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劇場里，扮演神的演員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轉义是：突然出現以挽救危局的人。——編者注

世很快就会认识到，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目前的情绪，他在诏令中所提到的那些意图甚至一点也不可能付诸实现。同时选举已经使他相信，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付款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它的原则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奴役人民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政府所采取的对立立场。

这样，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角逐着的政党就会把发生的事情完全归咎于社会党人，一个新的选举口号就会应运而生，那时俾斯麦在给他的主子和元首一顿必要的教训之后，就会采取行动，解散帝国国会。

但是俾斯麦以后会发现，情况已经变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果断了。俾斯麦从来都不能信赖贵族阶级；贵族一向把他当做真正保守主义的叛徒，并且准备一旦皇帝想摆开他，就把他甩掉。资产阶级是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但是它不再信任他。俾斯麦和皇帝之间的不大的家庭争吵成了众所周知的事。这次争吵说明俾斯麦已经不再是全能者，而皇帝也不保险不产生危险的怪念头。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人究竟会信赖他们之中的哪一个呢？明智的人不再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却不明智。的确，对 1871 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稳固性的信念，这个在老威廉作皇帝、俾斯麦执掌政权、毛奇统帅军队的时候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是不可动摇的信念，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赋税负担的加重，由于对所有进口物资、不论是食品还是工业品都课以不合理的关税而引起的生活费用的高涨，难以忍受的兵役重担，对于战争、而且是全欧洲规模的、将会有四五百万德国人被征入伍的战争所始终抱有的和不断加深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作

用，使得农民、小商人、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只有从政府所建立的垄断组织中获得利润的那一小部分人除外）愈来愈离开政府了。当老威廉、毛奇和俾斯麦构成一个似乎不可战胜的政府三执政的时候，人们曾像忍受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那样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现在，老威廉死了，毛奇已退休，俾斯麦必须和年轻的皇帝打交道；俾斯麦曾亲自挑起了皇帝的漫无止境的虚荣心，因而使这个年轻的皇帝自认为是第二个弗里德里希大帝，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自负的、渴望摆脱自己首相的控制的纨绔子弟，而且还是宫廷阴谋家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能再毫无怨言地忍受这种过度的压迫了。过去对于局势巩固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以前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反抗，现在成为必要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帝国国会不是那样顺从，那末下一个帝国国会在这方面也许还要大大地超过它。

因此，俾斯麦显然是打错了主意。如果他要解散帝国国会，那末甚至 *spectre rouge* [赤色幽灵]——反社会党人的口号——也帮不了他的忙。然而他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特性——不顾一切的蛮干。如果他要这样，他可能挑起暴动，尝试少量“放血”的作用。但是他这时不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在军队里呆过。他们在那里学会了遵守纪律，这一点至今帮助他们抵制了任何挑起他们暴动的做法。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一点别的什么。

写于 1890 年 2 月 21 日和 3 月 1 日
之間

載于 1890 年 3 月 3 日“新堡每日
紀事報”，并稍加修改后載于 1890
年 4 月 6 日“柏林人民報”第 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新堡每日紀事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 1960 年
“苏共历史問題”杂志第 6 期

今后怎样呢？⁶

1890年2月20日是俾斯麦时代完結的开端。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为了剝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結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卡特尔⁷正是这样的联盟而不是别的)正在收获自己的果实。烧酒稅、食糖出口奖励金、谷物和肉类的關稅使千百萬的錢財从人民的口袋流进容克地主的口袋；正当德国工业用自己的力量和自由貿易的条件下在世界市場上爭得了地位的时候，实行了工业品的保护關稅，实行这种關稅很明显只是为了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在国外以傾銷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整个一套間接稅的重担压在最貧困的人民群众身上，差不多不触动富人；为了抵补不断扩大的軍备开支，过分地加重賦稅的負担；随着軍备的不断扩大，世界战争的危險也日益增大了，这次战争可能使四五百萬的德国人“倒下去”，因为对亚尔薩斯—洛林的侵占已把法国抛到俄国的怀抱里，从而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仲裁法官；在出版界盛行前所未聞的賄賂行为，每当重新进行帝国国会选举时，政府就通过出版物系統地向人民群众傾瀉大量令人惊慌的謊言；貪脏受賄的警察当局利用收买或暴力迫使妻子背弃自己的丈夫，儿女背弃自己的父亲；出現了在德国几乎前所未聞的暗探誘捕手法；警察的专横远远超过了1848年以前的专横；一切权利都遭到德国的法院，首先是高貴的帝国法院的无耻蹂躪；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整个工人阶级变成了无权阶

級——所有这一切在相当时期里存在过，而且这样的时期由于德国庸人的怯懦延长了很久，但是现在就要结束了。构成卡特尔的多数已被粉碎，而且是彻底地和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因此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重新把它拼凑起来，而且只是在某个时机，那就是政变。

今后怎样呢？为支持旧制度而拼凑一个什么新的多数嗎？啊，这不仅仅是政府当局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在自由思想派⁸中将有不少胆小鬼，他们宁愿自己投奔卡特尔，也不愿让阴险的社会民主党人提高地位；同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被埋葬了的那些关于政府作用的幻想，又从棺材里钻出来了。但是政府不能利用自由思想派，因为自由思想派目前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结成联盟，而后者却是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阶级！

那末中央党呢？中央党里也有不少容克地主，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伐利亚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等等，他们都渴望投入易北河以东地区自己同胞兄弟的怀抱，并且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对容克地主有利的税收。在中央党的队伍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是够多的，他们力求比政府所应当做的倒退得更远，一旦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就会重新把整个中世纪行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要知道，道地的天主教政党，也像任何一个道地的基督教政党那样，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能有同中央党组成的新卡特尔呢？

这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党的统一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来维持的。中央党完全是由敌视普鲁士的人组成的，他们是：莱茵河流域的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人，南部的德国人，汉诺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天主教徒，不言而喻，他们在天主教地区特别有势力。所有其他的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反普鲁士分子：例

如韦耳夫派和其他分立主义者、波兰派、亚尔萨斯派，都聚集在中央党的周围。⁹一旦中央党成为政府的党，它就会分裂成容克地主行会反动派和农民民主派；属于前一派的老爷們知道，那时候他們将不会再在自己的选民面前露面了。尽管如此，还是会作这样的尝试，而且中央党的大多数都会赞同这种尝试。而这样做对我们只会有利。道地的反普魯士的天主教党本身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是道地的普魯士主义統治的产物。随着后者的垮台，前者也必定要垮台。

因此，中央党和政府结成暫时的联盟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党不是民族自由党，相反，它是第一个在同俾斯麦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而迫使俾斯麦去卡諾薩¹⁰的政党。可見，旧的卡特尔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俾斯麦只能利用新的卡特尔。

今后怎样呢？解散帝国国会，举行新选举，利用对社会民主党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嗎？这样做的时机也已經放过了。如果俾斯麦想这样做，他甚至不应当同他的新皇帝发生任何的爭吵，尤其不应当到处散布关于这种不和的謠言。

当老威廉在世的时候，三执政——俾斯麦、毛奇、威廉——在德国庸人的眼里是穩固的、永远不可动搖的。但是現在，威廉不在世了，毛奇已被迫退休，而俾斯麦正在犹豫不定，是等別人叫他退休呢，还是自动退休。而继承了老威廉地位的年輕的威廉則以他的短时期內的全部政績，特別是以他的著名的詔令表明，殷实的資產階級庸人無論如何不能信賴他，他也不希望受任何人的控制。庸人所信賴的人已經沒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庸人不能信賴。相信 1871 年建立的帝国內部秩序永恒不变的那种旧信念已經死亡，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复活。以前政策的最

后一根支柱——庸人——动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散帝国国会能有用吗？

实行政变？但是这不仅将解除对人民的束缚，而且也会使隶属于帝国的各邦君主不再有义务遵守被这次政变推翻的帝国宪法。政变将意味帝国的崩溃。

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旦把战争发动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的。如果克雷兹渡过加利斯河，或者威廉渡过莱茵河，就会毁灭一个大国。但是，是谁的国家呢？是自己的国家还是敌方的国家？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平，只是由于军事技术发生不断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己已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全无法估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

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政府用残酷的手段挑起暴动，然后用加倍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各地实行戒严，在普遍恐怖的情况下举行新的选举。然而，即使这样做也只能使毁灭延缓几年。可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知道，俾斯麦是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威廉不是也说过吗：一遇到极轻微的反抗，我就要下令把所有的人当场杀光？所以这个办法一定会被采用。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刚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他们正是由于自己的坚毅和沉着、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才获得这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大概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它也使得全世界感到惊讶。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每次新的选举中都像不可改变的自然进程那样不断增加；暴力、警察的专横、法官的卑鄙勾当——一切都白费力气；一支人

数不断增长的突击队一直在向前挺进，愈来愈快地向前挺进，现在它已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最强大的党。难道德国工人会仅仅为了把俾斯麦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而使自己卷入无望的骚动，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吗？当他们自身的无比的勇气受到外部情况的鼓舞，当一切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他们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像得到报酬那样地为社会民主党效劳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丢掉纪律和镇静，而自己冲向那对着我们的刀剑吗？不，决不能这样。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了我们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到来。

写于 1890 年 2 月 21 日和 3 月 1 日
之間

載于 1890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 10 号和 1890 年 3 月 14 日
“工人报”第 11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¹¹

写于 1889 年 12 月—1890 年 2 月
(英译文完成于 1890 年 3 月)

译成俄文载于 1890 年 2 月和 8 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1 册和第 2 册,德文原文载于 1890 年 5 月“新时代”杂志第 5 期,由作者译成英文载于 1890 年 4 月和 5 月“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并根据英译文校对过

我們，西欧的工人政党^①，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陣地和后备軍；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們来說已經是一种威胁和危險。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們这方面来說，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強調，——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撓和破坏我們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領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統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②

卡尔·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 1848 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強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見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③

①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譯文中不是“我們，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編者注

② 在英譯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編者注

③ 这一段在英譯文中是：“在英国，論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維·烏尔卡尔特的名字的。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紹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績的唯一獎賞就是：他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

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饒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烏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給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烏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已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烏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性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送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烏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說：«Si M. Urquhart n'existait pas, il faudrait l'inventer»[“即使不存在烏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編者注



載有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封面

的耶穌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在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穌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穌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馮·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赂，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胜利、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

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详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們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腸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們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魯士就是如此），这种現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們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經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簡單。他們并没有創造什么新的东西，他們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現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們来看看上一世紀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時間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創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們无所不能；他們坚韧頑强，大胆无畏，忠誠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來說，他們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沒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員广闊，补給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障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軟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組織、武装和調动，都碰到极

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¹²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¹³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头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 *matière à conquêtes* [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

土耳其人和他們的納貢者克里木韃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毀，他們的防禦力量暫時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們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島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羅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騷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又是他們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亞人，对于他們，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羅馬帝国的旧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統治，表明它的統治者在东方基督教徒中間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統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統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亞細亞、巴尔干半島的独占統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鎖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軍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場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陣地通过設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进行偷襲，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隱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峽和两个貝耳特海峽的同样的（直接或間接的）統治，从海上也就无法攻破它了。

对巴尔干半島的統治將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說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來說；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貴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輕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說法，从十八世紀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維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軍隊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們的客棧和小飯店(如波兰人所說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們通常总是忘了付錢。彼得大帝有步驟地毀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們还有“民族原則”¹⁴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謂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¹⁵。此后，由于波兰有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貴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紀，耶穌会教徒統治波兰，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羅馬天主教。这就給了大俄罗斯的沙皇們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們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領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現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意見，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語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維護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¹⁶，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羅馬天主教教会中的現狀。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 *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明确保障¹⁷；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贿赂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①。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¹⁹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

① 见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etc.» Jena 1830, 2. Band, S. 201—206¹⁸。

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

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材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²⁰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八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①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二

1762年，当大淫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²¹。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的威力，然后又把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抛给命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濒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遗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闹翻、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帝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²²，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来详细谈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²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

拥有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而加以践踏的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的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①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十九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②，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²⁴，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它，也只有它，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打了起来²⁵，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想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③；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帖欣和约，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

各項和約，其中包括 1648 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約的執行。這樣，德國的軟弱就被固定下來，它本身也成了法國和俄國未來瓜分的對象。

土耳其也沒有被遺忘。俄國對土耳其人的戰爭總是在俄國西部邊界太平無事，而歐洲在別處忙於其他事務的時候進行的。葉卡特林娜進行了兩次這樣的戰爭²⁶。第一次戰爭的結果是得到了阿速夫海沿岸地區，克里木宣布獨立，並在四年之後成了俄國的一個省份。第二次戰爭使俄國的邊界從布格河推進到德涅斯頓河。在這兩次戰爭當中，俄國的代理人都煽動希臘人起義反對土耳其人。自然，起義者最後都被俄國政府拋棄而聽任命運的擺布。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葉卡特林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義首先提出了“武裝中立”的原則（1780 年），即要求限制英國認為它的軍艦在公海上應當享有的權利，這一要求從那時起便成為俄國政策的不變目的，並且按照 1856 年巴黎和約的條款已基本上為歐洲和英國本身所承認。²⁷ 只有美利堅合眾國直到現在還不愿意予以考慮。

法國革命的爆發給葉卡特林娜帶來了新的時運。她毫不懼怕革命思想滲入俄國，而只是把這一事件看做是使歐洲各國彼此爭吵起來，從而使俄國能自由行動的一個新的有利時機。在她的兩個“開明的”朋友和鄰居死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魯士，列奧波特在奧地利企圖實行獨立的政策。革命給了葉卡特林娜一個大好機會，使她能以反對法蘭西共和國作幌子重新把這兩個人拴在俄國的鎖鏈上，並且在他們兩人忙於法國邊界的時候，在波蘭進行新的掠奪。普魯士和奧地利都陷入了羅網。雖然普魯士（它從 1787 年到 1791 年扮演了波蘭反對葉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

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較多的份額，虽然也不得不分給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²⁸ 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現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分散了1792—1794年同盟²⁹的力量，使得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了，法国在这时就得以巩固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連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們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記。而且，我們將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經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給邻居；把德国变成未来的瓜分对象；把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記的、可以逐漸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給瑞典作为补偿，——叶卡特林娜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提出的³⁰；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萊雅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統主义的詞句巧妙地結合起来，俄国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詞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們的所謂輿論。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領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統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現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

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港湾。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去问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的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不可忖度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计划；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外交家的耶稣会匪帮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让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³¹，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约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神甫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1779年帖欣条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决定性的话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来讲。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贪婪，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讲的话成为真正决定性的话。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

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³²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奢望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也希望得到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毗邻的关系对各小邦直接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世代追求的目的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弄得筋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在各个宫廷充满了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的同时，给公众散发了神秘的小册子，其中把俄国捧为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帖欣条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只要稍微懂一点事的人都会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利茨城下被

打败了，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³³ 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战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和 1807 年的提尔西特和约。³⁴ 这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过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卖身投靠以及彼此意见分歧，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德哥尔摩的暴力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³⁵ 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备同拿破仑破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亚波，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³⁶ 这样就在 1814 年实现了叶卡特林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仍然是沙皇格勒。在提尔西特和爱尔福特³⁷，拿破仑曾坚定地答应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给了他以瓜分土耳其的希望，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 1806 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³⁸ 但是，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性的话，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它靠混乱维持着。钢铁般坚强的士兵，钢铁般坚强的土

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被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要把他们粉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侖的大陆体系³⁹，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①。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

拿破侖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在

①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在原文中恩格斯的散文体的德文译文是：《wie ein Staat reich wird und wie er kein Geld braucht, wenn er nur Ueberfluß an Produkten hat... sein Vater das nicht begreifen konnte und ein Landgut nach dem andern vorhypotheekiren mußte》。）——编者注

这方面是够格的評断人，他們劝告他停留在德維納河和德涅泊河边，改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侖这样的統帅应当懂得，这个計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侖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經无法下决心进行曠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輝煌的胜利，通过突击爭取簽訂和約；他忽視了波兰人的忠告，直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侖的大軍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全軍覆沒，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統治的信号。普魯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侖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了俄国和普魯士的行列。在萊比錫会战⁴⁰以后，萊茵联邦脱离了拿破侖，而在拿破侖攻入莫斯科之后过了大約十八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所出卖的土耳其，于1812年在布加勒斯特簽訂了和約，把貝薩拉比亚让給了俄国人。維也納會議把波兰王国給了俄国⁴¹，因此，过去波兰的領土現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皇現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魯士听他使喚。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保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魯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尽归功于威灵頓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能消灭法兰西帝国。

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也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說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

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詞——我不愿說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談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貝薩拉比亚是羅馬尼亚人的，會議桌上的波兰⁴²是波兰人的。在这里根本談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問題，在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对別国領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搶劫。

三

对拿破侖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侖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統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詞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鉤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更加成功得多地借助这同一个詞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統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⁴³，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們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說来，問題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羅馬尼亚人、塞爾維亞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經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統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們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統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們繳納賦稅，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們；他們只是間或受到像中世紀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貴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時間之后，斯拉夫的萊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貿易从土耳

其的統治使它擺脫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連土耳其的統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統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統治一样，是和資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貪婪的劫掠；沒有資產階級从事經營活动^①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財產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 1774 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嘗試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⁴⁴。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須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說，要設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統主义这个詞儿就出色地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統主义的君主們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嘗試，使整个西方的資產階級群情激憤；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⁴⁵。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間。并不是說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們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在它的正統主义的同盟者的領地內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②。它完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錢、往希腊派送志愿軍及成批的武装輔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嗎？

① 在英譯文中不是“資產階級从事經營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貿易”。——編者注

② 在英譯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統主义的同盟者的領地內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而是“在它的正統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滿和内部不和”。——編者注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莱巴赫、维罗纳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⁴⁶；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①，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②；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纳，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③。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就会向它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

①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③ 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

的天然敌人”⁴⁷。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俄国想得到欧洲的崇高的许可，即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的全部企图都没有成功。而在此同时，土耳其于1825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茨措-迪-博尔哥(1825年10月4日(16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睬欧洲，甚至不理睬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显然，整个俄国外交界的主张都是这样。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由于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由于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活像《grec du 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拿破仑这样叫他)。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来，他已经讨厌希腊的起义者了。他无所事事，在沒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地在南方塔干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謠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①；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

发动了对土战争，而同时却避开了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两者都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1827年10月20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林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⁴⁸ 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1828年5月6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15 000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同年8月和9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警告，使它不敢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左右，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两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390页）⁴⁹。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各公国事务的新口实。⁵⁰ 多瑙河各公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karczma zajezdna»^①；在这整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① 在英译文中，«karczma zajezdna»的后面是：“（小饭店）”。——编者注

在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优势达到下一步的目的以前，七月革命⁵¹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个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⁵²。

我不来详细谈 1830—1848 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利的侵袭，派遣三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⁵³；其次，它后来在 1840 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盟，⁵⁴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①以及用 «Règlement organique»⁵⁵（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②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只是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个惨重的失败：当康斯坦丁大公 1830 年 11 月 29 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③的指示原本和使节们的一切重要报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在英译文中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 10 章第 218—222 页。”⁵⁶——编者注

③ 涅谢尔罗迭。——编者注

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 年間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①。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轉交給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指示，戴維·烏尔卡尔特于 1835 年将它們发表在“公文集”⁵⁷ 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爭吵，从而使它們全都服从自己的統治的那些陰謀的历史的主要資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資料。

俄国外交已經經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沒有受到損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 1848 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个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扩展到了維也納，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喚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脫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駐守着，动也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⁵⁸，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重新侵入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統治的口实。

不仅如此。奥地利，俄国在巴尔干半島边界上最頑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維也納的起义已瀕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軍隊中有許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寬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軍隊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

^① 这句话在英譯文中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 1825—1830 年間所搞的全部陰謀被揭露了。”——編者注

力镇压了匈牙利军队，从而肯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⁵⁹ 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了，他并且预先看到了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符合于沙皇政府的目的而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⁶⁰ 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所以，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份；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中于 *d'étonner le monde par la grandeur de son ingratitude* [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①。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报答，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沃尔肖伐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而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它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首批队伍一在保加利

^① 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句话。——编者注

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各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个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①，因为俄国是通过它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险。正是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那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假象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境的俄国土地上稳稳地住下来；假象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假象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边疆的一点，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便反过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入侵的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

^①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这个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

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和粮草给养都很差的军队在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只好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①匆忙締結的和約，条件极其寬大。⁶¹ 比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統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順。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敗，并且是发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給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争中的龐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太激动了，沙皇太濫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誠，要立即使他們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經濟方面和思想方面也逐渐发展；除貴族阶级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登极的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輿論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輿論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視。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沒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所追逐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繳納賦稅的时候，这种外交才

^① 亚历山大二世。——編者注

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末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在进攻方面和过去一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La Russie ne boude pas, elle se recueille [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⁶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在作这种积聚(recueillement)时，政府本身帮助了它。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①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

俄国的 «recueillement» 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 1856 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①；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特林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并且缔结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⁶³ 而在 1859 年，当路易-拿破侖决定向奥地利为俄国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当时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 1848 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反沙皇的意志，也违反路易-拿破侖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⁶⁴

1859 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法、英三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⁶⁵ 他以此使沙皇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放弃了他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 1864 年脱离了丹麦。⁶⁶ 然后是 1866 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 1849—1850 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二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

^①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

起来。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①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筋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开进了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所造成的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⁶⁷，其中把1866年战争跟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②。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經路易-拿破侖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法国立刻就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给过德国以外交上的支持。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他那现时被破坏了的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国外威势的丧失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那末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

① 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Uncle's a brick]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由此到本段末尾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起到“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编者注

暫的喘息之后开始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个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場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語种族联合势力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給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亚尔薩斯—洛林⁶⁸，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現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来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1877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經過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1878年1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門口，这时在波斯普魯斯海峽忽然出現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經能够看見索菲婭教堂圓頂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蒂凡諾条約提交欧洲會議审查。⁶⁹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羅馬尼亚、塞尔維亞、門的內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領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們都欠了俄国的債；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間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⁷⁰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魯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收复了1856年失去的那部分貝薩拉比亚領土；在阿尔明尼亚占据了新的重要的陣地；奥地利在占領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謀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維亞人要求独立和統一的一切意图；最后，土耳其由于領土丧失、筋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賠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①——暂时地为俄国

① 在英譯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編者注

守护着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达达尼尔海峽。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終目的，即攫取 «la clef de notre maison» [“我們房屋的钥匙”]① 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說并吞亚尔薩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末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約則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軍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軍事陣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結在这一或那一陣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驟，要真正占領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勝負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結局大概并不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維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輸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絕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綫，从而用围困法来攻占这一或那一国家（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②。但是，要

① 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8 年和法国大使科林庫尔談話时的用語。——編者注

② 在英譯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沒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按照 1856 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二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鎖的情况下，在我們的铁路暢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們毗邻的中立国輸入它們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貨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魯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給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們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間的陆上貿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遺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中充分表現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別的东西了。”——編者注

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一百五十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①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宿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通过和丹麦

①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1857年的印度起义⁷¹以后，早在1840年就已开始的对土尔克斯坦的征服⁷²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亚克萨尔特河上建立了据点；1868年合并了撒马尔汗，1875年合并了浩罕，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被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麦尔夫的缓慢的进军；1881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帖彼；1884年麦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海洛夫斯科耶和奥克斯河之间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地位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有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1857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土尔克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索利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挠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王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的代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1500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⁷³。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了与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相对抗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愈来愈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在俄国 *ex professo* [专门] 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毫无收获。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⁷⁴，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现在他们未必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塞米格腊迪埃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本身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⁷⁵ 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①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阿尔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虔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⁷⁶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民”。——编者注

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①，甚至連格萊斯頓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已經不会为了克里特島或阿尔明尼亚而冒欧洲战争的危險了。

現在我們談到了主要的問題。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 1856 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貢賦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們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經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 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現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門，而在国内，它也已經有足够的同盟者，他們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門。

当你讀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鎖；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見

^① 英譯文中在“自从美国人謙楠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鎮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的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編者注

解的話，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緒，即新兴資產階級的情緒，而資產階級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場手段的新的侵略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議会使俄国人民的絕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見，我們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經試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①而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烏有⁷⁷，这个經驗可以作为这样一点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議會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薩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領君士坦丁堡；（3）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熾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使得欧洲分裂为現在的两大軍事陣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陣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場世界上从未見过的战争，一場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軍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軍隊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絕對沒有可能預料勝負，完全不知道究竟誰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轉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結束

^①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譯文中这个詞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參議會）”。——編者注

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①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②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⁷⁸，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波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

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①、希腊人^②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会过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

①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②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

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①。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②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波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③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它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④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

③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

④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 700 万张选票中，它拥有 1 437 000 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 1848 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論反犹太主义

(摘自一封寄往維也納的信)⁷⁹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給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嗎？这就是我要請您認真考虑的問題。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魯士和奧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誰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簡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暫時聳动了一下听聞。况且，現在当他以市鎮参議員候选人身分出現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資本那样地反对基督徒的資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說出相反的意見，也还是有人讀他的著作的。

在普魯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馬克、支出两万馬克，因而落到高利貸者手中的小貴族、容克地主；在普魯士和奧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資本的競争而沒落的小資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說資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頂的階級，那末它是在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資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前进，促使他們最終达到現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

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能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

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則它就應該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殘酷的剝削，过着最貧困的生活。在我們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⁸⁰，——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說成是反对資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們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謝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說，馬克思是一个純粹的犹太人；拉薩尔也是犹太人。在我們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許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維克多·阿德勒（他为了效忠于无产階級事业目前正在維也納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爱德华·伯恩施坦、我們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議員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們建立了友誼而感到自豪，而他們全都是犹太人！“凉亭”⁸¹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話，我无論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一个“貴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載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
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报”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⁸²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⁸³以来，已经又有必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⁸⁴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⁸⁵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①）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

①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1848年1月”，而是“1847年12月”。——编者注

②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在“各种”之前还有“各国”两字。——编者注

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①）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一起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⁸⁶，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农民公社^②，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解体过程呢？

① “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②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农民公社”(Bauerngemeinde)，而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公社”(Obschtschina)一词。——编者注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⁸⁷。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Socialdemokratisk Bibliothek»）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⁸⁸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较为细心一点，他是能够把它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⁸⁹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⁹⁰。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在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阿尔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

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封面印的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上注释，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出版社，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⁹¹。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把它们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⁹²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面去，而在1852年11月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刑⁹³之后，它更被“依法”宣布为非法了。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摈诸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⁹⁴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

①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

Sozialdemokratische Bibliothek.

XXXIII.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Vierte autorisierte deutsche Ausgabe.

Mit einem neuen Vorwort von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German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

114 Kentish Town Road NW.

1890.

“共产党宣言” 1890 年德文版的扉页

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道地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1887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①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⁹⁵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由此可见，“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

^① 比万。——编者注

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⁹⁶，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⁹⁷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1890年版

Redaktion, Administration
 Expedition:
 VI. Gumpendorferstraße 60
 Wien,
 wobei sämtlicher Erzeugnisse zu
 eigener Abt.
 —
 Ödeme Reklamationsverfahren
 —
 Sprechstunden:
 An Wochentagen: 6-8 Uhr abends.
 An Sonn- und Feiertagen:
 10-12 Uhr vormittags.

Arbeiter-Zeitung.

Organ

der
 Oe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e

—♦—
 Erscheint jeden Freitag.

Abonnements-Preis
 (mit Franko-Belegungen):
 Für Oesterreich-Ungarn:
 Ganzjährig 3.-
 Halbjährig 1.50
 Vierteljährig 0.75
 Monatlich 0.25
 Einzelnr. Nummer 6 Kr.
 Für Teufelstend:
 Ganzjährig 3.-
 Halbjährig 1.50
 Vierteljährig 0.75
 Für die Länder des Welt-
 postvereins:
 Ganzjährig 4.-
 Halbjährig 2.-
 Vierteljährig 1.-

Br. 21.

Wien, den 23. Mai 1890.

II. Jahrgang.

伦敦的 5 月 4 日⁹⁸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省和各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定说，1890年5月1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

維也納已經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5月4日这一天，伦敦使維也納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年5月4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熟悉一下5月4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年4月1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Gas Workers' 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目前会员总数达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在它的积极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⁹⁹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沒有技术的工人中間，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他們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們带有閉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納沒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們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們竞争；它們有錢，但是越有錢，它們就越退化为單純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們保守，千方百計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詛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沒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則接納每一个同行；它們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純粹是，为了进行罢工而組織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們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們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們的領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經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許多年；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

們在几乎全部由工人組成的“激进俱乐部”¹⁰⁰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的場所，他們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現在已經看出成績很大。在碼頭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負責分发津貼的妇女之一；海德門先生——特拉法加廣場的逃兵¹⁰¹——却用誣蔑来答謝她們，說她們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給她們每人三英鎊。去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銀鎮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領導的¹⁰²；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創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爭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罢工失敗而又被取消了¹⁰³，这向他們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絕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決議在伦敦为爭取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議，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們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負責为此在海德公园組織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5月1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敗以后，示威决定改在5月4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請。这个組織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爭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勢。旧工联也贊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贊成由法律加以規定。他們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給常規日工資，——每小时的工資照此折算，——但同时也允許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

时，条件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費，譬如說，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工資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爭取可以按照“自由”協議来規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是爭取以議會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門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儼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邏輯地同法国的可能派¹⁰⁴ 永远結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們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規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褻瀆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組織說来，运动也已經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馬克思主义者”的領導；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动不在5月1日而在5月4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綱領中訂有爭取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是滿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結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結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员会耍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資产階級的政治实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許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在欧美工人們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人民集会，其組織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Board of Works)提出申請，并报告具体細節，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輪車在草地上通过的許可。此外还有一条規定是，一經有人申請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請。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組織

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請5月4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設立七个讲坛，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5月4日那一天公园由他們租定了，胜利毫无問題。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會議，也邀請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們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說，不許社会主义的組織、政治俱乐部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謎。理事会向會議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決議草案，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議既沒有加以討論，也沒有提付表决。最后，理事会竟拒絕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分参加會議，說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頓先生自己已經足足有十五年的時間，連想也沒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們对于他們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示威似乎已最終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組織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別的办法，只好去搶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結果爭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設立七个讲坛。靠欺騙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組織示威一事进行商談。

必須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計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們倡議举行的示

威，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月4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¹⁰⁵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来，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是

这些組織的一般成員，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的一般成員在內，却在中央委員會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員會这边。

許許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投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經終於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年5月4日英国工人階級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軍，这已經是毫无疑問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1836—1850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結果，另一方面是1848—1880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結果——終於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現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沒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謂党的領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純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沒有士兵的指揮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們想起1849年巴登运动¹⁰⁶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魯姆纵队：上校一名、軍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形形色色的罗伯特·勃魯姆纵队还为了爭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軍的領導而互相爭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現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給指揮官指出他們应守的崗位。誰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沒有摩擦，然而事情終能做成。不久以后，比很多人預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

軍將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階級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組織良好、坚强有力的大軍，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90年5月23日“工人报”
第21号

俄文譯自“工人报”

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 答复的草稿¹⁰⁷

“薩克森工人報”剛卸任的編輯部在該報 105 號（1890 年 8 月 31 日）上發表的告別辭中宣稱，似乎小資產階級議會社會主義目前在德國擁有多數。但是多數往往是很快就變成少數的，

“因此‘薩克森工人報’剛卸任的編輯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當時拉薩爾的幼稚的國家社會主義被克服一樣，目前社會民主黨中貪求成功的議會派也將很快被德國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說我對不久前在我們德國黨內發生的大學生騷動的性質還可能有一點點懷疑的話，那末這些大學生的主要機關報之一的前編輯部的這一極端無恥的行為則應該擦亮我的眼睛。前編輯部同我“一起希望”——結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奧艾爾、倍倍爾、李卜克內西、辛格爾這樣一些人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將擁有德國工人的少數，而以前編輯部為代表的“有原則的一派”則將擁有多數。這就是說，把前編輯部的希望簡直是誣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因而我得為此向它追究個人責任。

我不會有任何願望要去參與大學生和文學家老爺們挑起的無謂糾紛。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個希望知道我的意見的人談了我

的意見。如果愛鬧糾紛的老爺們也希望公開地聽我的意見，那就照這樣辦吧。

當這些老爺們開始大吵大嚷地反對黨的執行委員會和反對黨團的時候，我曾驚奇地問自己：他們究竟希望什麼呢？這一切是為的什麼呢？據我所知，所有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無根據的。在有關慶祝五一節的爭論問題上，黨的執行委員會也許闡述自己的觀點稍微遲了一點。但是執行委員會包括五個人，他們居住在四個相距甚遠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才能商討出一致的意見。然而，當執行委員會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時候，這個意見卻是正確的、唯一符合局勢的意見。漢堡事件完全證實了它的正確性。¹⁰⁸

黨團的或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個別成員在辯論時無疑是犯了錯誤。這種情況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會發生的，這要歸罪於個人，而不能歸罪於整個機構。黨團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違反了民主準則。但是要知道，這只不過是個草案，黨的代表大會可以通過它，拒絕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國際的倫敦代表會議¹⁰⁹也同樣違反過某些手續，巴枯寧主義者老爺們立即抓住這點，當作他們攻擊總委員會的表面的借口。儘管如此，現在誰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總委員會這裡，而不是在巴枯寧主義者的委員會那裡，這些人為了使國際從屬於自己而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秘密陰謀機構。

在爭論航運津貼時，當時的黨團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圖把“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部變成它自身束手無策的替罪羊，當時我堅決站在編輯部這邊反對黨團。¹¹⁰即使在現在我還是會這樣做，如果黨團或者黨的執行委員會真正做了任何對黨有嚴重危險

的事情的話。但是現在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①

寫于 1890 年 9 月 6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部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① 手稿在這裡中斷。——編者注

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

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

簽署人敬請貴報刊登下面這封信，這封信已經在昨天寄給德勒斯頓“薩克森工人報”的現任編輯部。

* * *

“薩克森工人報”剛卸任的編輯部在自己的告別辭（1890年8月31日第105號）中宣稱，似乎小資產階級議會社會主義在德國擁有多數。但是多數往往是很快就變成少數的，

“因此‘薩克森工人報’剛卸任的編輯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當時拉薩爾的幼稚的國家社會主義被克服一樣，目前社會民主黨中貪求成功的議會派也將很快被德國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剛卸任的編輯部的這個聲明對我來說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事。也許對編輯部本身來說也是如此。關於小資產階級議會社會主義在德國黨內擁有多數這個問題，我至今一無所知。因此，編輯部今後願意“希望”什麼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隨它的便，只是我並不打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說我對不久前在我們德國黨內發生的文學家和大学生騷動的性質還可能有懷疑的話，那末看到這種企圖宣布我是支持這些老爺的陰謀的極端無恥行為之後，任何懷疑都應該消除了。

我同剛卸任的編輯部的全部聯繫在於，編輯部幾個星期來在

我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報紙寄給我，不過我並不認為有必要把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的東西告訴它。現在我應當把這些東西告訴它了，並且是公開地告訴它。

在理論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了（一般來說在“反對派”的所有其他報刊上也是這樣）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其特點是：第一，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历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有的無限優越感。馬克思在談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國人中間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時也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学生，當時他說：«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實踐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顧黨進行鬥爭的一切現實條件，而幻想輕率地“拿下障礙物”；這也許會使作者們的不屈不撓的年輕人的勇氣受到贊揚，但是，如果把這種幻想搬到現實中去，則可能把一個甚至最強大的、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所有敵視它的人們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可是，甚至一個小宗派也不至於實行這種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關於這一點，從那時以來這些老爺們已經親身體驗到了。

他們幾個月來對黨團或者黨的執行委員會積下的埋怨情緒，歸結起來，最多也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東西。但是，如果這些老爺樂意去濾出蠅蟲，那也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德國工人為了感激這一點就應當吞下駱駝。¹¹¹

總之，他們收割的，正是他們種下的。且不談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的內容，他們在發動這整個運動時，是那樣幼稚、那樣天真而自

我陶醉地對待自身的重要性，對待黨的狀況和黨內存在的一些觀點，以至於結局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但愿這些老爺們堅決接受這個經驗教訓。他們之中有的人曾經寫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東西。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本來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如果他們不是那麼深信他們目前所達到的發展階段是完美無缺的話。應該讓他們懂得：他們那種本來還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檢查的“學院式教育”，並沒有給予他們一種軍官官銜和在黨內取得相應職位的權利；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應該從當兵做起；要在黨內擔任負責的職務，僅僅有寫作才能或理論知識，甚至二者全都具備，都是不夠的；要擔任領導職務，還需要熟悉黨的鬥爭條件，掌握這種鬥爭的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最後還必須自願地把自己列入戰士的行列中——一句話，他們這些受過“學院式教育”的人，總的說來，應該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於倫敦

載於1890年9月13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7號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報”第214號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會民主黨人報”，並根據“柏林人民報”校對過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¹¹²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1890年9月)¹¹³,比利时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了工联出席将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当时并没有确定。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末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他们有单独邀请权的唯一的代表大会。而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将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信任受骗了,1891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动¹¹⁴,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那末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他们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

的代表大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蠢事而把他们碰回去的话；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可能派是不会做的。

既成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使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委托给了两个全国委员会——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全国委员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这是使什么都做不成的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¹¹⁵以后那样，不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范围，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想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大会，而置与他们同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只是得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严地责备比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托，几乎是责成他们不要太就字面来了解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使自己陷于寸步难行，而我们的竞争者却能继续活动的境地。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毫无疑问，将要作出种种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也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生这种“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被公认为制造分裂的人始终是工人心目中的罪人。因此，如果在1891

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們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們身上。

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尝试是要做的，而且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末我們是否应当消极等待呢？那时我們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即在最后关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們提出布满明显圈套（我們很清楚知道这些圈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广大群众不能看穿其中的毒计，然而这又是我們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們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們因过于固执而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责任！

总之，我們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已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們要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①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們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們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指靠：（1）法国集体主义派¹¹⁶和布朗基主义者（而且后者的人数由于大批转入布朗热主义者阵营而减少了），（2）德国人，（3）奥地利人，（4）西班牙社会主义者，（5）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¹¹⁷，（6）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威人，（7）瑞士人，（8）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們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1）法国的可能派；（2）代表人数可能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利用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高涨为自己服务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3）比利时人；（4）荷

^① 以下到“我們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前的六段在手稿中用垂直线划掉。——編者注

兰人；(5)巴塞罗纳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6)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代表；(7)意大利人；(8)占丹麦所有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改良派”，他们大概还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几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1889年更庞大得多的队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末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这些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毫无作为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我们拥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加之，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至今还在使用的毫无作为的办法，那末，分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大会的人数再一次受到损失。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分裂“丑事”而不得不至今抱中立态度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而壮大起来；联合有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易于接受知识的优秀分子的英国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独裁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能够在其中起显著作用的代表大会（可能派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而首先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做到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末，作为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他们决不是可能派。

我們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 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 1889 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們的委托；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必須确定。

(2) 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規章、議程和決議对它來說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例的限制而自行規定自己的規章、代表資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議程。任何一个委员会，不論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关于合并問題的談判期間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約束。

(3) 各工人組織选派代表的条件和名額都要事先規定好（最好提出一定的建議，但提出建議不是我的事情）。

(4) 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員应予規定）拟出关于規章、代表資格审查方式和議程的建議，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写于 1890 年 9 月 9 日和 15 日之間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6 年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部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給“社会民主党人报” 讀者的告別信¹¹⁸

請允許我也向讀者告別。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經时常向其他政党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 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肯定会变，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讀者都会变。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篇幅、而且只有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的面貌的。它应当像它原来的那样，否則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們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們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必然会造成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論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來說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損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來說，特別是对我來說，这却是一个絕对的損失。

我生平曾經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們說話的人。

第一次是 1848 年到 1849 年为“新萊茵报”¹¹⁹ 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在維登代表大会上重新恢复了党，此后党又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非法的，开始了斗争。¹²⁰“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既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也不存在帝国刑法典和普魯士邦法。“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法律，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訂戶的手里，差不多像期票一样准；任何一个斯蒂凡也不能阻止德意志帝国邮局把它分送到收件人手里。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訂戶；如果说资产阶级讀者在 1848 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末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訂戶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 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地一刻不停地进行，我这个年老的革命者的心里常常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报纸也是值得为推销它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的。这无疑对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

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闡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則，編輯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們的資產階級报刊籠罩着一片死寂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反映出我們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謀詭計作斗争时的那种生动幽默。

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 1885 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贊成航运津貼的时候，該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見，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現在連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該报采取这个方針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繼續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時間內編輯部得到了德国國內外的黨員同志們的有力支持。4 月 2 日宣布禁令，而在 4 月 2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編輯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¹²¹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領受了一下备受贊揚的瑞士避难权。¹²² 正如 1830 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了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在这方面沒有任何新鮮的东西。自从 1830 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許这个小共和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即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做出让步。这不当責怪它。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說，今天沒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現在終于是停止胡說什么在“自由瑞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經過十二年的斗争，党获

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經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經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們；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視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們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現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們，因此我們也試圖利用我們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爭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綱領，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設法暫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們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須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其他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們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則，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街垒，訴諸武力嗎？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滿足。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力量的認識，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給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給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們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給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則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軍队的情况下

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結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領的一切重要障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經受住了考驗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們这一点提出异議，“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現。为这种情况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頓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下一次德意志帝国一定撑不住十二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90年9月12日和18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我的一位朋友寄給我一份 9 月 16 日的馬格德堡的“人民呼聲報”¹²³。這份報紙刊登了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既然恩格斯現在把我們反對派叫做‘大學生騷動’，那末我就要請他指出，我們在什麼地方堅持過同他自己的和馬克思本人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如果說我把我們的議會社會民主派描寫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資產階級的，那就請恩格斯只要看一看他本人 1887 年在自己的著作‘論住宅問題’的序言中寫的什麼好了。”

我同德國作家們的交往多年來不斷使我得到許多極其離奇的經驗。但是看來，這種交往注定還要變得更加開心。看，我必須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們”在什麼地方堅持過不同的觀點云云。至於說“我們”，即前不久曾經那樣趾高氣揚地登場又那樣垂頭喪氣地退場的那個被我叫做文學家和大學生騷動的“反對派”，那末可以簡單地回答說：幾乎在他們發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於說恩斯特先生本人，我認為沒有必要還要就這個問題同他談什麼。我在四個月之前就已經對他談過了，可是現在，不論願意與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這次《ernst》^① 的通信來打擾讀者。

① 雙關語：Ernst [恩斯特]是姓，《ernst》是“鄭重的”。——編者注

今年5月31日，恩斯特先生从格尔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¹²⁴，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三两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6月5日回答他说，我不能参与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而且我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写道：

“至于说您试图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问题，那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这一个范畴里，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仅仅在自己的祖国法兰西才激起了这样大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却制定了一部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最近二十年来，挪威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的文学繁荣。不管他们是不是小市民，但是这些人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创作的多得多，而且还给其他国

家的文学打上了他們的印記，对德国文学也毫不例外。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們必須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点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許会发现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頑强，它給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我們的工人阶级才最終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框框。德国工人是最坏的‘沒有祖国’的人，恰好是从他們已經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这个意义上說的。

可見，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夸张到了极点的可笑模仿，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可笑模仿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资产者絕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相反，在挪威，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間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紀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紀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这里，談不上由于巨大运动的失败和某个延續三十年的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絕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总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現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但是对于資本积聚的最强

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来说，这里还没有它的地位。而且海上贸易的猛力扩展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当其他各地都是輪船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占世界上第二位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 1720 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在这种停滞状况下也开始了运动，而且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正像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一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因而比起蜕化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它们还是反映出—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性格和首创精神，并且是行动独立的，虽然有时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奇怪。这类东西，在我对它们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先彻底研究—一下的。”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的那篇文章里。如果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①。接着我通过他自己引用的一个例子，即通过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按照德国的样子来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这个国家来，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在事先而且也是针对他本人说明了

① 見本卷第 81 頁。——編者注

我为什么責备这些老爷“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①。

而現在請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經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貨”来对待的純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带着美德被侮辱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說什么我必須向他指出——“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緒的两个阶段。起初他勇敢而自信地冲过来，似乎在这里除了空洞的喧嚷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們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急忙声明說，他什么也沒有說，并且抱怨別人輕蔑地和侮辱地对待他的純洁的感情。被侮辱的美德是在他給我的信中，在那里他抱怨巴尔先生“极端蛮横地对待了他”！被侮辱的純朴是在他給我的答复中，在那里他最天真地质問：“在什么地方？”然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这一点了。被誤解的善良的心灵是在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上，在那里他也质問曾經理所当然地訓斥过他的老布雷梅尔：“在什么地方？”

我叹息着問：在什么地方？

我总是要問：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希望知道还“在什么地方？”——那末，譬如說，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論壇”上的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危險”的文章中，¹²⁵ 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謬論断，說什么在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絲毫沒有(正是創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說什么經濟关系(但是它們

^① 見本卷第 81 頁。——編者注

本身就是人創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馬克思理論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論本身混为一談,让別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被許可不再回答以后提出的“在什么地方?”这种問題。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它們終於有了个尽头的时候,他却宣布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这时我們这些人就再也忍不住了,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哪怕能有片刻筋疲力竭的时候也好。

其次,恩斯特先生写道:

“如果說我把我們的議會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資产階級的,那就請恩格斯”云云。

一部分是非常小資产階級的?在那篇发表于“薩克森工人报”上并迫使我提出反駁的文章^①中說,小資产階級議會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我說,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現在恩斯特先生想只提出这样的論断:党团似乎只有“一部分”是非常小資产階級的。又是被誤解的善良的心灵,凶恶的人們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在这个善良的心灵上。但是什么时候曾有人不同意不仅在党团的成員中而且在整个党内也有小資产階級派別的代表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至于說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按其性质來說是小資产階級的,这却是事物的本性。如果全部問題仅在于此,那末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的什么呢?我們不得不注意这个老問題已經許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資产階級在党团里、尤其在党里占多数

^① 見本卷第 80—82 頁。——編者注

还是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誰也不会去等待这些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但是到今天为止，无产阶级反对非常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¹²⁶以及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在愈来愈使这个小资产阶级因素失掉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则在日益强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党团并不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当做破烂废物扔掉，而更危险得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偏见地衡量现实事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想强迫党接受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生和太斯特勒尔先生公开表示，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示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十二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场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了。但愿这一点也能帮助保尔·恩斯特先生了解，为什么我竭力反对把我同属于这类集团的分子混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0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0月5日
“柏林人民报”第2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致“柏林人民报”編輯部

当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有这样多真挚的关怀，这样多意想不到的荣誉落到我的身上，我很遗憾不可能对这些祝贺一一亲自作答。电报、信件、礼物、党的报刊上专门为我写的文章真是如雪片飞来——所有这些祝贺来自各个国家，尤其是来自德国各地。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 11 月 28 日如此关怀地想念到我的老朋友們和新朋友們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没有誰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許約，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給予我的荣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2 月 2 日于伦敦

載于 1890 年 12 月 5 日
“柏林人民报”第 28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柏林人民报”

LE SOCIALISTE

ORGANE CENTRAL DU PARTI OUVRIER

ABONNEMENTS
3 mois 1 fr. 50, 6 mois 3 fr., un an 6 fr.
10 CENT. le NUMERO

TOUT CE QUI CONCERNE LA RÉDACTION DOIT ÊTRE ADRESSÉ
AU SECRÉTAIRE du CONSEIL NATIONAL
PARIS — 14, AVENUE DE MONTSOURIS, 14 — PARIS

ADMINISTRATION
99, RUE MONTORGUEIL, 99
PARIS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¹²⁷

公民們：

我衷心地感謝你們在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对我的祝賀。

請你們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將獻給為無產階級事業而進行的鬥爭。讓我在我不能進行鬥爭的時候再死去吧。

但是，你們，以及我們在德國、英國、奧匈帝國、俄國——總之，在一切地方的弟兄們所打的勝仗，構成一系列如此輝煌的勝利，這些勝利足以使比我更老朽衰弱的人也變得年輕起來。而最使我高興的是法國無產者和德國無產者不顧我們的腐化的資產者的沙文主義嚎叫而建立起來的（我希望是永久地建立起來的）真誠的兄弟般的團結。

你們的偉大的同胞聖西門曾經第一個預見到，三個強大的西方國家——法國、英國、德國——的同盟是整個歐洲的政治和社會解放的第一個國際條件。¹²⁸ 我希望還能看到，這一同盟——將永遠結束政府之間和王朝之間的戰爭的未來歐洲同盟的核心——將

为三个国家的无产者所实现。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2月2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2月25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1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NÉPSZAVA.

TÁRSADALMI ÉS KÖZGAZDASÁGI NÉPLAP.

A MAGYARORSZÁGI ÁLTALÁNOS MUNKÁSPÁRT KÖZPONTI KÖZLÖNYE.

Szerkesztőség és kiadóhivatal:
VII. ker. külső Dob-utca 52.
Előfizetési-díjak és hirdetések ide köldendők.

Megjelen minden vasárnap.
Egyes példány ára 5 kr.

Előfizetési-díj: Egyre évre 3 forint 60 kr., fél évre 1 forint 90 kr., negyedévre 60 kr., egy hónap 30 kr.
Hirdetési-díjak tagozatosok részben postaküldeményként közzétehetőek.

致“工人紀事周报”和 “人民言論”編輯部¹²⁹

(布达佩斯)

1890年12月3日于伦敦

請允許我向你們表示我最真誠的謝意，感謝你們在11月26日的來信里對我七十歲生日的祝賀。

我深知：你們和其他許多人在這一天給予我的榮譽的絕大部分，只是由於我是馬克思的代表，比馬克思活得更久，才落到我的身上，因此，請允許我把它作為榮譽的花環奉獻在馬克思的墓前。我為了今後無愧於他而能做的一切，我都將做到——這點你們可以相信。

衷心感謝你們盛情地邀請我參加匈牙利黨代表大會¹³⁰。我不可能親身赴邀，但在12月7日和8日我的心將同你們在一起。

匈牙利社會民主工黨的存在再一次證明，現代大工業要在任何國家確立，都不能不使舊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革命化，不能不在產生資本家階級的同時產生無產階級，並且產生它們之間的階

級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在匈牙利,如我从你们盛情寄给我的“工人紀事周报”上看到的,这个工人政党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从一开始它就是国际主义的政党,在它的队伍里联合着马扎尔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我请你们向这个年轻的党转达我对它的代表大会的最良好的祝愿。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1890年12月14日“工人紀事周报”第50号,并用匈牙利文載于1890年12月14日“人民言論”第5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紀事周报”



Br. 18.

IX. Jahrgang, I. Band

1890-91.

卡·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序言¹³¹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綱領草案的批判以及給白拉克的附信——曾于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¹³² 召开以前不久送給白拉克，請他轉給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¹³³ 已把关于哥达綱領的討論提上了党的議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討論的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隱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馬克思对拉薩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針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薩尔的經济学原則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綱領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銳性，用来表述得出

的結論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見怪了。道地的拉薩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殘余存在着，而哥达綱領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創造者們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內容沒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針對个别人的尖銳的詞句和評語刪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綱領草案中所表現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特別憤慨。第二，我們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¹³⁴閉幕才两年，——他們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們；因而我們不得不預料，他們也会誣指我們是这个綱領的秘密創作者。这些顾虑現在已經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緣故，有些語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較緩和的說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載于1890—1891年“新时代”
杂志第1卷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时代”杂志

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

关于所謂捏造引文問題。事情的經過和文件¹³⁵

写于 1890 年 12 月—1891 年 2 月

載于 1891 年在汉堡出版的小册子：
弗·恩格斯“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
思。关于所謂捏造引文問題。事情
的經過和文件”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 1891 年版本譯的

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¹³⁶里，我曾經認為有必要回溯一場反對馬克思的論戰，這場論戰是由一個匿名作者於1872年在柏林“協和”雜誌¹³⁷上首先發動的，後來劍橋的塞德萊·泰勒先生又於1883年在“泰晤士報”上將它重新挑起。這位匿名作者——泰勒先生已經揭露，這位匿名作者就是路約·布倫坦諾先生——當時控告馬克思捏造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書所附的文件中，編號第12號^①）里對這個問題所做的簡短說明，根本不打算取悅布倫坦諾先生；他要答复我是十分自然的。他果然在一本小冊子——路約·布倫坦諾“我和卡爾·馬克思的論戰。兼論工人階級的進步及其原因問題”。柏林，瓦爾特和阿波蘭特書店，1890年¹³⁸——中這樣做了。

這本小冊子提供給我們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說它提供得太多，是因為它“兼”而詳細地敘述了布倫坦諾先生對“工人階級的進步及其原因”的看法。這些看法和爭論的目標根本沒有關係。我只須指出一點：布倫坦諾先生經常反復談論的所謂工人勞動保護法以及工會組織有助於工人階級狀況的改善，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發明。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從“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

① 見本卷第197—203頁。——編者注

“哲学的貧困”起，到“資本論”和我最近的著作止，对此曾談过几百遍，不过，我們在談到这一点时作了很多的保留。¹³⁹ 第一，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市場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滯和危机时期，它們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諾先生断言“它們能克服后备軍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使人好笑的夸张。第二，——其他次要的限制更不必說了——無論劳动保护法，無論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資本主义关系，这种資本主义关系始終不断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佣工人階級之間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終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沟，随着現代大工业的逐漸占有一切生产部門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寬。但是，由于布伦坦諾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滿意足的雇佣奴隶，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們用簡單的事实就能駁斥这些夸大，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說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在这次論战的文件中它只提到了那些直接来源于布伦坦諾先生和馬克思的文件，而根本沒有談到后来出現的有关这个問題的文件。为了使讀者自己能对这一切作出总的判断，我在附录中收入了：（1）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和“資本論”中被指控的地方；（2）布伦坦諾先生和馬克思之間的論战；（3）塞德萊·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馬克思之間的論战；（4）我为“資本論”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諾先生对此所作的反駁；（5）与格萊斯頓給布伦坦諾先生的信有关的材料。自然，我同时也从布伦坦諾的議論中刪去了那些与捏造引文問題无关，而只是“論进步問題”等等的地方。

在 1872 年 3 月 7 日柏林“协和”杂志第 10 期上，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对 1864 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¹⁴⁰的作者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据说，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頓的 1863 年 4 月 16 日預算演說中引来的一句話。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地方載于附录，文件第 1 号^①。“协和”杂志的文章也載于附录，文件第 3 号^②。在后面这个文件中，控告是这样提出的：

“这篇演說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頓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 150 英鎊和 150 英鎊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 150 英鎊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繳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頓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限定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样一句話强加給格莱斯頓。但是在格莱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没有这句話。他在演說中說的和这句話正好相反。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話！”

这就是匿名作者（現在已經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約·布伦坦諾）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應該說是唯一的控告。

马克思于 1872 年 5 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 10 期。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几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

① 見本卷第 155—156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160—161 頁。——編者注

的机关刊物”。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辯¹⁴¹（文件第4号^①）中指出，这句话不仅在1870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評論”上引用¹⁴²，而且还在成立宣言出現之前就被引用在1864年伦敦出版的“兌換論”¹⁴³一书中，最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像他所引用的那样包含着这句话：“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②，完全限于有产階級”。¹⁴⁴ 如果說“汉薩德”中沒有这句话¹⁴⁵（此話出自英国财政大臣之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是因为格萊斯頓非常明智地按照英国議会的传统慣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关于格萊斯頓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說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这句话所謂增添的話。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萊斯頓先生的机关报。

像紫罗兰那样在背蔭处开花的布伦坦諾先生又怎样回答呢？（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文件第5号^③）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发言时永远不会有勇气，重复他的控告，說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說，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駁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是真正毁灭性的”。

这个确凿的证据无非就是“汉薩德”中那个沒有这句话的地

① 見本卷第162—166頁。——編者注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內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③ 見本卷第166—171頁。——編者注

方。因此，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薩德”上没有的倒霉的話本身說来可能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掩盖这样一个极不愉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話，如“泰晤士报”的报道所表明的，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而我們的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对控告說来，这一确凿的证据已經几乎是“无法駁倒的”，而且日后可能成为“真正毁灭性的”，所以他拚命地向比斯利和“兌換論”所引的引文进攻，千方百計地把問題弄模糊，断言似乎比斯利引用时所根据的是成立宣言，而馬克思所根据的是“兌換論”，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們也絲毫不能說明这句话是格萊斯頓讲的还是馬克思臆造出来的这个問題。而这些問題，就它們的性质而論，布伦坦諾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論，我現在也不能下定論。这些东西不过是要用来轉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泰晤士报”那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談論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一些罵人的字眼来支持自己，什么“近乎犯罪的輕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地說道：

“不过，这里我們又看到馬克思的第三个辯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謊而論它远远超过了已經举出过的一切。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从第 7 版第 5 版〈应为栏〉第 17 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說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說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階級。”

所以，对于馬克思的“无耻地撒謊”真要感到惊奇了，他竟然还

敢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财富等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The augmentation there described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关于这一点，甚至布伦坦諾先生到现在也没有匿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就是上文所说的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于是，布伦坦諾先生在他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那句所谓馬克思增添的话（因为“汉薩德”中没有这句话），从而证明了他自己正是像他给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以后，得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薩德”的〉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薩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的东西，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萊斯頓也說，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萊斯頓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萊斯頓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說，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 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

那就不是同一件事。

馬克思引证格萊斯頓的話：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是“增添”，这是“完全是捏造的”“声名狼藉的地方”。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萊斯頓的話：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即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就不过是比沒有这句话的“汉薩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比較扼要”，并且“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也就是同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而当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作证明时，布伦坦諾先生說：

“最后他甚至还厚顏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說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顏无耻”。而馬克思的額头無論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別的地方^①。

匿名作者，即路約·布伦坦諾，以一种确实与馬克思的迥然不同的“厚顏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萊斯頓說，“他认为，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階級”。而事实上，無論根据“泰晤士报”或“汉薩德”，格萊斯頓都說，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的話”，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說，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有产階級”。

最后，高尚的匿名作者憤怒地指出：“的确，要評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詞（見“資本論”第257頁）：簡直‘无耻’。”

誰的行为，路約·布伦坦諾先生？

^① 双关語：《Stirne》是“額头”的意思；轉意是：“厚顏无耻”。——編者注

二

馬克思在他的答辯（1872年8月7日“人民國家報”，文件第6号^①）中過於忠厚了，他認真地仔細分析了布伦坦諾先生關於比斯利教授、“兌換論”等等的一大堆廢話；我們撇開這些次要問題不談。但是在結尾的地方，馬克思還引用了兩件對主要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實。除了“泰晤士報”的報道外，另外兩家倫敦的晨報在1863年4月17日的報道中也有這個“增添”的地方。根據“晨星報”¹⁴⁶，格萊斯頓說：

“這種增長”，——剛剛被描述為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是這樣一種增長，它完全限於占有財產的階級。”

根據“晨報”¹⁴⁷：

“上面所說的”——剛剛被說成是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增長是一種完全限於占有財產的階級的增長。”

對於其他任何一個對手說來，這個證據都會是“真正毀滅性的”。但是對於匿名的布伦坦諾說來卻不然。表明了同樣程度的厚顏無恥的布伦坦諾的答復（1872年8月22日“協和”雜誌，文件第7号^②），馬克思從未見過，因為在7月11日以後他就沒有再收到“協和”雜誌。我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諾的翻印本（“我和……的論戰”1890年版）中才讀到這一答復¹⁴⁸，因此在這裡不能不談談它。

① 見本卷第172—181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81—185頁。——編者注

“他〈馬克思〉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頑固的撒謊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現存制度計劃的人也会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薩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諾先生下此断語时的武断，較之他突然向我們讲下面一段話时的“厚顏无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馬克思在他的德譯文中干脆删掉了这一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結論是，格萊斯頓只是說，根据所得稅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財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階級**，因为工人階級免繳所得稅；因此根据所得稅的材料絲毫不能看出工人階級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說，工人階級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財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說，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階級，那也和包含同样內容的那句“增添”的話相反。至于“干脆删掉了的附句”，只要布伦坦諾先生肯稍微表現一点耐心，它一定会让他得到报答的。在他順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較容易地顛倒黑白了。既然他已經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用太担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馬克思的〉轉述来看也是为我們說話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萊斯頓說，他不认为〈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諾这样断言〉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階級，并且还說：‘**財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說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財產的階級的增长。**’‘注意到’一語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說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稅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說法〈原話如此！〉。”

发明 *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这一規則的耶穌会教徒，与匿名的布伦坦

諾相比不过是小學生。当“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晨报”一致声明，布伦坦諾断言馬克思“增添”的那句話实际上格萊斯頓說过的时候，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諾先生說話，当馬克思一字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話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撒謊”，“完全是捏造的”，“謊言”，等等。而当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时候，我們这位名叫路約·布伦坦諾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簡直无耻”。

但是，只要把1863年4月17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个地方的报道都列举出来，就可以彻底駁倒“增添”的說法。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們已經援引过了。

“每日电訊”¹⁴⁹：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說，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階級的話。財富問題的这一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階級的增长。**”

“先驅晨报”¹⁵⁰：

“我可以說，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財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階級的話。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財富的这样巨大增长**，完全限于資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貧民階級。”

“晨邮报”¹⁵¹：

“我可以說，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財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階級的話。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財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資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貧民階級福利的增进。”

“每日新聞”¹⁵²：

“我可以說，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財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階級的話。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財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資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貧民階級福利的增进。”

“旗帜报”153。

“我可以說，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財富的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階級的話。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財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完全限于資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貧民階級。”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所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无法駁倒的”。其中四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轉述的这句话和馬克思所“增添”的这句话完全相同。刚刚被描述为**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另外四家报纸——“先驅晨报”、“晨邮报”、“每日新聞”、“旗帜报”——“只是以在形式上比較扼要”的說法轉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語气更强了：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資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駐議会的記者。因此，它們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說，它們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句根本无法隱瞞的話的两种說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人，也有輝格党人和激进派。根据四家报纸，格萊斯頓說：**完全限于有产階級**。根据另外四家报纸，他說：**完全限于資本的增长**。可見，八个难以駁倒的证人都证明，格萊斯頓确实讲过这句话。問題只是，他讲这句话时用的是馬克思所援引的較委婉的說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强語气

的說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薩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但是“汉薩德”是不像这些晨报那样难以駁倒的。“汉薩德”的报道要受检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一般慣例是根据“汉薩德”进行引证。

八个受到信任的证人对一个受到怀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們这位对胜利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晨报的报道都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强加在格萊斯頓身上,正因为如此,它們是在“为”匿名作者說話,它們恰恰正是以此证明馬克思“增添”了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諾的“厚顏无耻”了。

三

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諾先生那种使我們感到触目惊心的厚顏无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增添”的話进行的攻击遭到了失敗,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障地。他已經找到了这样的障地;現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障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諾先生在他給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①)中,就已經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增添”的地方,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的問題。因为,既然这篇报道和“汉薩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它說的就“同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地方。因此,重要的已經不是“声名狼藉的地方”的本文,而是它的意思。現在要做的已經不在于否定这个地方本身,而在于肯定它的意思和它所說的正好相反。

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辯中說,由于沒有時間,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②,此后,这位匿名对手就更加武断地在这个不太純洁的題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第二篇反駁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7号^③轉載在这里。

① 見本卷第166—171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81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181—185頁。——編者注

他断言，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薩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富裕階級]^① 一語的不正确的譯文。这一点，作为十分次要的东西，我撇开不談，——众所周知，馬克思对英語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諾先生完全不同的。但是格萊斯頓先生当时用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者說，他是否真的想到什么，——这一点，在已經过了二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大概連他自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一个“附句”。这个地方已經全部援引在前面第 2 章第 7 頁上^②。馬克思删掉附句，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讀者掩盖这一事实：从所得稅的材料可以看到的財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階級，是因为工人階級免繳所得稅；从这些材料中絲毫不能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由此不应得出結論說，工人階級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財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布伦坦諾先生自己翻譯的“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句话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財產的階級。”

被馬克思別有用心地“删掉”的附句，是由以下这些詞构成的：“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

馬克思两次——因而也就是頑固地——删掉这些非常重要的詞，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讀者隱瞞：这种增长仅仅是應該課所得稅的收入的增长，換句話說，就是“占有財產的階級的”收入的增长。

① 馬克思关于这个譯名的意見，見本卷第 164 頁和第 176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117 頁。——編者注

布伦坦諾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責別人“撒謊”而义憤填膺，从而弄得双目失明了？或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說就怎样說，因为反正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無論在成立宣言或“資本論”中，馬克思都是以这些話开始的：“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 (the taxable income) 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內，如……則增加了……”^①

除了應該課所得稅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諾先生是否知道在英国还有别的什么“應該課稅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附句”給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談的正是應該課所得稅的收入，增添了什么东西？也許(看来的确是这样)布伦坦諾持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引证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人不像布伦坦諾那样大作一通关于英国所得稅的讲演，并在所得稅方面进行“捏造”，就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文件第6号)^②，也就像布伦坦諾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文件第7号)^③，那末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就是“被捏造了”，就是給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它里面“删掉”了某种东西？如果在“增添”的話中只是說，格萊斯頓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于有产階級，那末，难道那里在实质上不是談的同样的东西？——要知道只有有产階級才繳所得稅。可是，布伦坦諾先生当然是一面在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大吵大鬧，說什么这是馬克思的捏造，是无耻地撒謊，而同时他自己却从后門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布伦坦諾十分清楚，馬克思援引的格萊斯頓的話，所談的是

① 見本卷第156頁和第157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75—176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185頁。——編者注

“應該課稅的收入”，而不是別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篇控告（文件第3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 taxable 一詞譯为“應該課稅的”^①。如果布伦坦諾現在在自己的第二篇反駁中“刪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天起直到他1890年出版小册子，一直反复地断言，馬克思故意地別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即格萊斯頓在这里談的只是應該課所得稅的收入，那末，我們岂不是應該把“撒謊”、“捏造”、“无耻地撒謊”、“簡直无耻”等等这些他自己的用語奉还給他嗎？

我們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薩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話，在这些話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萊斯頓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馬克思在他給匿名的布伦坦諾的第二篇答辯^②中证明，他没有“增添”“声名狼藉的”話，接着他駁斥了匿名者的这样一个蛮橫的論断，即在作为唯一的爭論目标的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薩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一有爭論的句子，而后者則将它完全刪掉了。格萊斯頓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这和这个唯一的爭論点是毫不相干的。

相反，在成立宣言中，——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諾据以提出捏造引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在第4頁上^③，就在“声名狼藉的”話上面几行，直接談到，財政大臣（格萊斯頓）在自由貿易的千年王

① 見本卷第160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62—166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156頁。——編者注

国时期在下院宣称：

“大不列顛工人的一般狀況已經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絕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諾說馬克思別有用心地掩盖起來的話。

在整个論战中，从 1872 年給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 5 号^①）起，至 1890 年“我和……的論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止，布伦坦諾先生——以一种我們当然絕对不敢称之为“无耻地撒謊”的巧妙手法——閉口不談这一事实，即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切地引用了格萊斯頓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沒有先例的改善的郑重声明。而在布伦坦諾的第二篇反駁中，——如上所述，这篇反駁，馬克思直到去世时还不知道，而我也是直到 1890 年“我和……的論战”小册子出版之后才知道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只是作为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实际上已被抛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认，增添的句子确实属于格萊斯頓，而且断言，它是“为我們說話的”，即为布伦坦諾說話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駁中，布伦坦諾向新的防綫退却了，說什么馬克思閹割了和歪曲了格萊斯頓的演說；說什么馬克思强迫格萊斯頓說，富人的財富大大地增长了，而穷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穷了，而格萊斯頓却明确地說道，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沒有先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中，恰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萊斯頓的这些話，这第二道防綫又被突破了。而布伦坦諾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讀者〈“协和”杂志的讀者〉是无法監督他的！”

^① 見本卷第 166—171 頁。——編者注

至于格萊斯頓实际上說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們还要多少談一談。

最后，觉得自己很安全的布伦坦諾——第一，因为他是匿名的，第二，因为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小小的愉快：

“如果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罵，那末我們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自己軟弱无能的謾罵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罵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辯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讀者自己去判断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辯中究竟怎样“破口大罵”吧。至于布伦坦諾先生，那末我們已經展覽过他那文雅之詞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馬克思头上的諸如“謊言”、“无耻地撒謊”、“假引文”、“簡直无耻”等等，無論如何是一种有教益的“承认軟弱无能”，是布伦坦諾先生已經“用尽了其他一切辯护手段”的正确无誤的标志。

四

我們的堂皇演出的第一幕就这样結束了。神秘的（如果說还不是樞密官的）布伦坦諾，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希望做到的事。誠然，他在所謂“增添”的話上面沒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經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防御障地，并且在这个障地上保有最后一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教授們总是愛說，障地还在他手里。于是，他就可以吹噓，——至少在同他一类的人的面前，——他胜利地打退了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經在文字方面将馬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馬克思对于他已在“协和”杂志上被打死的事，却一个字也不知道；相反，他还“厚顏无耻地”繼續活了十一年，而且这十一年是他的成就愈来愈大的十一年，他在各国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十一年，他的功績愈来愈得到普遍承认的十一年。

布伦坦諾及其同伙，聪明地不让被蒙蔽的馬克思看到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或者向他說明他早已死去。但是当 1883 年他真的去世时，他們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們的手已經痒得耐煩了。于是，塞德萊·泰勒带着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 8 号^①）登場了。

如果說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諾事先並沒有和艾米尔·

^① 見本卷第 186—187 頁。——編者注

德·拉弗勒商量好（看来的确如此），那末泰勒的登場实在太冒失了。他用一种說明他显然意識到自己的事情毫无希望的装腔作勢的語調說，使他“特別惊异的是，布伦坦諾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馬克思的〉这种 mala fides [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諾的巧妙攻击，吹嘘有瀆神之罪的馬克思接着所作的垂死掙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們的讀者已經看到了。处于垂死掙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諾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語。

最后，我們再引用下面一段話：

“当布伦坦諾通过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薩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絕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給格萊斯頓的話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进行論战！”

所謂“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布伦坦諾引证的只是“汉薩德”。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薩德”中所沒有的那个爭論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諾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比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薩德”的报道完全一致，证明似乎馬克思所“增添”的話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沒有登載，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載着這句話；或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載着這句話，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說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叫做“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

其次，說什么在这之后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避免繼續进行爭論，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萊·泰勒先生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我們看到，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諾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也确确实实同样地載有

那句“增添”的話。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時間花費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馬克思后来的論战（文件第9、10和11号^①）首先证明，塞德萊·泰勒先生片刻也沒有坚持过原来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說，这“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这又是对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們得悉他已經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我們对他的朋友布伦坦諾表示祝賀。

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布伦坦諾先生在第二道防綫上提出的控告，說什么馬克思企图歪曲格萊斯頓演說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們引入完全不同的領域。起初問題是关于一个事实：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句话？現在誰都不否认，这一控告已为馬克思胜利地駁倒。但是关于歪曲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却把我們引入主观意見的領域，而主观意見必然是各不相同的。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的，——就其本身說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說来，——別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滿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滿意，社会党人則永远既不会使他們中的任何一个滿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滿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話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刪去了决定講話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見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誰也不

^① 見本卷第187—196頁。——編者注

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諾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馬克思提出这一控告，那末馬克思也許会认为連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萊·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轉折，他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諾。他背弃布伦坦諾的第一点是，他抛弃了他的原来的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告，甚至否认这一原来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背弃布伦坦諾的其次一点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謬誤的“汉薩德”弃置一旁，——引证时以“汉薩德”作为唯一的根据，乃是高尙的布伦坦諾的“慣例”，——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那种用同一位布伦坦諾的話来說是“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諾，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給“泰晤士报”的信的是，他不是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資本論”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見过他竟有“勇气”在給“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他和爱琳娜·馬克思爭論之后，立即到英国博物館^①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紹給自己的对手，他問她能否給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給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經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說，对爱琳娜·馬克思的第二篇答辯（文件第 11 号^②）哪怕添一个字，都是完全多余的。

① 英国博物館的图书馆。——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192—196 頁。——編者注

五

第三幕。文件第 12 号^①，即从我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說明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須回溯同布伦坦諾先生和塞德萊·泰勒很久以前进行的論战。这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諾作了答复。答复載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路約·布伦坦諾著，柏林，1890 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轉載了“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轉載了“人民国家报”上的馬克思的答辯，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們不能不談談。

首先我們查明，这里也不再談“增添”句子的問題了。在第一頁上援引了成立宣言上的句子，接着声明，格萊斯頓“和卡尔·馬克思的断言正好相反，他說”，这些数字只和繳納所得稅的人有关（格萊斯頓的这些话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该課稅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沒有先例的改善（格萊斯頓的这些话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所爭論的引文上面九行）。我建議讀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 1 号）和布伦坦諾先生的論断（文件第 13 号）^② 做一比較，看看布伦坦諾先生怎样在根本沒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敗了，布伦坦諾先生

① 見本卷第 197—203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155—156 頁和第 203—206 頁。——編者注

不得不违背事实，力图使自己的讀者相信，馬克思想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格萊斯頓在这里只是談的“應該課稅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階級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諾先生甚至沒有发觉，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控告就轉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与第一个控告直接相反。

在他順利地安排好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須請“协和”杂志注意所謂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議他写一篇文章来反駁馬克思。接下去的話非常精彩，必須逐字逐句地轉抄如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據編輯部为了它的報紙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馬克思先前挑起的論战之后，他很可能会对自已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許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編輯部希望布伦坦諾先生“为了它的報紙的声誉”而隱瞞自己的名字！布伦坦諾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声望啊！我們愿意相信，他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揚，这倒是这位先生真正伟大的地方。不过，这是他的事情和“协和”編輯部的事情。

因为“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許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一个人是誰，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秘密。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報紙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諾先生給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煩。他自己动手放肆地“攻击”起来，开始是用黑体字刊登关于“增添”的控告，后来是控告“无耻地撒謊”，“簡直无耻”，等

等。布伦坦諾先生——沒有匿名的——看来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誤。不是要让众所周知的馬克思能够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諾“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要让隱藏起来的布伦坦諾能够对众所周知的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諾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應該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樣，不过并不是按照布伦坦諾先生的愿望。不論是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現在的我，我們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論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但是我們在这方面的成就——無論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牲布伦坦諾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無論說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說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許人”的布伦坦諾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現在事后想迴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說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諢式的論战中的粗魯話”。伏尔泰、博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的辛辣的論战著作，都曾被他們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級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諢式的論战中的粗魯話”，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魯話”成为現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們从“丑角插科打諢式的論战”的这些样品和其他样品中得到了这样多的享受，以致整整一百个布伦坦諾也不能把我們吸引到那种充滿由虛弱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怨恨和极端絕望的苦悶的德国大学式的論战中去。

可是布伦坦諾先生以为，他已經重新說服了自己的讀者，以致現在可以放肆地請他們大吸鼻烟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載有和速記記錄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

〈格萊斯頓的〉演說的报道的时候，他〈馬克思〉就如‘协和’杂志編輯部所描写的，像墨魚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渾，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說，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爭論的目标模糊起来。”

如果說一字不差地包含着“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和“速記”记录，即完全删掉这句话的“汉薩德”，意思彼此一致，如果說布伦坦諾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末这除了說明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抛弃，說明被迫从进攻轉入防守的布伦坦諾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綫退却，还能說明什么呢？我們只肯定一点：我們认为，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連这第二道防綫，我們也已經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在这里，真正的大學的論战家出場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驕傲的布伦坦諾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墨魚那样行动起来，把水弄渾，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爭論的目标模糊起来。

耶穌会教徒常說：Si fecisti, nega. 如果你做了某件事，你就否认。德国大学的論战家走得更远，他說：如果你像恶訟师那样做了一件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馬克思刚一引证“兌換論”和比斯利教授的話，——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爭論的地方，——墨魚布伦坦諾就以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們“吸住”，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致必須聚精会神地細看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才能使真正的“爭論的目标”，即所謂的增添的句子，不致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就«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階級”〕一語的意义和馬克思展开新的爭論，这一爭論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諾

先生迫切希望的“模糊起来”告終，而不可能有什么別的結果。随后他又就出名的附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附句据說是馬克思有意地删掉的，而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間接指出的事实，已經在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萊斯頓演說的話中直接而明确地談过了。第三，我們的墨魚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使用下面这样的論断再次把爭論的目标模糊起来：說什么馬克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时的唯一的爭論点，和所謂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沒有任何关系的句子。

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自我辯护中，我們看見同样地噴射出一股墨水。自然，首先出現的又是“兌換論”。接着，又突然把拉薩尔的“铁的工資規律”噴射出来，虽然誰都知道，馬克思和它的关系就像布伦坦諾先生和发明火药的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諾先生应当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坚决地拒絕了对拉薩尔的任何推論担負任何責任¹⁵⁴，而且，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資規律描写为各种可变变量的函数，描写为具有极大弹性的規律，因而远不是铁的。既然放出了这样的墨水，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什么全都抓来了：哈雷代表大会¹⁵⁵，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格萊斯頓1843年的預算演說，英国工会，——把这一切都抓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諾先生的自我辯护和他的那些受到凶恶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則来抵抗轉入进攻的敌人。可以认为，有整整一大批墨魚在帮助把問題“模糊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諾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句子的論断是一种絕望的胡言乱語，而他又沒有勇气誠实地公开地放弃这一論断。布伦坦諾“如果現在”——用他自己的話来

說——“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即“汉薩德”〉引入了歧途…… 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把它們当做了绝对可信的东西，“不过錯誤至少会糾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相反，为了把問題模糊起来，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說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費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使事情模糊起来的墨水，好让真正的爭論目标显露出来。

可是布伦坦諾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的通知。事实上，人們和他开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以致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还没有使他的心灵从各种悲伤中得到解脱。起初“协和”杂志为了自己报纸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諾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馬克思以自己丑角插科打諢式的論战中的粗魯話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轉載全部論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編輯部經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絕轉載，它說，这种爭論沒有普遍意义。”

这就是品德高尚的人們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們的善良愿望常常由于人們的墮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这位未获公认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們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地轉載全部論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經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編輯部，还需要相当多的時間。

六

布伦坦諾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辯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兌換論”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本书是馬克思写作“資本論”所根据的主要資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談論这一新的噴射墨水的行为。我要談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沒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諾先生，而且也沒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諾先生自然对馬克思怀有无穷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議論它們，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于是为了滿足布伦坦諾先生的要求而做无聊的事。

在那里，在引文的末尾，要求馬克思“复述預算演說的原文”，那只能說是太天真了。而布伦坦諾先生正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证。自然，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須复述演說的全部原文，那未引证任何一篇演說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諾先生向我进攻。据說我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中給所謂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諾先生利用上了，他又用噴射墨水的办法把原来的爭論目标，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話，完全模糊起来；他改用了塞·泰勒先生所援引的“資本論”的一个地方作为目标以代替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話。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馬克思只可能从“兌換論”中借用“假引文”，布伦坦諾先生以几栏并列的形式刊載了“泰晤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資本論”中的

引文。这第二个附录也轉載在本书中，——文件第 14 号^b①。

布伦坦諾先生用“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I must say for one etc.) 这句话来开始“晨星报”的报道。这就是說，他是以此断言，前面关于 1842 年到 1852 年和 1853 年到 1861 年应该課稅的收入的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結論說，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兌換論”。

“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他的小册子的“讀者是无法监督他的”！但别人是有办法监督他的，这样，他們会看到，在“晨星报”上还是有这个地方的。我們把它轉載在这里，而把“資本論”中的那个地方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譯文都写出来，以便对布伦坦諾和他的讀者有所教益：

1863 年 4 月 17 日 “晨星
报”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as nearly as I can make out—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en years.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by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資本論”第 1 卷第 1 版第
639 頁；第 2 版第 678 頁；第 3
版第 671 頁；第 4 版第 617 頁
注 103¹⁵⁶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① 見本卷第 207—210 頁。——編者注

翻譯出来就是：

在从 1842 年到 1852 年的十年中，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就我所能查明的，增加了 6%，——这在十年內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 ……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則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布伦坦諾先生的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沒有这句话，这是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論断的主要王牌：馬克思引证的是“兌換論”，而不是“晨星报”。他以并列的各栏中这一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駁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說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正和馬克思引的詞句完全一样，而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諾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說这不是“删掉”，不是“歪曲”，那末这些詞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說在引文的开头布伦坦諾先生作了“歪曲”，如果說現在他已經避免断言在这同一引文的中間馬克思“增添”了一句话，那末这絲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隱藏了它的一部分。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結束。在点了一个逗点之后，接着还有一句话：

“可是我們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来是异乎寻常的（“泰晤士报”登載的是：“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来获得了如我們所知

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宣布說，它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这里从中間截断了這句話，“迫使格萊斯頓在句子的中間結束”，“因此這句話失去了任何意义”。布伦坦諾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7号^①）中已經把它称为“毫无意义的話”。

格萊斯頓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這句話，是一句完全明确的完整的話。如果說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說它沒有意义，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可是”給它添上無論多么长的結尾，这一結尾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說這句話在馬克思的引文中沒有“任何意义”，那末这不應該怪引用這句話的馬克思，而應該怪說這句話的格萊斯頓。

为了更深入地探討这一重要的情况，我們現在来看一下根据布伦坦諾先生的“慣例”一般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无謬誤的“汉薩德”。按照布伦坦諾先生自己的譯文，那里說：

“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貧极的鴻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縮小了。”

句点。而正是在这个句点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所以，如果說馬克思在这里也点了一个句点，那末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薩德”做的一样，而如果布伦坦諾先生根据这个句点給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硬說什么馬克思是从句子中間截断了格萊斯頓的話，那末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應該对后果

^① 見本卷第181—185頁。——編者注

負責。这也推翻了所謂馬克思用这个句点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論断；句点不是他的，而是格萊斯頓的，让布伦坦諾去和格萊斯頓討論這句話有无意义吧，这已經和我們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諾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萊斯頓先生通信。誠然，我們不知道他向格萊斯頓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萊斯頓先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諾先生只公布了格萊斯頓信中的两句空空洞洞、語焉不詳的話（文件第 16 号^①），关于这两句話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 17 号^②）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絲毫不能为布伦坦諾先生說話，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說明。

但是我們暫且假定，对这两句空空洞洞、語焉不詳的話只能作最有利于布伦坦諾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

“您完全正确，而馬克思絕對錯誤”。“我沒有做过任何修改”。前大臣的話，据說——因为，就我所知，格萊斯頓先生沒有用德文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說：我沒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話和馬克思“增添”了那句話呢？当然不等于。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的八家晨报会一致揭发这种論断是撒謊。它們毫無疑問地证明，這句話曾經讲过。可見，即使格萊斯頓先生未曾在“汉薩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改，——我虽然比他年輕十二岁，对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記憶，——那末，“汉薩德”中沒有這句話，这也絲毫不能为布伦坦諾先生說話，反而作了

① 見本卷第 211—212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212—213 頁。——編者注

很不利于“汉薩德”的說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唯一的一点放在一边，那末格萊斯頓先生的意見在这里就根本什么也沒有证明。因为，一旦我們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我們就将陷入对任何人都沒有約束力的意見的領域，在这个領域里，經過多年的爭論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十分清楚，当自己的話被人們引证时，格萊斯頓先生宁愿贊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諾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贊同对他进行尖銳批評的敌人馬克思的引证方法，而这的确是他的无可爭辯的权利。至于對我們說來，以及對解决馬克思是惡意地还是非惡意地进行引证這個問題說來，格萊斯頓先生的意見甚至還沒有隨便碰到的任何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者的意見重要，因为在这个問題上格萊斯頓先生已經不是证人，而是当事的一方。

七

最后，我們还要简单地談一談，格萊斯頓先生在他 1863 年預算演說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諾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說了些什么，从他所說的話中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諾先生，我們將以毫无瑕疵的“汉薩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諾先生自己的譯文。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內）的十年中，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据我們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 6%；但是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馬克思引证的这一句話，布伦坦諾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而只是說什么引文是从“兌換論”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諾先生的引文，在这里應該指出，他也根本沒有引证“預算演說的原文”。他删掉了格萊斯頓先生接下去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原因的題外話，甚至沒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去的引文是：

“主席先生，談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說，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話。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沒有注意到那些免繳所得稅的人的状况，或者，換句話說，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們的收入的增长。”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諾先生說是被馬克思“增添”的、但4月17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萊斯頓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話：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它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薩德”則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說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間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薩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話，它在这个問題上說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說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富裕阶级]，这对演讲人說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很感遺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錢納所得稅的人，是啊，这的确是“资本的简单增长”！

在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諾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讀到了一句話，在那里发现了不幸的自白，他拿来“汉薩德”的文本，在那里沒有发现那句倒霉的話，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馬克思拿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的这句话給他看。这时，布伦坦諾先生终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給別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結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和“汉薩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遺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薩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应该由此得出結論：“汉薩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而整个这场爭論，正是因为布伦坦諾先生忽視了仔细地对比

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萊·泰勒先生硬說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薩德”的报道格萊斯頓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諾先生断言，这篇演說“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贊揚”，讀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薩德”，这篇演說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語言，附带許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詞句弄得糊里糊塗。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純粹的胡說：資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說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話，那末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資降低。按照格萊斯頓先生的說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报纸，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中，用格萊斯頓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暗中代替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話，认为他想讲的是：資本的增长对工人有利，因为主要消费品会减价；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萊斯頓先生說，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确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話，——当他这样說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談到的增长之外的另一种增长，即他所謂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立刻忘記了，他所談的是繳納所得稅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何別的增长，——这我們不得而知。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問題在于本文和它的語法含义，在于格萊斯頓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諾先生也不知道，就連格萊斯頓先生本人，过了二十七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經不是什么权

威。不管怎样，这絲毫也引不起我們的兴趣。

所以，这些話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该課稅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我将感到非常遺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限于他們，因为工人們沒有应该課稅的收入；所以，这是資本的簡單增长！但是它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現在我們引证馬克思的話：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爭論的話，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轉述的。但是自从布伦坦諾先生不敢再断言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經不再提成立宣言，而把全部攻击指向“資本論”中对这个地方的引证了。在那里，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費品的价格。”

可見，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实质上”“只是以比較扼要的形式”正好轉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薩德”所刊载的、格萊斯頓先生讲过的話。唯一可以指責馬克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沒有用“汉薩德”，因而使格萊斯頓先生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而格萊斯頓先生原来讲的是沒有意义的。

根据“汉薩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說，人民群眾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識給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貧极的鴻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縮小了。”

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

馬克思只是扼要地轉述了两句干癟的正面的論断，这两句話在“汉薩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內容的、令人肉麻的辞藻中的。可以肯定地說，这两句話沒有因馬克思的轉述而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它們显得更好了。

最后，“汉薩德”在結束的时候說：

“但是如果我們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無論是农民或矿工，沒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們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們的生活資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們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這句話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話前面几行。那里說：“这就是官方按照議会命令在 1864 年間，即在自由貿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財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說：

‘大不列顛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經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絕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可見，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諾先生頑固地不让自己的讀者（当然，他們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个地方，就在第一版第四頁上。我們也不可能向他的讀者每人贈送一册，就像贈送給塞德萊·泰勒先生那样。

Nota bene [注意]：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辯（文件第 6 号^①）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辯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諾先生还没有把

① 見本卷第 172—181 頁。——編者注

“資本論”中的这个地方列入他的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諾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駁（文件第 7 号^①）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馬克思为它做的辯护。

只是在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轉折，同时，这个轉折不是布伦坦諾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劍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时才发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掩盖了格莱斯頓先生关于英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沒有先例的改善的响亮論断，因而使格莱斯頓先生的話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們应当承认，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頓的演說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证明，正是在財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階級中的絕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頓先生所謂英国工人階級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沒有先例的幸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詞，和从議會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于群众的貧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鮮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沒有任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頓的这些話。第一，这些話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財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良好的、甚至中常的时期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慣用語，因此它們是沒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頓一年之后就否定了这些話，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 1864 年 4 月 7 日发表的下一篇演說中，談到了处于“赤貧边缘”的群众和“工資沒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薩德”，他还說：

^① 見本卷第 181—185 頁。——編者注

“而且，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場合，不是为生存而掙扎又是什么呢？”(1)

但是格萊斯頓先生的这篇預算演說，馬克思紧接在 1863 年演說之后就引证了它，而如果格萊斯頓先生自己已經在 1864 年 4 月 7 日宣布，他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那种沒有先例的幸福状况已經不存在了，那末馬克思也就沒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对格萊斯頓先生說来也是过于短暫的論断。馬克思可以以演讲人下面这样的自白为滿足：虽然 150 英鎊和 150 英鎊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貧和极富之間的鴻沟未必縮小。

我們不打算談論德国官方經濟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馬克思的話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諾先生那样大喊大嚷，那末他的反駁就会永远不能完結了。

可是，讓我們来稍微仔細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有技术的工人或沒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資料的沒有先例的增长吧。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在 1861 年共有农民 1 098 261 人，其中作为奴仆生活在农場的有

(1) 在这里，讓我們根据“汉薩德”再从这篇演說中引证一些話。——赤貧者的人数下降到了 84 万人。“其中不包括获得慈善机关救济和私人慈善事业帮助的人…… 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及有许许多多工人在勇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維持高于赤貧状况的水平而掙扎。”在伦敦东部的一个教区里，在 13 000 人中有 12 000 人經常处于赤貧的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說，在伦敦东部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看不到公共馬車和单馬車，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丐…… 自然，为生存而掙扎的手段較前略有改善(!)…… 在許多地方工資提高了，但是在别的許多地方工資沒有提高……——而这首哀歌是出現在夸张地宣称状况获得“沒有先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的时候！

204 962 人⁽²⁾。从 1849 年到 1859 年，他們的貨幣工資一周增加了一先令，在有的情況下是兩先令，但是歸根到底這種增加大部分只是名義上的。1863 年他們的狀況怎樣，他們居住在什麼樣的名副其實的狗窩里，漢特醫生曾經做過描述（1864 年度“第七號公共衛生報告書”¹⁵⁸）：

“農業工人的生活費用被固定在他僅能活命的最低水平上。”

根據同一個報告，供給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品（尤其是在八個列舉出郡名的郡里），少於為避免因飢餓而致病所絕對必需的最低數額。而格萊斯頓先生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撒羅耳德·羅杰斯教授，在 1866 年曾說（“農業史和價格史”¹⁵⁹），農業短工又變成了農奴，而且，如他詳盡地證明的，他們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生活得比他們在阿瑟·楊格時代（1770—1780 年）的先輩差得多，比十四至十五世紀的短工也差很多。——因此，在“農民”方面格萊斯頓是一點也不走運的。

“礦工”的情況如何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 1866 年的議會報告¹⁶⁰。1861 年聯合王國有 565 875 名礦工，其中在煤礦中的有 246 613 人。在後面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資略有提高，而且大多是八小時一班，未成年工則必須做工十四至十五小時。礦山視察制度純粹是開玩笑：3 217 個礦井共有十二名視察員。因此大批礦工死於本來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件。礦主經常是先稍許提高工資，然後通過少給尺寸和少給分量的辦法克扣工資，使自己得到補償。根據 1864 年皇家委員會的報告，金屬礦的情況更糟。

而“有技術的”工人的情況又怎樣呢？拿五金工人來說，他們

(2) 這裡的數字部分根據 1861 年的調查統計，部分根據 1863—1867 年的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¹⁵⁷。

共有 396 998 人。其中机械鉗工有 7 万到 8 万人，这些人由于他們的的老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工人，由于他們必須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从 1859 年和 1860 年重新开始的工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反，从事这同一种生产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北明翰及其郊区就有 1 万名女工和 3 万名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釘子的铁匠(26 130)和制造鏈条的铁匠的状况則极端困苦。

在紡織业中，456 646 名棉紡工和織工（另外还要加上 12 556 名印花工），占了工人的一大半。当时，在 1863 年 4 月棉花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在（1862 年 10 月）百分之六十的紗錠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織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 2—3 天，5 万多棉紡織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領取补助，而（1863 年 3 月）135 625 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錢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縫紉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1866 年版第 211 頁¹⁶¹），如果他們竟听說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紡織工人，尤其是毛紡和麻紡部門的工人，生活比較不錯，——由于棉花缺乏，他們的活增多了。

童工調查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系列較小的行业的情况給我們做了最好的說明。織袜业有 12 万工人，其中只有 4 000 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其余的（內中有很多年紀很小的儿童）則无限度地工作；在大部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編織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 15 万工人中只有 1 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有大量的童工和青年女工从事过重的劳动；編草帽瓣和做草帽的有 4 万人，几乎全是被工厂主們无耻地用过重的劳动折磨得虛弱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 370 218 个縫外衣的女技师和女时装工，

380 716 个縫內衣的女裁縫和——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3 380 个男工,其中有 273 223 个鞋匠和 146 042 个裁縫,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在这 125 万人中充其量有百分之三十为私人訂貨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間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 sweaters [吸血鬼] 的人的剝削,可以用这样的話来概括他們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領取少得可怜的工資。

至于談到造紙业(10 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29 000 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 15 000 工人)、玻璃制造业(15 000 工人)、印刷业(35 000 工人)、假花制造业(11 000 工人)等等行业中的工人的“沒有先例的”幸福,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調查委员会要求,要让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 140 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使他們免于过度的劳动对他們大多数人的致命的危害。

最后,依靠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度日的赤貧者的数目在 1863 年为 1 079 382 人。

据此,我們可以得出在 1863 年无疑生活很坏的工人的大略数字了:农业短工按整数計为 110 万人,棉紡織业工人为 469 000 人,女裁縫和女时装工为 751 000 人,裁縫和鞋匠——除去百分之三十——为 401 000 人,花边业工人为 15 万人,造紙业工人为 10 万人,織袜业工人为 12 万人,童工調查委员会調查的小行业的工人为 189 000 人,最后,赤貧者为 1 079 000 人。总共有工人 4 549 000 人,在許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們的家属。

要知道 1863 年还是工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工业已經完全从

1857 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紡織业外，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門都在开足馬力生产。可是，状况的“沒有先例的”改善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是在 1863 年，它只涉及毛紡織、亞麻紡織、絲紡織工业中的工人，按整数計，他們共有 27 万人，棉紡織业的工人則在挨餓。在漂白和染色业中，对劳动的法律上的保护仅仅是一紙空文。此外，在需要整个的男劳力，而且往往还需要技能的工业部門，由于組織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业情况良好的时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即較高的工資，因而可以說，在这些需要使用繁重的男工劳动的工业部門，工人的生活水平平均說来确实有所提高，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提高說成是“沒有先例的”也是可笑的。但是，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經轉移到了由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們却仍然愿意只把强壮的从事重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們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

同上述 450 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赤貧者相对的，是 27 万报酬高的毛紡織、亞麻紡織和絲紡織工人。我們还可以假定，在 376 000 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得去，余下只有三分之一，即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釘工人、制鏈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566 000 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多少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紡織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在細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則为榨取血汗的小业主 (sweaters) 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經普遍地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了有組織的反抗。总而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們也难以湊滿 100 万工人，对于这

些工人我們能够說他們的状况随着工业和資本家利潤的增长而获得了改善；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他們从工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个說来只获得很少的利益，或者說，这类工人在性別和年齡上这样参差不齐，以致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过度劳动所抵銷。

如果上面所說的还不够充分，那末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而“公共卫生报告书”之所以需要，正是因为到 1863 年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階級状况的“沒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貴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調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飲食方面的“生活資料”的沒有先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們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飲食則只能勉强达到，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飢餓致病的水平。

总之，1863 年初英国工人階級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萊斯頓先生所吹噓的工人階級状况的“沒有先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說有什么地方可以責备馬克思的話，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萊斯頓先生上述那段吹噓的話，給了格萊斯頓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結論：第一，馬克思沒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沒有“刪掉”任何东西，足以使格萊斯頓先生有权报怨。

第三，布伦坦諾之流在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說，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文 件

一

被指控的引文

第 1 号 成立宣言¹⁶²

第一版用的标题：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定价一辨士。“蜂房”报社，弗利特街波耳特巷10号，1864年。宣言以下面的話开始：

“工人群众的貧困在1848年到1864年間沒有減輕，这是不容爭辯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貿易的增长來說却是史无前例的。”下面从“公共卫生报告書”中引用了城乡各类工人食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繼續写道：

«Such are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Parliament in 1864, during the millennium of free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has improved in a degree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Upon these official congratulations jars the dry remark of

the official Public Health Report:

«The public health of a country means the health of its masses and the masses will scarcely be healthy unless, to their very base, they be at least moderately prosperous».

«Dazzl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statistics dancing before his eyes,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exclaims in wild ecstasy: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dds Mr. Gladstone,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翻譯出来就是：

“这就是官方按照議會命令在 1864 年間，即在自由貿易的黃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財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說：

‘大不列顛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經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絕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贊美詞令形成尖銳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評語：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們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財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統計数字弄得眼花繚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則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萊斯頓先生补充說，——‘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第 2 号 “資本論”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第 3 版第 670—672 頁¹⁶³

根据这为数不多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¹⁶⁴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101)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

格萊斯頓說：“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資本不断增长。”(102)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是这样說的。过了二十年，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他在預算演說中又說：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則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費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

(101) “1861 年……人口調查”第 3 卷第 11 頁¹⁶⁵。

(102) 格萊斯頓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的演說：«It is one of the most melancholy features in the social state of the country, that while there was a decrease in the consuming power of the people, and an increase in the privations and distress of the labouring class and operatives, there was at the same time a constant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the upper classes and a constant increase of capital».

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103)

多么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穷”，只是随着他們給有产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說穷的极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經增大。至于說到生活資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三年間的生活資料价格比1851—1853年三年間上涨了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又繼續上涨了。(104) 格萊斯頓在1864年4月7日所作的下一个預算演說，是一首对于斂錢事业的进步和因“貧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贊歌。他談到处于“赤貧边缘”的群众，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为生存

(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consumption—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at any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說。

(104) 見藍皮书中的官方材料：《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 Kingdom》，Part. VI, London, 1866, p. 260—273, passim. 166

第二版附注。不說孤儿院等的統計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用度辯护的言論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記提到生活資料昂貴的情形。

而掙扎”(105)。不像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

“自然我並不否認，貨幣工資隨着資本的這種增加〈最近幾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於許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貴〈他認為這是由於貴金屬貶值造成的〉，這種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喪失了。……富人迅速地變得更富了 (the rich grow rapidly richer)，而工人階級的生活卻沒有什麼可以覺察得出來的改善……工人幾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隸，他們都是小店主的債務人。”(106)

(105) «Think of those, who are on the border of that region (pauperism)», «wages... in others not increased... human life is but,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格萊斯頓 1864 年 4 月 7 日在下院的演說。) 英國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來說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斷出現的顯著的矛盾¹⁶⁷：

«Voilà l'homme en effet. Il va du blanc au noir.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Importun à tout autre, à soi même incommode,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etc.» London, 1864, p. 135¹⁶⁸).

(106) H. Fawcett, l. c., p. 67, 82¹⁶⁹. 至於說工人愈來愈依賴於小店主，這是工人就業方面愈來愈多的變動和中斷的結果。

二

布伦坦諾和馬克思

第 3 号 控 告

1872 年 3 月 7 日“协和”杂志第 10 期

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①中有下面一段話：

“財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統計数字弄得眼花繚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在从 1853 年至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則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萊斯頓先生补充說，——‘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們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見了它。自然，作者們很少指出，这段話他們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們暗示，他們自己讀过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实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萊斯頓的演說来判断（参看“汉薩德議会議事录”第 3 輯第 170 卷第 243 頁及以下各頁）：

“1842—1843 年的每英鎊七辨士的所得稅（只是在大不列顛实行，并且在那里只是从 150 英鎊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由总数为 15 600 万英鎊的收入征收的。在同样的基础上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計算的 1860—1861 年的收入为 22 100 万英鎊。而我并没有听說，稅务方面有什么改变或者在征稅的方式上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常常做出让步或減輕負擔的規定，这些規定如果說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話，那毋宁說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 6 500 万英鎊，

^① 轉載于 1872 年 1 月 17 日“人民国家报”第 5 号。（布伦坦諾注）

也就是按上述条件課稅的国内总收入的 $\frac{2}{7}$ 。这是非常好的結果；而且这个結果的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段時間內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請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時間来研究这一問題。我比較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1853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1853年开始(这时作为起点的数字发生了变化)。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內)的十年中，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据我們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內，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談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說，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話。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繳所得稅的人的状况，或者，換句話說，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們的收入的增长。資本的簡單增长对工人階級說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間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說，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識給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貧极和富极的鴻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縮小了。但是如果我們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們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們的生活資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們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篇演說的内容和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萊斯頓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稅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鎊和150英鎊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稅。收入在150英鎊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繳所得稅。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萊斯頓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計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样一句話强加于格萊斯頓。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没有这句話。他在演說中說的和这句話正好相反。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話！

第 4 号 馬克思的答辯¹⁷⁰

1872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 3 月 7 日出版的“工人問題杂志”“协和”第 10 期給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論。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順便引用了格萊斯頓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預算演說中的一句話，而这句話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薩德議会議事录”中是沒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邏輯直截了当地作出結論說：“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這句話”，因此它幸灾乐禍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語写道：

“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這句話！”

說什么，最初用英語在伦敦当着格萊斯頓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話是我强加給他的，而且這句話在七年半的岁月里暢行无阻地載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現在才終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聞。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這句話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p. 6, Inaugural Address etc.). (逐字譯成德文是：“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在“双周評論”(1870 年 11 月)上的一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和

被伦敦各家报刊討論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 518 頁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話：

«An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s Mr. Gladstone observed,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譯成德文是：“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現的呀！那好吧！我們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現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兌換論。1844 年銀行法”，1864 年伦敦，T. 考特萊·紐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 30 号。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詳尽的批駁，在該书第 134 頁上引用了預算演說中的一句話：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譯成德文是：“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这同我引的話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經无可辯駁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謠說这句“話”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謊”！

我們順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轉載了格萊斯頓嘟嘟囔囔地說出的另一句話，他說英国工人階級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說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沒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隱瞞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強調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話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統計”(«appalling sta-

tistics») —— 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間的尖銳的对比(1)。

“兌換論”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薩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話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預算演說。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筆記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沒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損。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載的議會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沒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萊斯頓的这个极其聳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現在一样是格萊斯頓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預算演說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話：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譯成德文是：

“从**財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2)的話。这里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

(1) 这篇演說中的其他胡謔的辯护詞我在“資本論”一书(第638—639頁)171中曾予以批駁。

(2) «easy classes»,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一語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示有产階級中的确实有錢的部分的172。

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見，根据格萊斯頓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萊斯頓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說，“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iam, Itaiam!»〔“意大利！意大利！”〕^①最后，我們来談談“汉薩德”。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經過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說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話；不过，这是英国常見的議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 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¹⁷³把“泰晤士报”上登載的格萊斯頓实际发表的演說和格萊斯頓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說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評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篤信宗教的、畏畏縮縮地把自己的虔誠和自由主义的 «attitudes of mind»〔“情緒”〕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資本論”一书引起了特別大的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許多官方材料来評述資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錯誤。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們也迭有所聞。但是他們想：

“智者看不見的东西
却瞞不过幼稚天真的心灵。”^②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編者注

② 席勒“信仰的話”。——編者注

說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們感到怀疑的引文，他們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薩德議会議事录”上白紙黑字写着的那段話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峽对岸去。現在他們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語。他們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請看“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們應該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沒有花費一文錢来对問題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結局也許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員們表明：不管他們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們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馬克思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第5号 匿名作者的反駁

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

卡尔·馬克思是怎样辯护的

我們的讀者或許会記得今年3月7日本刊第10期登載的“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我們在那里研究了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它經常被用来，特别是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明显的证据，证明在保持現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工

人階級的状况必然恶化。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萊斯頓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預算演說。在这篇演說中格萊斯頓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他并且以所得稅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繳所得稅的人的状况”；它們“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們的收入的增长”。問題是，收入在150英鎊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繳所得稅。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萊斯頓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計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样一句話强加于格萊斯頓。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没有这句話。格萊斯頓說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們感到憤慨，我們声明：“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話。”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駁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对于在我們社会民主党中占統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伦敦先知的无人能够超过的淵博學識、誠实和絕對正确來說，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于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駁，或至少采取类似反駁的行动。在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上^①馬克思曾试图反駁。但是我們的对手根本没有能够駁倒关于 *mala fides* [恶意] 引证的指責。他的辯解方式如果說能证明什么的話，毋宁說是正好证明了这种 *mala fides*。他又利用了“人民国家报”的讀者无法核对他的材料的准确性这一情况。这种做法的无耻，更超过了他的引证方式的卑鄙。

自然，馬克思沒有走得这样远，以致對我們从議會速記記錄中摘录的引

^① 这就是說，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馬克思的答辯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責我們，說我們对这个答辯“英勇地保持沉默”。我們认为，这家報紙沒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銳的反駁文章。而我們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闡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們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編輯部注）

文的确切性提出異議。对他說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 *bona fides* [善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以別人的引证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道:

“在‘双周評論’(1870年11月号)上的一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討論的文章中, 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頁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話: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 完全限于有产階級。’——不过, 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現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記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談的都是国际的历史, 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 是根据馬克思本人提供給他的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 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引证格萊斯頓的話, 而只是指出, 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句引文。比斯利写道,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統計轉而談到关于所得稅的官方材料,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 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 完全限于……”——这实在是一种絕妙的证明方式! 人們把一些捏造的材料悄悄地塞給沒有听說我們不誠实的人, 后者輕信地进一步加以传播, 然后人們就利用这种情况, 并且利用轉述者的誠实, 来证明这些材料是确实的, 而且自己本人是誠实的! ——馬克思繼續辯护說:

“我們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 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現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 ‘兌換論。1844年銀行法’, 1864年伦敦, T. 考特萊·紐比出版社, 威尔柏克街30号。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詳尽的批駁, 在該书第134頁上引用了預算演說中的一句話: ‘……这样令人陶醉的……’, 这同我引的話一字不差。——这一切已經无可辯駁地证明: 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謠說这句‘話’是‘我的’产品, 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謊’! ……”馬克思繼續說道, “‘兌換論’的作者和我一样, 不是根据‘汉薩德’, 而是根据一家伦敦報紙摘录那句話的。这家報紙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預算演說。”

确实, 这本书(順便說一下, 它是一本常見的誹謗性小册子)的作者, 和馬克思一样, 也不是根据“汉薩德”摘录的。不过, 如我們下面就要指出的, 馬克思甚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報紙摘录的。但是, 我們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 我

們說馬克思給格萊斯頓的演說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話，這“無論在形式上或者在實質上”都並沒有斷言，他自己也編造了它。這只有在馬克思本人是這本書迄今還非常神秘的書的作者的情況下才會是這樣，而根據該書的那種可怕風格來判斷，看來倒是可以這樣設想的。馬克思所引的這句話的出處正是這本書，正因為如此，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從自己 1863 年的筆記本中找出這個摘要和那家報紙的報名，但是沒有找到！”把馬克思“資本論”一書中提到格萊斯頓演說的那個地方和“兌換論”加以比較，就能清楚地看出馬克思的引文的來源了。在“資本論”第 639 頁，尤其是在注 103 中，這一演說被引述得毫無意義，就像在“兌換論”第 134 頁上一字不差地引用的那樣。馬克思對於這句話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評論，在這本書中也已經有了，而且“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5 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同樣，在這本書的第 135 頁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克思引用的倫敦孤兒院的關於生活資料漲價的材料，但是，馬克思為了證明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沒有指出引自這本書，而是指出材料本來的出處（見“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4）。

現在我們要問：一個人是只有他自己編造了謊言才是撒謊，還是說他知道或理應知道真相却重述謊言，那也是撒謊？我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次，馬克思重述包含在“兌換論”中的謊言，他這樣做時難道不是明明知道真相，或者說他至少不是應該知道真相嗎？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复也是很簡單的。馬克思先生無疑十分了解的、作任何解釋的第一個原則是，要把那些初看起來含有矛盾因而沒有意義的地方解釋得沒有矛盾，如果對一段話這樣做辦不到，那最好是批評這段話，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對於一篇特別是由於熟悉對象和它的清楚明確而引起了所有有教養的人士的注意和贊賞的演說，尤其需要這樣做。最後，如果作者想斷章取義地抽出構成這段話中的矛盾之半的一個地方，把它拋給全世界的無產者作為對有產者的告密，那末離開這種確切性就是一種近乎犯罪的輕率。所以，如果說根據普通教育、科學性和責任心的要求，卡爾·馬克思就已經應該放棄採用上述的手段，那末他竟然引用這個假引文這一犯罪的輕率行為，就他來說就更加不能寬恕，因為他是完全可以知道格萊斯頓演說的原文的。第一，英國的報紙在演說發表後的第二天就援引了這篇演說，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援引，至少也是忠實於原意的。其次，在演說發表之後，格萊斯頓立即一字不差地將它載入了他的一本受到很大注意的著作：“關於財政問題的演說”1863 年倫敦版，在該書第

403 頁上，演說正是像我們援引的那樣敘述的。最後，馬克思可以在“漢薩德議會議事錄”中找到這篇演說的速記記錄。而且按照慣例，應該根據速記記錄引證議會演說，即使這些演說在必然不懷好意的報紙報道中並不包含矛盾。

不過，這裡我們又看到馬克思的第三個辯護手段。就無恥地撒謊而論，它遠遠超過了已經舉出過的一切。馬克思一點也不難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報”來證明自己的引文正確。但是，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報”從第 7 版第 5 版第 17 行起，是這樣敘述這一演說的：

“從財富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的狀況就是這樣。我從自己方面說，我會懷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我想，這種增長局限於處於優良條件下的階級的話。這裡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狀況。我所描述的增長，亦即以我認為十分確切的材料為根據的增長①，完全限於占有財產的階級。〈馬克思引證“泰晤士報”的話到此為止，我們繼續往下引證。〉但是資本的增長對工人也有間接的好處，因為這種增長會降低在生產過程中直接和勞動競爭的那種商品的价格。（聽啊！聽啊！）然而，使我們感到極大的並且我應當說是難以估價的安慰的是，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也不那麼窮了。我不敢斷定窮的極端程度已經縮小，但是我們非常幸運地獲悉，最近二十年來英國工人的狀況平均說來獲得了異乎尋常的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宣布說，這種改善是歷史上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中都幾乎沒有先例的。（聽眾表示贊同）”

將“泰晤士報”的這個報道和 3 月 7 日“協和”雜誌刊載的“漢薩德”的報道加以比較就會看出，兩個報道在實質上完全一致。“泰晤士報”的報道，只不過是以比較扼要的形式，敘述了“漢薩德”的速記記錄所一字不差地記載的話。但是，雖然“泰晤士報”的報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這個聲名狼藉

① 馬克思在他發表在“人民國家報”的德文引文中刪去了這個附句，然後加上這樣的話：“他（格萊斯頓）剛剛把它描述為‘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這種增刪也是為了故意使讀者誤解格萊斯頓的話的意思。按刪去的附句以及整個上下文來看，演說的意思是：從所得稅的材料看出的財富的增長只限於有產階級（因為只有收入在 150 英鎊以上的人才要繳納這種稅），至於工人階級，我們知道……（布伦坦諾注）

的地方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萊斯頓也說，他认为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階級，馬克思还是厚顏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

“可見，格萊斯頓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說，‘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們已經根据“汉薩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說的确切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話来消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說“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薩德’中經過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說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財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話”。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萊斯頓先生或許是有鉴于1864年才問世的誹謗性小册子“兌換論”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說呢！首先是根据无知的誹謗性小册子向我們提出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容的自相矛盾就证明了这种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馬克思声明說，別人也是像他那样引证的，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輸以这种謊言的人的話作为证明。接着，他企图利用这本小册子的不清楚的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辯护和证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論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无可非議的第三个来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他甚至还厚顏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說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詞（見“資本論”第257頁）：簡直“无耻”。

馬克思在結束他的辯护时說：“不愉快的結局也許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員們表明：不管他們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們却一窍不通，就像馱子弹琴一样。”

我們請讀者冷靜地判断一下，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結局的究竟是哪一方。我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馬克思先生說明，我們认为格萊斯頓的話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7月11日“协和”杂志第28期上，它与本題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沒有收录。

第 6 号 馬克思的第二篇答辯¹⁷⁴

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在 7 月 4 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萊斯頓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預算演說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們的机关刊物（第 10 期）声明道：

“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說，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編造这句话的。

“协和”說：“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萊斯頓断言过……，以便把……强加于格萊斯頓。”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兌換論”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謊。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說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見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現在用什么謊言来自圓其說呢？請听：

“我們說馬克思給格萊斯頓的演說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話，这無論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編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詐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們談妥，向他們推銷一批絲帶，声称每盘絲帶有三十埃勒^①，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

^① 埃勒(Elle)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譯者注

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沒有編造了它”。增添的繖帶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說：“絕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們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¹⁷⁵，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兌換論”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資本論”一书中涉及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識。現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爭論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兌換論”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邏輯的新范例。

我告訴工厂主的杂志說，“兌換論”第 134 頁上引证的話和我引证的話完全一样。而該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話和“兌換論”第 134 頁上引证的話完全一样。

往下竟說！

“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評論，在这本书中也已經有了。”

这純粹是撒謊。在“資本論”第 639 頁上我是把我的評論同格萊斯頓演說中的一句話联系在一起的，他說：“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穷’，只是随着他們給有产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說穷的极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經增大。”¹⁷⁶……这些“評論”在

“兌換論”中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

“……評論，在這本書中也已經有了，而且‘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5 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這樣一來，“而且”我也引證了莫里哀，並給“協和”的“博學之士”提供了一個機會，好讓他們查明來源并向公眾宣布說，這段引文是從“兌換論”上摘錄下來的！實際上在“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5 中我直截了當地說，“兌換論”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來說明”“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斷出現的顯著的矛盾”。

最後它說：

“同樣，在這本書的第 135 頁上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引用的倫敦孤兒院的關於生活資料漲價的材料，但是，馬克思為了證明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沒有指出引自這本書，而是指出材料的出處（見“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4）”。

“協和”非常聰明地忘記告訴自己的讀者，“這本書”沒有提供任何出處。這家雜誌想證明什麼呢？它想證明，我從“這本書”中抄襲了格萊斯頓的演說中的一個地方，而不知道這篇演說的出處；它是怎樣來證明的呢？這樣來證明的：說我確實從這本書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拋開這本書而根據原來的出處加以核對！

關於我從比斯利教授在“雙周評論”（1870 年 11 月）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中摘下來引文，“協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這篇文章談的都是國際的歷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聲宣布的，是根據馬克思本人提供給他的材料寫成的。”

比斯利教授說道：

“對協會的成就，誰的貢獻也沒有像卡爾·馬克思博士的貢獻那樣大。我認為，就熟悉歐洲各國產業運動的歷史和統計而言，是沒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資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歸功於他的

帮助。”¹⁷⁷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¹⁷⁸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¹⁾。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頓的演说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用短短十二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頓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頓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頓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頓的预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

(1) 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 quid pro quo [偷梁换柱的手法]。

在英国免繳所得稅”(見“协和”第 10 和 27 期)一样。但是英国稅务人員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 100 英鎊的人才免征所得稅。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爭論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這句話。”我从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則报道中引了一段話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話，因为格萊斯頓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話”，——这样的断語需要加以評論。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話指出，*«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語句在德文中沒有确切的詞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錢的人”，有产階級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階級叫做 *«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說法是，“不太富裕的階級 [die ungemächliche Klasse]”⁽²⁾。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給我引用的那段話加上“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話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讀者了解，它引的話是我的譯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譯文不同，它不是把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譯成“富裕的階級”，而是譯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階級”。它还使它的讀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財產始終被看成是有产階級的所有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們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話的翻譯，格萊斯頓先生也把

(2) *«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 [“中等階級或不太富裕的階級”] (“英国和美国” 1833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85 頁¹⁷⁹)。

他所描繪的資本主义財富的增加形容为“**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在結尾时他說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階級**”。可見，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給格萊斯頓先生的那句話，“**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給他的那句話，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貴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馬克思还要厚顏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見，根据格萊斯頓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萊斯頓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說，**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給广大的讀者！

我已經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讀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沒有引用格萊斯頓关于英国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的話，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別強調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間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它說道：“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話到此为止，我們繼續往下引证。”为了反駁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爭論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們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萊斯頓对資本家財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頌之后，就轉过来談工人階級。他根本沒有說，工人階級从“**財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萊斯頓接下去說了这样的話：

“但是資本的增長對工人也有間接的好處，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說，“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也不那麼窮了”。最後，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發了財的議會朋友們“非常幸運地獲悉”一個情況——議會調查和統計資料表明，情況相反——這就是，

“最近二十年來英國工人的狀況平均說來獲得了如我們所知道的異乎尋常的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宣布說，這種改善是歷史上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中都幾乎沒有先例的”。

在格萊斯頓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預算演說中除了描寫資本家財富增長的情景以外，總要“非常幸運地”加上幾句關於工人階級狀況有了改善的自鳴得意的話。儘管如此，他還是指責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謊，因為千年王國只是在自由貿易法實施以後才來到的。但是，這裡問題並不在於格萊斯頓用來安慰和慶賀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確。這裡說的只是，照格萊斯頓的觀點，所謂工人階級狀況“異乎尋常的”改善跟“財富和實力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這點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資本的辯護人——而格萊斯頓先生是它的報酬最優厚的辯護人之一——的正統學說正是認為，工人們改善自己狀況的最有效的辦法是使自己的剝削者發財。

使工廠主機關刊物無恥的庸俗或庸俗的無恥達到頂點的一件事，就是它斷言，“‘泰晤士報’的報道只是以比較扼要的形式敘述了‘漢薩德’速記紀錄中確切引用的話”。⁽³⁾我們把這兩個報道對照一下吧：

(3) 看來工廠主的報紙真的以為，倫敦的各家大報在它們關於議會的報道中沒有利用速記材料。

一

摘自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所載的格萊斯頓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說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話。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階級的增长。但是資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間接的好处，等等。”

我让讀者自己去把“汉薩德”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 Office [繁文縟礼局]^①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較一下。

二

摘自“汉薩德”1863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28 日議会議事录第 170 卷所載的格萊斯頓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說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 (the class of persons who may be described as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話。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繳所得稅的人的状况，或者，換句話說，为了确定一般真相 (!) 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 (!) 或者 (!) 他們的收入的增长。資本的簡單增长对工人階級說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間接的好处，等等。”

^① 这是狄更斯的小說“小杜丽”中的用語。——編者注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話——“**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薩德”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格莱斯頓1863年4月16日的預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但是这种增长（But that 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格莱斯頓1863年4月16日的預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 augmentation 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 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頓事后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薩德”中隐瞒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这句话。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現在教导我說，照批評的“慣例”，引用議會演說時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說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說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慣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狹隘的普魯士忠順臣民的見識。由于沒有時間，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別的時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請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敌人——按其地位說来至少和“协和”相等——說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話：«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4)?

卡尔·馬克思

1872年7月28日于伦敦

第7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駁

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第34期

再論卡尔·馬克思的特点

馬克思先生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27期上登載的“卡尔·馬克思是怎样辯护的”一文作了答辯。他坚持从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預算演說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頑固的撒謊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現存制度計劃的人也会吃惊。实际上这种頑固的撒謊

(4) 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癖性只能說明，作者害怕如果承认这个引文，即成立宣言中这个曾經获得轰动一时的效果的地方是假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会給它的作者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辯护文章中同意：在載于“汉薩德”的格萊斯頓演說的速記記錄中，沒有这个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萊斯頓先生刪掉了这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地方！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評論”的文章中引证这篇演說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給讀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論述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萊斯頓先生的这篇演說。所以我們指出，首先，这篇文章談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馬克思本人提供給作者的材料写成的。对此，甚至馬克思也沒有提出异議。但是他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沒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內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我們也并没有这样說，甚至也沒有暗示这一点。我們也完全相信馬克思先生的話。如果他向比斯利教授提出“兌換論”作为自己引文的证据，那末比斯利大概就不会轉載它了。其次，我們回答說（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沒有从格萊斯頓的演說中引证那个地方，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們从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句地引述了那句話，这从“协和”第27期上可以看到。馬克思現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这句話放在引号外面^①这一情况来使讀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說了这句話！！

馬克思想在下面这一事实中寻找证明格萊斯頓事后从自己的演說中刪掉了那句話的第二个证据：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兌換論”一书引证的格萊斯頓的演說，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們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的，并且一切都說明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借用他的引文的。首先这由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639頁，尤其是在注103中，演說被一字不差地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兌換論”第134頁上引用的那样。馬克思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資本論”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兌換論”第

① 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引自成立宣言的話，就像它在成立宣言中所刊載的那样。而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句自然也沒有加引号。（布伦坦諾注）

134 頁上那样引证格萊斯頓演說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段引文，并給它們附上了同样的評論，这也证明“兌換論”是馬克思引文的来源的論断。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駁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兌換論”中所沒有的評論。但我們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已經明确指出“兌換論”的作者就是引用莫里哀的文句的作者。但我們并没有說与此相反的話。最后，至于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 640 頁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兌換論”第 135 頁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末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字不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們的确切性。因而馬克思自己证明了：他給格萊斯頓演說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評論，是取自“兌換論”。这样他自己证明了：我們用来支持我們关于格萊斯頓演說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书中借用来的这一主要論据的各点是正确的。可是对于这一主要論据，也就是对于认为他像“兌換論”一样把格萊斯頓演說引述得**同样毫无意义**这一点，他没有进行任何反駁。

最后，第三，馬克思力图根据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載的关于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論断：格萊斯頓事后在“汉薩德”的速記记录中对他自己的演說做了捏造。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薩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讀者看不清这一点，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題外話，这个手段同时也会使“人民国家报”的讀者为他們的先知的淵博學識而受到新的鼓舞。即使根据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萊斯頓也是肯定地說，他认为他所說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于**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階級。馬克思援引“中等階級或不太富裕的階級”一书的作者威克菲尔德的話，断言根据格萊斯頓的話来看，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确实有錢的人”，有产階級中“真正富裕的部分”，而因為我們沒有注意所有这些議論，所以他現在指責我們隱瞞。但是，如果說我們对这一新的編造謊言的企图保持緘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因为不管威克菲尔德把中等階級叫做 the uneasy class 是什么用意，格萊斯頓演說的总的意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萊斯頓所謂的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于工人居民的階級，因為他是拿它們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馬克思在他自己的这个报道的德文譯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結論是，格萊斯頓只是說，根据所得稅的材料可以查明的財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階級，因为工人階級免繳所得稅；因此，根据所得稅的材料絲毫不能看出工人階級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說，工人階級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財富的异常增长之外。馬克思，如我們刚刚看到的，曾經毫无道理地指責“协和”隱瞞，而他現在却又心安理得地删掉了上述的附句，虽然我們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們根据真实情况，說“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薩德”的速記記錄中确切引证的話，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薩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这一附句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人民国家报”的讀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第三，最后，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薩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話，在这些話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萊斯頓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的改善。我們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全部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有爭論的地方。虽然如此，馬克思仍然欺騙自己的讀者，断言似乎我們想让人們了解，我們引的“泰晤士报”的話是他的譯文！！另一方面，他自然把我們指出（在第 28 期）的这样一点掩盖起来，即馬克思所謂的、格萊斯頓关于英国工人階級状况获得改善的論断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間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了这一指責。

此外，馬克思在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辯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据，证明他对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們根本用不着去检查，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时是否做了新的歪曲^①。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轉述来看也是为我們說話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萊斯頓說，他不认为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階級，并且还說：“財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說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

^① 再版时补加的注：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删掉了他在轉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删掉的那些話。請看两个报道的开头。（布伦坦諾注）

階級的增长。”“注意到”一語的意義和運用清楚地表明，這種增加和上面所說的增长是指根據所得稅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種增加和說法。

但是引證這兩個所謂的證據不過是要炫耀自己的博學，依靠它來維持“人民國家報”的讀者對他們的先知的信仰。馬克思發表在8月7日“人民國家報”上的文章，就是這種自我吹噓的標本，值得我們的讀者親自見識一下。我們還應當舉一個這類自我吹噓的例子，以免馬克思先生責備我們，說我們想向我們的讀者隱瞞他在一個次要的問題上修正了我們的話。我們說年收入在150英鎊以下的人在英國免繳所得稅。馬克思先生嘲笑我們無知，說只有當收入在100英鎊以下時才不征收這種稅。實際上根據1842年的法律，所有150英鎊以下的收入都不課稅，而在1853年所有100英鎊以上的收入才都課了稅，但是新課稅的收入得到了優待，稅率較150英鎊以上的稅率為低。後來在1863年享受優待的人擴大到了收入為200英鎊的人，並且以下面這樣的方式保持減稅，即所有在這個數字以下直到100英鎊為止（包括100英鎊在內）的收入，始終應扣除60英鎊作為不納稅的收入。

馬克思先生在結束他的文章時說，由於沒有時間，他不得不從此永遠停止同我們的愉快來往。我們懂得，馬克思先生是很願意利用機會尽可能地遠離那些會指出他的捏造的人的。如果馬克思先生最後還破口大罵，那末我們可以使他相信，沒有什麼比這種包含着承認他被揭露的謾罵更能使他的對手感到愉快了。辱罵是用盡了其他一切辯護手段的人的武器。

三

塞德萊·泰勒和爱琳娜·馬克思

第 8 号 塞·泰勒的攻击

1883 年 11 月 29 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編

請允許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 1863 年 4 月 16 日格萊斯頓先生預算演說的一段使人发生誤解的引文，即甚至像艾米尔·德·拉弗勒教授这样卓越的政論家，也根据德文加以重复引用并且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对它作解释的那段引文，早在 1864 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載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使人特別惊异的是，布伦坦諾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現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在八年之后，在一个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萊斯頓演說时所怀的 *mala fides* [恶意]。

卡尔·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辯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諾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掙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萊斯頓先生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說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薩德”登載的演說記錄，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財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話。当布伦坦諾通过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薩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絕對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給格萊斯頓的話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进行論战！

布伦坦諾和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辯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訂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爭論者中后面那位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簡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給我們

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仆人

塞德萊·泰勒

(1883年)11月26日于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這篇文章刊登在1883年11月29日的“泰晤士報”上。11月30日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給“泰晤士報”寄去了她的答辯。答辯沒有被刊登。寫給主編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於是愛·馬克思又寫信給“每日新聞”，結果仍然是徒勞。於是她把塞德萊·泰勒的控告以及自己的答辯一併發表在社會主義月刊“今日”1884年2月號上。我們把她的答辯收錄在這裡。¹⁸⁰

第9号 爱琳娜·馬克思的答辯

1884年2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報”主編

塞德萊·泰勒在11月29日的“泰晤士報”上提起了一段引自格萊斯頓演說的話,說這段話

“早在1864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載在著名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所發表的宣言中”。

往下他繼續說道(這裡我摘引了泰勒的信,從“使人特別驚異的是”起,到“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進行論戰”止)。

事情的實際情況簡單說來就是這樣。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是1863年4月16日格萊斯頓先生預算演說中的幾句話。在格萊斯頓先生描述了1853年和1861年之間國內財富的異乎尋常的增

长之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諾教授)在1872年3月7日的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内中说道:

“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爭論点。

馬克思在他刊登在1872年6月1日和8月7日萊比錫“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辯中,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萊斯頓演說的报道。

4月17日“泰晤士报”: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4月17日“晨星报”:

“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4月17日“晨报”:

“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他的“巧妙的攻击”“很快地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諾,在“垂死的掙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說法来辯护,說即使引文不是捏造的,它也是“使人发生誤解的”,是“怀着 mala fides [恶意]”,是“狡猾的断章取义”,等等。我担心,您不会給我篇幅来对布伦坦諾先生的这一过了十一年,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告作答辯。而且,这或許也不需要了,因为泰勒先生說:

“布伦坦諾和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辯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訂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很欢迎这样做。这对于紀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

上关于这个演說的报道和“汉薩德”的报道有出入的問題，我让最关心这个問題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千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它的确切性引起了爭辯。經济学教授們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說明問題的。用泰勒先生的話來說，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爭論者中后面那位〈馬克思〉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簡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給我們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閣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爱琳娜·馬克思

1883年11月30日于伦敦

第10号 塞·泰勒的反駁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編輯部

閣下！馬克思女士被拒絕发表她的答辯，对此，沒有人比我更感到遺憾了，她显然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她认为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諾教授之間的“唯一的爭論点”，就在于格萊斯頓先生的演說中是否有某一句話，对于这个看法，我却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問題完全是次要問題，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萊斯頓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討論布伦坦諾和馬克思之間这场牵涉很广的辯論的内容，而不占用貴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馬克思女士在貴报上公开說我的看法是“誹謗”和“誣蔑”(1)，所以我不能不請求貴报用两栏并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貴报讀者自己就能判断，馬克思博士在其巨著“資本論”中引证1863年預算演說时是誠实的还是不誠

(1) 在未刊登在这里的致“今日”月刊編輯部的附函中。(恩格斯注)

实的。讀了馬克思和布伦坦諾先生的來往答辯文件中的馬克思的信的讀者會了解，為什麼我用“泰晤士報”的報道，而不用“漢薩德”的報道。

1863年4月17日

“泰晤士報”

“在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內)的十年中，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就我們所能確切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國內的收入又增加了20%。這個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實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我认为，这种增長仅限于富裕階級的話。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長，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確切的材料為根據的增長，是一种完全限于有產階級的增長。但是資本的增長對工人也有間接的好處，因为这种增長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然而，使我們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說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比过去縮小，但是我們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來获得了如我們所知道的异乎尋常的

“資本論”第2版

第678頁注103

“从1842年到1852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20%。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長……

……完全限于有產階級，但是……但是这种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費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說。

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宣布說,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我請您特別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的意思。“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階級的話”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刚刚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階級。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階級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間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語表明,格萊斯頓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稅的材料为根据的数字,只包括要繳納所得稅的收入^①。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說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額在所考察的时期內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但是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来”到結束,十分明确地說明,格萊斯頓先生根据和所得稅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为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来获得了无疑是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沒有先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这样一种奇怪的样子,就像在馬克思博士的书中那样,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然是:使以格萊斯頓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辞句任意拚凑起来的话可以理解为,似乎他断言,工人居民的工資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階級的收入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駁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論断。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資本論”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譯文后面,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萊斯頓語句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于有产階級財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詭辯”的輕蔑的惊叹。

閣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塞德萊·泰勒

1884年2月8日于

劍橋大学三一学院

^① 在1842—1853年150英鎊以下的收入免繳所得稅,而1853年以后是100英鎊以下免繳所得稅。(“今日”月刊編輯部注)

第 11 号 爱琳娜·馬克思的第二篇答辯¹⁸¹

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編輯部

閣下！我断言当匿名的誹謗者攻击馬克思博士的时候，唯一的爭論点在于，格萊斯頓先生是否曾經使用某些詞，塞德萊·泰勒先生对我的說法提出了異議。他认为，問題实际上在于，

“引用所提到的引文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萊斯頓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1872 年 3 月 7 日第 10 期)登載的“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現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匿名作者先引证了国际的成立宣言，接着引证了格萊斯頓先生演說中的一个地方，即“汉薩德”所刊載的有关的全文；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些話做了归納；最后，他在結尾說：

“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萊斯頓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計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样一句話强加于格萊斯頓。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没有这句話。他在演說中說的和这句話正好相反。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話。”

这就是对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是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話而歪曲了格萊斯頓先生的意思。在控告中沒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誤解”或“狡猾的断章取义”。問題仅仅在于，“格萊斯頓先生的演說中是否有某一句話”。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讀过布伦坦諾先生的攻击文章

和我父亲的答辯，如果是这样，他的說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的实际情况。要么他沒有讀过。如果是这样，那将如何呢？如果是这样，投寄注明寄自劍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信的这个人，就沒有任何理由要費这么大的力气，用这样一种办法来非难我已故的父亲在写作方面的正直，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責，这种办法就不能不成为“誹謗”。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說就是布伦坦諾教授）和我父亲在 1872 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詞描写圣乔治——布伦坦諾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龙馬克思陷于“垂死的掙扎”；他能十分詳細地向我們描述这位圣乔治“通过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績，——这一切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致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測：对于他所說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沒有讀过。

泰勒先生如果讀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話：

“現在我們要問：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編造了謊言才是撒謊，还是說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謊言，那也是撒謊。”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諾在他反駁我父亲的第一篇答辯時說的話（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第 27 期第 210 頁）。在同一頁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萊斯頓也說，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階級”。

所以，如果說連布伦坦諾好像都根本不知道爭論的真正目标在哪里，那末难道塞德萊·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嗎？在他給“泰晤士报”的信上談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給“今日”月刊的信上談的是“資本論”中的引文。在这里，問題轉

移到了另外一个方面,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現在引证格萊斯頓演說中的地方,是照“資本論”第 678 和 679 頁上那样引证的,和“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薩德”的报道中的同一个地方并列。

“讀了馬克思和布伦坦諾的來往答辯文件中的馬克思的信的讀者會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薩德’的报道。”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讀者”之列。如果相信他自己的論据,那末,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別人能够理解,但是他本人却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們現在已經从絕對正确的“汉薩德”轉向这样一个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諾(就在“协和”同一頁即第 210 頁上)曾指責我父亲,說他采用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坦諾一定是“理解”的。

对我說来,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增添的那句話(“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上有,其他日报上也都有,而在“汉薩德”中這句話不仅被“匆忙地修改”了,而且根本被“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馬克思所查明。泰勒先生在他給“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大发雷霆,可是現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謬誤的“汉薩德”,而到布伦坦諾所謂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辯护了。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們特別注意他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他承认:

“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這句話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話中間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語表明,格萊斯頓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在这里，我們显然进入神学的領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統的解釋聖經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但是，如果根据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末就可能相信它的意思和真正的信仰不矛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萊斯頓解釋聖經那样来解释格萊斯頓的話，那末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統派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萊斯頓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場合要么是讲英語，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末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也帮助不了我們。如果是，那末他在这个場合是这样說的：如果实力和財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只限于富裕階級，他会非常惋惜；而增长确实是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也正是馬克思引证的話。

第二个地方是一句慣用語，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英国預算演說中都要重复這句話，尽管每次詞句略有不同。下面摘自馬克思給匿名誹謗者的第二篇答辯中的一段話，表明了他對這句話以及整篇演說的想法：

“格萊斯頓对資本家財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頌之后，就轉过来談工人階級。他根本沒有說，工人階級从‘財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萊斯頓接下去說了这样的話：‘但是資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間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說，‘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財的議會朋友們‘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議會調查和統計資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来获得了如我們所知道的异乎尋常的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宣布說，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萊斯頓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預算演說中除了描写資本家財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階級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鳴得意的話。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責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謊，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貿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問題并不在于格萊斯頓用来安慰和庆賀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說的只是，照格萊斯頓的观点，所謂工人階級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財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資本的辯护人——而格萊斯頓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辯护人之一——的正統学說正是认为，工人們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剝削者发财。”(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为了使泰勒先生滿意，我們还要补充一点：这里提到的格萊斯頓演說中的这个地方，在成立宣言第5頁上是完全引证了的，——就在有爭論的引文前面。可是泰勒先生最初指責的不就是这个宣言嗎？难道从他那里也得不到关于真正来源的提示，就像从道勃雷那里听不到任何合理的話一样嗎？

“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断出現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叫我們参看的“資本論”那一頁(第679頁)上注105的对象。的确，看来很像是馬克思由于他的 *mala fides* [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这样的矛盾似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馬克思既沒有刪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絕對沒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萊斯頓在演說中确实說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薩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話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們遺忘。

爰琳娜·馬克思

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諾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馬克思的“資本論” 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¹⁸²

最近出版英文本时，曾对許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訂，这是很必要的。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不辞劳苦，把所有引文的原文都找出来了，使占引文絕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轉譯，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須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細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頁碼弄錯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筆記本上轉抄时抄錯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錯誤）；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錯了位置（从筆記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譯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馬克思在 1843—1845 年在巴黎記的旧筆記本抄录的，当时馬克思还不懂英語，他讀英国經濟学家的著作是讀的法譯本；那些經過两次轉譯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話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的小錯誤和小疏忽也都这样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讀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細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內容有絲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沒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話（第 4 版第 562 頁注 47）；多半是馬克思把书名写錯了。¹⁸³ 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說服力，甚至由于現在更加确切

而更加具有說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个人所知，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柏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責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萊斯頓 1863年4月16日預算演說中的話（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資本論”第1卷第4版第617頁即第3版第671頁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篇文章的作者說，在“汉薩德”的（准官方的）速記記錄中根本沒有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这句话。他在演說中說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位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記不起这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萊斯頓說：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的話。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

有产階級。”

可見，格萊斯頓在这里是說，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至于准官方的“汉薩德”，馬克思接着說道：“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經過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說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財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話；不过，这是英国常見的議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 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

这个匿名作者愈来愈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材料，純貞地坚持說，按“慣例”只能根据速記记录引用議会演說；但接着他硬說，“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話）和“汉薩德”的报道（其中沒有这句話）“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說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談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謂“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謊”的文章，塞滿了极其难听的罵人話，什么«mala fides»〔“恶意”〕，“不誠实”，“捏造的材料”，“这个假引文”，“无耻地撒謊”，“完全是捏造的引文”，“这种捏造”，“簡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設法暗地里使爭論的問題轉向新的方面，并預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我們〈即这个“真誠的”匿名者〉认为格萊斯頓的話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見解还有很大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辯，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

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萊斯頓說，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薩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经过演说人审查过的“汉薩德”中却没有，用馬克思的话說，这是格萊斯頓“事后隐瞒了”。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者争辩。而匿名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馬克思以后再沒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些同剑桥大学有关的人曾传来一些謠言，说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犯了著作上的大错，但在这方面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載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塞德萊·泰勒。这个研究最温和的合作制度的人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謠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諾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萊斯頓演说时所怀的 mala fides〔恶意〕。卡尔·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諾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 (deadly shifts) 中还敢于断言，格萊斯頓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

士报’刊登他的演說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薩德’登載的演說記錄，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話。当布伦坦諾通过仔細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薩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絕對沒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給格萊斯頓的話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进行論战！”

“原来如此！”^① 布伦坦諾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劍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說中是多么輝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劍^②，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掙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們这位圣乔治的詭計。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的謊言”，什么“伪造”，而只是說“狡猾的断章取义”（craftily isolated quotation）了。整个問題完全轉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劍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辯，——因为“泰晤士报”拒絕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辯論归結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萊·泰勒先生回答說，在他看来，在馬克思和布伦坦諾之間的爭論中，

“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問題，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萊斯頓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說，“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萊斯頓的意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的书斋”）。——編者注

② 这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中福斯泰夫的話的改写。——編者注

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萊斯頓所說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諾所說，按“慣例”应当从“汉薩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不怀好意”，但我们这位劍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薩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不然怎么办呢？“汉薩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話！

爱琳娜·馬克思沒有費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駁倒了这个論据。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讀过1872年的論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現在就是在“撒謊”，他的撒謊表現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沒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沒有讀过这些論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無論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諾控告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現在他不是控告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話。其实這句話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頁上，只在这句所謂“增添”的話上面几行。至于格萊斯頓演說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馬克思指出了（“資本論”第618頁注105，即第3版第672頁）“1863年和1864年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断出現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萊·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琳娜·馬克思在答辯的結尾說：“事实上完全相反。馬克思既沒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絕對沒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萊斯頓在演說中确实說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薩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話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們遺忘。”

从此以后，連塞德萊·泰勒先生也閉口不言了。大学教授們所发动的整个這場攻击，在两大国持續二十年之久，而其結果是任

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像得到，正如布伦坦諾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薩德”像教皇般永无謬誤那样，塞德萊·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諾先生笔战获胜的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第13号 布伦坦諾的答复

“我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

1890年柏林版，第3—5頁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馬克思向大会提出了即将成立的国际工人組織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組織的成立宣言。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1863年4月16日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引起人們的注意：

“財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統計数字弄得眼花繚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則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萊斯頓先生补充說，——‘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1871年冬天，我在写作“現代工人公会”¹⁸⁴第2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參看該书第2卷第241頁）一下，增加工資就要进一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个經常不断地被重复的論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英国工会要求增加工資的时候，人們总是提出这个論点来反对它們。那时我想起了引自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別的許多人那样引用国际宣言上的話和1867年出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

第 639 頁上的相应的地方。我找来了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速記記錄，发现它虽然也指出，1842—1861 年期間工資的增长絲毫沒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也絲毫沒有减少他們对劳动的需求，可是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断正好相反，格萊斯頓說：“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沒有注意到那些免繳所得稅的人的状况……根本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財產和他們的收入的增长……但是如果我們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無論是农民或矿工，沒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們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在最近二十年中他們的生活資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們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沒有先例的。”

由于格萊斯頓演說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論断——在現存的国家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者必然愈富，貧者必然愈貧——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請在柏林出版的“工人問題杂志”“协和”的編輯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协和”編輯部建議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 1872 年 3 月 7 日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沒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據編輯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馬克思先前挑起的笔战之后，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許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辯。从論战后来的情况看出，不是馬克思本人捏造了謊言，而是他从一本誹謗性的小册子借用了一句捏造的引文；这本书是在 1864 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兌換論。1844 年銀行法。濫用金屬貨幣原則导致通貨貶值。从議事录看議會，‘交易所和 J. 貝爾納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伦敦，T. 考特萊·紐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 30 号，1864 年。这本頑固的瑟息替斯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政治經濟学著作及各种演說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詩歌以及嘲諷的評論。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如果現在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引入了歧途，并且在此之后开始引用正确的引文，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不过錯誤至少会糾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經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訂正引文而取消这个卓越的論点，可能会給宣传鼓动带来巨大的損失。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他們自己才掌握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們宁願

責備自己明知鐵的工資規律是錯誤的，却還是利用它作為唯一的宣傳手段，而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馬克思不放棄他的引文，力圖證明格萊斯頓事後刪改了自己預算演說的速記記錄；他現在用自己丑角插科打諢式的論戰中的粗魯話來攻擊那位在英國同行的協助下想抓住他的話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中的工廠主，而當證明了在格萊斯頓發表演說後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士報”上也載有和速記記錄意思彼此一致的這篇演說的報導的時候，他就如“協和”雜誌編輯部所描寫的，“像墨魚那樣行動起來，向水中放出黑色液體，把水弄渾，使敵人難於追擊，也就是說，他在毫無意義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爭論的目標模糊起來；而最後，他就逃之夭夭，聲言由於‘沒有時間’他不能繼續進行這一論戰”。當時他沒有對我刊登在1872年8月22日“協和”雜誌上的反駁他第二篇答辯的文章再作答辯。

我是發表在1872年3月7日、7月4日和11日以及8月22日“協和”上的文章的作者，這一事實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在馬克思還在世時出版的梅林的社会民主党史185第二版中也公開指明了我是這些文章的作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塞德萊·泰勒，研究了這一爭論，並就這件事寫了一封信給“泰晤士報”。由於當時馬克思已經去世，這就迫使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馬克思出面作答，愛琳娜在社會主義的“今日”月刊1884年3月號上不僅為她的父親的忠實辯護，而且最後指出，她的父親把據說格萊斯頓在演說中確實說過、而又用某種方法從“漢薩德”的速記記錄中抹掉的一句話重新恢復，使它不致被人們遺忘。

當時我已考慮用逐字逐句地轉載全部論戰文件來回答這種頑固地堅持錯誤引文的作法。但是編輯部經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和其他雜誌相比最適用於做這件事的專門雜誌，却拒絕轉載，它說，這種爭論沒有普遍意義。恩格斯顯然有不同的意見。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回顧了這一論戰，但是他在敘述這一論戰時，自然沒有揭露馬克思在論戰中所表現的不誠實。此外，他還原封不動地保留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4版第617頁）中強加給格萊斯頓的一句和他實際講的相反的話；不僅如此，馬克思在第一版中給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處只是：“1863年4月16日格萊斯頓在下院的演說”，而第四版在這個出處之外又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報’”，好像這個報紙的報導中包含着和馬克思所轉述的一樣的引文似的！可是就是在“晨星報”的報導中，也包含着所有被“兌換論”這本小冊子

刪去、而且后来也被馬克思刪去的話；這些話表明，格萊斯頓在他預算演說中談到所得稅材料的地方，談的只是繳納所得稅的人的收入，他是拿這些人和收入較少的、免繳所得稅的人相對而言的；這些話也表明，他根據所得稅的表冊肯定財富和實力有了令人陶醉的增長，同時他也指出，根據這些表冊肯定的收入的增長只涉及富裕的人，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為其餘的人的收入沒有載入這些表冊中；可是他並不認為，這種增長只限於這些階級，因為從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英國工人的狀況也同時獲得了任何國家和任何時代都沒有得到過的改善……

（以下的話和控告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問題的附錄”等等。——弗·恩格斯）

第 14 号 布伦坦諾答复的附錄的摘錄

（a）摘自“兌換論”，1864 年倫敦版，第 134 頁。

“從 1842 年到 1852 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在從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 20%！我的一位可尊敬的朋友說，這是因為澳大利亞的黃金造成的。我很遺憾，他深深地受了黃金問題的無稽之談的蒙蔽。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但是這種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品的價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麼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極端程度已經縮小。”

«Voilà l'homme en effet. Il va du blanc au noir.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Importun à tout autre, à lui même incommode,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①

“最近二十年來英國工人的狀況平均說來獲得了我們認為是異乎尋常的、歷史上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中都沒有先例的改善，這是一件極其令人滿意的事情，因為……工資幾乎不能使人獲得足夠的生活必需品”……

① 詩的譯文，見注 167。——編者注

为了确定“兌換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第1版第639頁）所作的結論之間的关系，值得注意下面的一点。馬克思把这里引自“兌換論”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格萊斯頓說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这句话对立起来，借以反駁格萊斯頓 1864 年 4 月 7 日的預算演說；“兌換論”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評論了 1864 年的預算，作为对刚才轉載的几頁的补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題外話中我們发现了下面的話（第 234 頁）：

“可是大臣雄辯地讲到了‘貧穷’……‘請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工資……在其他部門确实沒有提高……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为生存而掙扎’。”

現在我們把馬克思的話（第1卷第1版第640頁；第4版第618頁）和这句话比較一下。这里仍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复述預算演說的原文，而是同“兌換論”的完全一样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拚凑起来的混合物。在这里他也仍然沒有注明它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 1864 年 4 月 7 日格萊斯頓在下院的演說。下面更进一步說：“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來說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断出現的显著的矛盾。”（以下是前面引用过的莫里哀的四行詩）

显然，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莫里哀的文句，而且还借用了“兌換論”的作者所臆想出来的“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断出現的显著的矛盾”。

（b）如在說明这次轉載的序言中已經指出的，恩格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第4版第617頁上，又給照旧錯誤地引用的格萊斯頓預算演說的引文加上了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報”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篇演說的有爭論的地方已經根据“汉薩德”的速記記錄轉載在前面第 8—9 頁上。虽然在第 13 頁上已經同意思完全一致的“汉薩德”和只是为了便于報紙刊載而变得比較扼要的“泰晤士報”的报道作了对比，我們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報”的报道、恩格斯提到的“晨星報”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一次对比：①

① “泰晤士報”和“資本論”的引文的譯文，見本卷第 190—191 頁和第 157—158 頁。“晨星報”的引文和“泰晤士報”引文大致相同。——編者注

1863年4月17日

“泰晤士报”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inclusive,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s nearly as we can make out,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by 20 per cent. That is a fact so strange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1863年4月17日

“晨星报”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資本論”第1版

第639頁注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Now,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is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er,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y which in the business of production comes into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labour. (Hear, hear.) But we have this profound, and, I must say, inestimable consolation, that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extreme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we have the happi-*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But that augmentation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which go to the general consumption. So that we have this profound, and I almost say, inestimable consolation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Hear, hear.) At any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are less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that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it to be unexampled*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but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consumption —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At any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如上面那段轉載的話所表明的,“兌換論”在这里,从句子的中間把引文截斷,而加入了莫里哀的文句;馬克思,如前面的對比所表明的,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从“晨星報”引的引文,而是用一些圓點表明了被他刪去的一個地方之

ness to know, has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Cheers.) 后，一字不差地从“兌換論”引来了这句引文，迫使格萊斯頓在句子的中間結束……

improve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a degree which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which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and of any age. (Cheers.)»

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作为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的混合物，無論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汉薩德”中都沒有，而只有在“兌換論”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加了着重号的句子，正是亨利·罗伊，特别是卡尔·馬克思——請比較最后一句話——删去的句子，其目的是把同格萊斯頓实际上所說的話相反的东西强加給他。

第 15 号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报纸上的 議会报道摘录^①

“先驅晨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opinion that it i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晨邮报”。I may say,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① 这里摘引的各报的引文譯文，見本卷第 118—119 頁。——編者注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每日电訊”。I may say for one, that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alarm 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question to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stated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每日新聞”。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旗帜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第 16 号 格萊斯頓——布伦坦諾

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周报”¹⁸⁶ 第 49 期

簡 訊

路約·布伦坦諾在“德国周报”第 45 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轉載这次論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

这次論战的主要題目是格萊斯頓在 1863 年发表的一篇議會演說，这篇演說被馬克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組織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萊斯頓演說原文的爭論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萊斯頓自己。因此，格萊斯頓就轉載布伦坦諾和馬克思的論战材料問題寄給布伦坦諾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別重要的意义的。11 月 22 日格萊斯頓写信給布伦坦諾說：“您完全正确，而馬克思絕對錯誤”，11 月 28 日他又写信說：“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說明社会民主党的論证方法的特点的問題，可以认为已經最終解决了，而这个解决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不利的。

揭露騙局是布伦坦諾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爭論是特別合乎时宜的。

O. A.

第 17 号 恩格斯对第 16 号的答复

1891 年“新时代”第 13 期第 425 頁

关于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問題¹⁸⁷

我在給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談到路約·布伦坦諾先生曾經对馬克思发动的一場匿名的攻击——他控告馬克思似乎从格萊斯頓的一篇演說中捏造了引文。

对此，布伦坦諾在他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路約·布伦坦諾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 年——中作了答复。我即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答复。

可是在 1890 年 12 月 4 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 49 期上又刊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評，其中說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萊斯頓演說原文的爭論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萊斯頓自己。因此，格萊斯頓就轉載布伦坦諾和馬克思的論战材料問題寄給布

伦坦諾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別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萊斯頓写信給布伦坦諾說：‘您完全正确，而馬克思絕對錯誤’，11月28日他又写信說：‘我沒有做过任何修改’。”

这應該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馬克思絕對錯誤”？对什么东西“我沒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說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說是什么都不指。为什么布伦坦諾先生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句話呢？

要么是格萊斯頓先生不准他把整封信刊登出来。那末这就充分证明，这两句話什么也沒有证明。

要么是格萊斯頓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允許布伦坦諾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末只发表这两句什么问题也不能說明的摘出来的話就恰巧证明，格萊斯頓的話整个說来对布伦坦諾先生沒有好处，因而他把它“炮制”成了上面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句話的意思，我們不仅應該看到格萊斯頓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應該看到布伦坦諾先生的相应的信。在用原文发表他們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于解决爭論是沒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們的紙張。

弗·恩格斯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給 法国工人的賀信

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們：

正好二十年以前，巴黎工人像一个人一样起来反击受梯也尔领导的资产者和地主們的罪恶侵犯。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看到巴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梯也尔企图夺取巴黎工人曾经如此光荣地用来抵御了外敌侵犯，后来还要更加光荣地用来迎击凡尔赛雇佣军进攻的武器。为了摧毁起义的巴黎，地主和资产者們向普鲁士人乞求援助，并且得到了这种援助。巴黎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被敌人的优势压垮和解除了武装。

巴黎工人已经二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到处的情況都是如此；在一切文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都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到处都握有全部武装力量。

但是，結果如何呢？

結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在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預見到，終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絕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

当东京佬^①敢于覬覦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时候，我們在巴黎看到了这种情况；現在我們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俾斯麦的继承人^②要求帝国国会撥发經費，以便借助用金錢收买了的軍士来巩固軍队中的服从精神，而且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在軍士中出現的社会主义者太多了！¹⁸⁸

既然发生了这类情况，既然軍队中也出現了曙光，那就意味着旧世界的末日已經不远了。

让必不可免的事情发生吧！让走向沒落的资产阶級离开政权或者死亡吧！无产阶級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載于1891年3月25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27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

① 茹尔·費里。——編者注

② 卡普里維。——編者注

卡·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一书导言¹⁸⁹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¹⁹⁰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结束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¹⁹¹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¹⁹²，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¹⁹³，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內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間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連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終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众寡不敌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由于法国从 1789 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 1848 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们从 1830 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阶级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违背诺

言、公开嘲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复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兰西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 1814 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 1815 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 1866 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 1870 年爆发了，结果是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¹⁹⁴

必然的后果就是 1870 年 9 月 4 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了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 月 31 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

免在受敌軍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

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軍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軍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訂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凱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魯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軍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魯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締結了和約¹⁹⁵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統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軍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沒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在頒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紀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

和常备軍，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組成的国民自卫軍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規定把已經付出的房金轉作以后的預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鋪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員，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¹⁹⁶。4月1日規定，公社公務人員(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員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馬克)。次日頒布了一項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轉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禱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¹⁹⁷，这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4月5日，鉴于凡尔赛軍隊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頒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終沒有貫徹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軍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毀掉旺多姆廣場上由拿破侖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敵軍大炮鑄成的凱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決議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記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計劃，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結成一个大联盟的計劃。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紹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紹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剝削者們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紹所都交由巴黎二十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閉当鋪，因为这些当鋪是专供私人用来剝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毀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贖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訥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埃德将军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亵渎神圣的人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①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口气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

^① 达尔布瓦。——编者注

5月3日占据了木兰-薩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平，14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延伸到城墙跟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愈接近首都的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愈激烈愈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造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薩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

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經濟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魯东說，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参看“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198）。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組織大工业以至工場手工业，这种組織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結成一个大的联盟；簡言之，这种組織，正如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魯东学說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魯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間已經絕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間也像在“馬克思主义派”中間一样，完全是由馬克思的理論統治着。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階級中間还可以遇到蒲魯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們是按密謀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紀律团結在一起的，他們认为少数坚决和組織严密的分子在順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眾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們聚集在少数領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們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組織。正是軍隊、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侖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

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骯髒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

实际上却是統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

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纪念日子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
第2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
出版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西内战”

*关于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 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給霍賽·梅薩的信) 199

1891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梅薩：

从您3月2日的来信中得知您翻譯的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的西班牙文譯本即将出版，对此我們感到非常高兴。不用說，我們是热烈贊同这一版本出版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被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魯东理論，毫無疑問从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就从地平綫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資產階級激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取得麻痹工人的空洞詞句的一个巨大武庫。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輩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蒲魯东的空洞詞句，那末，在他們当中的許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套娓娓动听的空話就还能引起反响。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那里殘存的唯一的蒲魯东派，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資產階級激进派或共和派。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在你們那里，在你們的議會里和你們的报刊上也有这类共和派，他們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只是因为他們看到蒲魯东的思想是一种十分合适的手段，以使用資產階級的冒牌社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產階級意志的正

确而扼要的表现。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譯成西班牙文載于 1891 年
在馬德里出版的卡·馬克思
“哲学的貧困”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哲学的貧困”西班牙文
版,并根據法文草稿校對过

致負責在米兰組織保卫 劳动权利国际群众 大会的委员会²⁰⁰

亲爱的公民們：

万分遺憾，我不能够应你們这样盛情的、对我說来这样荣幸的邀請来参加你們在4月12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二十年以前，我曾經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書記的职务²⁰¹，我觉得同你們的国家有特別亲切的关系，因此，我就更感到遺憾。这个国际从那时以来在正式的形式上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上，它是始終存在着的；現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生命力，更加强大了；它現在是这样强大，以致1864—1875年的旧的正式形式，对于团结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紅旗下的千百万欧美工人說来，已显得太狹窄了。我同你們一道，希望你們4月12日的群众大会将把新的战士队伍引导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大軍中来；希望群众大会将对巩固意大利工人同他們的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兄弟們——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团结关系作强有力的推动；最后，希望群众大会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年来，我們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还要做許多工

作,才能指望取得迅速的和牢靠的胜利。Dunque, avanti, sempre avanti!〔因此,要前进,永远前进!〕

弗·恩·

1891年4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卡·馬克思“僱傭劳动与資本” 1891年单行本导言²⁰²

这部著作最初問世是在 1849 年，从 4 月 4 日起以社論的形式陸續发表在“新萊茵报”上。它的基础是 1847 年馬克思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²⁰³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載完；虽然在第 269 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字样，但这个諾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頓、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²⁰⁴，——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 年 5 月 19 日）。这部著作的續稿，在馬克思的遺稿中始終沒有发现。²⁰⁵

“僱傭劳动与資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 1884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印书館”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現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銷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問題：在这种情况下，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 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 1859 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論点不同，并且从較晚的著作来

看，有些用語和整个語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讀者都有无可爭議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連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說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場合，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論述同他的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預先告訴讀者：这本小册子現在已經不是像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那样。况且原本已經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編入全集再版以前，这已經够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結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資向資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現在这一版上則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們解释，是为了使他們知道，这里并不是純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牽涉到全部政治經濟学中一个极重要的問題。向資產者們解释，是为了使他們确信，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經濟結論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問題却終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經濟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襲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

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記賬和計算价格來說，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显的謬誤和混乱。

政治經濟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內，不断地发生变动；它們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純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經濟学作为科学出現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找出隱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規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搖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搖摆所圍繞的穩定的軸心。一句話，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調节价格的規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說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結果古典政治經濟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經濟学就认为滿足了。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誤会起見，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够了。馬克思曾經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創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該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們現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經濟学家們一起簡單地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們在这里总是以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馬克思 1859 年

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資本論”第一卷里找到²⁰⁶。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們馬上就陷进一連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們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們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們就絕對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們絲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轉。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說：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費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費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們不得不对邏輯施加一些暴行。他們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費用（遺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費用。而这种生产費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時間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門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狹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資本主义生产占統治的条件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階級，只有为生产資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資料占有者工作以掙得工資，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費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階級能够以必要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幣价格。現在我們假定，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幣价格是平均每

天三馬克。

这样，我們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資本家那里得到一天三馬克的工資。資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譬如說——十二小时。在这当中，資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們所說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鉗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銅——值二十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損耗，按一天時間和按一个工人計算，值一馬克。一天的工資，照我們的假定是三馬克。总共算起来，我們所說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費二十四馬克。但是資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二十七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費用多三馬克。

資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三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說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們所說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二十七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二十七馬克当中，有二十一馬克是在我們所說的这个鉗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經存在的价值；二十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六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們那些經濟学家自己的假定，这六馬克只能是从我們所說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十二小时的劳动創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六馬克，这样我們就会終於发现什么

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們所說的这个鉗工說，——“六馬克嗎？但是我只拿到三馬克呀！我的資本家向天发誓說，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三馬克，假使我向他要六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說前面在談到劳动价值問題的时候，我們曾經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現在我們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們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們所找到的却多于我們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說来，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三馬克；对于資本家說来却是六馬克，資本家从这六馬克中拿出三馬克作为工資付給工人，而其余三馬克則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們把由貨幣所表現的价值归結为劳动時間，那末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謬了。在十二小时劳动時間內創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說，在六小时內創造的是三馬克，即工人劳动十二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十二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十二等于六！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謬的。

不管我們怎样掙扎，只要我們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們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經濟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經濟学走入了絕境。从这种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馬克思。

經濟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費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費用，

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費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馬克思說：“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²⁰⁷ 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資本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費用一致的；那些被經濟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費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这样一来，我們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进而談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馬克思在論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节）²⁰⁸。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給資本家之后，就是說为了获得預先讲定的工資——計日或計件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給資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資本家把这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場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經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輔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日工資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三馬克，——至于他是計日还是計件获得这笔工資，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們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時內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增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資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實現的。从这六馬克中，他付給工人三馬克，剩下的三

馬克則留給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里生产六馬克的价值，那末在六小时里他所創造的就是三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資本家工作了六小时之后，就已經把包含在工資中的三馬克等量价值偿还給資本家了。在六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訖，誰也不欠誰一文錢。

“等一等！”——現在是資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十二小时。六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六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們才算是两訖！”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簽訂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六小时的劳动产品，應該去工作整整十二小时。

計件工資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們所說的这个工人在十二小时内制成了十二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損耗共計二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两个半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設的同样条件下，資本家只付給工人每件商品二十五分尼。十二件就是三馬克；要得到这三馬克，工人必須工作十二小时。資本家从十二件商品上得到三十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損耗共二十四馬克外，还剩下六馬克，从这六馬克中，他拿出三馬克作为工資付給工人，而把其余三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六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資而工作六小时（在十二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資本家工作六小时。

那些优秀的經濟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們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見了。在我們現代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問題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

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創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現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項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費用的那个余額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工資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時間就在縮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時間却在延长。

这就是全部現代社会的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階級。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現，是在我們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現。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階級的劳动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階級从他們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資本家階級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須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随着每一項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計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縮減。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終於造成一种定会使現代資本主义經濟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計量的財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絕大多数人口无产階級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階級，这就使得

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避免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逝；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²⁰⁹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載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
第109号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
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馬克思“雇
佣劳动与資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雇佣劳动与資本”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四版序言²¹⁰

我曾經預料，这一著作对我們的德国工人來說困难是不多的，現在这个預料已被证实。至少从 1883 年 3 月第一版問世以来已經印行了三版，总数达一万册，而且这是在已經升天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統治下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证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現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軟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譯本。帕斯夸勒·馬尔提涅蒂翻譯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1883 年貝內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① 1884 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載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 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1886 年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6 年海牙版。²¹¹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門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門过去談得

^① 在原文中这一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編者注

的确太少；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的地方关于当时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²¹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 (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²¹³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①早就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作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增订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②

因此，我仔细地全文重新校阅了一遍，并作了许多补充，我希望在这些补充中充分地估计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仍然竭力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但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

① 約·狄茨。——編者注

②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这一句的末尾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社来说仍然还是极其罕见的”。——編者注

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間或有人非常热衷于仿效英国的这一榜样。

我的这本书已被譯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譯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馬尔提涅蒂譯,并經作者审閱,1885年貝内万托版。后来譯成羅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昂·納杰日杰譯,載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雅西出版的“現代人”杂志。以后又譯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桑·特利尔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譯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²¹⁴

* * *

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談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經”的影响之下。人們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詳尽的这种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現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似乎根本没有經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誠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順序排列起来,它們彼此并立而沒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說在古代的个别民族中間,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間,世系不是依父亲而是依母亲来算,因此,女系被认为唯一有效;在今天的許多民族中間,在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詳細的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見到,——这种种事实誠然已經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更多。但是沒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們,甚至在爱·伯·泰

罗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年)一书²¹⁵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許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可笑琐事相提并論。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論”²¹⁶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論点:(1)最初在人們之間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詞“杂婚”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女系——母权制——来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輕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見,这种尊敬和威望竟达到了完全的妇女統治(Gynaikokratie)的程度;(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实际上就是侵犯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內献身于他人来贖罪或贖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认为他非常认真地从古代經典著作中搜集来的許多段落,可以作为这些論点的证据。由“杂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見,——特別是在希腊人中間——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侵入体现旧观念的傳統神;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們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們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庫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沒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間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

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令人吃惊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²¹⁷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杀死他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此事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杀害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但是，阿波罗却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精彩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

像当年的埃斯庫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說，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創造了奇迹：推翻了母权制，代之以父权制。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結蒂会成为純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細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远非始終有益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貶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徑的研究者的功績：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談，而提出古代經典著作中的許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許多民族中間，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的权利，必須以在一定限度內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分已經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們、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們再也沒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誠然，巴霍芬并沒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論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論点，而这在 1861 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本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現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沒无聞。1865 年在同一領域里出現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沒有听說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約·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驅者正好相

反。在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字斟句酌的辩词。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末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足够地找到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尖锐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末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像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期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血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有关系。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

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因此，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来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掳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末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页)²¹⁸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不了解这种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他们都是麦克伦南材料的来源）的更早的个别记载，累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嘉人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²¹⁹，并指出，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世界的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1847年在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²²⁰也证明了在这个部落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沒

有把問題弄清楚；他經常說到“只依女系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較早发展阶段說来是正确的用語也应用于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按女系来算，但亲属关系也从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一种局限性，法学家創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術語，就繼續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論，虽然好像合理，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这样一件显著的事实，即〈假装的〉搶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即依男系算的世系〉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中間表現得最明显”(見“古代史研究”，第140頁)。

而且，他又說：

“奇怪的是，据我們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地方，从来没有杀嬰的习俗。”(同上第146頁)

这两件事实是和他的說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說来对抗它們。

可是，他的理論在英国仍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响应：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創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权威。他那把外婚制“部落”与內婚制“部落”对立起来的理論，虽然人們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統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不抱成見的观察、从而任何坚决的前进步驟都成为不可能了。鉴于在英国，而且別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績估价过高，我們应当着重指出，他那純粹出于誤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內婚制“部落”的

对立理論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現愈来愈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論的纖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一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間,存在过几个男子共同占有几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并且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²²¹)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 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許多方面說来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是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級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問題和表格,搜集了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材料,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許多部落,并且以略加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許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島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說明。(3)但是,除了这种婚姻形式,在这些島屿上还存在着一种只有用更古老而如今业已消灭的群婚形式才能說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得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結論,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一书²²²中,因而把爭論轉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領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它相应的家庭形式,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徑及进一步窺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得到胜利,麦克伦南的精心設計的理論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

起而为自己的理論辯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說来完全人为地編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們的每一个論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爭辯的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一个人的舅父和他的外甥之間有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0章），根据凱撒关于不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記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記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結論說，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檢察官讲话，他在起訴时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却要求辯护人每句話都要有最严格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純粹的虛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許多。根据他的意見，摩尔根所說的亲属制度，乃是純粹的社交礼仪的規則，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們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會員和英国同业公会會員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說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辯护是极端軟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沒有遭到反駁。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內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沒有被动搖，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們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給这个对立所做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是相矛盾的。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內娶妻，而另一种則絕對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辯駁的真理。請參看例如吉罗-特龙的“家庭的起

源”(1874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版)²²³。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²²⁴(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猜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論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初形式。希腊的及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这个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論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繪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許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

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剽窃了。但是我们在他们之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正应归功于摩尔根。在英国，人们尽可能地对他的这一著作完全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著作来敷衍了事；对于他的记述中的个别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于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显然受到千方百计的抵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原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对于英国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不得求助于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²²⁵ 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在原始

历史学领域内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经过一妻多夫制、抢夺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內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視為放肆的邪說；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瀆圣罪。加之，摩尔根用以打破这些教条的，又是这样一些一經說出来便立即为人人所明白的論据；因此，一直无法摆脱外婚制与內婚制之間的矛盾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現在簡直要敲着自己的脑門大叫起来：我們为什么竟这样愚蠢，自己沒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說即使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冷淡地把摩尔根撇在一边，那末他还有一个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像傅立叶那样地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評，而且还用了只有卡尔·馬克思才能用的字眼来談論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得到了应得的惩罚，麦克伦南忿然地責难他“根本仇視历史方法”²²⁶，而且日内瓦的教授吉罗-特龙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吉罗-特龙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宮中，全仗摩尔根才被救了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沒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間，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們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見解。結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說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資料，不論在什

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說，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6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1期和189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根据“新时代”杂志校对过

^① 我于1888年9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前罗彻斯特选区的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分住在罗彻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在华盛顿陆军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帮助，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感到兴趣，并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的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給奧地利黨第二次代表 大會的賀信²²⁷

1891年6月26日于倫敦

敬愛的同志們，

請接受我對你們盛情邀請我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最真誠的感謝；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能親自前來參加；我謹在此表示我最好的祝願，祝代表大會工作順利。

自從奧地利的工人政黨在加因斐²²⁸重新站穩腳跟以來，你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你們這次代表大會將成為取得新的更大勝利的起點的最好保證。

我們黨具有多么不可摧毀的內在力量，它用來證明這點的，不僅是它迅速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不僅是它今年在奧地利就像去年在德國那樣徹底結束了非常狀態²²⁹。它用來證明它的這種力量的，尤其還有這樣一點，即它在所有國家內都在克服所有從有產階級中補充自己隊伍的其他政黨所無法應付的困難，完成它們所無能為力的事業。當法國和德國的有產階級彼此懷恨在心，相互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敵意時，法國和德國的無產者卻手攜手地一致行動。而在你們奧地利，當各個省的有產階級由於盲目的民族仇恨而喪失最後一點點統治能力時，你們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將

向它們顯示出一個沒有任何民族糾紛的奧地利的面貌，一個工人的奧地利的面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 1891 年 7 月 3 日“工人報”第 27 號
和 1891 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小冊子“1891
年 6 月 28、29 和 30 日在維也納舉行的
奧地利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記錄”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報”，并
根據小冊子校對過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綱領 草案批判²³⁰

写于 1891 年 6 月 18 日和 29 日之間

第一次发表于 1901—1902 年“新时代”
杂志第 1 卷第 1 期（沒有附件）；并用
俄文全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6 年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現在这个草案²³¹大大优于以前的綱領²³²。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濃厚殘渣,基本上已被清除;草案在理論方面整个說来是立足在現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討論。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緒論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一 緒論部分(十段)

概括說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結合的东西結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綱領,又是对綱領的**解释**。唯恐写得簡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說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帶水。在我看来,綱領应当尽量簡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讀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說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了解,就能牢牢記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論述絕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做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計过低。比最簡洁最扼要的綱領还难得多的东西,他們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說非常法时期使

得給新参加进来的群众以充分的教育这一工作难于进行，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那末現在，当我們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閱讀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嘗試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話，我預备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現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談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場”……“的分离”——，这里的三个詞都是說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Bergwerke]，用这个最慣用的詞来表达一切，因为在我国，即使它們是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我认为还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第二段。我认为在这里要插进：“社会的劳动資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要插进：“……对劳动資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关于这些老爷們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財產”据为己有这一点，在第一段中已經說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詞用进来，才在这里又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詞，都不会使意思有任何增加。而在綱領中是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綱領。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資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資料。在蒸汽机出現以前，沒有蒸汽机也行，但現在沒有它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資料都直接地或間接地——或者根据它們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是社会的劳动資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目前存在的東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引起任何誤解。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s vom Jahre 1891

Das jetzige Programm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vorstandes ist ein Programm, das sich in der That als ein Programm darstellt, das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rklasse zu vertreten vorgibt, während es in Wirklichkeit nur die Interessen der Bourgeoisie zu vertreten sucht. Das Programm ist in jeder Hinsicht ein Programm der Bourgeoisie, das die Arbeiterklasse zu betrogen sucht.

Es besteht aus 3 Abschnitten: 1. Der Kampf gegen die Bourgeoisie, 2. Die Forderung der Demokratie, 3. Die Forder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I. Der Kampf gegen die Bourgeoisie

In dem Programm wird behauptet, dass die Bourgeoisie die Arbeiterklasse zu betrogen hat und dass die Arbeiterklasse sich gegen die Bourgeoisie zu wehren muss. Dies ist eine alte Fabel, die seit Jahrhunderten erzählt wird. Die Bourgeoisie hat die Arbeiterklasse nicht betrogen, sondern sie hat sie befreit. Die Arbeiterklasse hat sich nicht gegen die Bourgeoisie zu wehren, sondern sie hat sie zu überwinden. Das Programm ist ein Programm der Bourgeoisie, das die Arbeiterklasse zu betrogen sucht.

弗·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的开头部分

如果这段末尾是仿照国际章程的緒論部分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它写，即：“社会貧困（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²³³ 体质衰退已包含在社会貧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演說詞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綱領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須修改。

“在个人所有者的統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談的是一个經濟事实，也就应当从經濟上去加以說明。但“个人所有者的統治”这个說法則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所說的情况是由这一伙强盜的政治統治造成的。第二，属于这种个人所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資產者”是指什么呢？它是第三类个人所有者嗎？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資產者”嗎？既然談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給我們德国整个骯髒腐敗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記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殘余却可以不提嗎？）。农民和小資產者也是“个人所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綱領中都沒有提到他們，因此在表述中應該使他們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說的个人所有者的范疇之內。

“劳动資料和被剝削者創造的財富的积累。”

“財富”是由（1）劳动資料、（2）生活資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財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財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連結起来，这是既不合語法，也不合邏輯的。

“……在資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說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資產者”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这里只要举出資本家就够了，那末上面也只要提到資本家就

够了。如果要詳細談，單單舉出資本家是完全不夠的。

“無產者的人數和貧困越來越增長。”

這樣絕對地說是不正確的。工人的組織，他們的不斷增強的抵抗，會在可能範圍內給貧困的增長造成某些障礙。而肯定增長的，是生活的無保障。我以為要將這一點寫進去。

第四段。

“根源於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的無計劃性”

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據我所知，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社會形式，是一個經濟階段，而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則是在這個階段內這樣或那樣表現出來的現象。但是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呢？那是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可是這種生產已經愈來愈成爲一種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爲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着和壟斷着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刪掉“私人”這兩個字，這個論點還勉強能過得去。

“廣大人民階層的破產”。

這種演說詞句會使人覺得，似乎我們還在爲資產者和小資產者的破產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會這樣說，而只會說明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由於城鄉中等階層，小資產者和小農的破產，使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鴻溝更加擴大了（或加深了）。”

結尾兩句把同一件事說了兩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個修改方案①。

① 見本卷第279頁。——編者注

第五段。“原因”應該是“其原因”，这大概純粹是笔誤。

第六段。“矿山、矿井、矿場”，見上面关于第一段所談的。“私人生产”，見上面所談的。我认为应当这样說：“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謀利的現代資本主义生产轉变成成为全社会謀利和按預先拟定的計劃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轉变所需要的……創造出来，并且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轉变，工人階級的解放，从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认为要像第一部分附件中所建議的^①那样写。

第八段。“有階級觉悟的”，这在我們中間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簡略說法，但是我认为，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譯成外文起見，不如用“认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說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第十段。在“階級統治”后面，少了“和階級本身”几个字。消灭階級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階級，消灭階級統治在經濟上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提議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們來說，是对資產階級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別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資產階級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能够”，我看不如删去。“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究竟是誰?)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可以包括一切：保护关税和貿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經營自由，农业貸款，交換銀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

^① 見本卷第 280 頁。——編者注

要說的，前面的句子已經說過了，完全沒有必要特別說明，我們在要求整体时，也就是指它的各个部分；我认为这样会把印象冲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来轉到个别的要求上面去，那末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力爭一切足以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設施”，因为重复，應該删掉）。或者，更好是直截了当地談这里所牽涉的問題，即必須補上資產階級所耽誤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①。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評論，以及論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議，是很重要的。

二 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沒有說本来应当說的东西，即使这十項要求都如愿以偿，我們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德意志帝国宪法，以交給人民及其代議机关的权利来衡量，不过是1850年普魯士宪法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东西，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議院連否决稅收的权利也沒有，正如在宪制冲突时期所证明的，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²³⁴ 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魯士議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內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魯士和罗伊斯-格萊茨-施萊茨-罗宾斯坦²³⁵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

^① 見本卷第280頁。——編者注

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間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資料轉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謬的。

談論这个問題是危险的。但是,無論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現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現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項法律統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現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們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現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問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掙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須用暴力来炸毀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須再炸毀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将贖买王朝的問題,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軟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議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盖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問題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

意义的問題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討論而認識模糊和意見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結果呢？难道應該重演曾經在保护关稅問題上发生的事情嗎？当时有人把保护关稅宣布为只与資產階級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的問題，因此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投票，而現在有許多人都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轉而热中于保护关稅主义的資產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頓和布萊特的經濟詭辯，并且把最純粹的曼徹斯特主义作为最純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²³⁶ 为了眼前暫时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現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終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誠的”机会主义也許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險。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 如果說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党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產階級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經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們的优秀分子像米凱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許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綱領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統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連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綱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靜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問題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應該而且能够写到綱領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議机关之手的 yêu求。如果我們不能再多走一步，暫

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須結束。——只要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的保留权利²³⁷依然存在，而例如紹林吉亚的地图仍然呈現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你就試試看去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魯士必須停止存在，必須分解为几个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魯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魯士主义就是德国現在正受其鉗制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終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現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說来現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經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島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議會虽然是統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純粹消极的一員。对德国說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別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組織；其次，与国民議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議院，在联邦議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資格参加表决。前一点我們已經順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們这里就是联邦會議，我們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說来，我們的“联邦制国家”已經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們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給予它以必要的补

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現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現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 1798 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国²³⁸ 没有什么不同。从 1792 年到 1798 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鎮，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們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組織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經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給我們证明了，而現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給我們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鎮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鎮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鎮长官，这在讲英語的国家里是絕對沒有的，而我們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現象，就像消除普魯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以上所說的一切，只有不多的东西是应当写进綱領中去的。我之所以談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說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許公开談論这类东西的，——从而同时強調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徑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騙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費司法（这两項我們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問題一夜之間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事先进行討論，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到那时該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綱領中去，并且至少間接地可以作为对不能正面說出的事情的暗示的：

“省、专区和市鎮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

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談到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綱領要求，我在这里比你們在当地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問題最好趁現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討論。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間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那末無論如何也要說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說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針对什么而言呢？是針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針对人民代議机关的決議呢？这是应当加以补充的。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視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資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們的胡說。）

(6)关于“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就失去意义了，它是属于前一段的。

(8)和(9)这里我希望你們注意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1. 律师，2. 医师，3. 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付托給卡普里維先生呢？而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絕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一点相一致呢？

(10)这里，我认为要这样說：“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鎮的一切靠征稅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稅。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間接稅、關稅等。”其他都是多余的、使印象冲淡的解释或論证。

三 經濟要求

关于第二点。結社权还需要防范国家的侵犯而予以保护，这在德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厉害。

最后一句“为了調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了大騙。这样，在許多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为此只要工人中有一个是害群之馬就够了。如果没有談妥在爭論的时候两半分开来表示意見，那末，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要好得多。

最后，我請你們再用法国的綱領²³⁹来对照一下。在那个綱領里，正好是在第三部分，有些东西似乎談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綱領²⁴⁰可惜因時間仓卒沒有找到，它也有許多方面是很好的。

第一部分附件

(1) 删去“矿井、矿場”，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2) 社会的劳动資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剝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經濟上受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貧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3) 在这种剝削制度的統治下，被剝削者所創造的財富的积累在剝削者——資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階級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等等。

(4) 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資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間的鴻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資料的所有者階級已經丧失担当經濟領導和政治領導的使命和能力。

(5) “其”原因。

(6) ……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謀利的資本主义生产轉变成成为全社会謀利和按預先拟定的計劃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轉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資本主义社会本身創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轉变，工人階級的解放，从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7)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不言而喻，工人階級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業委託給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敵人和剝削者，也不可能委託給小資產者和小農，小資產者和小農自己已被大剝削者的競爭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剝削者一邊或站到工人一邊以外，別無其他選擇^①。

(8)……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並從而把對工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權力集中於一手之中……

(10)……階級統治和階級本身^②、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末句刪去)。但是，德國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礙着它為人类的……鬥爭。首先它必須為運動爭得自由的場所，必須掃清大量的封建主義和專制制度殘余，一句話，就是必須完成德國資產階級政黨由於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過於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應該把其他文明國家里已經由資產階級親手實現了的各種要求也寫進自己的綱領中。

① 最後半句原來是：“不是依附於大剝削者，就是掉進無產階級的隊伍，也就是說，不是成為工人階級的敵人，就是成為工人階級的附屬品”。後來被划掉，用鉛筆改成：“除了站到……別無其他選擇”。——編者注

② “和階級本身”這幾個字是用鉛筆寫的。——編者注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摘自給保·拉法格的信)²⁴¹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我們有充分理由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滿意。

代表大会投票贊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是很好的;旧的国际以此結束,新的国际則以此开始。这簡直是海牙代表大会²⁴²的決議在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向英国工联敞開大門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步驟证明: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約束的表决結果表明,我們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多梅拉·紐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經把高調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們已經認識到自己所担負的責任;他們是一个組成为“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說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欧洲局势

俄国已經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其他国家的

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1891年小麦歉收估计为1150万百升，黑麦歉收为8700万或1亿百升，而这后一种歉收主要涉及两个消费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于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来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至少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被迫采取主动来召集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²⁴³）。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照例将下得太迟）。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的分裂。大土地占有者、«ruraux» [“地主议员”、“乡下佬”]^①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会党人法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

^① 对1871年法国反动的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轻蔑叫法，恩格斯用来称呼德国容克。——编者注

会得到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失去自己的障地而形成一個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各种握有统治权的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以及一部分主张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末，在1898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没有这样厉害。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引起了我们已期待二十五年之久的英国的工业危机……那末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9月12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德国的社会主义²⁴⁴

主要部分写于 1891 年 10 月，德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写于 1892 年 1 月

载于 1892 年在利尔出版的“1892 年工人党年鉴”（没有前言和结束语），并载于 1891—1892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19 期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译文的主要部分译自“1892 年工人党年鉴”，并根据“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校对过；俄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译自“新时代”杂志

下面是我应我們的巴黎朋友的請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譯文。我认为，不論对法国社会主义者來說，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來說，我都有責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來說，这是因为應該让德国的人們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討論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沒有一切资产阶級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來說，这是因为他們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說了他們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說話。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五十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許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記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們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爭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

—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 年 1 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①。

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 1862 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 1848 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②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²⁴⁵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

①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德译文中不是“同样地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是“都光荣地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纯粹的共和派的机关报”。——编者注

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①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关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²⁴⁶。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愈来愈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②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议员^③面前，这种沿袭下来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²⁴⁷。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而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编者注

弟就永远构成一个統一的、团結的家庭。如果說当时还有把他們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末承蒙俾斯麦在 1878 年頒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使得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錘击一样襲击着他們所有的人,把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彻底錘炼成了一个統一而一致的整体。現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薩尔全集的正式版本²⁴⁸,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薩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綱領中的道地的拉薩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詳細地闡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变故、厮杀、失敗和胜利呢? 当 1866 年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門时,党有两个議員^①和数十万选民;現在它有 35 个議員和 150 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 1890 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經過十一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而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 年时,資产階級議員^②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現在,不管他們是否乐意,也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那代表未来的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击潰了俾斯麦,并在十一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滾滾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壩,淹沒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万第^③,这个党現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給社会党人的票数:

① 奧·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內西。——編者注

② 在德譯文中不是“資产階級議員”,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的議員”。——編者注

③ 在德譯文中不是“万第”,而是“农村地区”。——編者注

1871年.....101 927	1884年..... 549 990
1874年.....351 670	1887年..... 763 128
1877年.....493 447	1890年..... 1 427 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1895年选举中至少得到250万张选票；而到1900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①中的350万至400万。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年保守党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1377417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1177807张选票；进步党人（激进派）^②得了1159915张选票；天主教徒^③得了1342113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

① 在德译文中“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进步党人（激进派）”，而是“德国自由思想派”。——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央党”。——编者注

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²⁴⁹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²⁵⁰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 200 万^① 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② 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200 万”，而是“200 万至 300 万”。——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

二

上面所說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經濟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繼續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許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①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經濟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錯誤。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內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視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視。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亚尔薩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沒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²⁵¹后的第二天就能預見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說：“难道条頓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們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

^① 在德譯文中补充有：“其結果会怎样呢？”——編者注

嗎？如果軍事上的僥幸、勝利後的驕橫以及王朝的陰謀把德國推到宰割法蘭西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國就只有兩條路可走。它必須不顧一切成為俄國掠奪政策的公開的工具，或者是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後重新開始準備進行另一次‘防禦戰爭’，但不是進行那種新發明的‘局部’戰爭，而是進行種族戰爭，即反對斯拉夫種族和羅曼語種族聯合勢力的戰爭。”²⁵²

毫無疑問，和這個德意志帝國相比，連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也代表革命，——誠然只是資產階級革命，然而總歸是革命。但是一旦這個共和國屈從於沙皇俄國，情況就會改變。沙皇俄國是西方各民族的敵人，甚至是這些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敵人。如果沙俄匪幫侵入德國，他們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發展而是毀滅，不是進步而是野蠻。法國同沙皇攜手合作，不可能給德國帶來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個法國將軍侈談德意志共和國，他就會被整個歐洲和美洲嗤笑。法國會不得不背棄自己的革命作用^①，而允許俾斯麥帝國把自己裝扮成同東方野蠻對立的西方進步的代表。

但是，現在在官方德國的背後有德國社會民主黨，國家的未來、國家的最近的未來是屬於這個黨的。一旦這個黨取得了政權，如果它不糾正它的前任對其他民族所幹的非正義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運用這個政權，也不能鞏固這個政權。它一定要準備恢復現在被法國資產階級如此卑鄙地出賣了的波蘭；它一定要讓北什列斯維希和亞爾薩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願去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國能自己當家作主，所有這些問題就不難

^① 在德譯文中不是“背棄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棄自己在歷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編者注

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間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問題，这个問題将在瞬息之間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嗎？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們的不耐煩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嗎？这样做合算嗎？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軍費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許多甚至在尔虞我詐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間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說，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則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經濟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賭，只要維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純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語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經綽綽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錘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只得把旧普魯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給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維希割让給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給法国。即使法国拒絕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給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

之間的永远敌視的根源^①。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②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侖在提尔西特和約以后强加給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場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間它将是沙皇的順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記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不論是沙皇、法国的資產階級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們三者來說都是敌人的政党。我們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廢墟上握手言欢，我們也許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維（或者他們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③，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內作出的牺牲，它已經爭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沒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內使政权轉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崗位^④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如果說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鎮压，那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們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們毀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嗎？应当不加

① 在德譯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糾紛的苹果”。——編者注

② 在德譯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編者注

③ 在德譯文中不是“努力”，而是“战斗”。——編者注

④ 在德譯文中补充有：“直到最后一个人”。——編者注

抵抗就放弃已經爭得的、他們必須对全世界无产階級負責的那个崗位嗎？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們必須坚守所有已經占領的陣地，不向內外敌人投降。而他們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誰——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遺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來說，法兰西共和国也許能代表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坦、魯維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來說，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來說，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階級革命的。

一場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來說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場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須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縛。但是我們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們沒有忘記法国在1793年为我們提供的那个光輝范例²⁵³。1793年的一百周年紀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資產階級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緒要阻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請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紀的法国长褲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坦先生的士兵闖进德国国土，人們将用“馬賽曲”的这句歌詞来迎接他們：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軍隊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揚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約十年的時間里取得胜利。战争則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內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敗，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間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擲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們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論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現在的德国政府取得軍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資產階級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 1 500 万到 2 000 万武装人員互相殘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廢墟，以致于旧的資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 * *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結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資產階級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檳酒灌得暈头轉向²⁵⁴，而在塞納河和馬尔納河之間 1814 年戰場上的大規模軍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頂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議會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討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間在紧要关头发生誤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說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

爭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債²⁵⁵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馬克的公債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銀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債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額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 000万馬克的債券，这样，公債就只推銷了24 000万馬克，而不是4亿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揚出去的想法发行公債的企图，——这次計达8亿馬克，——也遭到了惨敗。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資本沒有一點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揚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規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沒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見；就連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沒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轉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絕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

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²⁵⁶；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①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則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貧瘠的荒蕪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場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們，——而农民沒有它們就活不了，——他必須付錢給地主。

为了使土地貴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貴族以国家債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領到了全部資本化了的贖金，而农民則必須在許多年內分期偿付这笔贖金。正如預料中的那样，貴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錢財大部分揮霍掉了，而农民則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貨幣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經濟的条件下抛到了貨幣經濟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納不多的稅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現金支付，而現在他不仅必須靠划給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須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場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飼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須交納比以前更重的稅，以及年度贖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現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競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市場，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貨幣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手工业則完全受商人，即中間人、薩克森式的 *Verleger* 或英国式的 *Sweater* 摆布，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資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話，誰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讀一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場的形成本”那一章（第24章，第5节）²⁵⁷ 就够了。

布阿吉尔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統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

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經濟轉变到貨幣經濟这个为工业資本建立國內市場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²⁵⁸ 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規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經濟轉变到貨幣經濟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漸地被引入工場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則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渦，如果說工場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則是用連发枪打他們。

这就是当 1891 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許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說使自己的官吏特別慣于盜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習慣和制度，一部分在 1861 年后被經濟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統地鏟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毀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飼料不够吃，后来則由于同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話，我們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經濟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銳形式的深刻的

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 (kulaki) 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致“人民之友报”編輯部²⁵⁹

1891年1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們：

請接受我对你們盛情邀請我参加“人民之友报”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最真誠的感謝。遺憾的是，我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因为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的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这一卷終究要出版才行。因此让这封信来代替我吧。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衷心地向你們光荣的紀念日表示祝賀。我知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其他治安法的限制下，使“人民之友报”这样的战斗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維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至少大体上也能够想像出在这十年当中为此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你們能够不顾一切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更加增添你們的光彩；要知道，奥地利的出版法以有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說来沒有危险性作为出发点，它的目的看来正是想通过对工人报纸的經費施加压力，来使它們不是淪于破产，就是变得馴服听话。如果說布隆的工人不顾这种財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十年內一直出版自己的报纸，絲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末，这就是現在只有在工人中間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又一证明。

当我結束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对这样的現象再一次表示

最大的喜悅：正当青年捷克的²⁶⁰和古老德国的資產者到处相互仇視的时候，捷克工人和德国工人却团結一致肩并肩地为整个无产阶級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

再一次衷心地感謝和祝賀你們。

你們的老头 弗·恩格斯

載于1891年11月25日
“人民之友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之友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致“每日紀事报”編者的 声明的附函

閣下：

茲对一項前所未有的无耻譏言²⁶¹ 做一答复，随信寄上^①，請予刊登，以明历史真相。

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紀事报”，竟允許其外国通訊員对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及其領袖散布誹謗譏言，对此我感到遺憾。

謹致崇高的敬意

写于 1891 年 11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第 1 版第 28 卷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① 見本卷第 307—308 頁。——編者注

关于已故的馬克思夫人

致“每日紀事报”編者

閣下：

貴报巴黎通訊員在本日貴报晨刊上，除对我的亡友卡尔·馬克思的家庭做了其他一些事属捏造的报道外，还讲到，在公社失敗以后，法国司法部长曾下令逮捕刚刚在利尔当选为議員的保尔·拉法格先生。这位通訊員接着繼續写道：

“据說当时馬克思夫人，以不抓走其女婿为条件，对当局讲出了一个武器庫的所在地点。在此以后，拉法格先生就越过国境逃往西班牙。”

由于馬克思夫人的女儿艾威林夫人此刻不在伦敦，我就有义务来駁斥上述加于她母亲的誣蔑性的指責。事实是这样的：当拉法格先生同他的妻子^①以及他妻子的两个姐妹^②在巴涅尔-德-呂雄的时候，一位同情他的共和国警察官員曾事先向他透露即将逮捕他的消息。当日，拉法格就騎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入西班牙。²⁶²那时馬克思夫人在伦敦，因此，她即使有援救拉法格的意图，当时也不可能插手并为此向法国政府透露任何事情。这虛构出来的所謂武器庫云云，純属无稽之談，其用意是要在这位品德高尚、不畏

① 劳拉·拉法格。——編者注

② 燕妮·馬克思和爱琳娜·馬克思。——編者注

牺牲因而根本做不出卑鄙之事的妇女去世之后破坏她的声誉。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月17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载于1891年11月26日

“每日纪事报”第926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²⁶³歌詠团 (托登楠街)

1891年11月28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考茨基夫人刚刚告诉我，我的朋友列斯纳通知她，说你们打算在今天晚上为我七十一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但我已先同一位朋友约好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而且因为他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人，现在要取消这个约会已经绝对不可能。因此，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在家。

亲爱的同志们，这样我只好书面地为你们的深情厚谊向你们表示我真切的感谢，同时也对于我未能及早得悉你们的意图表示遗憾。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会的事稍有所闻，我就会赶快预先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阻止你们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意愿，我只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以我还余

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事业。

忠实于你们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年英国版序言²⁶⁴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著作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羞愧。这本书于1886年由美国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²⁶⁵和一篇附录。那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在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原来的序言——则大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

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²⁶⁶的废除及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从商业观点看来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虽然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的最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最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

金錢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說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住一文錢就很高兴的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間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資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²⁶⁷，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貿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們，尤其是大的工厂主們，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們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紛，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們，現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們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們說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額外勒索已經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沒有这种額外收入就不能維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門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門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經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欺压現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現象中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資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內容，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

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花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阶级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²⁶⁸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²⁶⁹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

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²⁷⁰，“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 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 12 000 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²⁷¹ 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认真地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英译本²⁷²——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 1865 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

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²⁷³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现在照录如下：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²⁷⁴；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

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²⁷⁵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²⁷⁶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

自由貿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問題，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場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沒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統治和政治統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間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視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現在他們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許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門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現形的工联，現在被工厂主們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当中传播健康的經濟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寵爰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認為是穷凶极恶的罢工，現在也逐渐被認為很有用处了，特別是当工厂主老爷們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經廢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經成了那些曾經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們自己的政治綱領。‘取消财产資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現在已經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議會改革²⁷⁷已經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現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議會中討論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規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說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議員支薪’和縮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議會’——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說宪章运动已經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鎮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馬克思常說的，变成了它的遺囑执行人。²⁷⁸ 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統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們不得不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來說，工业資本家的这种統治的結果一开始是惊人的。

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为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

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貿易論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設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設是一个純粹的妄想。現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別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創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資本家获得更大的財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淪为赤貧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們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結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現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現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場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結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現在新的市場一天比一天少起来，連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別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現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主要份額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結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貿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顛协会南港會議上，該协会的經濟組主席英格利斯·鮑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說：

‘英国获得巨額利潤的日子已經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門的发展停頓了。几乎可以說，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279

但是結果会怎样呢？資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須繼續增长和扩大，否則必定死亡。即使現在，仅仅縮減一下英国在

世界市場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額，就意味着停滯、貧窮，一方面資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資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須經常扩大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經常的扩大現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資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絕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問題：要么是國家灭亡，要么是資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們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暫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終結束时，当目前这种慘淡的停滯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經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絕以后，英国再也沒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連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內，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現。”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許的补充。不用說，現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現了”，而且是大

規模地出現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詩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經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輿論——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們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終輕視这种輿論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暫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实际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貧穷淵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絕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謂“新工联”，即广大的“沒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組織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組織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說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們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們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們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們的会员。新工联則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經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們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貴族輕視和藐視的粗人。但他們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們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絲毫沒有沾染上传統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見，而那些处境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見弄得昏头昏脑。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爭取領導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牽着富有而傲慢的

“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 *fin de siècle* [世纪末] 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弗·恩格斯

1892年1月11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
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CRITICA SOCIALE

RIVISTA QUINDICINALE

di studi sociali, politici, filosofici e letterari

Nel Regno: Anno L. 8 - Semestre L. 4 - All'Estero: Anno L. 10 - Semestre L. 5,50

Lettere, vaglia, cartoline-vaglia all'Ufficio di CRITICA SOCIALE: MILANO: Portici Galleria V. E., 23 (3° piano) 1000
PER MILANO gli abbonamenti si ricevono anche presso la Libreria Fratelli Dumolard: Corso V. E., 21

Anno II - N. 4.

La Rivista non si vende a numeri separati

Milano, 16 febbraio 1892

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維奧²⁸⁰

不无名气的卓万尼·博維奧在今年2月2日“論壇报”刊載的一篇文章里指責最近一个时期轉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党議員，說他們太輕視政体問題。这点我倒不怎么在意；然而使我耿耿于怀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載于1892年1月16日的“社会評論”）^①，把同样的指責加在全体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个人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議論：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說社会党人将在最近将来取得政权，但不明确說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錯的和为什么錯的。恩格斯竟然用数字（而我总是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很好的证明）来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議會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不远的年份。好极了；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① 見本卷第287—292頁。——編者注

——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真是这样吗？……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可能谈论它。可以认为，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式，但是不能撇开形式。”

为了答复这点，我声明，我完全否认可尊敬的博維奧的解释。

首先，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这里我要用可尊敬的博維奧本人的一个说法。的确只有成为“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丝毫怀疑。

整个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維奧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国皇帝会从社会党的圈子里任命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退位为前提的条件（因为没有这种条件，这些大臣就别想得到自己政党的支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老实说，博維奧担心我们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去”，这却使我认为，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是天真到极点了。

也許可尊敬的博維奧提到魏特林是想說，照他看来，德国社会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沒有他們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这一次他又錯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認識，應該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資料归社会公有的要求。这一經濟革命将怎样实现呢？这将取决于我們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維奧自己說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創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式”。譬如說，如果明天由于某种料想不到的事变，我們党担负起执掌政权的职责，那末我非常清楚應該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綱領。

“形式對我們無所謂”？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無論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来没有說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說过类似这样的话；这只是可尊敬的博維奧說的。我想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諸如此类的«sciocchezza»〔“蠢話”〕記在我們賬上。

不过，如果可尊敬的博維奧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載于2月1日的“社会評論”）^①出来，并且讀完它的话，也許他就不会費神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为一談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2月6日

載于1892年2月16日
“社会評論”杂志第4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并根据
“社会評論”杂志校对过

① 見本卷第293—298頁。——編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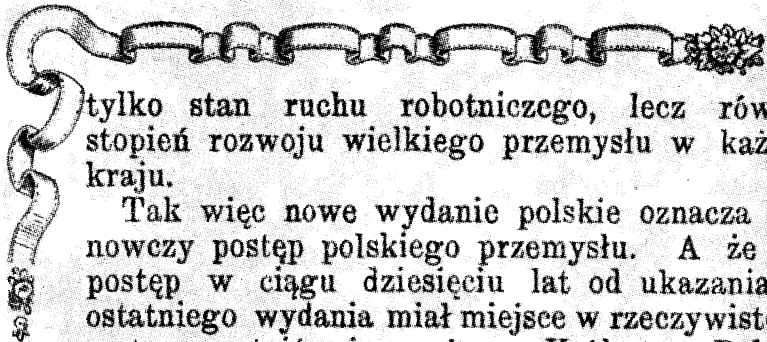


Przedmowa do 2^{go} wydania polskiego



EN fakt, że nowe wydanie „Manifestu Komunistycznego“ stało się potrzebnem, pobudza do różnych uwag.

Najpierw godnem jest zaznaczenia, że Manifest w ostatnich czasach stał się do pewnego stopnia probierzem rozwoju wielkiego przemysłu na lądzie europejskim. W miarę, jak w pewnym kraju wzrasta wielki przemysł, wpośród robotników tego kraju wzmaga się pragnienie wyjaśnienia swego stanowiska, jako klasy robotniczej w obec klas posiadających, rozszerza się wśród nich ruch socyjalistyczny, i rośnie popyt na Manifest. W ten sposób ilością egzemplarzy Manifestu, w języku krajowym rozszerzonych, można z dostateczną ścisłością mierzyć nie

tylko stan ruchu robotniczego, lecz również stopień rozwoju wielkiego przemysłu w każdym kraju.

Tak więc nowe wydanie polskie oznacza stanowczy postęp polskiego przemysłu. A że ten postęp w ciągu dziesięciu lat od ukazania się ostatniego wydania miał miejsce w rzeczywistości, o tem wątpić nie można. Królestwo Polskie, Kongresówka, stała się wielkim okręgiem przemysłowym państwa rosyjskiego.

Gdy wielki przemysł rosyjski rozszany jest sporadycznie — część nad zatoką fińską, część w guberniach środkowych (Moskwa i Władimir), to znowu nad Czarnem i Azowskim morzem, — polski przemysł skupił się na stosunkowo małej przestrzeni i korzysta zarówno z wygod, jak i niedogodności takiego ześrodkowania. Wygody uznali konkurujący fabrykanci rosyjscy, żądając przeciwko Polsce ceł ochronnych, bez względu na swe gorące chęci przerobienia Polaków na Rosyjan. Niedogodności — dla polskich fabrykantów i rosyjskiego rządu — ujawniają się w szybkim rozroście idej socjalistycznych wśród polskich robotników i w coraz większym popycie na Manifest.

Lecz szybki rozwój polskiego przemysłu, przerastającego o głowę przemysł rosyjski, jest swoją drogą nowym dowodem niespożytej siły żywotnej polskiego ludu i nową gwarancją przyszłego odrodzenia narodowego. Odrodzenie zaś niezależnej, silnej Polski jest sprawą, która nie tylko Polaków, lecz wszystkich nas obchodzi. Szczere współdziałanie międzynarodowe ludów europejskich jest możliwem tylko wtedy, gdy każdy

“共产党宣言”1892年 波兰文版序言²⁸¹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愈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刊行，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十年前刊印上一版以来确实已有这种进步，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波兰王国，即会议桌上的波兰²⁸²，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由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从事竞争的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因为他们虽然拚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抵制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都感受到的害处，则表现为

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事情，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①。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和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校对过

^① 在波兰文版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給 法国工人的賀信

1892年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們：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紅旗，同时向飄揚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旗和飄揚在普魯士人占領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到今天已經过去 21 年了。

这面紅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階級已站得这样高，在它眼里，战胜者与战敗者都同样消失了。

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資产階級沙文主义表現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階級都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让資产者去庆祝他們的 7 月 14 日或 9 月 22 日吧²⁸³。无产階級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 3 月 18 日。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資产階級才給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无耻的誣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才敢于从公社存在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把自己看做是战敗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敗时，国际也无法再繼續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社員！”的叫囂下，在欧洲各地被摧毀了。

自从蒙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①，到今天已經过去 21 年了。1871 年出生的孩子，現在已經达到成年，由于統治階級的愚蠢，他們当了**士兵**，他們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領，学习組織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於我們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 1871 年要更加强大 20 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响应我們号召的，現在已不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第一国际只能預見并为之做准备的国际无产阶级联盟，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1871 年在公社的巴黎近郊占領过炮台的那些普魯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目前正同巴黎公社社員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为爭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階級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載于 1892 年 3 月 26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79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① 見本卷第 221 頁。——編者注

对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 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語²⁸⁴

对于这第二版,我只想說几句话: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这个名字誤作霍普金斯(第45頁),現已改正;又威廉·湯普逊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改为1824年²⁸⁵。希望安东·門格尔教授先生的图书学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于伦敦

載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哲学的貧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²⁸⁶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²⁸⁷，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显然也是够麻烦的。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具有一种极其笨拙的 *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便首先一定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EDWARD AVELING

D.Sc.,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ITH A SPECIAL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LONDON:
SWAN SONNENSCHNEIN & CO.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 年英文版的扉页

主要原則和宇宙的基本規律之所以存在，从来都只是为了最后导致这个新发现的卓絕的理論。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經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經濟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經濟学批判史”²⁸⁸——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內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員起来向一切前輩哲学家和經濟学家进攻、特别是向馬克思进攻的三路論证大軍——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問題：从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到复本位制²⁸⁹，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無論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爭論中闡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連貫的形式）馬克思和我对这許多形形色色的問題的見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來說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务担負起来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为一系列論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萊比錫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題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²⁹⁰，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現在法国众議院中利尔市的議員保尔·拉法格的請求，我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編成了小册子，由他譯成法文并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²⁹¹。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²⁹²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譯出的。1883年，我們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羅馬尼亚文的譯本²⁹³。

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册子已经用十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 1848 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个附录之所以收入英译本中，是因为考虑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更不为人所知。这篇附录仍旧保持了原状，我没有涉及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经有包括几代人的庞大的宗法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后来，当公社范围扩大，太不便于共同经营的时候，便出现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现象。²⁹⁴ 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 *sub judice* [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²⁹⁵ 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即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资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作者并把产品的卖价超出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

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作者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企业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发动的机器来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动作^①。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到英国“体面人物”^②的偏见，那末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坏。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²⁹⁶。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²⁹⁷，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

①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这篇导言从开头到“调整机器的动作”为止的几段被删去。——编者注

② 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① [“痛苦”]^②。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識，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③；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禁锢自己的肉体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智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① «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悶，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 *qualitas* [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詞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論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識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們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給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許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說一个詞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詞，除了通过我們的感官而为我們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維同思維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詞不表示我們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詞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們來說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們就絲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結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們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規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說系統化了，但是他沒有論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識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則。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論’²⁹⁸中提供了这种論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論的偏見；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萊、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論的最后的学說藩籬。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來說，自然神論²⁹⁹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簡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頁。³⁰⁰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越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在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像巴克兰德和曼特耳那样的地质学家也歪曲自己科学中的事实，以避免同创世纪的神话有太多的冲突；而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骯髒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³⁰¹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总之，随着橄榄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和传播，大陆在宗教问题上的怀疑论也致命地传播开了，而且事情达到这样的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没有像英国国教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在体面这一点上，却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

的,而且肯定要比“救世軍”³⁰²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这种情况下,許多对不信教思想的进展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詛咒的人,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許多日用品那样带有 made in Germany [德国造] 的商标,而肯定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貨,如果知道他們的不列顛祖先在两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們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論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現力的字眼來說)^①“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規律支配的,它絕對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論者补充道,我們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說法也許在拿破侖那个时代有点价值,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侖的問題——为什么在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³⁰³一书中对造物主連提也沒有提到,——曾經驕傲地这样回答:«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 [“我不需要这个假說”]。可是在今天,在我們关于宇宙发展的概念中絕對沒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立足的余地;如果人們說,有一个被排斥于整个現存世界之外的最高存在物,那末这样說本身就有矛盾,而且在我看来,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承认,我們的全部知識是以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們怎么知道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是我們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訴我們: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

① 在德譯文中“(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現力的字眼來說)”一語被刪掉。——編者注

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In Anfang war die Tat》〔“起初是行动”〕。^①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②。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一语被删掉。——编者注

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論者出来說道:我們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維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們的認識范围之外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們之外这样一个事实;而当你的感官使你知道了这一事实的时候,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可認識的«Ding an sich»〔“自在之物”〕。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們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識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們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許知識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經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們能够制造的东西,我們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認識的。对于本世紀上半叶的化学來說,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現在我們学会了不依靠有机过程的帮助,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声称:無論什么物体,只要知道它的化学結構,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构造出来。我們現在还远远地不知道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結構;但是沒有理由說,我們在几个世紀以后还不能达到这种認識,并以这种認識制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們达到了这点,我們同时就制造出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都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在做了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后,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說話和行动,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許会說:就我們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用現在的說

法，能，是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灭的，但是我們沒有证据来证明它們不是在某一个时候被創造出来的。可是，如果你試圖在某一个特定的場合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駁他，那末他立刻就会要你閉口。如果說他 *in abstracto* [抽象地] 承认唯灵論的可能性，那末他 *in concreto* [具体地] 一点也不愿意知道这种可能性。他会对你說：就我們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來說，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是不存在的；對我們來說，物质和能是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灭的；在我們看来，思維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职能；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物质世界是受不变的規律支配的，如此等等。所以，就他是一个讲科学的人來說，就他知道一些事情來說，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領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譯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論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册子中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論”。信教的人将会取笑我，不可知論者将会气愤地质問我是否在嘲弄他們？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詞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終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經濟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階級，以及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① 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如果我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② 也是有利

① 在德譯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用德文來說叫做庸人”。——編者注

② 在德譯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編者注

的，那末人們对我或許还会更諒解一些。我提到过这样的事实：約在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国的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都为他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階級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現象而感到惊奇。現在我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階級，并不像有知識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階級的宗教傾向是有其緣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紀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階級^①是欧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紀的封建組織內已經贏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來說，也已經变得太狹小了。中等階級，即資產階級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繼續存在已經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羅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內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關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領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內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組織。

此外，随着中等階級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資產階級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

① 在德譯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出发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350頁），恩格斯的用語 «middle class» [“中等階級”]、«bourgeoisie» [“資產階級”]，都譯为“市民階級”（«Bürgertum»）；以后，这些用語又被恩格斯譯为“資產階級”（«Bourgeoisie»）。——編者注

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現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沒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

上面所說的，虽然只就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現存的教会发生冲突这方面提到了两点，但已經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羅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說大学和城市商人領先发出了呼声，那末一定会在而且确实已經在农村人民群众即农民中得到强有力的响应，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到处同他們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①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頂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謂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喚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馮·济金根領導下的下层貴族的起义（1523），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³⁰⁴两次起义都失敗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們在这里不能闡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諸侯和中央政权^②之間的战斗，結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見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变成了农奴。

① 在德譯文中不是“长期”，而是“伟大”。——編者注

② 在德譯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室中央政权”。——編者注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①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②。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③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④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德国小诸侯”。——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自耕农”，而是“中农 (yeomanry)”。——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

④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 yeomanry 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而查理一世才被推上断头台”。——译者注

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 1793 年在法国和 1848 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①。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②称为“大叛乱”的辉煌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是以自由党历史家称为“光荣革命”³⁰⁵的一件比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的。

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③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族(就像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菲利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³⁰⁶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而且立即着手增加地租，办法是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慷慨地胡乱处理教会土地，造成了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十七世纪继续不断地发生的大量没收大采邑分赠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情形，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而是“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个地方，«middle class»〔“中等阶级”〕这个用语，也同«bourgeoisie»一样，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力图間接地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經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資產階級和工业資產階級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祿和官职”^①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給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而这些經濟利益，在当时已經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細节問題上或許发生过爭执，但是总的說来，貴族寡头非常清楚，他們本身的經濟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階級的經濟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这个时候起，資產階級就成了英国統治階級的微末的但却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統治階級的其他部分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人或工厂主本人，对自己的伙計、工人和仆役來說，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直到不久以前还說的那樣，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們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們訓練得馴服順从。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經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貴族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屬的灵魂，使他們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們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簡言之，英国資產階級这时已經参加镇压“下层等級”、从事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助长了資產階級的宗教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②学說，不仅震动了中等階級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宣布自己是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

① 在德譯文中不是“俸祿和官职”，而是：“官职、閑差、厚祿”。——編者注

② 在德譯文中在“新的”的后面补充有：“无神論的”。——編者注

的人們的哲学，而跟适合于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沒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大大不同。它同霍布斯一起，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者登上了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³⁰⁷。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洛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論形式，仍然是一种貴族的、秘传的学說，可見，唯物主义之所以被中等階級仇視，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資產階級的政治联系。于是，同貴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論相反，过去曾經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繼續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階級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这时候，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了法国，它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尔学派³⁰⁸的一个支脉，并且和这个学派汇合了。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貴族的学說。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呈現出来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沒有把他們的批評局限于宗教信仰問題；他們把批評扩大到他們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設施；而为了证明他們的学說可以普遍应用，他們选择了最簡便的道路：在他們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們大胆地把这一学說应用于所有的知識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論，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說，竟給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論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³⁰⁹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

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飾的政治战綫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貴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間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間的妥协，表现在訴訟程序被繼續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誠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遺迹，并且在 Code civil³¹⁰ 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滿地表现了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現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虽然英国的法律仍然用野蛮的封建的語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經濟关系，——这种語言之符合于它所表达的事物，正像英文的拼法符合于英文的讀音一样（一个法国人說过：vous écrivez Londres et vous prononcez Constantinople [你們写下伦敦，而讀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也只有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經丧失而到現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紀，并且把它們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

还是回过来談我們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給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貿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爭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向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的胃口。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可恶的”恐怖

政策，而且还由于这次革命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走向极端。英国资产者如果没有本国的贵族教他像贵族一样待人接物，替他开创新风气，给他提供陆军军官去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去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那他怎么能行呢？诚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从妥协中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³¹¹，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这样，如果说唯物主义成了法国革命的信条，那末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加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宗教。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的宗教本能一旦失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愈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的国家，愈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愈是固执地坚守它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尽可以彼此不同，但是它们全都是明显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以及其他等人，开始了产业革命，这一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经过一些逐步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个妥协的参与者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改变了；1830年的资产阶级，同前一世纪的资产阶级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于是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这一斗

爭的結局只能是新的經濟力量的勝利。首先，在 1830 年的法國革命的刺激下，不顧一切抵抗，通過了改革法案³¹²。這使資產階級在議會里獲得了公認的和強大的地位。隨後是谷物法的廢除，這永遠確定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即工廠主對土地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勝利；然而這也是它專門為自己的利益獲得的最后一次勝利。它後來取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不得不同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分享，這個新的社會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久就成了它的對手。

產業革命創造了一個大工業資本家的階級，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產業工人的階級。這個階級，隨着產業革命對一個又一個的工業部門的占領，在人數上不斷地增加；而隨着人數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這一力量早在 1824 年就表現了出來，當時它迫使議會勉強地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³¹³。在改革運動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進的一翼；當 1832 年的法案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的要求寫進人民憲章，並且為了同強大的資產階級反谷物法同盟³¹⁴ 相對抗，組成了一個獨立的政黨，即憲章派。這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

後來，大陸上發生了 1848 年 2 月和 3 月的革命，在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來決不能允許的要求。接着而來的是普遍的反動。最初是 1848 年 4 月 10 日憲章派的失敗；其次是同年 6 月巴黎工人起義的被鎮壓；再其次是 1849 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戰勝巴黎。這樣，工人階級的要求的嚇人聲勢，至少在短時期內被壓制下去了，可是用了多少代價啊！如果說，英國資產者先前已經確信有必要

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緒，那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一定会如何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必要性呢？他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們的譏笑，年复一年地繼續把成千上万的金錢花在向下层等級宣传福音方面；他不满足于他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組織者“琼生大哥”，从美国輸入了基督复活派³¹⁵，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还接受了“救世軍”的危險的帮助，“救世軍”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宣传，把穷人当做上帝的选民看待，用宗教方式反对資本主义，从而使早期基督教的階級对抗的因素得到滋长，这对于目前在这上面花現錢的富翁來說，总有一天会带来麻煩的。

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規律：資產階級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經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資產階級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內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即 1830—1848 年，是极小一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着王国，而大得多的一部分，則被高标准的选举資格限制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 1848—1851 年，整个資產階級統治了国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資產階級的无能，带来了第二帝国。只是在現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資產階級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政权达二十年以上；而它已經显露出衰落的鮮明征兆了。資產階級的长期統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法国和美国，資產階級的继承者——工人，也已經在敲門了。

在英国，資產階級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 1832 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貴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級职位。富裕的中等階級对此表示的温順态度，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爰·福

斯特先生发表那次公开演说以前，我是一直不能理解的。福斯特先生在那次演说中劝告布莱得弗德的青年学习法语，以此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并且援引自己的经验说，当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而必须出入于那种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他是感到多么难堪！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而不是加上了商业干练气味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心。^① 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取得了胜利的人物，科布顿们、布莱特们、福斯特们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二十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³¹⁶ 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直到今天，英国的资产阶级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

① 即使在商业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自大态度也是足以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谈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体面的，而且当他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到英国，使他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便颇为自傲了。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这样一来就控制了英国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则变得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也没有觉察到，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四十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的时候，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十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去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去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的英国式的需要、习惯和爱好。

己的和人民的金錢去豢养一个供裝飾用的有閑等級，要它在一切庄严的場合体面地代表民族；而且当他們自己中間有人被认为有資格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們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权集团里去的时候，他們便认为是无上的光荣。

这样，工商业中等階級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貴族从政权中完全赶走，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階級，便已經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 1848—1866 年英国貿易的空前繁荣（通常以为这只是由于自由貿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輪船以及一般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重新迫使工人階級处于依附自由党的地位，他們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一样，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們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漸成为不可遏制的了；在輝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領們“畏縮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的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戶主的选举权^①，并且重新划分了选区。随着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 年又把戶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并且又重新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³¹⁷ 这一切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階級在选举中的力量，使工人階級至少在 150 个到 200 个选区中現在已經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議會制度是訓練人們尊重傳統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說，中等階級曾經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約翰·曼納斯勛爵所戏称的“我們的老貴族”，那末，工人群众則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去看待当时所謂的“优越者”即中等階級。的确，大約在十五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們对雇主的恭敬，以及他們在为自己要求权利时所表現的克己的謙遜，大可

^① 在德譯文中在“戶主的选举权”的后面补充有：“（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編者注

排解我們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³¹⁸的經濟学家們由于他們本国工人的不可救药的共产主义傾向和革命傾向而产生的煩惱。

但是英国的中等階級——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們看得远。他們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階級分享了政权。他們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領教过人民这个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 的作为。从那时以来，他們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納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資產階級日益增加自我捐稅，以維持各种基督复活派^①，从崇礼派³¹⁹ 直到“救世軍”。

現在，英国的体面人物^② 战胜了大陆資產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待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經变成了叛乱者。他們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根据相当充分的理由，他們在选择取得統治的手段时，絲毫不在乎这种手段是否合法。这个 *puer robustus* [强壮的小伙子] 一天比一天更 *malitiosus* [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資產階級，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們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年輕人感到暈船暈得厉害的时候把他在船上装模作样抽着玩的雪茄烟悄悄地丢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篤信宗教的人，他們毕恭毕敬地談論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法国資產者每逢星期五进 *maigre* [素食]，德国資產者每逢星

① 在德譯文中不是“以維持各种基督复活派”，而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宗教蠱惑方式”。——編者注

② 在德譯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的体面庸人”。——編者注

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听完新教的冗长的布道。他们已經吃了唯物主义的苦头。«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必須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拯救社会于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經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現在輪到英国資产者来嘲笑他們了：“蠢才！这个我早在两百年前就可以告訴你們了！”

然而，無論英国資产者的宗教愚鈍，或是大陆資产者的 *post festum* [事后] 皈依宗教，恐怕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 *vis inertiae* [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內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終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經濟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們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則，我們必須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搖搖欲墜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开始重新动起来了。毫无疑问，他們还被各种传统束縛着。有资产阶级的传统，例如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須依靠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謀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們最初摸索着从事独立行动的努力中继承下来的传统，例如，把一切沒有經過正規学徒训练的工人排斥于許多旧工联之外；这就等于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在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諾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訴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³²⁰。如同英国的一切事

情一样，工人阶级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有时做一些没有效果的尝试；它在前进中有时对“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示过分的不信任，同时却逐渐地吸收着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并且一批接着一批地把工人吸引进来。现在它已经把伦敦东头的没有技术的工人从沉睡中唤醒了，我们全都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了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末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英国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末，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的工人运动在最近二十五年所获得的进展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进着。如果说，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坚韧和毅力，那末，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由作者译成德文摘要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本1958年版译出，并参考了德译文和俄译文

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892年5月31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曾两度被禁止的党代表大会，我希望代表大会这次能够开成³²¹。我虽然不可能作为客人去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是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参加大会的奥地利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我的最恳切的关心。我们在这里享有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进行运动的自由，我们对于奥地利工人尽管遇到给他们的运动造成困难的无数障碍，还是争取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荣地位，自然能够给以应有的评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这里、在大工业的故乡，工人的事业也正在向前推进；而且总的说来，当前最美好和最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无论我们往哪里看，工人运动到处都在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你们的老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2年6月10日
“工人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
根据手稿校对过

№. 153.

Die Zeitungen des Tages
sind an jedem Sonntag
zu den gewöhnlichen Preisen
zu haben. Die Preise sind
in der Zeitung angegeben.
Die Zeitungen sind an jedem
Sonntag zu den gewöhnlichen
Preisen zu haben. Die Preise
sind in der Zeitung angegeben.
Die Zeitungen sind an jedem
Sonntag zu den gewöhnlichen
Preisen zu haben. Die Preise
sind in der Zeitung angegeben.

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Zentral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9. Jahr g

Das Blatt enthält die neuesten
Nachrichten aus Berlin und
aus dem Ausland. Es enthält
auch die Verhandlungen der
Kammer und des Reichstages.
Die Preise sind in der Zeitung
angabegeben.
Das Blatt ist an jedem
Sonntag zu den gewöhnlichen
Preisen zu haben.

Redaktion: SW. 19, Bentz-Strasse 2.

Sonntag, den 3. Juli 1892.

Expedition: SW. 19, Bentz-Strasse 3.

卡尔·肖萊馬³²²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的一座新坟前哀悼的，不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学家，早在拉薩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个共产主义者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的一員，并且按时繳納党費。

卡尔·肖萊馬于 1834 年 9 月 30 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 1858 年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門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广开着飞黃騰达之門。但是，尽管他的年輕同行大部分都热衷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給私人化学家安格斯·斯密斯当助手，后来給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³²³ 的化学教授。1861 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萊馬，得到了欧文斯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现在关于脂肪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脂肪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脂肪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

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們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通过我們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們之間頻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1874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東西接受下来，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家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³²⁴然而那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1890年我們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1891年，我們一起旅行刚刚开始³²⁵，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1892年2月起，他几乎已经不能迈出家門，从5月起便卧病在床；6月27日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六七年前，他由瑞士去达姆斯塔德。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

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誰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一句话，在他母亲和他兄弟家里进行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在那里也进行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发软了：同英国发生外交纠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斯塔德闹了一场大丑剧而告终，这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500票。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坟前献了花圈，花圈上系着红带，写着《From the Executive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

1892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7月3日“前进报”
第153号附刊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³²⁶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①是根据美国版序言³²⁷写成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

^① 见本卷第311—325页。——编者注

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³²⁸以后，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 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

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 1844 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

調了。他們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資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沒有这种額外收入就不能維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說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規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門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門中远不是这样——資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經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現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現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資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了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資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資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条件，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創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花费資本家一文錢，但仍然落入資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們和万德比尔特們，全部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們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結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現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現在已从英国資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鮮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現象，現在或者已被消

除，或者已經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經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經消失了，“七日規”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詩的笔調来描写的地区，現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經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飾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們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說英国現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剝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則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毀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們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輕，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現在已經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較，情况特別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無論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結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爭取縮短工作日、爭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時間特別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斗争；我們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資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讀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

时，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的关于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騙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資制，同样是資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們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們的抵抗。

不論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繼續到目前，即詳細地一一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已經极为詳細地描述了 1865 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頂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馬克思已經讲过的話。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論观点，和我現在的观点絕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 年还没有現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馬克思的功績，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出現出我們的祖先魚类的鰓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現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別是在末尾，很強調这样一个論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單純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說，而是一种最終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現存关系的狹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論。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 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这一論断——虽然当时

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

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

資。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銷售市場，同时又供給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則，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說成完全是自由貿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貿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貿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問題，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場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沒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統治和政治統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間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許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門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現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們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間传播健康的經濟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寵愛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們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剝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經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經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們自己的政治綱領。取消财产資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現在已經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

1884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議員支薪和縮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說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馬克思常說的，变成了它的遺囑执行人。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統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來說，工业資本家的这种統治的結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現代工业的搖籃來說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間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輸出与輸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資本家手中的財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誠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現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軌。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來說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軍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現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烏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

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規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規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規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們的輪子压軋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工业資本家二十年的統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破产之后，1873 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暫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續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門都处于經常停滯的状态。既沒有完全的破产，也沒有人們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慣常被人指望的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蕭条，所有部門的所有市場上都出現經常的过饱和現象，——这就是我們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貿易論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設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設是一个純粹的妄想。現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別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創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資本家获得更大的財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淪为饥餓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們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結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現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現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場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

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至多也只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

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1885年是这样写的。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藪已

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 *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

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①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②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

① 詹·凯·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② 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 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就来大大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頓先生执政，新议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頓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流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蹉跎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 年 7 月 21 日于伦敦

载于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德文第 2 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

*关于英国的經濟和政治 发展的若干特点³²⁹

像英国的这种渐进的、和平的政治发展，由于无尽无休的妥协，造成一个充滿矛盾的形势。在一定的限度內，这种形势由于有相当多的好处，实际上为人所容忍，可是它的邏輯上的荒謬現象却使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受到真正的折磨。所以，一切“掌握国政的”政党就必須在理論上进行伪装，甚至辯解；当然，办法只能是詭辯，歪曲，以至純粹用空話来支吾搪塞。于是，在政治領域里就大量出現重复神学护教論的所有拙劣的伪善辞句和欺人之談、把神学的精神毒素也移植到世俗的土壤上去的书刊。于是，保守党就自己給道道地地的自由党伪善园地施肥，播种，松土。于是，神学护教論也就得到这样一种它在別国所沒有的、从普通人的意識中汲取的論据：福音书里讲的事情同新約里宣揚的教义正相矛盾，那有什么不得了？难道这就意味着那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嗎？英国宪法里的矛盾还要更多，它到处自相矛盾，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因此就是真实的！

1868年以來之所以沒有出現危机，世界市場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場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資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資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許許多多的投資

場所。因此，在铁路、銀行等等方面，在純属美国的投資場所，在印度貿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沒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³³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

写于 1892 年 9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部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³³¹

亲爱的同志们：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在9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这项决议是难以保持沉默的。

根据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受托筹备在1893年召开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的苏黎世委员会，向工联代表大会发出了邀请信。尽管煤气工人工会书记威廉·梭恩同志一再要求，这封信在代表大会的三天会期内仍未被宣读，因此，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对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表示意见。

最后，马特金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委托工联代表大会委员会³³²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帕涅尔同志（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奎尔奇同志回答说：已经准备在1893年召开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个在苏黎世召开，另一个在芝加哥召开³³³。苏黎世临时委员会邀请工联代表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应当接受邀请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而不是召开第三个代表大会。

保守的旧工联的代表表示反对，其借口是苏黎世和芝加哥代

表大会都不是英国工联召开的；同英国工人比起来，大陆上的工人组织得差，软弱无力；英国人不应当对大陆社会主义的任何荒谬理论(wild theories)承担责任，等等。只是在这一切之后，才宣读了我们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信。

最后，以 189 票对 97 票拒绝了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并且通过了一项提案：“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对全欧洲大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侮辱。我们希望，英国无产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这些人在感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但目前对这个字眼还感到恐惧，因而让老的保守主义者牵着自己走），这些比较觉悟和比较坚定的分子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改正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有必要使大陆上的工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上述决议的侮辱。我已经把格拉斯哥事件告诉了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友，希望他们对应当遵循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因为法国的同志们过几天就要在马赛举行代表大会³³⁴，他们可以在那里对工联进行第一次反击。

作为光荣的国际总委员会的前西班牙书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个涉及西班牙同志不亚于其他国家同志的事件告诉西班牙全国委员会。

敬礼和社会革命！

写于 1892 年 9 月 16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第 1 版第 29 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美国的总统选举³³⁵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heimarmene，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运。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他们指的是使人的意志和愿望终成泡影，使人的一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是从那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可以理解的形式，而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为认识自己本身的必将灭亡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运、天意，这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

美国总统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世界市场说来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事件。

四年以前，在波士顿用英文，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发表了我的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文章^①。我在那里曾经指出：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美国在内战后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证明美国人力图摆脱这种垄断的束

^①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7月“新时代”³³⁶。

縛；依靠着丰富的自然資源和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和精神，这个目的現在已經达到了，因而在美国，保护关税已成了工业的桎梏，其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接着我又說，如果美国实行了貿易自由，那末再过十年它就会在世界市場上击败英国。

果然，1892年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为貿易自由开辟了道路。麦金利的那种保护关税已經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胡乱抬高一切进口原料和进口粮食的价格反过来也影响了許多本地商品的价格，这样也就堵塞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場上的大部分銷路，而另一方面国内市場則已經苦于美国工业产品过剩。事实上，近年来，保护关税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小生产者被結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大生产者所挤垮，让后者，即有組織的垄断势力支配市場，从而剝削国内的消費者。美国要克服这个由保护关税制产生的經常的內在工业危机，只有为自己打开世界市場之門，为此它就必須摆脱保护关税，至少要摆脱像現在这样荒唐的保护关税。在选举中表現出来的輿論上的大轉变，证明美国已决定这样做。一旦美国在世界市場上站稳脚跟，它就会——和英国一样，而且是借助于英国——在自由貿易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

那时候，我們就会看到一場史无前例的工业斗争。在所有的市場上，英国工业，特别是紡織工业和冶金工业的产品，将被迫投入一場同美国工业产品的斗争，而且最終要遭到失敗。美国的棉麻織品現在就已經在排挤英国貨。讀者想知道，什么样的奇迹使得郎卡郡的棉紡織厂工人对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一事，經過一年光景就从激烈的反对者轉变为热烈的拥护者嗎？那就請翻开今年10月的“新时代”第2期第56頁，从那篇文章里你們会看出，美国的棉麻織品正一步一步地把英国貨挤出中国市場；英国貨

的进口在 1881 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赶上美国货，而在 1891 年只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³³⁷ 而中国，和印度一样，是棉麻織品的主要銷售市場。

这再一次证明，随着新的世紀的临近，一切条件都在变化。如果把紡織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重心从英国移到美国的话，英国要么就得变成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日强盛的残余过日子，而无产阶级则餓肚皮的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組。前一条出路不可想像，因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所不能容許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发展程度已經大大超出与此相容的水平。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出路。保护关税制在美国的結束归根到底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英国的胜利。

而德国呢？1878 年已經在世界市場上爭得了自己的地位的德国，現在正由于它胡乱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逐漸喪失这种地位，它現在是否会仍旧頑固地通过对原料和粮食征收关税来給自己关上——而且是在面临着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的美国竞争的情况下——世界市場之門呢？德国资产阶级是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步美国的后尘，还是仍旧消极地等着，让已經强大起来的美国工业把容克和大工厂主結成的保护关税主义的卡特尔³³⁸ 压垮呢？最后，目前情况正需要投入一場工业斗争，对手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年輕最强盛的国家，它在几年的時間內毫不費力地償还了巨額战争債務，它的政府正不知如何支配收来的稅款；而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給德国的經濟力量以新的过于沉重的軍費負担，它們会不会懂得这是多么荒謬絕伦的做法呢？

德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終於干成一

件大事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由于它太狭隘，太怯懦，它只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明：它的戏已经演完了。

写于 1892 年 11 月 9 日和 15 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2 年 11 月 16 日“前进报”

俄文译自“前进报”

第 269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馬克思, 亨利希·卡尔³³⁹

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的一个律师(后为司法参事)亨利希·馬克思的家里。根据亨利希·馬克思的儿子的洗礼证书可以看出, 亨利希·馬克思于1824年同全家一道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教。卡尔·馬克思在特利尔的中学毕业后, 从1835年起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 以后又研究哲学; 1841年, 他在柏林提出一篇論伊壁鳩魯哲学的学位論文³⁴⁰, 結果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 他迁居波恩, 打算在大学里任教; 但是, 政府对他的在波恩的大学里讲授神学的友人布魯諾·鮑威尔百般刁难, 最后鮑威尔终于被大学解聘, 这个事实使馬克思很快就清楚地看出: 在普魯士的高等学校里是沒有他的立足之地的。大約就在这同一时期, 萊茵激进資产阶级年輕一代的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代表, 在同自由派領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商妥之后, 决定在科伦創辦一家大型的反对派报纸; 馬克思和鮑威尔也被聘为該报的主要的經常撰稿人。当时办报所必不可少的許可证, 通过迂迴曲折的方式悄悄地領到了, 于是, “萊茵报”就从1842年1月1日起开始出版。馬克思写了一些长篇文章, 从波恩寄給这家新創辦的报纸; 其中最重要的有: 对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的批評, 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的文章, 以及另一篇关于盜窃林木和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文章。³⁴¹ 1842年10月, 馬克思担任該报的領導, 并移居科伦。从这时起,

該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质。而同时，对报纸的领导又是如此巧妙，尽管該报先后受到双重的、以至三重的检查（先由普通检查官检查，然后呈交行政区长官复查，最后还要由 ad hoc [专门] 从柏林派来的馮·圣保罗先生检查一次），政府对这样一种报纸还是无可奈何，所以它决定从 1843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該报继续出版。在这一天馬克思退出了編輯部，报纸以此为代价获准緩期三个月，但是后来报纸终于还是被完全查禁了。

于是馬克思决定到巴黎去，这时阿尔諾德·卢格在“德国年鉴”³⁴² 大約与此同时被查禁之后，也准备到巴黎去。动身以前，馬克思在克罗茨納赫同燕妮·馮·威斯特华伦結婚。燕妮是馬克思童年时代的女友，馬克思早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同她訂了婚。1843 年秋，这一对年輕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³⁴³，但是該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編輯之間很快就暴露出原則性的分歧。卢格仍然保持黑格尔哲学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路綫，馬克思則热心地研究政治經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結果馬克思轉向了社会主义。1844 年 9 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訪馬克思，停留了几天；他們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們就开始合作，直到馬克思逝世。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駁布魯諾·鮑威尔的論战性著作（他們在黑格尔学派分裂的过程中同布魯諾·鮑威尔之間也产生了原則性的分歧），即“神圣家族。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³⁴⁴（184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馬克思参加了在巴黎以“前进报”这个名称出版的一份篇幅不大的德国周报³⁴⁵ 的編輯工作，該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

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空虛拙劣。普魯士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基佐內閣把馬克思驅逐出法国。这个要求被滿足了；1845年初，馬克思迁居布魯塞尔，恩格斯随他之后也来到布魯塞尔。在这里，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魯塞尔和巴黎出版），以及“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年在布魯塞尔出版）³⁴⁶。此外，馬克思有时还給“德意志—布魯塞尔报”³⁴⁷写些文章。1848年1月，他同恩格斯一起受秘密的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春加入了这个团体）。³⁴⁸从那时起，“宣言”出版了許許多多經作者同意的和未經作者同意的德文版本，并被譯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

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并且在布魯塞尔也激起了人民的风潮时，馬克思被逮捕并被驅逐出比利时；这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請馬克思重新到巴黎去，于是馬克思又迁居巴黎。

在巴黎，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一起首先反对了組織軍团的儿戏，因为这給新政府的多数派提供了一个摆脱“已經成为累贅”的外国工人的方便手段。很清楚，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組織起来的比利时軍团、德国軍团等等，只能在一出国境之后就墮入預先設置好的陷阱，而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为四百名失业的德国人爭取到了和发給参加軍团的人同样的路費，使他們也得以返回德国。

4月間，馬克思迁往科伦；在他的领导下，从6月1日起在科伦开始出版“新萊茵报”，該报在次年5月19日出版了最后一号；威胁着編輯們的是：或者根据法庭命令被逮捕，或者作为非普魯士国民被驅逐出境。馬克思遭到的是后一种命运，因为他在居留布

魯塞爾期間脫離了普魯士國籍。在該報存在期間，馬克思曾經兩次被陪審法庭傳訊：1849年2月7日被控違反出版法，2月8日又被控煽動對政府的武裝反抗（在1848年11月拒絕納稅期間）；兩次他都被宣判無罪。³⁵⁰

在“新萊茵報”被查禁後，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是在6月13日示威³⁵¹以後他被迫作以下的選擇：或者是留在布列塔尼被拘禁起來，或者是再次離開法國。不言而喻，馬克思選擇了後者，於是他移居倫敦，並且從此以後就在那里定居下來。

在倫敦，馬克思創辦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³⁵²（1850年在漢堡出版），總共出版了六期。他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主要著作“從1848到1849年”闡明了這幾年的事件，特別是在法國所發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內部聯繫；此外，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寫了許多書評和政治述評。在前一著作發表後不久，作為該著作的繼續，出版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³⁵³（1852年在紐約出版，1869年和1885年在漢堡重版）。由於發生了科倫共產黨人的大案件，他出版了小冊子“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³⁵⁴（1853年在波士頓出版，最近一版於1885年在蘇黎世出版）。從1852年起馬克思擔任“紐約論壇報”³⁵⁵的駐倫敦通訊員，並且在許多年當中可以說是該報歐洲欄的編輯。他的文章一部分署了他的名字，一部分則以社論的形式發表；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訊，它們是根據認真的研究寫出的，而且往往是包含一系列對於歐洲某一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詳盡評論的文章。其中軍事性質的文章——論克里木戰爭、印度起義等——是恩格斯寫的。馬克思的關於帕麥斯頓勳爵的文章³⁵⁶有幾篇曾經在倫敦以單行本重印出版。直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他才停止為“論壇報”撰稿。

1859年, 馬克思一方面同卡尔·福格特展开了由于意大利战争而引起的論战, 这场論战是以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³⁵⁷ (1860年在伦敦出版) 作为結束的。另一方面, 在这同一年, 出版了他在英国博物館进行了多年的政治經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³⁵⁸ (1859年在柏林出版)。可是, 第一分册刚出版, 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后几个分册的基本思想发展中的一切細节; 迄今保存下来的手稿³⁵⁹ 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于是他立刻重新开始工作, 这样, 他没有繼續出版那几个分册, 而是直到1867年才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册: 資本的生产过程”³⁶⁰ (1867年在汉堡出版)。

馬克思在写作全部三卷“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至少是初稿——的过程中, 终于又得到机会同时在工人当中进行实际工作。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許多人, 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經自命为该协会的創始人。不言而喻, 像这样的組織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創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 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在建立国际时, 朱泽培·馬志尼也企图籠絡那些团結在国际中的人, 使他們接受他所宣揚的神秘的、充滿密謀精神、以«Dio e popolo» [“上帝和人民”] 作为口号的民主, 让他們为这种民主效劳。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決了, 相反, 得到通过的是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³⁶¹; 从此以后馬克思就穩固地取得了对国际的領導。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馬克思写的, 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失敗后出版并翻譯成大多数欧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內战”³⁶²。

在这里不可能叙述国际的历史。这里只須指出一点：馬克思这样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則性的緒論部分，以致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能在这个范围内一致地合作共事；这种联合的内部一致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們从出現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現以前，从未受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階級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聞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連經費也沒有；总委员会并沒有所謂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債務。用这样少量的錢做这样多的事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如果繼續用旧的形式同政府以及在所有国家都同样狂怒的資產階級进行斗争，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还要在协会内部进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同他們同流合污的蒲魯东分子的斗争。Le jeu ne valait pas la chandelle [得不偿失]。因此，当在海牙代表大会³⁶³上在形式上也取得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之后，馬克思提議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紐約。这样就保证了协会繼續存在下去，准备迎接由于局势的变化而必須在欧洲恢复协会的时刻到来。但是当这样的局势实际到来时，旧的形式已經过时了；运动大大超过了旧的国际。

从那时起馬克思不再进行公开的鼓动，但同时他仍然和过去一样积极地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他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通信，他們在紧要关头，只要有可能，总是亲自向馬克思本人請教。他愈来愈成为战斗的无产階級的公认的和有求必应的顧問。但是，除此之外，这时馬克思却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

学研究工作上来, 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已經大大扩大了。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 因此, 在他那里, 每一单个問題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問題。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 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 主要是为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 而在他以前沒有人試图这样做过。馬克思除了能以所有的日耳曼語和罗曼語自由閱讀以外, 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語、俄語和塞尔維亞語。但是很可惜, 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去利用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1881年12月2日他的夫人^①去世, 1883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②去世, 就在同一年的3月14日, 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中靜靜地与世长辞了。

过去出版的馬克思傳記大多数都是錯誤滿篇。唯一可靠的傳記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傳記(作者恩格斯)。³⁶⁴

現在把馬克思的已經发表的著作尽可能詳尽地开列如下:

1842年在科伦“萊茵报”上发表的有: 关于萊茵省議会的辯論、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关于盜窃林木的文章; 該报1842年10月至12月的社論。在“德法年鉴”(阿·卢格和卡·馬克思合編, 1844年在巴黎出版)上发表的有: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論犹太人問題”。——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 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4年在巴黎报纸“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未署名)。——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1847—1848年在布魯塞

① 燕妮·馬克思。——編者注

② 燕妮·龙格。——編者注

尔出版)上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1847年在布魯塞尔和巴黎出版。德文版: 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的第二版。西班牙文版: 1891年在馬德里出版。——“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1848年在布魯塞尔出版。英文版: 1888年在波士頓出版。德文版: 收入“哲学的貧困”德文版。——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在伦敦出版。最新德文版: 1890年在伦敦出版; 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都已有譯本。——在“新萊茵报”(1848—1849年在科伦出版)上发表的文章及社論等。其中“雇佣劳动与資本”曾多次出版单行本, 最新版: 1891年在柏林出版; 已有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譯本。——“两个政治审判案”, 1849年在科伦出版(包括馬克思的两篇辯护詞)。——“新萊茵报。評論”, 1850年在汉堡出版, 共出6期。其中发表了馬克思的文章“从1848到1849年”。同恩格斯合写的书評和每月述評。——“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852年在紐約出版。第三版: 1885年在汉堡出版。已有法文譯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3年在巴塞尔出版(全部被沒收); 1853年在波士頓出版。最新版: 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1852年至1861年在“紐約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几篇关于帕麦斯頓的文章于1856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增訂本)。1856年6月至1857年4月以前先后在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和伦敦“自由新聞”上发表“十八世紀外交史内幕”(論英国輝格党大臣們对俄国的經常的自私自利的依賴)³⁶⁶。——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文章³⁶⁷。——“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年在柏林出版。1890年出波兰文譯本。——“福格特先生”, 1860年在伦敦

出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在伦敦出版；其次还有总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1871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最新德文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已有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年在汉堡出版；最新第四版1890年出版。已有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译本。——“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在印刷中。已有俄文译本。第三卷将在1893年问世。

写于1892年11月9日和25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第4卷

俄文译自“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致“柏林人民論壇”報編輯部³⁶⁸

“人民論壇”發表的一組題為“汝拉聯合會和米哈伊爾·巴枯寧”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寫一個簡短的駁斥。

雖然作者^①似乎盡力要實事求是和不偏不倚地闡述自己的主題，但實際上，他卻把它敘述得像無政府主義者老爺們自己敘述的和他們所希望敘述的那樣。譬如說，他對巴枯寧派的材料旁征博引，對巴枯寧派的日內瓦對手們所公佈的材料則引用得很不夠，至於倫敦總委員會的材料，那就根本不提了。

我只從一篇文章（11月12日第十篇）中舉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杜撰。

說總委員會1871年在倫敦召開了一個“秘密的”代表會議³⁶⁹，“只有瑞士無政府主義各支部沒有接到通知；但是，它們得悉這一意圖”云云，

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代表會議的公開和秘密的程度，同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每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一樣；不在報紙上宣揚，也不邀請記者到會場。

汝拉各支部當時公開與總委員會對抗，同總委員會沒有保持

① 路·艾里提埃。——編者注

任何正式联系。相反，在总委员会里却有两个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罗班和巴斯特利卡，他们是根据“独裁者”马克思的建议选进来的。恰好是罗班保持了同汝拉各支部的联系；他早在1871年3月就以它们的名义建议召开那次后来又被它们否认的代表会议，而且还把召开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了它们。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鬼话。

代表会议

“本来准备在马克思家里召开……在马克思的住宅里举行了……”。

愚蠢的谎言；代表会议是在所谓的法兰西区的托登楠大院路附近一家“蓝柱”小酒馆里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成员也说得不对；有争论的地方也不是章程中的一段，而是章程的绪论部分中的一段。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第一个地方性的巴黎（蒲鲁东主义者的）委员会，在自己的法文译本里把它歪曲成这样：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让位于它的伟大目标”。³⁷⁰

日内瓦代表大会³⁷¹的文件在通过法国国境时被波拿巴的警察没收了，只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这些文件最后才物归原主，就在文件被没收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旧译文又在日内瓦被匆忙地重新印了出来，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能够据此断言，仿佛日内瓦代表大会就是那样决定的。总委员会受同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于1871年出版了英文、法文和德文标准本章程³⁷²，这样就最后戳穿了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当然，这是使无政府主义者大大扫兴的）。现在在我面前就放着马克思把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

的改动記在上面的那份章程，这些改动只限于章程的条文本身，完全沒有涉及緒論部分。

其次，說伦敦代表會議決定把

“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置于日內瓦委員會的号令之下”，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就在这里，我对作者的意图的正直性产生了一些怀疑。他究竟是会认字还是不会认字。如果說他会认字，那末他在代表會議的決議里只能够讀到：（1）撤銷汝拉委員會（擅自使用）的罗曼語區委員會这一名称，并把这一名称授給原先的日內瓦委員會；（2）号召汝拉方面妥善解决他們同日內瓦方面的爭端；（3）如果这点不能做到，那末他們应当建立他們自己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³⁷³ 因此，代表會議所作的，只不过是完全让日內瓦方面和汝拉方面都在他們自己自治範圍內行事。

总而言之，这位作者不論真正是或者假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在一切方面都听信可怜的被誹謗的无政府主义者羔羊的話。对于这些老爷們认为不必要談的事情，我們这位如此权威的作者根本一无所知，所以他对构成整个爭端的內幕方面的东西也一无所知。在巴枯宁創建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背后，隱藏着一个秘密的同盟，它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际的領導权弄到无政府主义者手里。³⁷⁴ 这个秘密的同盟广泛地分布在汝拉，分布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委員會最先是从小西班牙获得这件事的证据，后来又从小日內瓦得到了与这一反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无辜的陰謀有关的章程和大批其他文件。就是根据这些文件，海牙代表大会在1872年才做出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約姆开除出国际。³⁷⁵ 为了駁斥目前又

在冒头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件事情和其他許多事情的始末的捏造，可以讀一讀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伦敦、汉堡版；科柯斯基的德文譯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1874年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³⁷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11月15日于伦敦

載于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論壇”報第47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柏林人民論壇”報，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³⁷⁷

最近有些唯理論的民族学家以否认群婚为时髦；因此，下面这篇我从 1892 年旧历 10 月 14 日的莫斯科“俄罗斯新聞”上譯出的报道是值得讀的。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了存在着极其盛行的群婚，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相互間性交的权利，而且肯定了这种群婚具有跟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婚姻，即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形式。典型的普那路亚家庭是由一群兄弟（同胞的或較远的）跟一群同胞的或較远的姊妹結婚而組成的，而在庫頁島上，我們看到，一个男子是跟自己兄弟的所有妻子和自己妻子的所有姊妹結成婚姻的，如果从女子方面来看，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有权跟她的丈夫的兄弟和她的姊妹的丈夫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它跟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形式的区别，只在于丈夫的兄弟和姊妹的丈夫不一定是同一些人。

其次应该看到，我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 4 版第 28—29 頁所讲的，在这里也被证实了。那里讲到，群婚絕不像我們的庸人的慣于妓院的幻想所描繪的那样；实行群婚的人們，并不是公开过着庸人暗中所过的那种淫蕩生活；这种婚姻形式，至少就現在还可以遇見的例子来看，与不牢固的对偶婚制或跟一夫多妻制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是許多在其他条件下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性交情事，在这里却为习俗所許可而已。³⁷⁸ 至于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正在逐

渐消灭，那只不过证明这种婚姻形式本身正在消亡，它的极少流行，也可证实这一点。

此外，整个这篇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再一次表明：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其基本特征上，是多么相似，甚至相同。关于庫頁島上这些蒙古种人的記載，大部分都适用于印度的德拉維达部落、太平洋各島屿发现时的島上的土人，以及美洲的紅种人。这篇报道写道：

“尼·安·楊楚克 10 月 10 日〈旧历；新历为 10 月 22 日〉在莫斯科^①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會議上提出了施特恩堡先生的关于庫頁島吉里亚克人³⁷⁹的有趣的报告，吉里亚克人是一个很少被人研究并处在蒙昧人的文化阶段^②上的部落。吉里亚克人不知有农田耕作和陶器术，主要靠漁猎为生，用投入熾热的石头将木槽里的水温热，等等。特別有趣的是他們的家庭和氏族制度。吉里亚克人不仅把自己的生父叫做父亲，而且把自己生父的一切兄弟也叫做父亲，把生父的兄弟的妻子和自己母亲的姊妹全都叫做母亲，把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③的子女統通叫做自己的兄弟和姊妹。如众所周知的，北美的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的一些部落，都有这样的称呼法^④，不过在他們中間，这种称呼法早已跟现实不相符合了，而在吉里亚克人中間，这种称呼法却表明迄今仍然存在着的秩序。直到現在每一个吉里亚克男人对自己兄弟的妻子以及对自己妻子的姊妹都有丈夫的权利^⑤，至少行使这些权利并不认为是被禁止的事情^⑥。这些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

① “莫斯科”这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② 在“俄罗斯新聞”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編者注

③ 在“俄罗斯新聞”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亲属”。——編者注

④ 在“俄罗斯新聞”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編者注

⑤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⑥ 在“俄罗斯新聞”上不是“不許可的”，而是“罪恶”。——編者注

群婚^①的残余，颇似本世纪上半叶还在散得維齿群岛存在着的有名的普那路亚家庭。家庭和氏族^②关系的这种形式是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基础。

吉里亚克人的氏族，是由他的父亲的一切兄弟（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③、由这些兄弟的父亲和母亲、由他的兄弟的子女及他自己的子女组成的。显然，这样构成的氏族，可能有大量的成员。氏族的生活是按下面的原则来进行的。氏族内部是绝对禁止通婚的。死者的妻子，根据氏族的决定，转嫁给死者的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④中的一个。氏族养活自己的一切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我们没有乞丐——一个吉里亚克人对报告人说，——谁穷，哈里〈氏族〉就来养活他。’氏族成员由共同的祭祀和节日、共同的坟地等联系起来。

氏族保障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安全，防止不属于本氏族的人对他的侵害^⑤。惩罚的手段是血族复仇^⑥，但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下，这一制度的作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氏族复仇的行动以外。在有些场合（不过这种场合是极少见的），一氏族收养他氏族的人。通例是财产不得拿出死者的氏族以外。在这一方面，吉里亚克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十二铜表法的一项有名的条文：«Si suos heredes non habet, gentiles familiam habento»（“如无继承人，应由同氏族人继承”）。³⁸⁰ 吉里亚克人生活中任何一件非常的事件，都非有氏族的参与不可。氏族长者，在不久以前，大约一两代以前，还是社会的首领，即一族之‘长’。不过，现在，氏族长者的作用只是

-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编者注
- ②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而是“家庭和亲属”。——编者注
- ③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而是“（所有亲等的）”。——编者注
- ④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兄弟”。——编者注
- ⑤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不属于本氏族的人”，而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
- ⑥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惩罚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

领导宗教仪式了。氏族往往散居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过，同氏族人在分散以后，仍继续互相惦记着，互相来往作客，互相帮助和庇护等等。而且，吉里亚克人如无特别的需要，绝不舍弃自己的同族人和自己氏族的坟墓。氏族生活习惯，给吉里亚克人的全部精神，给他们的性格、习俗和制度，都打上了显著的烙印。共同讨论一切事情的习惯，经常维护同氏族利益的必要性，血族复仇^①方面的连环关系，和几十个同伴一起住在一个大帐篷里的必要性和习俗，总之，经常生活在人群当中，使吉里亚克人养成了一种非常合群非常健谈的性格。吉里亚克人是非常好客的，他们爱招待客人，自己也爱作客。好客的高尚习俗，在不幸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困难的年月里，当吉里亚克人自己和狗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并不伸手去乞求施舍，他可以把握地去作客，而且在那里有时可以被养活很长一个时期。

在庫頁島的吉里亚克人中間，几乎完全遇不到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吉里亚克人把自己的贵重东西存放在仓库里，从不锁门。吉里亚克人极富于羞耻心，如果他被揭露干了什么不名誉的事，他便会到大树林里去上吊。在吉里亚克人中間，谋杀事件是十分罕见的，大都是只有在激怒中才杀人；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贪图私利的目的。在和其他人的关系^②上，吉里亚克人表现得真诚、守信用和忠厚。

吉里亚克人虽然长期隶属于中国化的满族人，虽然受了阿穆尔边区移民^③的极端有害的影响，但是在道德方面仍保存着原始部落所固有的许多美德。不过他们的生活制度的命运已经不可扭转地被决定了。再过一两代，大陆上的吉里亚克人将完全俄罗斯化，他们在接受文化上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将承受文化上坏的东西。庫頁島的吉里亚克人，距俄国人定居地的中心多少远一些，因此有可能保持纯洁稍微久一些。不过邻近的俄国居民对他们也已经开始有所影响了。各村的人都纷纷到尼古拉也夫斯克去购买东西和谋生，而每个挣了工钱返回故乡的吉里亚克人，便带回了像工人从城市带到俄罗斯乡村的那种气氛。此外，在城市里谋生及其变化不定的运气，愈来愈破坏那种原始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吉里亚克人这样的民族的简单经济生活的主要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编者注

②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编者注

③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赖居民”。——编者注

特征。

施特恩堡先生的論文还搜集了有关吉里亚克人的宗教观点、宗教仪式、法律制度^①等方面的材料。該文将刊載在‘民族学評論’381上面。”

写于 1892 年 11 月底—12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92—1893 年“新时代”杂志
第 1 卷第 12 期

俄文譯自“新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在“俄罗斯新聞”上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律习惯”。——編者注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³⁸²

敬爱的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我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同时，我不能不对你们队伍中发生的纠纷表示深深的遗憾。我决不是要进行干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不仅没有负有使命，而且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也没有这种可能。我只能表示愿望，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上能顺利解决分歧和^①消除分裂的危险。

祝党代表大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你们的 弗·恩·

写于1893年1月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① 手稿中在这后面有一句话被划掉：“为匈牙利党保存保·恩格耳曼同志这样一个无疑是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编者注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 不久前的行徑³⁸³

巴黎的資產階級報刊大肆宣揚，說什麼警察當局破獲了一個極其卑鄙的陰謀。據說有幾個“俄國虛無主義者”陰謀要把那個溫和的全俄羅斯沙皇和君主干掉；但是警察當局有所戒備，“謀殺案的主犯”被抓住了，俄羅斯祖國的慈父得救了。

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弄明白，“俄國虛無主義者”之所以榮膺這樣一個稱號，只是因為他們同俄國的虛無主義[nihil]毫無共同之處。這僅僅是一些不幸在彼得堡的慈父沙皇統治下出生的波蘭人；他們非常規矩而謙遜地居住在巴黎，決沒有幼稚到要去搞謀殺陰謀，——有理智的人現在把這種事讓給警察當局去干了。單是不得不宣布這些“俄國虛無主義者”的波蘭姓氏這一點，就使警察當局也覺得謀殺和陰謀的說法很不妥當了。警察當局不得不通知它的哈瓦斯通訊社和路透通訊社說，這些人僅僅被驅逐出法國國境。

到處都掀起這種叫囂，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簡單。

機會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統治者——部長、參議員、眾議員——都無例外地同巴拿馬丑聞³⁸⁴有關；有的是受賄人，有的是同謀犯和包庇者。然而他們都有這樣的看法：社會輿論注意他們的卑鄙齷齪活動的這一方面已經太久了。他們想：

全世界說我們以騙人勾当破坏了共和国信誉的事已經說得够多了；我們現在讓他們看看，我們在政治方面也能使这个共和国威信扫地，我們讓他們看看，在对沙皇卑躬屈节方面，我們能够大大地超过已故的俾斯麦。俄国大使館希望了解波兰流亡者的档案，那我們就来证明我們强烈希望把它所想要的一切都敬献給它，不仅把档案，而且連波兰人也一道，要是有必要，則把整个法国都敬献給它！

如果資產階級共和国因此而自趋灭亡，那對我們只有好处。它的继承者已經等在門外——这决不是保皇派，保皇派虽然又十分积极地开始搞阴谋活动，但是他們并不危險；这些继承者将是社会主义者。然而这些法国現今的統治者的愚蠢也可能使我們受到損害。他們討好官方的俄国，央求它的恩寵，他們舐它的长靴，他們在这帮俄国痞棍面前低三下四，他們把沙皇捧为法国的真正主宰和法国政治的領導者，而实际上沙皇自己却处于完全不能給法国以任何实际帮助的困难境地。今年冬季证明，俄国的饥荒將持續若干年；国内的資源已枯竭，并且长时期不能恢复，財政状况簡直是糟透了。不是法国需要俄国，恰恰相反，正是俄国沒有法国的道义支持就会完全失掉活动的 ability。只要这些法国資產者稍微有点常識，他們无需用金錢和战争就能够迫使他們的俄国同盟者去做一切。他們不是这样，而是跪着向它哀求，并且让自己被利用来满足俄国的国家目的，这一点就連普魯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也是沒有做过的。可是他們还以为他們做得很巧妙；他們想都沒有想到，彼得堡正在嘲笑他們这些蠢人！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 ——很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这是亨利四世在以改信天主教換得巴黎投降時說过的話。La

France vaut bien une Marseillaise——很值得为法国奏一次“馬賽曲”，这是亚历山大三世在他政治上无能为力，毫无出路的最紧张时刻而海軍上将热尔韦却把法国奉献給他³⁸⁵ 时說过的話。

写于 1893 年 1 月 10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93 年 1 月 13 日

俄文譯自“前进报”

“前进报”第 11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馬³⁸⁶

一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德国的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蚤这样唱道。可是，那里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 la bella Italia [美丽的意大利] 千方百计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巴拿馬案件的国度——la belle France [美丽的法国]，也不亚于有信教习俗和韦耳夫基金³⁸⁷ 的国度——纯洁和畏神的德国。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托斯卡纳的，一家那不勒斯的，一家西西里的和两家罗马的，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行。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足值的支付手段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但是后来一年又一年地延长，一直延到 1892 年 12 月 31 日，最后，又延长了三个月——到 1893 年 3 月 31 日。

还在克里斯比内閣时期，即在 1889 年，由于必须对这种银行特权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当时传播着令人不安的流言，曾经下令调查这些银行的业务。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議員孔西利奥进行的，对罗马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議員阿耳維西进行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帮助他，还派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員比亚季尼去

給他当鉴定家。孔西利奧发现了什么，至今一无所知；而阿耳維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明文件，在阿耳維西死后，人們得到了一份通常认为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副本，由此也就产生了意大利人所謂的《panamino》，即小巴拿馬。

当时克里斯比內閣一声不响地把阿耳維西的报告压下不管。阿耳維西在参議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事情鬧出来，但是每一次都让别人堵住了嘴。当原来下令进行調查的大臣米切利由于又要使銀行法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而在議会委员会中做了一个替羅馬銀行大肆吹噓的报告，并且坚决請求他的朋友阿耳維西不要以揭露来損害他和国内信貸机关的声誉时，阿耳維西也保持了沉默。不久，克里斯比垮台，魯迪尼上台；后来魯迪尼垮台，成立了現在执政的焦利蒂內閣。規定要改組銀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年的确定的銀行法，仍然沒有着落。誰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誘餌。就像在儿童游戏“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輾轉相传，最后到12月21日，最后一点火星才用最违法的方式无情地踩灭掉。

还在1892年12月6日，根据焦利蒂的建議，提出了一个关于把銀行特权延长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暗中有关于在銀行管理中有严重舞弊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流言在传播，焦利蒂在12月21日就要求把該法律的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3月31日。在进行辯論的时候，議員科拉揚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宣讀了阿耳維西关于羅馬銀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季尼关于他对賬本和庫存現金进行审核的結果的專門报告中的个别段落。于是就暴露出来了惊人的事情！非法超額发行的銀行券达900万法郎；銀行的現金同黄金儲备混在一起（这对銀行行长和出納員來說极其

便利，但銀行章程是禁止这样做的)；总存量全部是根本不能兌現的空头票據；曾經从銀行基金中撥出了 7 300 万貸款发放給 179 个特权人物，其中 3 350 万仅仅发給了 19 个人。在銀行的債務人中間，有借款超过 100 万的銀行行长湯隆古和借款 400 万的銀行監事长朱利奧·托洛尼亞公爵，等等。此外，科拉揚尼一个名字也沒有提到，但他暗示他知道的比說的还要多，并且要求議会对銀行的业务进行調查。

接着另一位議員加瓦齐宣讀了阿耳維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其中談到羅馬銀行給律師、新聞記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額貸款，这些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錢将近 1 200 万，而在已經公布的資產負債表內却沒有列入。

在克里斯比內閣期間下过調查命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內閣首相焦利蒂、克里斯比和魯迪尼也相继跳了起来，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們在发言时是多么义憤填膺啊！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銷員在被人揭露他拿好样品給人訂貨，却用最次品交貨的时候，也不可能燃起如此高尚的怒火的。

同一天，議員們在議會出納处換掉了 5 万法郎以上的羅馬銀行的銀行券，而銀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 1 000 法郎)下跌了 100 法郎。然而在大臣們的豪言壯語之后，到傍晚时，証券交易商們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人們以为这桩丑聞已經了結，事情已成过去。

二

可是科拉揚尼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实情况，而且他所談的

恐怕还不及調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銀行行长湯隆古、总出納員拉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完全是按家庭式地发放了近 900 万的貸款。而且，按照湯隆古的說法，这个銀行的管理一般都是“按家庭式的”——patriarcalmente；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把作工商业优惠貸款用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担保的抵押发放出去或者发放給那些把工业仅仅理解为从事各种各样投机勾当的人，凭不断延期的票据或者甚至按公开的往来戶进行发放。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漸漸使几乎所有的新聞記者和不少于一百五十位本屆众議院議員，即大部分明明是沒有支付能力或甚至仅仅靠借債度日的人，成了銀行賬本上的債務人。阿耳維西的报告还附有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議員阿尔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議員，而且每人的借款数为 50—60 万法郎。在这些人中間，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界尊敬的人^①和本屆政府的两位大臣——格里馬耳迪和馬尔提尼；格里馬耳迪甚至还是銀行的法律顧問之一，年薪 25 000 法郎。这已經非常可观了，但这些都是 1889 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甚至还不是小巴拿馬，而只不过是 panaminetto，即很小很小的巴拿馬。

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勾当的传说（其中当然也有夸大的），在科拉揚尼的发言推动下，就一个接一个地漸漸在人們中流传开来。人們开始从羅馬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內就从存款总数 1 400 万中提取了 900 万以上），并且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受它的銀行券。政府感到，現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么多年

^① 梅諾蒂·加里波第。——編者注

来一届政府推給另一届政府去办的事情（妥善地解决关于銀行和紙币的問題），現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在1月的头几天內，关于把两家羅馬銀行和两家托斯卡納銀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貸机关的談判就开始了，同时內閣发布了关于重新检查銀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构核心的国民銀行自然拒絕无条件地承担羅馬銀行的一切过失；因此它进行阻撓，頑固地討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信任变成了张惶失措。羅馬全市从羅馬銀行中提取了100万以上的存款，儲蓄銀行也从那里取出了50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羅馬銀行的股票在科拉揚尼的发言后跌到670法郎，1月15日的牌价只有504法郎，尽管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意大利北部，已經开始拒絕接受这家銀行的銀行券了。

但是这时传出了关于对羅馬銀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結果。誠然，朱利奧·托洛尼亞公爵偿还了債務；1月13日他还了400万法郎，1月14日又还了60万，15日还了余下的200万。誠然，行长湯隆古和出納員拉扎罗尼为了償債而把自己的巨額財產全部交給了銀行。誠然，“一位显貴”（“那不勒斯信使报”³⁸⁸ 以此明显地暗指国王^①）偿还了大臣格里馬耳迪及其家属的銀行債款。誠然，激进立宪派議員福提斯声称，他是作为銀行的法律顧問取得貸款的。但是，这些怎么能同下面这个消息相比，这个消息說，根据重新检查的材料，只有权发行7000万銀行券的羅馬銀行，共发行了銀行券13300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銀行賬本上开列了一些虛构的債权人，在他們名下記了总数达4900万的賬；行长湯隆古凭一张注明1893年1月3日这样近的日期的普通收

① 翁伯托一世。——編者注

据領取了2500万(1月21—22日的“世紀报”³⁸⁹)。有人还說,黄金儲备虽然没有发生問題,但只是因为:总出納員的侄子米凱萊·拉扎罗尼男爵曾經专门为此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現款,挪用几天,答应在检查后立即 in natura〔用原物〕归还这笔錢;不过,这需要作一番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当时把羅馬銀行的全部基金查封了。事情的揭露已經到处引起了滿城风雨,150个議員的名字被人們多少准确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三届內閣是知道这件事的,它們为了进行选举活动,經常把大笔銀行現金交給自己的拥护者使用,它們常常在內閣會議上討論这些盜用的公款,它們完全了解自己对盜用公款所应負的責任,而有意識地加以隱瞞,因而就助长了繼續盜用公款。

在这一切之后,终于在1月19—20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发表的比亚季尼的报告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馬確有其事。

三

危机已經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銀行一道干过欺騙勾当、揮霍浪費过銀行基金(不言而喻是用誠实貸款的方法)的人中間,一部分人握有政权,另一部分人則沒有掌握政权。很自然,把刀子一按到他們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一个共犯者采取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劊子手的崇高决定。同法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那里就是魯維埃、弗洛凱和弗雷西訥之流把累塞普斯和丰唐这些人牺牲了,而累塞普斯和丰唐正是經常被他們及其共謀者“把刀子按到脖子上”(照沙尔·累塞普斯的說法),来从巴拿馬騙局中榨取政治活动的經費的。同样焦利蒂和格里馬耳迪也把

自己的摯友湯隆古犧牲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前任先前曾向这个人勒索銀行的錢財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下一条出路——破产。而当格里馬耳迪的債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捕湯隆古了。

但是湯隆古是一个老江湖，一个飽經世故的老意大利人，在騙人行当中决不是年輕沒有經驗的新手，不像曾不得不为賴納克之流安排巴拿馬騙局的沙尔·累塞普斯及其他傀儡那样。湯隆古是一个篤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4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和中間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銀行的办公室里見到的，——“小乖乖，你不要使我难为情”^①，——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打交道。湯隆古同梵蒂岡的关系很好，他就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給了意大利警察当局所望尘莫及的梵蒂岡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謀害的文件，这种文件他是不愿过于仓卒地托付給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出現了小巴拿馬案件时的情形也同法国出現了巴拿馬案件时一样，人們非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某些证明文件，而是为了使这些证明文件完全消失。于是湯隆古决定，这种能对他起保护作用 and 揭露事实真相的文据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預审推事手里，而只能够保存在梵蒂岡。

再接着上面的說吧。当內閣一同国民銀行达成了協議，——根据这个協議，后者承担羅馬銀行的全部資產和負債，并且負責按每股450法郎（股票价值是1000法郎）付款給股东；当內閣一觉得可用这个協議保证不公布那些欠銀行錢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勇

^① 引自海涅：“归乡集”补遺。——編者注

敢的湯隆古就不能不立即看到，在資產階級政治里，对效勞所給予的報酬是忘恩負義。从1月16日傍晚起，他的家門口就布置了崗哨；1月19日，他和总出納員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來說，这决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議會报”³⁹⁰的一个編輯說过：

“他們会把我关进監獄，但是希望他們明白，这是自找麻煩……如果想要我为別人的过錯承担責任，那末我就要把事情鬧出来…… 他們不是想要使我破产嗎？那时我要公开宣布那些曾經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字。我曾屢次說这些錢不能給，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錢是必需的（occorrono）。而且我有证据……經常都是这样；我越是为他們效勞，他們越是往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我現在垮台，那末跟我作伴的就大有人在。”

而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于1月25日被帶往雷季納·切利監獄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員說道：“我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權利。”他对他的家屬說道：“他們希望我死在監獄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訊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馬案件中的經理們那样百依百順的，不会像他們那样不以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用沉默来为自己哀求寬大判決的。虽然湯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報紙說他是一个高大而結实的人，是一个“真正七十高龄的胸甲騎兵”；他过去的一切說明，他懂得：只有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頑强的反抗才能救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名的 cassetta d'oro [金匣子] 会从梵蒂岡搬到法庭，它里面的东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愿他一切順利！

然而就在1月25日那一天，議會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也鬧开了。焦利蒂能够对他的150名議員高声叫喊的，只是魯維

埃对自己的 104 名議員高声叫喊过的东西：要是我們不拿这些錢，你們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这也确实如此。克里斯比和魯迪尼所能說的也只是这些话。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揭露——不論是在議會中，还是在法庭上。小巴拿馬案件也同巴拿馬案件一样，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整个这一事件的寓意是什么呢？——不論是在巴拿馬案件，小巴拿馬案件，还是韦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資產阶级的全部政治——不論是在各資產阶级政党之間的愉快爭吵，还是它們对工人阶级的冲击的联合反抗——不花費大笔金錢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錢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說明的目的；由于資產者先生們的吝嗇，政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隱諱的目的而用隱蔽的方式去謀取資金。这方面的行家俾斯麦曾經說过：“我們在哪里找到錢，就从那里取用。”至于“我們在哪里找到錢”，这我們刚才已經看到了。

写于 1893 年 1 月 26 日和 29 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93 年 2 月 1、2 和 3 日

俄文譯自“前进报”

“前进报”第 27、28 和 29 号

CARLO MARX e FEDERICO ENGELS

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FEDERICO ENGELS

Centesimi 25

MILANO

Uffici della **CRITICA SOCIALE**

Portici Galleria, N°23

—
1893

“共产党宣言” 1893 年意大利文版的扉页

致意大利讀者

“共产党宣言” 1893 年

意大利文版序言³⁹¹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 1848 年 3 月 18 日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米兰和柏林发生了革命，即发生了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中心——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割据和内訌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曾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 年 3 月 18 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 1848—1871 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 1848 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³⁹²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智慧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

了。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也就不能不使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获得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四十五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看看，在1848年以前存在的政治条件下，能有什么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的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良好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

意大利是否会給我們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紀元的誕生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載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
意大利文版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欧洲能否裁軍?³⁹³

写于 1893 年 2 月

以一組文章的形式(沒有序言)載于
1893 年 3 月 1—5、7、9 和 10 日
“前进报”第 51—56、58 和 59 号,并
于 1893 年 3 月底出版附有序言(3
月 28 日写)的单行本

署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譯的

序 言

这里重印的几篇文章曾于 1893 年 3 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案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这是我的论断的基本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办法。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随签订协议的政府的性质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最多两年的服现役期限作为起点，那末再过几年也许就可以规定短得多的期限了。

我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軍事的訓練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說明了：絕對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議的民兵制度和現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一談。

弗·恩格斯

1893年3月28日于伦敦

一

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恰好在现在，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特别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的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而各个地方的努力都已经达到了力量（有的地方是新兵，有的地方是金钱，也有的地方二者都是）开始耗竭的程度。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没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

我肯定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之后，最终证明了包括预备队和后备军³⁹⁴在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就是在当时的畸形的普鲁士形式下——优越于可以找人代役的征兵制。大陆各国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采取了这种制度。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巨大的不幸。主要预备队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其性质来说，比起根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又加上了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兼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提

尔西特和約对普魯士那样。³⁹⁵ 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軍备竞赛，漸漸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軍的服役期限。在法国，地方部队获得了由年龄較大的人組成的預备队；在德国，恢复了第二类后备軍，甚至恢复了民軍。³⁹⁶ 这样一步一步地繼續下去，直到自然的年龄极限为止，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应征人員的名額，并相应地造就了一批新的干部来訓練新兵；但是就在这方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而在法国甚至已經超过了极限。最近几年来，在法国軍隊中应征入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負起兵役重担的青年。曾經观看过 1891 年在香檳举行的大演习并完全承认、有时甚至是带着贊叹的口吻承认当前法国軍隊的战斗素质很高的英国軍官，在这方面是公正的，他們一致指出，在行軍和战术演习中掉队的青年士兵多得不相称。在德国，誠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备人員完全用光，但新的軍事法草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一句話，就在这方面我們也已經达到可能的极限了。

普魯士軍事制度的現代化的、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男子在他年龄适于服兵役的整个时期內都要为国防事业出力。而在 1870 年以来各国軍隊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出的唯一的革命的特征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像中實現的这个要求，各国政府已不得不（常常是违反意愿地）愈来愈多地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人們服預备役的长的年限，还是要所有适于服兵役的青年都服兵役，現在都已經是某种不可动搖的东西，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反对，相反，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也在实

实际上完全实现。

因此，可以借以满足裁军需要的就只剩下一点了，这就是现役期。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得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是要预先说明，这个期限在将来一旦认为可能缩短时就立刻缩短，并宣布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的。我肯定说，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即使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二

对最长現役期作国际性的規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国的軍隊。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軍隊來說，現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內是战局初期衡量它們在各种战争环境中的活动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別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的情况下是如此。1870年，我們的战士们充分領教了曾經长期服役的帝国步兵的刺刀冲锋的 *furia francese* [法兰西狂暴]，以及在維尔特和色当城下的騎兵冲锋的威力；但同时施皮歇恩城下，他們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們甚至用較少的兵力就能把那同样的步兵赶出設防坚固的障地。³⁹⁷ 所以一般來說应当承认：在随着民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限度內，現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經過战斗考驗的軍隊的一般战斗訓練水平，特別是他們的进攻能力的水平。

如果在国际范围內規定了最长現役期，那末各国軍隊的战斗能力的对比关系将大致和現在一样。一国軍隊在它的直接作战能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軍隊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現在不可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現役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現在为止是这样微不足道，以致于没有什么意义；而在服役期縮短的情况下，正如同現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支軍隊中的每一支如何利用協議所規定的服役期。而且，两支軍隊的人数之比将与两个国家

的居民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最終真正实现的时候，在經濟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人的百分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軍隊人数的标尺。那时就不会有像 1813 年普魯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这种便宜事已經沒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規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所有的軍隊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在这个問題上是有話可說的，如果允許他們这样做的话；因为經常缺錢这一情况到处都使得对一部分应征人員只“匆忙地”訓練几个月。这样就不得限于最主要的东西，而把整堆的傳統的廢話拋在一边，那时人們就会惊奇地发觉，对于把一个个体格发达的青年人变成一个士兵來說，所需要的時間是多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談到，訓練德国补充兵的軍官們对此多么惊异。³⁹⁸ 在奥地利軍隊中，許多軍官直截了当地說，服役期几乎和德国的补充兵相同的后备軍，在质量上优于常备軍。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后备軍中恰好沒有常备軍中浪費在傳統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時間，正因为如此，那里也就不会白白浪費時間。

1888 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斗的战术布勢仅仅局限于最必要的方面。里面什么新东西也沒有。奥地利人从 1859 年起就很善于在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黑森—达姆斯塔德人几乎同时成立了由四个連纵队簡單地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营纵队，而在 1866 年后，他們在普魯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合理的編制。³⁹⁹ 在其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为习惯所神圣化、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仪式；而我对此是絕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在 1870 年的战争以后，我曾經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

于現代作战方法的連和营的密集队形和运动的要图，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未来国家”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盛行于普魯士軍隊中的只重視步法的軍事操练精神，使得已經明令废除了的无益的时间浪費又通过大检閱的后門恢复了。忽然发现，校場操练作为对抗削弱团結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真正的紀律的唯一手段等等，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似乎秩序和紀律只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废除“閱兵步法”这一項就可以騰出許多个星期来作合理的操练，更不用說外国軍官到那时再也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閱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士兵——只要他們在这以前还不会——整整站两个小时的崗而决不想任何事情的技能，似乎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别是他們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野外警戒勤务訓練条例之下，在有各种各样执行保安勤务的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經失去了任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就至少可以贏得百分之二十的服役期来作軍事訓練，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这就是連队中非战斗的事务工作人員、軍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也有許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那末，騎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騎兵不是需要較长的服役期嗎？——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騎馬、又不会照料馬匹的应征人員，长些的确最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許多事可做。假如馬匹飼料标准不是定得这样少——要知道，現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專門把

馬匹喂肥，以使它們达到标准！——假如在每一个騎兵連中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定額以外的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馬上操练，一句話，假如认真地設法用比較紧张地练习重要东西和去掉多余东西的办法来弥补服役期的縮短，那末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事情也可以进行得很順利。至于說到預备軍馬的訓練（現在人們經常以此作为借口，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絕對必要性），那末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徑。此外，沒有任何东西妨碍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騎兵中志愿入伍者以及超期服役軍人服役三年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們在預备队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补偿，否則这是不能實現的。

如果去听軍事权威的意見，那末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們看来，这一切都是絕對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我已經看了五十年了，許多軍事制度今天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而且是被原来那些权威扔掉的；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軍隊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軍隊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贊揚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前簡直就是荒謬的东西；最后，我还經常看到，在每一支軍隊中都有其特殊的因襲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供下級官員、士兵和群众遵守的，是由高級官員培养起来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軍官們的嘲笑，而且在第一次行軍时就会完全化为烏有，——一句話，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經驗，我要奉劝大家正是对軍事“权威的意見”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

三

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們的高級軍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領域內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現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軍事这样革命的領域。在我当年在庫弗尔格拉班⁴⁰⁰使用过的六磅或七磅的滑膛榴弹炮和現在的后装綫膛炮之間，在當時的大口徑滑膛枪和現在的后装五毫米連发枪之間似乎相隔有整整几百年之久；而这还远沒有到头，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經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現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絕不能預見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們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計的因素。

四十年前步兵的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 300 步；在这个距离上一个战士可以沒有任何危险地經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有的射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 1 500—1 800 步的距离上就已經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 600—1 000 步，火炮的最大射程是 3 000—4 000 步。而新的、暫且还没有經過战斗考驗的小口徑步枪在作用半徑方面却接近于火炮的作用半徑，这种步枪射出的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三到五倍；因此，一个装备連发枪的排在火力方面等于以前的一个連；誠然，火炮的有效射程不能說有同样的提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現在却装有威力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的确，暫時还不能肯定地說，誰应

当經受住这种威力，是射击手还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軍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我們面前出現了这样的軍事权威，他們五年前还在强行給自己的軍隊灌輸早已从戰場上消失的老弗里茨^①的綫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們虔誠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导說：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敗！这些权威直到現在还不敢侵犯士兵制服上的发光的鈕扣和金属的鑲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前挂着寬寬的紅带子的枪騎兵和虽然沒有胸甲——总算沒有了！——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騎兵送到炮火下面去，他們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拿虽然极其无聊、但却受到虔誠的尊崇的带穗肩章去为祖国牺牲，毕竟比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牺牲要好些。

我认为，無論是对德国人民來說，或者甚至是对德国軍隊來說，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見在軍隊中占統治地位，是沒有好处的。我們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如果我断言在我們的最有能力的軍官中缺乏有这种头脑的人，断言极力想摆脱二十年和平时期內又极为盛行的墨守陈規和只重視步法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謬誤中。但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前，我們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預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們在軍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上面我是想证明，如果只教給士兵們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編者注

使他們不在任何傳統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費時間，那末，現在就可以為一切兵種規定兩年的現役服役期。但是我立刻事先做了附帶的說明：不應當安於兩年。而且問題在於，關於在國際範圍內規定兩年服役期的提議只是進一步逐漸縮短服役期的第一步——比如說，最初是縮短到十八個月（兩個夏天和一個冬天），然後縮短到一年，然後……？從這裡開始未來的國家，真正的民兵制度，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事情真正開始的時候再來詳細論述。

主要的問題在於開始這件事。只要睜眼看看事實，看到縮短服役期對於各國的經濟發展和歐洲和平的保持都是必要的，那末由此得出的最直接的結論就會是確信**軍事訓練的重心必須轉移到對青年的教育上來**。

當我被放逐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萊茵的時候⁴⁰¹，我感到驚異而高興的是，在各地農村學校的操場上都看到了雙杠和單杠。這好極了，但遺憾的是，僅止於此。體操器械是按照規定以真正的普魯士精神添置起來的，但是這些器械的利用情況無論如何是不好的。這些器械沒有派上應有的用場，或者更正確地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根本沒有加以利用。要在这方面終於認真做起來，難道就那么困難嗎？在各年級學生的四肢還很富於彈性和十分靈活的時候，經常而認真地教給他們自由體操和器械操，比起現在這樣在二十歲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他們出一頭汗，自己也出一頭汗），白費氣力地企圖使他們因工作而變硬了的骨骼、肌肉和韌帶恢復以前的靈活性和柔韌性來，不是更好一些嗎？任何一個醫生都會告訴你們，分工使一切受它影響的人變成殘廢，使一部分肌肉發達而其他部分萎縮，而且在每一個勞動部門中這種情況都有不同的表現，每一種勞動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變成殘廢。先使人們變成殘廢，然

后在服兵役时又竭力使他們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这难道不是发瘋嗎？只要在中小学中及时預防这种殘废現象的发生，士兵的质量就会提高两倍，难道这个真理是軍官的認識所不能达到的嗎？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輕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軍事密集队形的构成和运动的規則。中小學生天生就站得挺，走得直，特别是如果他們做体操的話；而我們的新兵在队伍里站成什么样子，教会他們在站和走时姿勢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們每一个人在服兵役时都看到了的。以排和連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教会，而且容易得很，在軍隊中連想像都想像不到。有些事情在新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对中小學生來說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轉弯时保持間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來說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中小學生只要有系統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輕松愉快地学会。如果把夏季的大部分時間用于行軍和地形练习，那末这無論对中小學生的身心发展，或是对軍事財政（它将因此省下几个月服役時間的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軍事远足可以极好地利用来教会中小學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这种远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學生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們有可能在較短的时期內受到專門的軍事訓練，——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魯士軍官）在他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經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現代軍事很复杂的情况下，不預先对青年人进行軍事訓練，就根本不要想向民兵制度过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經驗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現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魯士的琴弦。对普魯士国家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把服役期滿的軍士放到哪里去。到現在为止

是用他們去當憲兵、邊防軍、看門人、抄寫員、各種文官；在普魯士的官僚系統中沒有哪個角落可憐得可以不安插那些有權任文職的軍士。總之，你們曾千方百計地給軍士們安插職位；你們曾固執地把他們放在他們不適合的崗位上，委托他們去做他們一竅不通的工作；難道還不該把他們用在那個他們多少通點竅並且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的領域嗎？讓他們去做教員，但是，不是讓他們去教讀、寫、算，而是去教體操和隊列訓練，這對他們和學生都是有益的。而且，一旦把脫離了兵營的小圈子生活的軍士放到眾目睽睽的學校操場上，並且不是受軍事法庭的管轄，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的管轄，那時，我敢打賭，我們那些富於反抗性的青年學生就會把過去最惡毒地折磨士兵的軍士也教好。

四

下面我們還要回过来談談能否指望用国际協議的办法使类似的关于普遍地、均衡地和逐步地縮短服役期限的建議被接受的問題。我們暫且假定这个建議已經被接受了。那末，这个建議能否由一紙空文变成現實呢？各方面是否会誠实地执行这个建議呢？

总的說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規避協議的作法都需要費不小力气，因此无論如何是掩盖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民自己也会監督協議的遵守情况。如果想要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限繼續服役，那末誰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至于談到个別的国家，那末奧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个協議，把它当作一种解救的措施，而乐于一絲不苟地遵守这个協議。关于俄国，我們将在下一节里談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

如果法国在協議上签字并且批准它，那末总的說来，它无疑是会遵守这个協議的。但是这里假定，存在于有产階級和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一部分工人階級中的复仇意图暫時占了上风，并且可能直接地或以詭辯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協議的条款。这样的破坏永远不会是巨大的，否則巴黎就宁可拒絕接受協議了。而德国处于这样一种幸运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詭計寬宏大量，装作沒看見。尽管法国曾千方百計力求使 1870 年的失敗不可能

重演，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要更多得多的优越性。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有逐年增多的优势，現在已經有 1 200 多万。第二，在普魯士，現在的軍事制度已經存在七十多年，居民已經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經在許多次动員中經過仔細的檢驗，在这方面产生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經受到实践的考驗并且已經知道得很清楚，——德意志其余各邦的軍隊也都具有这种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試行第一次总动員，而且是由一个要混乱得多的組織来試行。第三，在法国，实行像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服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的服役一年的人从軍隊中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說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許的政治制度的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是缺点的东西，現在在軍事方面却成了优点。毫無疑問，同人口对比，沒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样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而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的制度，無論它多么不民主，从政治观点看来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給了軍事指揮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对大量的、已經受过充分的普通訓練的青年人进行准备担任軍官的軍事訓練。1866 年的战局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那时起，特别是从 1871 年起，德国軍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殊的、差不多是絕无仅有的注意。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軍官中有不少人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無疑問，如果拿这些軍官同他們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較，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軍官在軍事方面还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預备队和后备軍的全体人員中，受过軍官訓練的人的百分比，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由于軍官特別多，所以德国在动員时期就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地編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訓練的軍队。根据李希特尔的說法（見 1892 年 11 月 26 日“自由思想报”）⁴⁰²，——据我所知，無論是帝国国会或是軍事委员会都沒有否定这种說法，——每 1 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 1 个机动的預备团、2 个后备营和 2 个补充营。这样一来，每 3 个营就可以提供 10 个营，換句話說，和平时期組成 173 个团的 519 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 1 730 个营，猎兵和射击手还不算在內。而且这一切可以在这样短的期限內完成，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的，甚至在接近这样短的期限內也是办不到的。

一位法国的后备軍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軍官的数量要少得多；可是对于根据正式声明建立的新部队的干部配备來說，他們应当是够了。这位軍官还承认，这些軍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編成的部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說的德国所能提供的軍队。而且，法国所能提供的軍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在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感到缺少軍官。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現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一个德国拥有无穷无尽的軍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協議規定的期限而把士兵的訓練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装作看不見嗎？

五

現在我們來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應該直截了当地說，不仅俄国将来是否遵守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縮短服役期限的協議完全无关紧要，就連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協議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們所关心的問題来看，实际上我們几乎可以根本不注意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 1 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在軍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大致地相比。德国的 5 000 万人口集中在 54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而从軍事上值得我們注意的俄国的 9 000 万或者最多 1 亿人口，則散居(根据保守的統計)在 35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德国人因为人口非常稠密而取得的这种优势，还由于他們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 1 亿人能比 5 000 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很多時間；但是归根到底他們終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軍隊不仅需要应征人員，而且还需要軍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軍官只能从貴族和城市等級中間征集；但是貴族比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軍所需要的軍官呢？

对于一方好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以經濟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沒有这种水平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一，要把一个中等才能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訓練有素的士兵，一般需要相当多的時間。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任务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的进攻来解决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們的全部生活經驗教导他們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結合。在乡村还是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在城市是劳动組合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是 *krugovaja poruka*，即伙伴们彼此互相負責；一句話，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只有团結才能得救，另一方面，单独的只靠自己的主动精神的个人注定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俄国人的这个特点在軍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結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不可能拆散的；越是危險，他們就越加紧密地結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这种在拿破侖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足以补偿俄国士兵的許多欠缺方面的团結的本能，現在已成为直接的危險。現在密集的人群已从戰場上消失；現在的問題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綫之間的联系，因为这时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摻混在一起，指揮又常常并且是迅速地轉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軍官来担任；現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地采取在当时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不失掉同整个分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群居本能来建立，而只有在每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只有在西方資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比較高的“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我們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小口径后装連发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軍队的伟大力量的这种长处变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現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

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時間，而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軍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組織成战时的新队伍呢？如果連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軍官，那末俄国又如何能作到呢？在俄国，有文化的居民（中用的軍官只能从这部分居民中培养）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在这里，士兵，甚至是受过訓練的士兵，比在任何別国的軍隊中都需要更多的軍官。

最后，第三，大家知道，普遍盜用公款和盜窃現象在俄国官吏中間、而且往往在軍官中間也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样去进行动員呢？俄国过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立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軍隊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紙空文。当号召轉入預备役的退伍軍人和民团^①（后备軍）拿起武器以及需要保证供給他們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員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不是一切都在規定期限和規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而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慣于盜窃和貪污的俄国官吏之手，一切事情怎么能够順利地进行呢？在俄国进行动員，这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

換句話說：甚至从純粹軍事角度来考虑，我們可以允許俄国人随便征集多少士兵和讓他們随便服多長時間的現役，只要沙皇认为需要的話。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現役軍人更多的軍隊，而且也未必能及时作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貴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駐扎在从柯夫諾到卡麦涅茨的全部

^① 在原文中这个詞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編者注

边境綫上的俄国軍隊，将在自己的国境内处于敌人的領土上，陷入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了一两次敗仗，戰場就会从維斯拉河轉向德維納河和德涅泊河；在德軍后方，在德軍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德軍的波兰盟軍；不过，如果普魯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懲罰。

到現在为止我們仅仅考察了問題的純軍事方面，我們深信，在这个問題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但是，只要我們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經濟状况，特別是財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六

俄国現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絕望的。1861年的农民解放以及与之有关的——一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結果——資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向經濟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現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个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的过程。

貴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有价证券提供的补偿，这些有价证券在最短的时间內就被他們揮霍净尽了。这个結束以后，新的铁路为他們自己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銷售市場；于是貴族就从事砍伐和出卖林木，在卖得的錢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經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地主庄园大部分仍然經營得很坏；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貴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負債累累；他們庄园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們以前所有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质量更差；他們被剝夺了利用公社牧場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們失去了飼养牲畜的基地；捐稅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現在到处都要用货币来交稅；此外，他們还要——也是用货币——支付利息和偿还贖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贖金(wykup)；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經濟状况的恶化外，又突然加上了强制的从自然經濟向货币經濟的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結果，农村財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館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思是

吃公社的人)和 kulaki (高利貸者)对农民的剝削大为加强。而且所有这些好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現了使农民的自然經濟彻底破产的新的工业。大工业以自己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还要么夺去他們的手工业产品的銷售市場,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业依附于資本家“包买主”,或者更坏,依附于他的中間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旧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忽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場的現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注定要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产。^①

在这种社会变革延續了二十年之后,也出現了它的其他一些結果。无情地砍伐林木毀坏了土壤水分的貯藏所;雨水和雪水沒有来得及滲进地里就很快順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到夏天則河里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許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位降低了,据說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禾谷的根就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們破产了,而且許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貧瘠了;这种土地貧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續整整一代之久。

1891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1891年起俄国始終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大量地毀掉了农民最后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資料,即他們的牲畜,并使他們負債累累,以致必然

^① 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9期上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見本卷第298—303頁。——編者注]中已經談到了。

要摧毀他們最后的生命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于絕望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資金。在俄国，貴族靠借債度日，現在农民也靠借債度日，但是，首先靠借債維持的是国家本身。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錢是众所周知的：超过 40 亿馬克。它的国内債務有多少誰也不知道；第一，因为既不知道发行的公債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紙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紙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錢。40 亿馬克的俄国国家債券已把西欧的金融市場塞得过于飽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債的情况就說明了这一点；总数 5 亿法郎的公債只銷掉 3 亿，其余两亿，俄国財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額认购了債券的銀行家那里收回。⁴⁰³ 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內，任何新的俄国公債甚至在法国也沒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似乎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們，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絕望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們自己不这么愚蠢，而把为此所需要的錢投到它嘴里去的話。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資產階級**輿論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相反地，倒是俄国需要法国。沒有法国，沙皇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半島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更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並沒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輸出已經遭到了破坏。

現在主要的輸出項目只剩下黑麥了，而它差不多完全是輸往德國。只要德國一開始吃白麵包而不再吃黑麵包，現在官方的沙皇和大資產階級的俄國立刻就會破產。

七

我們對我們的鄰邦、我們的愛好和平的敵人已經批評得够多了。但是我們自己的情況又怎樣呢？

我們應當直截了當地說，只有永遠結束對士兵的虐待，逐步縮短服役期對於軍隊才是有益的，而近年來這種虐待現象在軍隊中已經根深蒂固，習以為常，遠遠超過了人們願意承認的程度。

這種虐待士兵的現象是步法操練和校場操練的永恒伴侶；只要普魯士軍隊在某個時期成為和平时期的軍隊，這兩者就在普魯士軍隊里廣為流傳起來，然後它又從普魯士人那裡傳給薩克森人、巴伐利亞人等等。對士兵的這種態度是真正的“舊普魯士”時代的遺產，那時士兵不是招募來的流浪漢，就是農奴的兒子，所以他應當毫無怨言地忍受儼若容克地主的軍官們的一切嘲弄和侮辱。正是那些破產了的、變窮了的和寄生的貴族（他們在易北河以東地區為數不少）現在還在提供對士兵的凶惡折磨者，在這方面只有喜歡硬充容克地主的傲慢的資產階級子弟才能比得上他們。

這種對士兵吹毛求疵的態度在普魯士軍隊中從來也沒有消除。但是以前它比較少見，而且帶有較溫和的、有時是幽默的性質。但是，自從一方面需要教士兵愈來愈多的科目，同時另一方面又不考慮把過時的、失去任何意義的戰術練習這全部無用的廢物拋棄的時候起，軍士就逐漸取得了愈來愈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採用只要他認為合適的任何訓練方法；同時，規定軍士要在短期內

給自己的班有效地灌輸这种或那种軍事規則，也間接地迫使他采取强制手段。加之士兵提出申訴的权利純粹是一种嘲弄，中意的旧普魯士方法在士兵順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奇怪了。因为我确信，在德国西部建立的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量城市居民的团队中，对士兵的侮辱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組成的团队中要少得多。

对此从前有过一种(至少是实际上的)解药。在使用从枪口装弹药的滑膛枪的时候，在演习时很容易把一块打火石放入枪管，使它落到空弹筒里，因此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常常由于疏忽大意而被击毙。有时也出錯；我知道有一个科伦青年，在1849年就是这样死于别人向他的长官射出的子弹。而現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觉察不到了；然而軍隊中自杀事件的統計数字是虐待士兵現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当“严重的时刻”到来并使用实弹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問題，即是否又会有人要采用旧的做法，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有过的地方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要知道，这是会大大促进胜利的。⁴⁰⁴

英国軍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贊揚1891年在香檳演习时法国軍隊中官兵之間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軍隊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像报刊上所經常披露的我們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現象。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想在法国軍隊中效法普魯士用鞭笞来惩罚的企图就遭到了彻底失敗。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的最糟糕时期，也沒有任何一个长官敢把我們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种作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法国士兵。而現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哪一个法国軍士敢命令士兵們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如果法国士兵听到或讀到有关自己未来

的敌人毫无怨言地让人侮辱的种种情况，他們一定会多么鄙視这些敌人。而設法使每个法国兵营中的士兵都能讀到和听到这种情况，——这是一定有人去干的。

現在在法国軍隊中占統治地位的精神以及軍官、軍士和士兵之間的关系，正是 1813—1815 年在普魯士軍隊中占統治地位的，并且曾經两度使我們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們現在却反而日益接近 1806 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当时士兵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軍官之間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这一切把普魯士軍隊引到了耶拿⁴⁰⁵，后来就当了法国的俘虏。

人們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談得多么多啊！可是在和平时期，他們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統地消灭这些因素！

八

直到現在我們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縮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兵制度的建議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問題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接受。

我們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提出了这个建議。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己也許还要縮減得更短。奥地利軍隊中似乎比德国軍隊中更坦率得多地談論正在一部分軍隊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果。許多奥地利軍官直率地肯定說，服役只有两三个月的后备軍部队的战斗素质比常备軍高；不管怎样，他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像人們所說的，一个后备軍的营在二十四小时內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而一个常备軍的营則需要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軍中人們害怕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規旧套，而在后备軍中一切組織都是重新建立的，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規旧套。无论如何，在奥地利，無論人民或政府都热切地盼望減輕軍事負擔，他們本身的經驗向他們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縮短服役期限。

意大利也会双手接受这个建議。它正被軍事預算的重担拖得筋疲力竭，已經到了必須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縮短最长服役期在这里也是最簡捷的出路。因此我們可以說，三国同盟⁴⁰⁶ 要么将瓦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們建議的措施。

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議，那末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議，同其他国家相比，它絲毫不会使自己的軍事状况恶化。相反，它将有可能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普遍义务兵役制仅仅在二十年前才在法国实行这一情况，对法国来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中包含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一切还都是新的，只是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度，可以很容易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見的頑强反抗。所有的軍隊在打了几場大敗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所以，在法国，最好地利用協議中所規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軍隊一样处于革命改革状态，所以那里也能比任何地方都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年的一般体育訓練和专门軍事訓練。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軍事力量比起德国来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义的潮流，——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蠢，——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議的政府，尤其是当这种建議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們假定，法国将拒絕这个建議。那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議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們不应忘記，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統治使德国受到——不是沒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維希，不遵守以及最后用欺騙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約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⁴⁰⁷，吞并亚尔薩斯—洛林，卑鄙地迫害普魯士的波兰人——所有这些和恢复“国家統一”毫无共同之处。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貪于侵占別国領土的坏名声；那个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攆走，可是仍然把兄弟般地

統一“从艾契河到默麦尔河”^①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弗兰德、瑞士和所謂“德国人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德国沙文主义資产者，誠心誠意地帮助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輝煌，以致現在在欧洲誰也不相信“正直的德国人”了。無論你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的不信任，人們把德国看做是現在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国敢于提出我們的建議，那末所有这一切都会結束。它会作为和平的捍卫者而出現，而且这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它会表明自己决心成为裁軍的首創者，正如这理应由发出了进行武装的信号的国家来作的那样。不信任一定要变为信任，厌恶一定要变为同情。不只是三国同盟是和平的同盟这个套語終将成为现实，而且現在仅仅虚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輿論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压倒在我们的建議中还可能会发现（如果对它各方面进行挑剔的話）的軍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絕关于裁軍的建議，它就会陷入德国現在所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而他們是一个最大的强国）就会說，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誰要和平，誰要战争。在这以后，如果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它就会遇到一种使它认为（只要它有一点聪明）进行战争絕對不可能的形勢。不管法国装成什么样子，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的一方。这样它就不仅会挑起各个小国家，挑起英国来反对自己，而且它甚至不能滿有把握地取得俄国方面的援助，取得俄国方

① 这是套用霍夫曼·馮·法勒斯累本的“德国人之歌”中的一句話。——編者注

面这样一种传统的援助，即俄国先教唆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让它们去听天由命。

我們不会忘記，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結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同被敌国領土跟俄国隔开的法国一样，它們都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們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可是在海上，英国是绝对称霸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絕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敗；这将是規模大大扩大了巴黎饥饉⁴⁰⁸，挨餓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这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

我們再往下看：現在自由党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萊斯頓又是俄国的朋友。如果爆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由于上述各种情况，甚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果德国提出我們的建議，并遭到法国的拒絕，那末德国就不仅会克服英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緒，保证自己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还几乎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靠攏德国的敌人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們得出下列結論：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議。那时由于軍备的經常增长而引起的战争危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建議的倡議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議。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大为恶化，而使德国的处境大为好轉，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争，而且它可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們才会成为它的真正的盟国）一起自己对自己負責地开始逐步縮短服役期限

和准备实施民兵制度。

是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个能够求得解脱的一步呢？还是等法国最终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取得全部荣誉呢？

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今天如果我不对德国工人谈谈在英国这里即将举行的、正是在今年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一节活动，那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可谈呢^①？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是亨利希·海涅笔下的那个“虔诚的育儿所”^②，那末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是柔顺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是勇敢的工联和合法改良派不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时代以失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现在无疑地已经行动起来了。谈到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它们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相信，英国工人

① 手稿中此句之前原有下面一段，报上没有登出（可能是在誊抄时略去，也可能是在发表时由于情况改变而删掉）：“当我要给德国的五一节报纸寄出这样一篇东西的时候，在柏林将发生讨论军事法草案的危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草案被否决，接着帝国国会就会被解散，那时选举运动将会压倒和盖过五一节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固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断定，人们所渴望的妥协还是会取得，帝国国会的寿命可以再延长两年。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足以改变这一切。既然德国工人的五一节将在什么情况下庆祝还不得而知，那末，关于他们的五一节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编者注

②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所竭力要做的不是把雇佣劳动制度消灭，而只是加以“改良”。而現在的情况怎样呢？工人群众越来越认清，他們的出路，与其說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主作斗争以爭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是在于組織成为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爭得政治权利，爭得議會^①。这在1892年大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們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中把自己的三名候选人^②送进了議會，而且还在二十多个选区里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了他們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力量。⁴⁰⁹这就使工人們的自信心空前地加强了。

在英国，即使在現行的有限制的选举制度下，工人也至少在一百五十个选区里占了选民的绝对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草案⁴¹⁰被通过，他們就将在二百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票現在就已經能决定选举的結果了。工人的阶级意識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反他們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識的这种觉醒也表現于今年五一节的准备活动。預备性商談第一次順利地进行，沒有发生爭吵和无謂的競争，参加者齐心协力，积极热情。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于社会主义者，这个节日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可爭辯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3月13日

載于1893年5月1日“前进报”社
出版的专刊“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譯的，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① 在手稿中不是“爭得政治权利，爭得議會”，而是“爭得議會，爭得政权”。——編者注

② 詹·凱·哈第、約·白恩士和約·哈·威尔逊。——編者注

为庆祝 1893 年五一节給 奥地利工人的賀信⁴¹¹

伦敦。奥地利的同志要我为他們的五一节报纸写几句话。我能向你們說些什么呢？应当怎样庆祝五一节，你們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你們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 1890 年起，奥地利工人每年都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兄弟們表明：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五一节是意味着什么。任何地方都不能同你們相比，或者哪怕只是重复你們的例子。

的确，奥地利的五一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在德国，1890 年可以举出刚刚結束的帝国国会选举，这是一次对德国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大检閱，在它面前，任何五一庆祝活动都要显得逊色。在法国，在普选权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給工人带来巨大胜利的市鎮选举⁴¹² 恰好发生在 1892 年 5 月 1 日；在 5 月 1 日这一天，人們当时得为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工作，而不是进行庆祝活动。可是在你們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至于你們那里的出版自由、結社和集会权利等情况，則从政府参事查普卡男爵先生在帝国議會回答质詢时所做的說明⁴¹³ 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当奥地利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終不渝地坚持进行五一庆祝活动时，他們是正确的，無論如何是正确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說，这一节日主要是国际的問題；因此也可能由于国内的特殊条

件,这个节日要退居次要地位。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是国际的问题,而且也是,也许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因此在他们那里,它无疑始终是居于首要地位。

但愿今年的五一节也像以往那样过得有声有色。

写于 1893 年 3 月—4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
“庆祝 1893 年五一节”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⁴¹⁴

1848年回忆片断

当时卡尔·马克思在維也納⁴¹⁵会晤了布拉格书商鮑洛施，他是奥地利国民議會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的領袖。鮑洛施痛心地说，波希米亚的民族糾紛以及所謂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仇恨。马克思問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鮑洛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終，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

两个民族的波希米亚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現在他們理解到了；他們理解到：所有这些民族糾紛只是在大封建主和大資本家統治时期才有的，民族糾紛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統治服务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当工人階級一取得政治統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階級就其本性來說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4月8日于伦敦

載于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
“1893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并根据
捷克文的专刊校对过

尽管如此

为庆祝 1893 年五一节
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欧洲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奥地利想使五一示威游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了。

同普选比较起来，今年五一节的意义，在法国无疑是、在德国很可能是、在英国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选中，无产阶级将获得新的阵地，而且必然会获得新的阵地。^①

因此，如果五一节由于普选的临近而在某一方面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不应为此感到不安。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更弱了，而是恰恰相反。

示威游行是一桩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斗争手段时才是这样。

请资产阶级不要得意的过早吧。

^① 手稿中接着有如下一段被删掉：“在比利时，就在五一节的前夕，无能的政府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正在玩火，他们似乎想引起一场能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⁴¹⁶——编者注

我們還要同他們在票箱旁見面，以後還要在波旁王宮⁴¹⁷
見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月14日于倫敦

載于 1893 年 4 月 23 日
“社會主義者報”第 134 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會主義者報”，
并根據草稿校對過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⁴¹⁸

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要推翻时间的顺序。至少在西班牙，同任何历法相反，5月1日是跟在5月2日后面⁴¹⁹。过去西班牙工人纪念5月2日，而现在他们庆祝这个月的1号。

从5月2日到5月1日，——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实际上，1808年5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另一方面是马德里的人民。^①从表面上看这很简单。实际上情况十分错综复杂。为了反对外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暴政，西班牙人民必须同时反对法国的革命，^②为了重新争得本国的独立，同一个西班牙人民不得不恢复贵族和僧侣所支持的狂热的白痴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独裁。

意大利、德国、甚至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意大利和德国只有把自己交给君主的、封建的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才能摆脱拿破仑的压迫。

就是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初看起来极其简单明了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了。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在外国军队后面的是拿破仑，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代表、实际上他在本国是暴君、对邻国是侵略者。在马德里人民后面的是愚痴的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僧侣。这是一种惊人的混杂！”——编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而法国革命的产物就是拿破仑”。——编者注

然而从5月2日到5月1日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5月1日标志着一个清楚而明显的形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和彼此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在普遍解放的红旗下面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而另一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特权而联合起来的各国有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有保障。前进！

写于1893年4月

原文是法文

手稿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编辑部⁴²⁰

1893年6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期；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① 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1848年以前，人们可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我甚至在晚年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在亚洲边境上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并且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加利亚文，我非常

^① 在恩格斯的信中，对编辑部的称呼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о редакцията на сборникъ «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编者注

高兴。421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①

你们的 弗·恩格斯

载于1893年“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校对过

^① 这句口号恩格斯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а живѣ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ъ!». ——编者注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閉幕詞⁴²²

記 录

男女公民們！

請允許我把我說過的話(演講人剛才是用英語和法語講的)譯成我祖國的語言——德語。你們對我的這種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動，我認為這不是對我個人的接待，我只是作為那個肖像就掛在那上面的偉人(指馬克思)的戰友來接受它的。自從馬克思和我加入運動，在“德法年鑑”上發表頭幾篇社會主義的文章以來，已經整整五十年過去了。從那時起，社會主義從一些小的宗派發展成了一個使整個官方世界發抖的強大政黨。馬克思已經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現在還活着，那末在歐美兩洲就不會有第二個人能懷着這樣理所當然的自豪心情來回顧自己畢生的事業。還有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1872年舉行了國際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⁴²³。在這次大會上發生了兩件事情。第一，同無政府主義者徹底劃清了界限。這個決定是否多余呢？巴黎代表大會、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和這次代表大會都不得不做同樣的事情。⁴²⁴ 第二，國際停止以舊形式進行活動。當時是喝飽了光榮的公社鮮血的反動勢力猖獗到了極點的時候。舊的國際如果繼續進行活動，就只會造成得不償失的犧牲；國際把自己的會址遷到了美國，也就是退出了舞臺。每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組織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現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們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繼續我們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們应当容許討論，但是共同的原則应当始終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們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們手中夺去的了。

这里有这样多的英国代表出席，这一点使我特別感到高兴，要知道英国人在組織工人方面是我們的老师；但是，尽管我們从他們那里学到了許多东西，他們也毕竟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新的、他們可以学习的东西。

我路过德国时，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表示惋惜。据說，同警察作斗争要更有意思得多。像这样的战士，全世界任何警察、任何政府都是制服不了的。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閉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全場暴风雨般的祝賀声、經久不息的欢呼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齐唱“馬賽曲”）

以报道或記錄的形式載于 1893 年 8—9 月的一些社会主义报纸和工人报纸上，并載于 1894 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1893 年 8 月 6 日至 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記錄”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譯的

1893年9月14日在維也納的 社会民主党人大會上的演說⁴²⁵

報紙上的報道

親愛的同志們！

今天晚上我受到了當之有愧的接待，在我離開這個會場以前不能不對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謝。我必須說，可惜現在只能由我來享受我的亡友馬克思的榮譽了。我是在這個意義上接受你們的熱烈歡迎的。如果說我在參加運動的五十年中的確為運動做了一些事情，那末，我並不因此要求任何獎賞。我的最好的獎賞就是你們！到處有我們的同志：在西伯利亞的監獄里，在加利福尼亞的金礦里，直到澳大利亞。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大的國家，在那裡社会民主党沒有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現在全世界無論做什麼事，都得看看我們的神色。我們就是一個使人畏懼的強國，一個比其他強國更能起決定作用的強國。這使我感到驕傲！我們沒有白活，我們能夠自豪地、滿意地回顧自己的事業。^① 在德國，有人會想用暴力來鎮壓運動，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資產階級完全意

① 這句話在發表於“新自由報”的報道中是：“現在你們正在進行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它是無產階級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選權是檢驗黨的影響、計算黨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的德國歷史教導我們認識這一點。”——編者注

料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維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战栗（暴风雨般的掌声）。刚才一位讲演人^①提到，在国外，社会民主运动总是被人估计不足。亲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維也納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常漂亮的大厦（会场大为活跃），我还請人指给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占领过的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厦的那一天起，谁也不会再对你们估计不足了（掌声雷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那种惶恐的样子，当时他们报道说，7月9日无产阶级占领了維也納⁴²⁶，而且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地占领了它。（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

載于1893年9月15日“新自由报”
第10440号和1893年9月22日“工
人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报”，并根据
“新自由报”校对过

① 洛伊特納。——編者注

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 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說⁴²⁷

報紙上的报道

同志們！

我衷心感謝你們对我的出色接待，这种接待我是当之无愧的。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在苏黎世和維也納已經說过的話。^①我不把它看做是对我个人的接待，而看做是对一个伟人的同事和战友，对卡尔·馬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的接待，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給予我的东西。你們知道，我不是一个演說家，也不是一个議會活动家，我是在另一个方面工作的，我主要是在自己的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不过，我还是想对你們說几句话。我上一次看到柏林，已經是将近五十一年前的事了。⁴²⁸同那时比起来，柏林完全变了样。那时候它是个小小的所謂“王都”，居民几乎不滿三十五万人，靠为宮廷、貴族、駐軍和官吏服务来維持。現在它已是拥有差不多两百万居民的、靠工业来維持的巨大的首都；今天即使宮廷、貴族、駐軍和官吏都搬到別的地方去，柏林也还是柏林。而且柏林的工业发展还引起了另一个变化。在那个时候，柏林还没

① 見本卷第 479—482 頁。——編者注

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呢，几个月以前这里举行了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的检閱，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将近十六万张选票⁴²⁹；柏林选出的六个議員中有五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柏林走在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前头，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

而且不仅是柏林，德国所有其他地方也都完成了同样的工业革命。我有十六年不在德国了。⁴³⁰ 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亲身体驗过——从1878年起，这里由反社会党人法統治着，现在你们已幸运地把它废除了。当这项法律还生效的时候，我一直避免到德国来；我想使当局免除把我驅逐出境的麻煩，要知道，我一到德国来就得立刻把我驅逐出境。（全場欢动，有人喊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在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已经看到，德国的經濟状况有了多大的轉变。在上—代，德国是个农业国，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农村居民；现在它已是个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萊茵河两岸，从荷兰边境到瑞士边境，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烟窗。初看起来，仿佛这只是和资本家有关系的事。但是资本家在发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誰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在每一次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不可遏止地增长感到吃惊，他们問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結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統一、最团結、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靜的头脑、严格的紀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我确信

今后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最后让我高呼：**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 1893 年 9 月 26 日“前进报”
第 226 号附刊和 1893 年 10 月
6 日“工人报”第 4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并
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93年1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七十三岁生日的盛情祝贺。祝协会永久繁荣，愿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第一次举起的老的红旗！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 大学生代表大会⁴³¹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們：

感謝你們盛情邀請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遺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請，因为我有一些重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們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們的努力将使大学生們愈益意識到，正是應該从他們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階級，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發揮巨大作用。

过去的資產階級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們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階級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問題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詞句，而是丰富的知識。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載于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大学生”
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 (1871—1875)”序⁴³²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以外，它們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专门評論德国以外的国际問題的。

第一篇文章“再論‘福格特先生’”，結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馬克思在1859—1860年就意大利战争問題所进行的那場論战。这篇文章最終确定了上述的福格特先生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在1860年他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間接的证明。⁴³³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描述西班牙1873年七月起义期間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已經出过单行本。⁴³⁴无政府主义，这种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的頂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繼續存在并花費这么多金錢来扶持它，以致我們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們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宣言”⁴³⁵涉及了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現在人們常常忽視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的判断，这个方面却是不能忽視的。

对1874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的批判⁴³⁶，正是在目前重又

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議院的,还有以我們的朋友瓦揚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⁴³⁷从1880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以来⁴³⁸,他們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在1887年,在格雷維退休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議会的多数贊成选举茹尔·費里,这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劊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統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階級⁴³⁹的坏透頂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議員的協議,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議會领导;然而軍事組織是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軍官是从他們当中招募来的,而他們的軍事领导人公社將領埃德取得了指揮权,并在市政厅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里設立了他的总參謀部。面临着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諾当总统。

后来,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⁴⁴⁰表現了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見。这种行动方式給我們一个保证:議会里瓦揚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議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动作,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讀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資料轉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階級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賴德律-洛兰型的人

物和 1874 年的带有蒲魯东主义情緒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薩尔派;虽然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識到生产資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薩尔式的由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們綱領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馬克思和我说來,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称来表示我們特有的观点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詞也許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經濟綱領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來說,对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來說,这个詞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說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論俄国的社会問題”⁴⁴¹,在 1875 年也出过单行本,現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較詳細的跋^①。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問題,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經濟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我所引的馬克思的一封信^②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住在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請求我对这个問題发表我的看法。長時間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經濟状况的特点了解得很不够;难道我能在同一个時間里既整理付印“資本論”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正在用以編造临死前的財產清单(这是馬克思喜用的說法)的真正卷帙浩繁的文献嗎?但是人們坚持要我重印“論俄国的社会問題”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試圖从对俄国当前經濟状况的历史比較研究中得出某些結論,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結論沒有无条件地給俄国公社許諾

① 見本卷第 494—510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04—506 頁。——編者注

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还是試图論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資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縮短它現在已必然要經過的資本主义阶段的行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載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
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
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
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
1875)”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一文前言⁴⁴²

为了便于了解下面这篇札记，这里提供几段历史资料。

1873年2月9日，国王亚马多对他的西班牙王冠厌倦了；他——第一个罢工的国王——退位了。12日宣布共和；接着在巴斯克地区爆发又一次的卡洛斯派起义。

4月10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它在6月初开会并在6月8日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11日组成以皮-伊-马尔加耳为首的新内阁。同时选出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委员会，但是极端的共和主义者即所谓的不妥协派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就这样，当7月3日新宪法颁布的时候，不妥协派发现，新宪法在把西班牙分裂为“若干独立的自治州”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因此，不妥协派马上在各省举行起义，从7月5日至11日他们在塞维尔、哥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加迪斯、亚尔科、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等地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成立了独立的自治州政府。7月18日，皮-伊-马尔加耳辞职，萨耳梅朗上台，他立即派军队对付武装起义者。武装起义者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抵抗，几天功夫就被打败了；7月26日，由于加迪斯的陷落，整个安达鲁西亚又恢复了政府的统治权；差不多同时，木尔西亚和瓦伦西亚也被制服了；只有瓦伦西亚在斗争中表现出一点坚毅精神。

只有卡塔黑納坚持住了。这个連同舰队一起落入起义者手里的西班牙最大的軍港，从陆路方面也設了防，除了要塞围墙以外，还有十三座独立的炮台，因此要攻下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政府避免破坏自己舰队的停泊处，所以“拥有主权的卡塔黑納自治州”一直繼續存在到 1874 年 1 月 11 日，最后，由于絲毫沒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而投降了。

在整个这次可耻的起义中，我們在这里所談到的只是更为可耻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是把这些所作所为比較詳細地描繪出来作为对現代人的教訓。

写于1894年1月初

載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
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
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
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
1875）”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跋⁴⁴³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如果准确地說，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为“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錯誤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特卡乔夫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慣例，宣称自己在西欧面前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也为受到我的批評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辯护，辯护得如此激烈，仿佛我的批評是針對他本人似的。⁴⁴⁴

他在同我的論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⁴⁴⁵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間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現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見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現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

Lettres de Frédéric Engels sur la Russie.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Серія II. — Выпуск III.

ФРИДРИХЪ ЭНГЕЛЬСЪ О РОССИИ

1) Отвѣтъ П. Н. Ткачеву (1875 г.)

2) Послѣсловіе къ нему (1894 г.)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В. ЗАСУЛИЧЪ

ЖЕНЕВА

Типографія „СОЦІАЛЬ-ДЕМОКРАТА“, Route de Lancy, 6

1894

“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俄国”
(載有弗·恩格斯給“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一文写的跋)的扉頁

在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鮮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現成的。

“保存公社和給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統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問題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問題所在。”（赫尔岑給林頓的信）⁴⁴⁶

因此，在俄国也許还存在政治問題；但“社会問題”对俄国來說則已經解决。

盲目模仿赫尔岑的特卡乔夫，也把事情看得像赫尔岑那样簡單。虽然在 1875 年他已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問題”在俄国已經解决，但是他說，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貧困的、被上帝遺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們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如果說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們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天之驕子，那末当时的許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則宣揚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天之驕子；据說不是西欧无产階級将用自己的斗争給旧的經濟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我的批評也就是針對这种幼稚的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們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車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貢獻，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庫特人中間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鎖，車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讀过馬克思的著作，当“資本論”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維柳伊斯克的雅庫特人中間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鎖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东西，对俄国說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們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視野的局限性，那末我們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現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資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們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而在西方，个人已經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經過痛苦的經驗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認識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經濟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沒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說来，要貫徹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 西方目前正在經過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爭取的那种制度，在我們这里却仍然是我們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 我們看見，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帶來了多么悲慘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費力。西方的例子我們不应当視而不見。”（“車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內瓦版第5卷第16—19頁；轉引自普列汉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① 1885年日內瓦版）447

① 在原文中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編者注

而在談到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并在各戶之間进行产品分配的烏拉尔哥薩克时，他說：

“假使烏拉尔人在他們現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使用机器耕田的时候，那末烏拉尔人到那时将会因他們保存了那种允許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計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 131 頁)

只是这里不应忘記，烏拉尔人和他們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軍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們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情形大致同我們这里摩塞尔的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們現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烏拉尔人本身，而是他們为之效劳的俄国軍事国庫。

不管怎么說，事实是这样：当資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潰而它本身发展中的无法消除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財產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說西方用重新改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資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轉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末在俄国已經存在，或者說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資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資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資料公有的現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嗎？或者像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①里表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那样：“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学家們所希望的那

^① 見本卷第 504—506 頁。——編者注

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經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問題的提法本身已經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現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馬尔克、凯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們的、同时又是在它們内部产生并且逐漸控制它們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戶之間和各人之間的交換的影响下，随着時間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賴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說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問題，那末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連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創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繼續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經可以得出結論，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創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別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 1861 年就已經是这种共产主义

的比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的南方斯拉夫家庭公社(扎德魯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耕，已經让位給单个家庭的經營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間隔時間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終止，在我們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潰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計劃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資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賦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經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則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則上管理大工业呢？

誠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 5 000 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們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 1800—1840 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們而設想出来的計劃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納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沒有談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

其次，要处在較低的經濟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問題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換出現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資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資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經濟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态所面臨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魯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資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資料轉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資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殘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殘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縮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們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經歷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資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資本主义經濟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現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縮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們的成功則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資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

国家。但比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經吸取了資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馬克思和我已經在 1882 年 1 月 21 日給普列汉諾夫譯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說过了。我們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們看見，除了狂热发展的資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試問：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級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須先經歷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經歷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級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⁴⁴⁸

可是，不应当忘記，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經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間的失敗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須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扩展铁路不能沒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謂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資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給农民的份地比以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負支付贖金和更高捐稅的負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貸者手中，这些高利貸者大半都是发了財的农民公社社員。铁路为早先的許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門，使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銷售市場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經濟关系被

破坏了，随着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員中間出現了巨大的財產差別——穷人淪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貨幣經濟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了。^①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当时还很年輕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預，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債務人，干脆废除他們的債務，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現在世界上也沒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規定，在公社社員之間重新分配土地，間隔時間不得少于十二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 1877 年，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現在以国家銀行司庫的身分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紙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Vestnik 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談論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②在“祖国紀事”（O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来反对他。⁴⁵⁰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錯誤，写了一封信給“紀事”的編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譯成俄文于 1886 年发表在日內瓦的“民意导报”（Věstnik Narodnoj Voli）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⁴⁵¹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轉述。

馬克思首先駁斥“祖国紀事”强加給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俄

① 見恩格斯“家庭……的起源” 1892 年斯图加特第 5 版第 109—113 頁。⁴⁴⁹

②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編者注

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來說沒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急速地过渡到資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緩的事了。他在“資本論”第一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簡短評語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評語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損害人类的資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規模的鬻武竞赛、国債竞赛、賦稅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話，——那末，欧洲也許最終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預言的那样（我們順便指出，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魯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資本論”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頁）⁴⁵² 馬克思接着說⁴⁵³：“無論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們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經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話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經以应有的高度尊敬談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評家’〈車尔尼雪夫斯基〉。⁴⁵⁴ 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問題：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学家們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資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說話的口气是贊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測’，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說。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經濟发展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这个問題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資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結論：

如果俄国繼續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給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資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①

接着馬克思还揭穿他的批評者所犯的一些錯誤；涉及我們这里研究的問題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那末，我的批評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談的是資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經在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資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馬克思在 1877 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謀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 (ispolnitel'nyj komitet) 的政府⁴⁵⁵。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軍，从而也一定会給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創造无比順利的斗争条件。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資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沒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階級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間，俄国無論是資本主义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潰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 1894 年，情况怎样呢？

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敗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繼續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資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毀了军队，調兵到戰場上去的漫长路程毀了军队；必須借助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遙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資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甚至国内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場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沒有提供鋼軌、机車、車廂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門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較现代化的紡織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銀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銀行；由于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預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

現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貴族和官僚的直接議會統治所代替，那末这一过程也許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資產階級执政，那末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沒有別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是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資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試驗。必然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而且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

可能产生的东西；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情况那样，人們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創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預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爭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應該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們已看到，連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們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們并不因为他們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天之驕子而去同他們爭論。但是我們完全沒有义务去跟他們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驕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錢。它要錢不仅是为了維持宮廷的豪华生活，維持官僚，首先是維持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維持它那可怜的財政經濟和在铁路建設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国庫的全部赤字了；于是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銷；一部分公債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潤全部归股东，而将来

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来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流通的不是黄金，而只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几种只征收黄金的关税，顺便指出，这种征收办法使这几种关税的税额提高百分之五十。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外国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期票，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用去换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去借新的外债，那末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样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这样就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把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到最高点。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沒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幣軍事基金或者下决心宣布国家破产。而这两种做法都将意味着俄国对外政策的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問題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吏們的专制独裁統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統治不但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而且它給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的改变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誰也不能預測的。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轉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階級化，

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潰。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馬克思和我在 1882 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轉变相結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須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們的世界^①、他們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絕状态中解脫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闊的天地，使他們認識外部世界，同时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貧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給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現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沒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無論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資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于 1894 年 1 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
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
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
1875）”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
1875）”

① 在原文中这个詞是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編者注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⁴⁵⁶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現在正在排印中，可望不遲於今年9月問世。盼望已久的第三卷將完成整個著作的理論部分，到那時，就只剩下最後一卷即第四卷了，第四卷將對剩餘價值理論作歷史的批判性的概述。⁴⁵⁷第一卷表明，資本家怎樣從工人那里榨取剩餘價值，第二卷則表明，這個最初包含在商品里的剩餘價值怎樣實現為貨幣。可見前兩卷所談到的剩餘價值，只是它在第一個占有者即工業資本家手里的情形；然而剩餘價值只有一部分留在這個第一個占有者的手里；隨後它就以商業利潤、企業主收入、利息、地租等形式在各個有關方面的人中間進行分配；第三卷所闡述的就是剩餘價值的分配規律。而講完了剩餘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也就結束了剩餘價值的整個生涯，此外對它就沒有更多的東西好談了。除了資本主義利潤率的一般規律，第三卷還研究了商業資本、生息資本、信貸和銀行、地租和地產等問題，這些問題連同前兩卷研究過的題目，已把標題中所答應要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概括無遺了。

寫於1894年1月9日左右

載於1894年1月12日“前進報”
第9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前進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关于“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正如“前进报”已經报道的那样^①，将在今年秋天問世。大家知道，第一卷研究了“資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了“資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将研究“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生产和流通的单独过程在这里将不是各別地加以研究，而是把它們联系起来、作为資本运动的統一的总过程的前提和普通环节来加以研究。既然前两卷的每一卷都只是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內容來說，它們还需要补充，从形式來說，它們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下述情况特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两卷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資本家手里的時間为限；只能一般地指出，这个第一个占有者根本不一定是，或者哪怕在通常看来也不是它的最終的所有者。然而最明显的是，而且甚至从社会的表面就可以看到，資本的一般运动正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各有关方面之間，在商人、貨幣債权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間的分配。这样，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卷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紅綫一样貫串着整个第三卷。对这一分配的各个規律分別进行了研究：剩余价值率同利潤率的关

^① 見本卷第 511 頁。——編者注

系；同一的平均利潤率的形成；这一平均利潤率在經濟发展过程中的下降趋势；商业利潤的划出；借貸資本的干預以及利潤之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在借貸資本基础上产生的信用系統及其主要体现者銀行和像交易所这样的投机中心，超額利潤的产生以及这一超額利潤在一定場合下轉化为地租；带来这种地租的地产；作为結果——新創造出的价值在三种所得形态即工資、利潤（包括利息）和地租之間的总分配；最后，这三种所得形态的所得者：工人、資本家、地主——現代社会的階級。可惜，这最后一部分——階級，馬克思沒有完成。

这个对全部內容的簡要概述足以說明，同研究对象有关而在前两卷中必然得不到解决的全部問題，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写于1894年1月9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93—1894年“新时代”杂志
第1卷第16期和1894年1月
26日“工人报”第8号

俄文譯自“新时代”杂志

署名：弗·恩·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⁴⁵⁸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他们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子改组国民生产。他们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他们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就处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古老的压迫形式，它们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代遗留下来的（mezzadria [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口所排挤）；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展。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⁴⁵⁹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去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多半是未来的无产者，然而目前还不是无产者。只有这个天天面临着经济破产的威胁并且现在已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胜利是通过或多或少的和平方式取得的，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改宗的”共和主义者⁴⁶⁰将会掌握政权；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①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⁴⁶¹——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

①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付款的借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改宗的”共和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的活动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 ammonizione [警察监视] 等等），这是不应该予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自由和活动场所更加扩大，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⁴⁶² 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 ambiente [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affini» [“亲戚”] 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末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

能会到来，而誰知道，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不言而喻，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說来不是我們所代表的階級的运动，那不是我們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經到来，那就讓他們去发泄他們的激情吧。至于我們，我們受这些先生們的漂亮諾言欺騙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論是他們的声明，还是他們的阴谋，都不應該打動我們。如果說我們有責任支持任何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那末，我們同样有責任不讓我們无产階級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謂的牺牲，不让无产階級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絕。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們的人就将参加，而且連一声号令也用不着，我們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須清楚地了解，而且我們必須公开宣布：我們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联合，但是和他們截然不同；我們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們滿足，它对于我們來說仅仅是已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領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們就将分道揚鑣，并且从那一天起，我們將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障地而向新的障地突进的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許在新政府中給我們几个位置——然而总是要我們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賴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位置的錯誤⁴⁶³。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們心甘情愿地为由純粹的共和主义者組成的多数派对工人階級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責任，同时，这

些先生們加入政府就完全癱瘓了他們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活动。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見；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是頗为躊躇的。至于一般的策略，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确信到它的正确性；它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但是說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是另一回事；这必須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須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

写于 1894 年 1 月 26 日

原文是法文

譯成意大利文載于 1894 年 2 月 1 日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

“社会評論”杂志第 3 期

意大利文譯本校对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为紀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894年3月18日于伦敦

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3月18日的即将来临而干杯，这个日子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

恩格斯

載于 1894 年 3 月 25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183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

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⁴⁶⁴

1894年3月22日于伦敦

衷心感謝你們盛情邀請我參加奧地利黨代表大會，可惜，我不能應邀參加。我謹向到會的代表們表示我最真摯和最熱烈的祝願，祝你們工作順利。

今年，黨代表大會要完成幾項特別重要的任務。在奧地利，問題是要爭得普選權，即爭得那種在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過機械訓練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徑連發槍射得更遠、打得更准的武器。統治階級——不論是封建貴族，還是資產階級——正在千方百計地反對把這種武器交給工人。鬥爭將是長期的和激烈的。但是，如果工人們能顯示出政治遠見、能保有耐心和堅毅精神、能團結一致和遵守紀律、能發揚這一切已經使他們取得這樣多輝煌成就的品質，那末，最後勝利保證是屬於他們的。歷史的必然性，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都完全在他們一邊起作用。雖然普遍和平等的選舉權不可能一下子就爭到手，但是我們現在就已經可以為奧地利帝國議會中未來的無產階級代表高呼“萬歲！”了。

弗·恩格斯

載于1894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小冊子“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記錄”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小冊子“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記錄”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⁴⁶⁵

1894年5月15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要我参加党代表大会的盛情邀请，我是在5月8日接到的。很抱歉，由于临时有点不舒服，使我不能立即作复，因此只能在今天事后向你们表示感谢并祝你们的工作取得最好的成功。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匈牙利最近一个时期的运动^①。在匈牙利，也像在其他各地一样，资本日益控制整个国民生产。它不仅创建新的工业，而且使农业也屈服于它，它推翻农业的古老方法，使独立的农民淪于破产，把农村居民分裂成为一方面是大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掠夺者，另一方面是大批贫苦的农村无产者。资本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革命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久前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看到了。⁴⁶⁶这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不定什么时候也得要经受的。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但是也只有它才能产生使新社会制度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唯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个运动证明了，资本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到处控制国民生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而在东欧，农业是无比重要的部门”。——编者注

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建设这种新的更好的社会的男女。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5月18日“工人新闻”
第20号,并译成匈牙利文载于1894
年5月18日“人民言论”第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新闻”,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⁴⁶⁷

写于 1894 年 6 月 19 日和 7 月 16 日
之間

載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
第 1 卷第 1 期和第 2 期

署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时代”杂志

一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現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脫奴役和貧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脫，而社会主义則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脫。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們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擋地給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羅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則在六十来年中爭得了一个可以絕對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說安东·門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羅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純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沒有随着西羅馬帝国的灭亡而出現”⁴⁶⁸，那是他恰恰沒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統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別个样

子——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①；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捷克塔博尔派⁴⁷⁰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1830年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勒南说：“如果你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

①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⁴⁶⁹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都是这样或差不多这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襲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說“基督教的起源”⁴⁷¹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位过去国际的活动家，在比方說閱讀所謂“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創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創伤，能不綻开来。这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訴苦的調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不来！好多六十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論他是誰——的手說，“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題目我們也有可讲的——我們的协会里也挤滿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們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魯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費，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們最好的資料来源之一是薩莫薩特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羅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持另外的看法。相反，对他們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平易的唯理論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謬的。这位在任何場合都不抱偏見的证人，曾經讲述过一个生于赫勒斯滂的帕里城、自称为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一生的历史。这位佩雷格林年輕的时候是在阿尔明尼亚以通奸开始其冒险活动的，他在犯罪地点當場被拿获，将按当地习俗被处私刑。僥幸逃脫之后，又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而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譯文⁴⁷²：“这时，他湊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

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奇妙的教义。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以致他的老师們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們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結果，基督徒們最終把他視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領(主教)…… 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捉了起来，投进監獄…… 当他因此而身被鐐铐的时候，基督徒們认为他受囚禁是他們的大不幸，他們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沒有成功，于是他們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顾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監獄門口；較有势力的一些基督徒則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們带着飯去，在他的身边讀他們的圣书，——一句話，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們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甚至有基督教会的使者从若干小亚細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辯护。这些人，只要事情关系到他們的教会，無論在什么地方他們都会立即到場，快得簡直令人难以相信；他們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費用。因此，佩雷格林在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錢，以致監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們的肉体 and 灵魂不死，自以为他們将永生；所以他們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情愿牺牲自己。而且他們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們灌輸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們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諸神而信奉那位被釘十字架的詭辯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們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們无区别地輕視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們不經檢驗和证明而徑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騙子手来到他們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們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費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們到处都給他以保护，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規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們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們就把他赶出了他們的教会。”⁴⁷³

讀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

的就是“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大約从 1840 年起,好多年間簡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⁴⁷⁴ 处于危險状态;他是一个魁梧健壮的长須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頗为无害的糊塗蛋;不久他就死了。接着来的是他的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庫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語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內做得很成功,甚至他們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輕狂的奥古斯特·貝克尔也被他誘了过去。这位庫尔曼給他們做过讲演,这些讲演于 1845 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間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門徒(也許就是奥古斯特·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話:

“沒有一個人會表达出我們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簡言之,一切使我們的时代深切感到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們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現了。这就是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庫尔曼博士。他发表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說。”⁴⁷⁵

当然用不着我說,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說,不过是飾以拉梅耐式的半聖經味的詞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的故做伤感的胡謔。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亞細亞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騙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聞記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剝削他們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庫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装腔做势能手給他們灌輸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賢, id est [也就是]庫尔曼,将調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現在在旧世界里,弟子們就已經應該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給这位至圣,而自己則

應該对殘羹剩飯感到滿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繼續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庫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費过着十分闊綽和心滿意足的生活。誠然,这种情况並沒有延續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間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結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庫尔曼不見了。

凡是亲身經歷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記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現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在运动正在爭夺新地盘的边远地方,像这样的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暫时的、有限的成功。如果說,各国工人政党里都要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紅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⁴⁷⁶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說的編造者、无結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賴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誠实的傻子和不誠实的騙子——,那末,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則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沒有一种狂想、胡說或騙术会不钻进年輕的基督教会,会找不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誠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無論我們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或是最初的基督徒,对于一切投合他們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輕信,这就使我們甚至无法肯定,我們的新約中是否沒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給基督徒們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聖經批判——迄今我們在早期基督教史領域中的認識的唯一科学基础——曾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杜宾根学派**⁴⁷⁷，广义來說，應該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內。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別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它承认，所有四篇福音书都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說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記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銷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約故事以外，还想把許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史上可資信考的資料硬塞給我們。但是無論如何，杜宾根学派从新約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擯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經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魯諾·鮑威尔**⁴⁷⁸。他的巨大功績，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給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純希腊的和希腊—羅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給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謂基督教是

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魯諾·鮑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⁴⁷⁹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魯諾·鮑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鮑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鮑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奥里略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鮑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鮑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如果说杜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那末，布魯諾·鮑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

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駁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間。凭現有的資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問。新发现，特别是罗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貢獻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約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時間的判定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內：它大概是在 67 年 6 月和 68 年 1 月或 4 月之間写出的；所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語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徒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約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時間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謂的約翰启示录；而且因为本来似乎是全部聖經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这一篇，現在已由于德国的批判而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想同讀者来談談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連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激动不安。我們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紀元前 164 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約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⁴⁸⁰ 时的紀元 250 年止，根据勒南的統計，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十五种之多，較晚的仿作还不計算在內（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即使在专家圈子之外也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馬和希腊，而尤甚得更多的是小亚細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一堆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誠的蒙蔽和明白的欺騙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⁴⁸¹ 以及其他神秘荒誕的

东西占居着首要地位。早期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来頓城的紙草书之类的資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諾斯替教派⁴⁸²曾在基督紀元二世紀时热心地从事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們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 mathematici [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說法，他們曾在克勞狄烏斯时代和維特利烏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羅馬⁴⁸³——所从事的，正是我們將要看到的构成約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一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讀者是應該的。它們（例如但以理书、以諾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維拉占語集⁴⁸⁴）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別人——大都比这些作品的假想作者晚得多——写的，而且它們所預言的也主要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 164 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馬其頓的世界統治的兴衰和羅馬的世界統治的开始の預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預言的效驗的办法，使讀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終将胜利的預言。所以，假如約翰启示录果真是它那假想的作者所作，那它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的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約翰的作者，無論如何是小亚細亚的基督徒极其尊重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給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語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历史存在虽不完全可信但或然性仍很大的使徒約翰。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那末这只会加强我們的看法。这将最有力地证实，此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早期基督

教。但應該順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約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絕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連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現了穿着祭司长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細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間行走，并把給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給“約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銳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會議⁴⁸⁵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不知道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們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賽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絕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創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贊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贖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贖了罪。这里我們看到了使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閃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們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品牺牲求其寬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襲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們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間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贖掉。这样一来，以后就沒有必要再做任何牺牲，許許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

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恢复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这一篇里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篇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把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称做别的什么，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谈到别迦摩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的人；固然他们的犹太教对先前的犹太教而言是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先是 144 000 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 12 000 人，随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 69 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这一点，还很少意识到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

場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们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做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做斗争，这既是最早的基督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早期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 1848 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并且起码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

集会。

最初的基督徒也是分裂成无数的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爭論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統一的手段。就在我們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們已經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們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別迦摩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別迦摩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訓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不是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詳情，我們毫无所知，只是談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說他們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們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說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說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 1869 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⁴⁸⁶一书中（第 303—305、367—370 頁）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論据。所有这些論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謂的保罗使徒书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而使徒行传和使徒书至少就其今本來說比启示录起碼要迟六十年才写成的著作，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資料不仅是极可怀疑的，而且是彼此完全互相矛盾的。而有决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点：我們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別迦摩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現在該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較詳細的这两个場合，所譴責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

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論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爭論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絕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場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規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間的通婚；这个詞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們这位約翰对于正統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談到天上的 144 000 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們原是童身。”

而在我們这位約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沒有。因而他是属于早期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籠統地視性关系为罪惡的派別。如果我們还注意到，他把羅馬叫做大淫妇，說地上的君王們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驕奢淫逸而发了財，那我們对上述的那个詞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論所要賦予它的那种狹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論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約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蕩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現象，即对性关系的傳統束縛也同所有其他藩籬一起发生动搖。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紀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多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傾向，也相当常見。在現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三十年代圣西門派的《réhabilitation de la chair》〔“肉体复权”〕——德文譯作《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 ——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誠的育儿所”^①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不論在柏林或在自己的庄园里，不經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統治地位的高貴等級（当时我們还没有階級）！如果这些正人君子再知道傅立叶給肉体規定的自由还不止这样的話，不知道該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蕩行为让位給較为理智的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从德国从海涅的“虔誠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憤慨，就被人們置之一笑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撓地对内外敌人做斗争，——就这些而論，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把它們写得同样好。

① 摘自海涅的詩“安心”。——編者注

三

我們这位約翰传諭給七个小亚細亚教会，并通过它們传諭給69年的經過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約翰传諭的真正題旨的引言。这里，我們才进入早期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應該的那樣，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們很像美国南部蓄奴各州的 mean whites〔白种貧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放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債務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說来，絕對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說来，天堂已經一去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們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羅馬征服者用蕩平一切的铁拳消灭淨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組織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組織則以包括一个或几个亲属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島得到政

治的統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羅馬世界統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羅馬的世界統治一下子永远結束了小的联盟；軍事暴力、羅馬的訴訟程序、稅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內部組織。除失去独立和特有的組織而外，更加之以軍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們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資財，然后又以重利貸給他們，为的是讓他們能够繳納新的苛捐杂稅。在純自然經濟的地区或以自然經濟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賦稅及由此引起的对貨幣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貸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財產差异，使富者更富，貧者赤貧。对于巨大的羅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淪为赤貧的人們的出路在哪里？他們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都卷入一个統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須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領域內。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繼續存在，就漸漸成为羅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同样，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懲罰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貴得多；希腊人則宁可把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可是，基督教出現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里的报偿和懲罰，造出天国和地獄。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們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而事实上只是靠着对彼岸世界里的报偿的希望，斯多葛—斐洛学說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新的世界

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則之一。

但这种天堂乐园絕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們开放的。我們將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經過对地獄势力的殘酷斗争才获得与打开的。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是很快就要到来的。我們的約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預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給非拉铁非教会說:“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說,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給約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預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說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們以后会看到,人們預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現在向我們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襲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約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結,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經写出,至少是部分写出的以諾书。聖經批判已經詳細查明,我們这位約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預兆,每一項降給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襲来的;这样,約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貧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那种虛假的狂喜和幻景,他連在想像中也沒有像他描写的那样經歷过。

这些幻景出現的經過,簡略地說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約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

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約翰看見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們大声喊着說：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賜給他們，并有話劝他們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的仇敌，要給恨你們的人祝福”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隱諱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頻繁，我們的約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說广大众人还是不想懺悔他們的罪恶，說神的鞭子还應該再向他們头上猛抽，說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們，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醴，但又說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頑固不化。这是这样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正在进行斗争，而 *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現七个带着号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現。在第七个天使吹号之后又出現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經說过許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現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紅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穌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轄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騎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經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

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关闭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之中,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一千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許多死者复活,一种可怕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幸福快乐的。

就这一预言对当时事件的关系而给它做出解释,要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艾瓦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也为非神学界所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不会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并且归于沉淪。”

这里兽指的是羅馬的世界統治，順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作王，但已經医好了，而且将要回来，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瀆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爭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沒有記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兽的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第13章第7—18节）。

我們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羅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現在我們来看这样一个問題：已經統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轉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羅馬皇帝，究竟是誰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那末第二該是提比利烏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烏斯，第五是尼祿，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說，尼祿已經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作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萊茵河的軍团在維特利烏斯率領下暴动起来，而在其他行省，其他軍事长官也在准备軍事暴动。就在羅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論，我們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統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

69年4月15日)統治期間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誰呢? 666这个数字将告訴我們。

在閃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間，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約从紀元前三百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 $a = 1$ ； $b = 2$ ； $g = 3$ ； $d = 4$ 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設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預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詞或詞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做出关于其前途的結論。这种数字語言也用来表示密語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語叫做 gematriah ——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 mathematici [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烏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維特利烏斯时代，被赶出羅馬，大概是因为“太胡鬧”的緣故。

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羅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烏斯在二世紀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它至少出現在許多人还知道这个数字之謎的时候。⁴⁸⁷ 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誤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貝納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祿。数字的根据是 קסו נה (尼祿凱撒)，即有犹太圣法經传和巴尔米拉銘文为证的希腊字 Nêron Kaisar (尼祿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帝国东半部鑄造的尼祿錢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 $n(\text{nun}) = 50$ ； $r(\text{resch}) = 200$ ； $w(\text{waw})$ 代替 $o = 6$ ； $n(\text{nun}) = 50$ ； $k(\text{koph}) = 100$ ； $s(\text{samech}) = 60$ ； $r(\text{resch}) = 200$ ；合計 = 666。如果我們拿拉丁文的写法 Nero Caesar 做根据，那末去掉第二个 $nun = 50$ ，我們就得出 $666 - 50 = 616$ ，即伊里奈烏斯的

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都为突然的动乱所笼罩。加尔巴自己就曾带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到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叫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僭望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之祸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转身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尤其被这些消息所吓倒。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佩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特诺斯（现在的特尔米亚）岛上，直到他——还在奥托时代——被杀死。这样，在尼禄对之进行了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开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再来，认为他的回身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信其来临可使殉道者欣然就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就要到来，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三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要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做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

勃萊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 1836 年出現世界的末日和可怕的审判。这个預言应驗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可怕的审判沒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虔誠的启示录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 1836 年,斐·貝納里給 666 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給一切預言性的数字演算,給这种新式的 gematriah [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們这位約翰只能做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說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 12 000 斯达第 = 2 227 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 500 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純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間,他代替太阳为他們照耀,那里再沒有死亡,再沒有忧愁,再沒有苦难;生命水的河从城中穿过,河两岸长着生命树,結十二样果子,每月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⁴⁸⁸ 第 542 頁)。圣徒們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們所知道的来說,68 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細亚就是这样的。神圣的三位一体連影子也沒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華,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間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統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許以恩泽,給不馴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規矩: *parcere subjectis ac debellare superbos* [寬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可怕的审判日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樣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說,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誤解以賽亚书中的富有詩意的一处(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

的“神的七灵”也同样是从神产生出来的——虽然地位較低。他們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做了贖罪的牺牲，为此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他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他的特殊功勋，而不是被当作其内在本质必然产生出的一种东西。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宮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論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論做些让步，曾德—阿維斯陀⁴⁸⁹ 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轉向异教徒的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有了波斯式的天宮建制——在流放⁴⁹⁰ 以后——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們的想像的时候。就連基督教本身甚至在它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間把对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賴耶尔的說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納，在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約九世紀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島史”⁴⁹¹ 第1册第227頁）。只有現今的資產階級时代和它的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終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論。

我們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說。这些最初的战斗的教会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贖罪的牺牲外，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撓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們已經看到，作者还完全不知道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相应地，全篇沒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許多其他地方使

我們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 000 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記”，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說，他們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并且用羔羊的血把它们变得鮮明洁亮；根本沒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現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沒有給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話看来，耶穌的見证不是洗礼，而是預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場合，自然是該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經通行的話；因此，我們差不多可以有絕對把握得出結論說，我們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現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不知道。如果說在路德的譯文中，基督許諾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誤解。在希腊文本中是 *deipnêsô* ——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聖經完全正确地譯为：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絕對沒有談到。

我們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時間——68 年或 69 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滿紙是希伯来腔調、荒謬的构句和文法錯誤。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話，現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賜給你們。”

至于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現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傳說的层层籠罩之下現在

已經辨認不出；就連那几篇所謂“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魯諾·鮑威尔所說，或者是更晚的作品^①，或者最多也只是旧有无名作家的著述經過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場偏頗的历史学者才加以否认。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時間的判定已經精确到几个月以內），这篇作品給我們描繪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四世紀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話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話对于受基督教和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見于“艾达”⁴⁹²的神話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为它以純淨的形式告訴我們，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羅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論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論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希腊羅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羅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繼續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①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經作者同意的法譯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連杜宾根学派还承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魯諾·鮑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以下与德文版同。——編者注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 工人組織⁴⁹³

亲爱的同志們：^①

我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通知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組織：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将于8月29日和随后的几天在馬德里举行，英国的朋友們如能按信末所附地址寄来几句賀詞（用西班牙文或法文），則不胜感謝。

因为1893年在拜尔法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⁴⁹⁴通过了要求一切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社会化的決議，从而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我认为自己有責任把它們的机关——議會委员会——也列入寄发本邀請信的名单之中^②。

本邀請信寄給：

爭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

費边社，

① 在寄給費边社書記的信中，不是“亲爱的同志們：”，而是“亲爱的先生”。——編者注

② 在手稿中，这一段放在方括弧內；在寄給費边社書記的信中，这一段被刪掉了。——編者注

工联代表大会議会委员会，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⁴⁹⁵。

尊敬你們的 弗·恩格斯

賀詞請寄：馬德里，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帕布洛·伊格
列西亚斯

写于1894年8月6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并根据
寄給費边社書記的信校对过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

(給卡·德拉瓦勒的信)⁴⁹⁶

9月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公民：^①

……但是，既然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我就在此一并向你们致最美好的祝愿，祝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工作取得成就。

意大利社会党人正在遭到前所未闻的非常法⁴⁹⁷的迫害，毫无疑问，非常法还将使你们受好几年的奇灾大难。这有什么！别人也曾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曾饱喝无产者的鲜血，可是结果是：在法国议会中有了五十名社会党议员。

在德国，俾斯麦曾在整整十二年中把社会党人置于法律之外，但是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他们把俾斯麦赶下了台，现在他们是帝国中最强大的政党。

^① 手稿中在称呼语之后有一段话在发表时略去了：“您8月30日的来信寄到伦敦时恰好我不在那里，信是给我转到这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迟迟未复的原因，我为此深感遗憾。我感谢您个人和您所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对我的盛情邀请。可是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编者注

法国和德国工人所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工人也同样能做到。梯也尔、麦克馬洪和俾斯麦所未能得到的东西，姓克里斯比的也是得不到的。胜利属于你们！^①

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譯成意大利文載于 1894 年 9 月 22—
23 日“階級斗爭”週報第 38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階級斗爭”週報，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① 在手稿中不是“属于你们！”，而是“属于我们！”——編者注

給西西里島社会党人的賀信⁴⁹⁸

向你們的報紙——西西里島工人的机关报致敬，祝它长寿，向你們正在改組的党致敬。^①

大自然把西西里島創造成为人間天堂。而这就足以使分为对立階級的人类社会把它变成了地獄。

古希腊羅馬时代为了經營大地产和大矿場而賞給了西西里島一个奴隶制。

中世紀以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

現在的时代宣称它已消灭这些桎梏，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这些桎梏的形式。它不仅保存了旧的賦役，而且还加上一种新的剝削形式，所有剝削形式中最殘酷、最无情的剝削形式——資本主义的剝削。

西西里島的古代^②詩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曾經歌頌了他們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詩式的生活；毫無疑問，这是美丽的、富有詩意的幻想。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現代詩人，敢于歌頌今天西西里島“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詩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島的农民能够在哪怕是羅馬对分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

① 在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向刚刚重新出版的西西里島工人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編者注

② 在手稿中不是“古代”，而是“古希腊”。——編者注

地，难道他們不会感到幸福嗎？这就是資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結果：自由人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

但愿他們不要丧失勇气。一个更好的新社会的曙光正在开始照亮各国被压迫階級。而各地的被压迫群众都在团結自己的队伍，他們不顾边界的限制，不顾語言的差別，到处在相互达成協議。国际无产階級大軍正在形成，——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将使它获得胜利！

弗·恩格斯

(伦敦)

写于1894年9月26日

譯成意大利文載于1895年6月30日
“解放”周报和1895年8月16日“社会
評論”杂志第16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評論”杂志，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給“社会評論”杂志編輯部的信)499

当年輕的意大利社会党遭到极其殘酷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时，我們的責任，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的責任，就是要設法給它援助。我們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临着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广为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誹謗，我們提供一点证据，也許不是完全沒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責备意大利社会党人說，他們故意装成一副好像在^①进行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具来掩盖完全是另一种的政策，一种宣传“階級斗争”（它“会使我們回到中世紀”）和旨在建立其目的是“夺取政权”的政党的政策；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則不过問政治，不攻击現存的政体”；总之，他們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完全沒有恶意的、善良的小伙子！

如果說这里是在嘲弄誰的話，那末正是嘲弄意大利的公众。要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于向它奉献这样的蠢話。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階級斗争”是我們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們組成为“以夺

^① 在手稿中此处补充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編者注

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那末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和我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瑞士^①、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在这些党中，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这正像其他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时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②，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

而且，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③ 在十二年非常法期间所经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斯比。^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 年 10 月 27 日于伦敦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 1894 年 11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第 21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① 在手稿中“瑞士”一词没有。——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没有。——编者注

③ 在手稿中不是“德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编者注

④ 在手稿中，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比。”——编者注

給“前进报”編輯部的信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馬尔同志 10 月 25 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关于土地問題的辯論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⁵⁰⁰的決議，說它們“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贊同”。据“前进报”11 月 10 日报道，我們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說法。⁵⁰¹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錯誤，显然，福尔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

根据我的記憶，关于南特綱領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①的詢問而写的，它的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們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沒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預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則上是絲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經濟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則，成为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即在社会党人范围内，我們的法国朋友在想要不仅永远保存小农

① 大概是保·拉法格。——編者注

私有者，而且永远保存剝削別人劳动的小佃农方面将是孤立的。

因此，如果我就这个問題发表了意見的話，那末我所說的就恰好是同福尔馬尔所听說的相反的东西。

但是，既然我已被牽連进来，那末，看来除了把我的观点說得更明确之外，沒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載一篇不长的文章，說明和論证我的观点^①。

弗·恩格斯

1894年11月12日于伦敦

載于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
第268号和1894年11月22日
“社会民主党人”第43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前进报”

^① 見本卷第563—587頁。——編者注

法德农民問題⁵⁰²

写于 1894 年 11 月 15 日和 22 日之間

載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
第 1 卷第 10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时代”杂志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感到非常惊奇。其实，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①，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 *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

^① 德文原文是 *wird «gelegt»*。Bauernlegen [驱逐农民] 是德国历史上放逐、剥夺农民的叫法。（弗·伊·列宁在他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上加的注。）

婪的市民。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記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侖的神話，創立了第二帝国。我們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許多东西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場，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們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已成长起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預感和憧憬已經明朗化了，更加广闊而深刻了，它們已变成了能滿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綱領；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議員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議會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經濟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們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們便談到农民問題的中心点了。

我們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着統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場合則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薩克森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們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某些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魯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則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們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按地区而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沒有一种是在稍許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像的低微工資，以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銷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說，我們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問題；我們只是考察一些显

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許我們詳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組成的情况。

我們先从小农說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并且一般說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不，对于整个問題說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只要我們搞清楚了我們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們便有了确定我們对农村居民其他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們这里所說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也如小手工业者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資料这点上不同于現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所以，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殘余。他的祖先曾經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沒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罕有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羈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是三方面不同的。第一，法国革命已为他解除了必須对地主担負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場合，至少在萊茵河左岸，給他保证了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員的自治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古老公社土地的权利。公社的土地一部分被他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羅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用欺詐手段从他手中掠夺去了，从而現代的小农便丧失了不购买飼料而喂养耕畜的可能。而在經濟方面，丧失公社土地使用权的意义，要比废除封建地租重大得多；无法喂养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起来。第三，現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他們所获得的原料来生产他

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他的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作为交换物的产品或作为互助的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如果说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那末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愈来愈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应该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与这种成见作斗争呢？在不改变自己原来立场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提出些什么建议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予以重视，因为它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⁵⁰³ 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建立其成员

半数由工人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鎮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給市鎮，市鎮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論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鎮监督的条件下交給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組合共同耕种；規定养老金和殘废撫恤金，其款項用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別稅支付。

这个綱領为小农（佃农也在內）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鎮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給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銷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 5 000 法郎的土地，废除在土地轉手时征的稅；建立爱尔兰式的調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們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規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債的 *Code civil*〔民法典〕第二一〇二条，并剥夺債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規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訂早已过时了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則在每个市鎮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訂；最后，实行免費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試驗站。

我們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們在这里暫且不談——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別的国家里已經实现了。佃农調解法庭正在明显地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农民合作社在萊茵河地区已經存在。修訂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經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綱領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現存資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別損害就可实现的。我們說这一些，只是为了說明綱領的特征，决不是要責难它，——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綱領，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間都获得了

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越吃胃口越大——我們的法国同志就想把綱領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們同时也感觉到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怎么可以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現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綱領的基本原则呢？为了預防这种异議，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議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論性的緒論，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則中包括有保护小农財產免于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們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来仔細考察一下这个緒論以及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緒論是这样开始的：

“鉴于按照党的总綱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資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如果說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資料已經达到如此程度的資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末，——至少在現代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財產；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貧困；

鉴于如果說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責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現在游手好閑的私有者实行剝夺之后，占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大地产，那末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責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庫、高利貸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別人土地，即使有时剝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

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貧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組織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們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土地綱領，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經營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讓我們来更詳細地考察这个“緒論”。

首先，紧接法国綱領中关于占有生产資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一論点之后，应该添上一段，即生产資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無論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由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所造成了；所以，必須以无产階級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資料轉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資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綱領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爭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經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說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綱領所說，个人占有無論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个人占有本来就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維護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綱領，那末就应该引证整个綱領，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緒論中所引用的論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現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資料，在我們的时代已經不再赋予这些

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經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全然絕迹，起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維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貸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获得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債務奴隶却永远沒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二一〇二条删掉，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們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脫出来，因为他为了暂时延緩毁灭的日期，必須“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連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給高利貸者。你們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們綱領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緒論中說道：在現代的法国，生产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財產；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經指出过，說得如此籠統的后面这点，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說仅仅在于把生产資料轉交給生产者公共占有。我們只要忽視这一点，上述論点立刻就会使我們产生出一种錯誤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現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說，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滿身債務的私有者变成沒有債務的私有者。自然，社会主义是要設法使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的，但不是用这种方法。

無論如何，事情已弄到在綱領的緒論部分竟率直地宣稱，仿佛社會主義的職責，甚至它的迫切的職責，是在於

“保護自食其力的農民的小塊土地，而反對國庫、高利貸者以及來自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方面的侵犯”。

這樣，緒論便宣布社會主義的職責是在於實現一件在前一段中曾經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緒論委託社會主義“保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雖然它本身就斷言這一所有制“不可避免地註定要滅亡”。國庫、高利貸者、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這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借以實現這種不可避免的滅亡的簡單工具又是什麼呢？“社會主義”應當用什麼方法去保護農民不遭受這三者的侵害，我們下面就會看到。

但是所要求的不僅是保護小農的所有權。與此同時，

“對那些作為佃農或分成制佃農 (métayers) 耕種別人土地，即使有時剝削短工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着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產者，也應該予以同樣保護”。

這裡我們就站到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去了。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僱傭勞動的。而這裡卻宣布社會主義的迫切的職責是在於保護那些有時“剝削短工”——確實就是這樣說的呀！——的法國佃農。這是因為這些佃農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着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既已踏上了斜坡路，那是多麼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滾啊！如果德國的大農和中農來見法國社會黨人，請求他們在德國黨的執行委員會面前張羅一番，要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他們剝削男女長工方面加以保護，借口是說他們“自己受着”高利貸者、收稅吏、糧食投機商和牲口販子方面的“剝削”，——那末法國社會黨人將怎樣回答呢？

誰又能担保我們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輸入事項轉交国家管理的建議)也派到他們那里去,借口說他們“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貸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剝削”而請求社会党人在他們剝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應該說明,我們的法国朋友們并不像別人可能觉得的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的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給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須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甜菜:他們得向一定的工厂并按照該工厂所規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得购买一定的种子,使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規定的肥料,此外他們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詐。这一切我們在德国也是很熟悉的。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率和明确地說出来。这一段以它現在这种极为籠統的提法,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綱領,而且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詞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被用来做出不合它的起草者們本意的解释,那末他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

緒論的結束語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歪曲的解释。按照这一結束語,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經營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資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資本主义方式經營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們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可以和他們一道走,

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們一起奋斗。我們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階級的个别人物，但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同样沒有人們可能想像的那种坏意思；关于这一切，起草者們显然只是沒有考虑到罢了；但是可惜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們上了当；要是有人在字眼上挑他們的毛病，他們可不要大惊小怪。

緒論的后面接着是对綱領本身的一些新的补充。它們也像緒論一样措詞很草率。

关于市鎮应当取得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給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鎮为此目的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鎮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給小农支配。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給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經營方式只容許小規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現行的間接稅和直接稅，代之以对 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進稅。”

許多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綱領中都包含有这一类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鮮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真正意义被理解得多么不够。我們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預算是 9 000 万英鎊。其中有 1 350 万至 1 400 万英鎊来自所得稅，其余的 7 600 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稅（邮政、电报、印花稅），但絕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費品抽稅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較貧穷阶层的收入經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总合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現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

了。我們姑且假定說，所有这 9 000 万英鎊在英国都是靠对 120 英鎊 (3 000 法郎) 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稅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財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統計，在 1865—1875 年是 24 000 万英鎊。假定現在每年是 3 亿英鎊；9 000 万英鎊的捐稅負担在这种場合便会吞沒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換句話說，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沒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作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們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稅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暫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債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則将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綱領的起草者們大概自己也意識到，农民必得长久地等待这种稅收改革，因此“暫且”(en attendant)向他們提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稅和減輕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稅。”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較大的农田；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剝削短工”的农民有利的。

其次：

“漁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魚类以及庄稼所須做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是頗得人心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銷了。現時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鷓鴣、梭魚和鯉魚呢？够不够給每个农民一年之內用一天以上的時間去漁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說，重新頒布一些反高利貸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

年来無論何时何地都遭到失敗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貸者求貸在他看来已是較小的禍害,那末高利貸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貸的法律制裁的。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帶給他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在特別需要貸款时难于获得貸款。

“公費治疗并按成本供給药品”——

这無論如何不是專門为农民提的要求;德国綱領比这更进一步,还要求免費供給药品。

“应召預备役士兵在服役期間,其家屬应得貼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專門为农民提的要求。

“减低肥料、农业机器和产品的運費”——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經实行,而且主要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計劃”——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詞和漂亮諾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話,在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論性緒論的后面,新土地綱領的实际建議却一点也沒有向我們說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希望怎样做到維護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說法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們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穩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他們在試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沒有使对。

大概，他們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間——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們只有凭借很冒险的广泛的許諾，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許諾寻找根据，他們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論上的論断。如果較仔細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許諾是自相矛盾的（許諾維護一种自己宣布为注定要灭亡的事物）；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沒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貸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共同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最后，或者对于小农只有很小的意义；因此，綱領的純实践部分本身便改正了錯誤的引言，并把緒論中那些表面上令人生畏的响亮詞句化为事实上极其无伤大体的措施。

老实說，在由小农的整个經濟地位、由他的教育和隔絕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資产階級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支持的偏見之下，我們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兌現的諾言，才能立即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說：我們得向他們許諾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們的財產，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經濟力量，而且要把这財產从現在就已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

农变成自由的私有者，而对于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私有者則解除其債務。即使我們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展成現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們就沒有解放农民，而只是把他們灭亡的时间延緩了一下。

但是，我們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們明天在我們不能实现自己的諾言时又离开我們。要求我們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們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們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他們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們向后者取得拯救他們的小經濟的諾言吧；当他們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談的話語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調子，他們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們許諾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找解救，但我們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經发生过像我們这里一样喧囂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末他們未必会犯南特的錯誤。

那末我們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們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們應該怎样对待他們呢？

第一，法国綱領的原理是絕對正确的：我們預見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們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們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剝夺小农（不論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們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

然，到那时候，我們將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們本来現在就應該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他們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們就得几乎完全是在农民中間进行宣传）就已提出了类似的計劃。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許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結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經營方面，我們就会发现：在把各小块土地結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結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規模經營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給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撥出一些田地給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給这些农民以資金和可能性去从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們自己的消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們的經濟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轉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別社員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別場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决定于这一場合的情况，以及我們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們那时将有能力給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銀行接受它們的一切抵押債務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資金中抽撥貸款来建立大規模生产（貸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錢，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

們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們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經濟，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們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經濟，那末他們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規模的資本主义經濟将排挤掉他們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現在我們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規模經營。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这是他們唯一得救的途徑嗎？

我們永远也不能許諾小农給他保持个体經濟和个人財產去反对資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們只能許諾他們說，我們不会违反他們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預他們的財產关系。其次，我們可以促使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撓現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詐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場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誰也搞不清楚到何处为止算是誠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詐。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騙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騙者方面，这始終是有很大差別的。而我們則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运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决心的話，就使他們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們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問題。我們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們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們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挽救而沒有真正轉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們无須等到資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現出来的时候，

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們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須牺牲一些社会資金，这从资本主义經濟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資，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費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說来，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細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議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見，如果我們所給的諾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設想我們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簡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閉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搖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們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們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統治着的时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要保全他們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們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車把独輪手推車压碎一样是毫無問題的。我們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經濟发展趋势行动，而經濟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們的話的。

然而，在結束这个問題之前，我必須說明我相信南特綱領的起草者們在实质上是跟我抱有同样观点的。他們甚有見識，决不会不了解，現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是必定要轉归公共占有的。他們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⁵⁰⁴ 南特綱領在措詞上的矛盾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們实际上所說的并不是他們所想要說的。如果他們得不了解，他

們的言論被人濫用，——实际上已經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們自己的过錯。不管怎样，他們應該更詳細地說明他們的綱領，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則必須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現在我們来談一談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继承人分家，同时还由于欠債和被迫卖地，我們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一系列过渡阶段。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間的地方，中农在利益和观点上是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他本身的經驗應該告訴他，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已經下降为小农了。但是，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經營又到处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應該首先維護雇佣工人，即維護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繼續存在的諾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們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們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謬的話，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許諾就几乎是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們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們中間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希望把自己的地位永久保存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他們会看到就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則要到我們这里来，而且还要准备在将来分享其他一切工人将有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們更关心得多的是他們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們。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他們的經濟繼續存在下去的保证，我們是决不能給的。要

是这样，他們就只有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許諾，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員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我們确切地知道如下一个經濟上的真理，即由于資本主义經濟的競争和海外廉价的粮食生产，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債務和他們的經濟到处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們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們也只能建議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內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剝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們現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結論，他們就要到我們这里来，而我們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們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要不然的話，我們就只得讓他們去听天由命，而去同那些一定会對我們表示同情的他們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們在这里也将拒絕实行强力的剝夺，不过我們可以指望，經濟发展将使这些頑固脑袋也学到乖的。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簡單。这里摆在我們面前的是毫无掩飾的資本主义企业，因此我們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里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階級，因而我們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我們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剝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剝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剝夺是否要用贖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們，而是取决于我們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們自己的行为。我們决不认为，贖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們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里我們不去談論这点。我

們將把這樣歸還給社會的大地產，在社會監督下，轉交給現在就已耕種着這些土地並將組織成合作社的農業工人使用。我們將在什麼條件下轉交這些土地，關於這點現在還不能說出一定的意見。無論如何，資本主義農場之轉變為公有農場在這裡是已經完全準備好了，並且可以馬上實行，比方說，就像在克虜伯先生或施杜姆先生的工廠中一樣。這些農業合作社的范例，將使最後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塊土地農民看到合作的大規模農場的優越性，而且也許會使某些大農看到這些優越性。

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在農村無產者面前展開一幅光輝的遠景，就像在工業工人面前所展開的一樣。所以，把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爭取到我們這方面來，對於我們僅是時間問題，而且甚至是一個很短時間的問題。而當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整個德國立刻就會改變風向。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實際上的半農奴狀況，是普魯士容克統治的主要基礎，因而也就是德國的道地普魯士霸權的主要基礎。正是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容克——他們愈來愈欠債，愈來愈貧窮，靠國家和別人的供養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愈來愈拚命抓緊自己的統治不放，——正是他們造成了並在維護着官僚和軍官的道地普魯士性質；他們的傲慢、狹隘和驕橫，使得普魯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國——儘管顯而易見，此刻它之作為現時唯一可能實現的民族統一形式，是無可避免的——在國內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國外，雖有其光輝的勝利，却如此不受尊敬。這些容克的權力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在七個舊普魯士省份的全部領土上，也就是說，幾乎在整個帝國三分之一的領土上，他們握有在這裡提供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地產，不僅握有地產，而且還通過甜菜制糖廠和釀酒工廠

握有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門。無論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沒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未握有整个的王国。他們都是散布在广闊的地域里，并且在爭取經濟和政治优势的斗争中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魯士容克的这种优越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經濟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預算中），負債和貧穷化現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止地日益扩大；只是法律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半农奴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制地剝削农业工人的可能性，才把正要沒頂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們和团结他們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容克的統治就会完結。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个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魯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們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普魯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們决战的場所，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擋我們到这里来。如果像他們威胁我們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們党的扩展，那末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階級接近我們的宣传。这对我們反正一样。我們終究会将他們爭取过来。

关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四卷⁵⁰⁵

“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其中写道，看来，第四卷即讲述理論历史的那一卷的出版工作将不得不放弃，因为

“除了一些簡短的札記，找不到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最后一卷的任何草稿”。

我們希望，“前进报”在这方面是犯了某种程度的錯誤。至少，弗·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給我們提供了多少有点希望的消息。根据这个消息可以知道，有一部在1861—1863年写的手稿“政治經濟学批判”，計有四开本1472頁；这部手稿的第220—972頁就是“剩余价值理論”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部分写道：“这一部分手稿，包含政治經濟学核心即剩余价值理論的詳細的批判性的历史…… 我为自己保留了下述权利：把这部手稿的批判部分当作‘資本論’第四卷来发表，而且将在这一卷里略去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經交代清楚的許多东西。”⁵⁰⁶

写于1894年11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94—1895年“新时代”
杂志第1卷第9期

俄文譯自“新时代”杂志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94年1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协会的真诚的谢意，感谢它对我的生日的友好祝贺。我希望，四年前已经纪念过成立五十周年的协会能像我这样活到七十四岁，并且到那时候它仍旧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能够再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

致真挚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給 奥地利工人的賀信⁵⁰⁷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①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經为自己占领了；現在的問題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議會。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內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順利和成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2月27日于伦敦

載于1895年1月1日
“工人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① 在給維·阿德勒的信中，这句话前面还有以下一句话：“請你向奥地利工人轉达我对他們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賀。”在报上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了。——編者注

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导言⁵⁰⁸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

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功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

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⁵⁰⁹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叙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叙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⁵¹⁰）。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问题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叙述与第一次叙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

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資料，使生产資料受联合的工人階級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資本及其相互間的关系。”⁵¹¹ 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現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說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換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聰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說“分配手段”也應該轉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說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經濟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們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稅、包括薩克森森林⁵¹²及其他補貼在內的貧民救济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現今已經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鎮；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們所想要废除的。

* *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們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經驗，特別是法国經驗的影响。須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現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們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產階級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濃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維也納、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間在巴黎发生无產階級与資產階級彼此爭夺統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資產階級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資產階級，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

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 *in partibus* [在国外]^① 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銜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

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

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 1848 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 1848 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澈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⁵¹³，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

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⁵¹⁴,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

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統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爭辯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統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魯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謂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憊。1871年的輕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襲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們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編入军队，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兵士，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軍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殘酷而結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別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結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軍費按照几何級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稅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較貧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薩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瘋狂軍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紀念日，則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敗，如馬克思所預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時間。在德国則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潤補助⁵¹⁵，簡直像处在温室

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 1866 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 1871 年为 102 000，1874 年为 352 000，1877 年为 493 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 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 年为 550 000 票，1887 年为 763 000 票，1890 年为 1 427 000 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 1 787 000 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⁵¹⁶，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

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主义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⁵¹⁷ 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

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該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惶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

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1848 年 10 月在维也纳，1849 年 5 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依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 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 年 7 月和 1848 年 2 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 1848 年 6 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 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 3 月 18 日夜間和 19 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

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①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连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弹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說，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說，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⁵¹⁸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①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枪响劍鳴的地方去？为什么現在人家因为我們不愿立刻貿然走到我們預先知道必遭失敗的街头上去，就指責我們怯懦？为什么他們这样坚决恳求我們終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們完全是白白浪費他們的恳求和挑战。我們并不是这么笨的。他們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軍隊排列成在老弗里茨^①时代那样的陣式，或是排列成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⁵¹⁹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說在国家之間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經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襲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帶領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經过去了。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應該参加进去，自己就應該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們为什么流血牺牲^②。最近五十年来历史，已經使我們領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應該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們現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絕望了。

在罗曼語国家里，人們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們所能夺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③。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沒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謀、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絲毫也不能信賴軍隊，一般說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編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們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們應該拥护什么”。——編者注

③ 在“新时代”杂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編者注

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預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⁵²⁰，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①，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⁵²¹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們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 1871 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②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

世界历史的諷刺把一切都顛倒过来了。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們跟奧迪隆·巴罗一起絕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們⁵²²，可是我們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結实，兩頰紅潤，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們不糊塗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們騙入巷战，那末它們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們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顛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瘋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顛覆者嗎？难道是我們引起了1866年内战嗎？难道是我們把汉諾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騷公爵驅出了他們祖传世襲的合法的領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領土嗎？⁵²³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們，竟在那里埋怨变革！*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e querentes?*〔誰能容許格拉古埋怨叛乱呢？〕^①誰能容許崇拜俾斯麦的人們咒罵变革呢？

可是讓他們去通过他們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讓他們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殘忍些吧，讓他們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東西吧，——他們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給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們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現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們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魯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魯士的將軍鮑古斯

① 尤維納利斯的第二首諷刺詩。——編者注

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們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regis voluntas suprema 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們，这里閑談沒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請不要忘記，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現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約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間的契約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間的契約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約，契約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約义务的約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給我們絕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們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約束，而能随便对付你們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訴你們。^①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羅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經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沒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亞細亞，并且滲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個相当长的时期內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軍隊中也有許多信徒；整个軍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軍团被派去参加占統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軍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們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別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議。連兵营里长官所慣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軍隊中的秩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話被刪去。——編者注

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請原諒，我該說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顛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們的集会場所被封閉或者甚至被搗毀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薩克森禁止了紅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剝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們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訓練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連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輕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說他們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毀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宮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 303 年用大規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軍隊中絕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羅馬帝国君主，即教士們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6 日于伦敦

摘要載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杂志第 2 卷第 27 和 28 期，并載于 1895 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該书 1895 年版条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遺憾，这次我不能参加你們的三月节日活动了。由于疾病又一次发作，虽說不严重，可是治疗要求绝对安静，所以我又要被困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了。我希望，你們的节日活动不至于因我缺席而减色。

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⁵²⁴

我衷心感谢执行委员会的盛情邀请，然而我无法赴邀，因为给我治病的医生坚决反对我此刻接受任何邀请。鉴于入场券可能对别人还有用，因此我不揣冒昧，将它随信奉还。

写于 1895 年 4 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第 1 版第 29 卷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附 录

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 法国“閃电报”記者的談話⁵²⁵

……最反对接見記者的恩格斯先生同意为我們破一次例，同我們談一談他的感想。

我們問恩格斯：“您对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前在巴黎的暴行有何看法？”

“我看这只是一些被收买的奸細干的事，这些奸細企图敗坏他們在其中占有某种地位的那些政党的信誉。政府无疑愿意这些爆炸事件发生，因为这些事件既为整个资产階級利益服务，同时又特別为某些政治集团的阴謀效劳。的确，它們的目的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統治。

不久前在德国‘柏林风潮’⁵²⁶ 期間，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那里我們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警察局一手干的。的确，在这些所謂的社会主义示威游行的头一天，我們有些被引入迷途的朋友参加了运动，但是他們很快就明白了示威游行的真正性质，并且馬上退了出來。

几家属于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小鋪被搶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对被捕的暴徒的审訊表明，主謀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們竭力利用某些貧民的飢餓来迫使他們大叫：‘打倒犹太人！’

在意大利，对契普里昂尼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訊，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奸細們的行为也在陪审法庭面前被揭露

出来。

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巴黎有两三个坏蛋愿意为警察局效力，可是，除了警察局本身，誰也不敢肯定說，他們是社会党里的人。”

俄 国 的 外 交

“您不担心，所有这些内部震蕩将使各国政府到欧洲战争中去寻求出路嗎？譬如說，你們的威廉皇帝……”

“不担心。我希望威廉皇帝为德国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多活一些时候，”恩格斯笑着說。“但是，我并不相信馬上就会发生战争。”

“难道俄法同盟絲毫沒有引起您对这点的担心嗎？”

“絲毫沒有。去年，可能俄国有过侵略意图。喀琅施塔得的場面⁵²⁷（帝制俄国对共和制法国过分明显的献殷勤）可以說是形迹可疑的。軍队在边境集結，看来也应当引起某种担忧。但是，今天的一切却完全是另一个样。

事实上，即使俄国想打仗，它也打不起来。目前，它不得不同較之其他一切敌人都更为危险的敌人，即同饥荒作斗争。

这个禍患并不是某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偶然性歉收的結果。这是俄国新的社会制度的后果。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的状况已大大改变，在克里木战争期間，整团整团的人馬在雪地里覆沒。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轉折的开始。在把俄国的孱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的彻底失败之后，因自己帝国的可怜状态而陷于絕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

尽,別无出路。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須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俄国饥荒的各种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期,沙皇实行了农奴解放,这一解放成了在貴族和农民之間重新分配土地的借口。好地,以及林地和水塘都給了貴族。农民得到的則是坏地,而且数量非常不足;同时,农民还必须四十九年之內为自己的份地逐年交付一定数額的款項。这引起了什么后果呢?

农民无力向国家交納地租,不得不欠下許多債;他們的死路太多而活路太少。一帮 *kulaki* (高利貸者) 扑向这些土地劳动者,于是,他們欠下的債就愈来愈多,以致使他們对有朝一日能够还清債款失去了任何希望。当高利貸者不愿意放債时,农民为了弄到錢就只好出卖自己的收成,他們不仅卖了自己的口粮,而且連播种必需的种籽也卖了,这样一来,下一年的收成也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头一个坏收成就必然引起真正的饥荒。而这一饥荒反过来又給俄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喂牲口,于是只好把它宰了或者卖了。然而,沒有耕畜,既不能耕地,又不能往地里施肥。这样,农业生产就长年受到破坏。

农民解放只是在俄国发生的經濟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人为地創造作为中間階級的工业資產階級。为了更快地达到这点,制定了一个真正的禁止性关税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俄国工业并促使它异常迅速地发展;然而,因为这个工业不能生产出口商

品,所以它需要有国内市場。而俄国的农民却差不多什么都不买,习惯于自己制造一切:房子、工具、衣服等等;就在不久前,他还生产許多木制品、铁制品和皮革制品,把它們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当林地轉归地主,因而把森林从农民手里夺走的时候,农村家庭手工业就趋于衰落。工厂生产的发展最后結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于是农民一定得买工厂制品。可是,正当工厂工业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饥荒降临了,它給工厂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农民不能再买任何的工厂制品;一些人的破产招致另一些人的破产。”

經濟状况和軍事状况

“这么說,在您看来,俄国的經濟状况不容許它想到打仗,是不是?”

“是的。如果我說沃邦和布阿吉尔貝尔所描繪的十七世紀法国农民的生活情景⁵²⁸,也可以用在今天不得不用草充饥的俄国农民身上,这并不是过甚其辞。就是在法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級制度也不是沒有經過震蕩的;而在俄国,这一过渡刚刚引起了危机,这一危机势将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根据这一切原因,俄国人当前考虑得多得多的,是吃飯問題,而不是打仗。”

“最近一次的俄国公債……”

“我正好想談这批公債。这是一个巨大的失敗。非常愛談报复的法国资产阶級,它的爱国主义並沒有强烈到解囊相助的地步,沙皇政府要的是2 000万金鎊,但它得到的只有1 200万……”

“据說,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給他們的受到俄国政府排挤的同道者报仇,曾經促成这批公債失敗,是嗎?”

“我发表反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言論够多了，現在我不会替他們辯护，說他們这样愚蠢。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們作为銀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剝削尽量多的糊塗虫，如此而已。”

“这么說，您不相信俄国的强大？”

“俄国在防御方面是强的，但作为进攻的一方，無論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它都不强。我已向您說过，經濟状况不容許它作这种危險而又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們看看俄国军队的組織，那我們会看到，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不可怕的。

一旦发生战争，它派不出比現役軍数量更多的士兵。它的預备兵只是一紙空文；誠然，它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是，它沒有后备軍官来补充軍官。的确，它能从哪里得到軍官呢？从哪个方面得到呢？”

我們的交談人說：“在我們德国，后备軍官比我們所需要的多50%。难道法国在这方面不是处于相对的劣势嗎？”

强有力的法国

我們回答：“絕不。我們法国虽然没有富余的軍官，但干部是配备齐全的。”

恩格斯先生回答：“这絕不会使我不愉快。我并不想看到德国軍队强大到能征服全欧洲。为了达到我們的目的，为了欧洲工人階級的解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具有相同优点的德国。你們的伟大同胞圣西門，曾經第一

个宣布必须有法、英、德的同盟作为欧洲安宁的首要条件。那是真正的‘三国同盟’⁵²⁹。”

“在結束談話時，請允許我們說，您把俄国的狀況描繪得有些陰暗了。”

“完全不是那樣。您願意我告訴您一件事情嗎？您知道，為了幫助挨餓的俄羅斯農民，曾經決定從有餘糧的高加索運來糧食。接着下了一道道有關的命令，把許多許多糧食運到一起，派車皮去裝運。但是，卻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派去的空車皮集中得太多，造成了堵塞。糧食放在車皮旁邊，而車皮却一動也不能動。沙皇^①得知這一消息，大發雷霆，派了一個將軍到出事地點；這個軍人大吹大擂，宣稱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可是他能夠弄走的只是幾個列車；大部分糧食都在原地爛掉了！下了動員令又會怎樣呢？俄國的鐵路本來就不那麼多，而俄國的軍官就連這麼點鐵路也不會利用。”

關於亞爾薩斯—洛林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亞爾薩斯—洛林這個一切糾紛的根源會怎麼樣？您相信能同時使法國和德國都滿意地和平解決這一問題嗎？”

“我希望，經過十年左右，德國社會黨將取得政權。它首先要辦的事，就是讓亞爾薩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見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這一問題將在沒有任何法國士兵的參預下得到解決。相反，德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是妨礙社會黨人

^① 亞歷山大三世。——編者注

取得政权的唯一手段。如果法国同俄国結成同盟进攻德国，德国将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而对于民族的生存，德国社会党人远較资产者更为关心。因此社会党人将战到最后一人，并且将毫不犹豫地采取 1793 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

載于 1892 年 4 月 6 日“閃电报”，
并摘要載于 1892 年 4 月 16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82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閃电报”，并根据
“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 法国“費加罗报”記者的談話⁵³⁰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說了如下的話: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但我应当馬上补充一句,我們社会党人,对业已造成的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我們正在为自己的利益順利地利用这一局势。軍事撥款沒有被批准,主要是由于我們宣传鼓动的結果。⁵³¹ 各議會党派都不能无视我們,政府更是这样,它十分清楚,对它來說我們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軍事撥款的时候,都非常憤慨,中央党和激进派⁵³² 在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場,无疑是受到了輿論压力的影响。”

恩格斯想要強調一下他的話,补充說:“要知道,德国人民說:‘我們出的兵已經够多了! 应当到此为止了!’”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恩格斯先生?”

“現在,当我同您談話的时候,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上届更不乐意投票贊成撥款。不过,我也不是閉眼不看这样的可能性:今后将有五年立法活动的下届帝国国会議員們可能同政府相勾結,因为政府将借助于‘緩和的暴力’来力爭妥协的解决。但是,非常可能,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撥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来个第二次

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将最终使冲突尖锐化，那时候还很难說誰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1864年在俾斯麦和普魯士議會之間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就会重演。⁵³³”

恩格斯的回答使我想起一个新的問題——他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經展开討論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外战争。

我的交談人作了生动的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在1864年俾斯麦同普魯士議會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魯士是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它必须得到联邦内所有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同意搞政变，它就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解体。但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保障各小邦免受普魯士統治的唯一的東西，它們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摆布。难道可以設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嗎？不会的，为了把我的意思說得更确切，我要对您說：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联邦的所有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支持他，而所有的邦政府也永远不会一致贊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說法沒有說服我，我繼續坚持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駁說：“我並沒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种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們的別的朋友們已經說过，他們預見会有人对普选权心怀叵測。”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嗎？”

“我們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們設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們，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前我們和政府之間的力量对比，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說，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嗎？我不认为会这样。頂多，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齡資格限制，送給我們一种修改和訂正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說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种普选权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⁵³⁴”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議員当中进行大規模逮捕嗎？”

恩格斯提高声音說：“不，在德国誰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联邦的某些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肯认可这种明目张胆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別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各小邦能够借以防止被普魯士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們轉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問題上。恩格斯在这个問題上远不是悲观的。

他对我說：“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在我們的时代里，誰会去承担挑起战争的責任呢？也許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征服？…… 即使这样，也有問題！…… 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它从国外拿不到錢，連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 * *

說到这里，我的交談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繼續說：

“实在說，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貧瘠了。如果法国政府了解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

切……除了錢和有效的軍事援助。沒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孤立…… 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軍事威力吧！請回想一下土耳其战争。要是沒有羅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勒夫那是无能为力的……⁵³⁵ 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在我們的时代，战争的結局是那样难于預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估計的全新的条件下。出現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聞的击穿力。出現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在战争过程中試用过。因此，我們完全无法想像，武器上的这一变革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謀部里就会遭到反抗；人們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侖第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我們的时代，战争就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就会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們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們粮食的正是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連一担粮食都別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綫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英国政府根据那些經營各种横渡大西洋业务的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可以支配在它監督下建造的这些公司的船只；因此，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商船开往它所反对的那一个或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

成为局势的主宰。当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刻出来迫使接受它的媾和条件。話又说回来，别以为威廉二世可能发动战争。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 * *

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 1890 年多获得 70 万张选票，也可能多 100 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 250 万张，也将是 225 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适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 150 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 80 名议员，而不是 36 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10 万居民产生 1 名议员。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 6 名议员到帝国国会去，虽然现在柏林的居民已经超过 150 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 16 名议员。另一个例子是：科伦现在已有 25 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 1 名议员。”

“在所有的选区都将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 400 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看了一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

么最終規律强加給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組織方面的詳細情况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这里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产資料轉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們就会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統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說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遙远。

恩格斯先生反駁說：“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樣远，我认为，我們党担負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經不远……可能到本世紀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

真的！請您看一看从我們开始議会斗争以来我們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換句話說，如果选举到 1895 年才举行，那末我們将会得到 350 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 1 000 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 700 万。如果在总数 700 万选民当中有 350 万选民拥护我們，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現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請不要忘記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們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們在軍隊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 1 000 万选民当中我們已經有 150 万，就是說大約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們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 6 个士兵里就有 1 个是我們的。當我們有 350 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軍隊就会有一半站到我們这边。”

当我对于受社会党人影响的軍隊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于自己的原則表示怀疑时，恩格斯先生一字不差地对我說了下面这样一段話：

“當我們取得多数时，我們的軍隊将自觉地做法国軍隊曾經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絕向人民开枪。是的，無論吓坏了的资产者怎

样說，我們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轉到我們这边来的時間，我們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法学家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們必須掌握政权，我們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們当中有許多人已經准备同我們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材在我們这里将会超过我們所能使用的数量。”

听了这些充滿乐观精神的話以后，我就向弗·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載于 1893 年 5 月 13 日“費加罗报”
和 1893 年 5 月 20 日“社会主义者报”
第 14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費加罗报”，并根据
“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 “每日紀事报”記者的談話⁵³⁶

……我在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先生的寓所訪問了他，自然碰上他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結果而喜气洋洋。

他回答我的問題說：“我們爭得了10个席位。第一次投票給了我們24席，在第二次投票时，我們的85位候选人有20位当选。我們得到了16个新的席位，失去了6个席位，这样，我們淨得10个席位。柏林选出的6个人中有5个是我們的。”

“你們一共得到了多少选票？”

“这我們只有到帝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才能知道；那时候会知道准确的数字，不过現在也可以說，我們得到的选票在200万张以上。1890年，我們得到了1 427 000票。請不要忘記，这些选票純粹是給社会党人的。除了人民党⁵³⁷——这是激进共和主义的政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同我們竞选。我們提出了391个候选人，并且拒絕同任何别的政党取得協議。如果我們愿意这样做，我們还可以再得二三十个席位，但是我們坚决拒絕無論什么样的妥协，也正因为如此，我們的立場才这样有力。我們的任何一个議員，除了我們党的綱領以外，都沒有义务要支持任何政党或任何措施。”

“可是，你們的这 200 万张选票不是本来应当給你們更多的席位嗎？”

“是的，这里一切都归罪于不良的議席分配办法。在刚成立帝国国会的时候，原定各选区一样大小，每 10 万居民将选出議員 1 名；但是，划定选区时的缺点，以及居民的增长和迁徙，使得現在各选区的选民人数很不相同。这对我們非常不利。就以柏林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为例吧。他在选区里得到 51 000 票，而这选区的居民却有 50 万左右。”

“为什么你們失掉了 6 个席位呢？”

“失掉这些席位，各有各的特殊情况。不来梅，我們在 1890 年就认为不过是僥幸。在卢卑克，我刚从倍倍尔那里知道，是因为許多工人离开了，如果选举是在冬天举行，我們會保住这个席位的。其次，不应忘記，商业危机对我們的影响要比对你們的影响更厉害，我們不得不同企业主的激烈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虽然投票是秘密的，但有人将这种秘密化为烏有了。我們这里投票不像你們英国那样要在选票上划記号；而是每一个选民把他带来的选票投进票箱。此外，商业危机和 1892 年的霍乱流行，迫使許多工人接受了国家津貼，而这要剝夺他們的选举权整整一年。”

恩格斯先生接着說：“但是，我对我們的失敗比对我們的胜利更引为驕傲。在德勒斯頓（农村选区），我們得到的票数比所有其他党派都投票贊成的那个候选人一共只少 100 票，而参加投票的人数总共是 32 000 人。在奥滕曾，我們的候选人在总共 27 000 票中所得的票数只比他的对手少 500 票，而他的对手也是得到所有其他的党派支持的。在斯图加特，我們的候选人得到 13 315 票，比那个当选的候选人一共只少 128 票。在卢卑克，投票人数是

19 000 人，我們所差的只有 154 票。而且，正如我已經說过的，所有这些选票都是拥护社会党人而反对所有其他党派同盟的。”

“請您談談，你們的政治綱領是怎樣的？”

“我們的綱領差不多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⁵³⁸的綱領完全一样，但是我們的政策却完全不一样。”

“也許，你們的政策近似費边社的政策？”

“絕對不是，”恩格斯先生激烈地回答，“我认为費边社⁵³⁹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它希望只用这个党所提出的那些手段来达到社会的革新。我們与所有現存的政党相对立并准备同它們作斗争。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只是一个小宗派，而且作为一个小宗派在行动着。这是一个閉塞的組織。它不懂應該怎样領導整个工人运动并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它把馬克思主义变成正統教义。例如，它固执地要求約翰·白恩士在各碼頭罢工时举起紅旗，然而，这一行动会毀掉整个运动，不但不会把碼頭工人吸引到我們这边来，反而会把他們重新推到資本家怀抱里去。我們不做这种事。但是，我們的綱領是純粹社会主义的。我們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誠然，我們接受任何政府給我們提供的一切，但只是把它作为分期付款的債款，我們对此并不感謝。我們永远投票反对預算、反对任何軍事撥款或扩充兵員。在那些第二次投票时沒有我們候选人的选区，我們的选民得到了指示，只支持那些答应一定投票反对关于軍队的法案、反对任何增加捐稅和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法案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关于軍队的法案将被通过。⁵⁴⁰ 反对派已彻底瓦解。事实上，

目前唯一实在的和团结的反对派就是我們了。民族自由党归附了保守派。自由思想党分裂成两部分,而在选举之后,它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天主教党和一些小党派害怕再一次解散帝国国会,为了避免解散帝国国会,它們准备作任何让步。”

“照您看来,这次选举将怎样影响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呢?”

“如果关于军队的法案通过了,那末法国和俄国显然也将在这方面采取步骤。法国现在就已經把所有男性国民,甚至生理上不宜服役的人,都赶到军队里去了,不过它无疑将着手改善它那作为作战机器的军队。俄国将会碰到补充军官的困难。当然,奥地利和德国将一致行动。”

“那末,您认为欧洲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小嗎?”

“任何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都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战争。新式速射武器的准确性和远射程以及无烟火药的运用,标志着军事上发生了这样的变革,以致誰也不能說,在这些新条件下,正确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将冒灭頂的危险。而行将在战场上相遇的军队,也将是如此龐大,以致同未来的战争比較起来,过去的一切战争都形同儿戏。”

“照您看来,社会民主党将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無疑問,我們將为和平而斗争。我們始終抗議兼并亚尔薩斯—洛林,在色当战役之后,馬克思和我写了‘国际’的宣言,我們在宣言中指出,德国人民沒有理由同法兰西共和国发生爭端,我們要求光荣条件下的和平,并且預言了后来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就是:这一兼并会把法国抛进俄国的怀抱并对欧洲的和平造成經常的威胁。⁵⁴¹我們的党在帝国国会里向来要求,让亚尔薩斯—洛林

的居民有可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重新并入法国，或者留在德国，或者并入瑞士，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

“那末，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

“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志^①。在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②。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

“您可以给我一些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增长的数字吗？”

恩格斯先生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图表，上面标示出自从目前这样的帝国国会成立以后，在每次选举中每个党派所得的票数。

他说：“1877年，我们得到50万票；1881年，由于残酷的反社会党人法，我们只得到30万票；1884年，我们得到55万票；1890年，我们得到1 427 000票。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得到200万票以上。”

“您怎样解释这一异常迅速的增长呢？”

“主要是经济原因。1860年以后，在我们德国，正如1760年和1810年之间在你们英国一样，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工业革命及与之俱来的一切不良现象。你们的工业家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其次，目前的商业危机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比对你们那个年老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更糟。因此，在我们这里，对工人的压制也就更厉害。当我說‘工人’的时候，我是指所有各阶级的劳动者。受大商行排挤的小商人、营业所职员、手工业者、城市工人和

^① “现代人”。——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农业工人都开始感觉到我們現在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压迫。我們向他們提供同这种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方法，既然他們大家都会閱讀和独立思考，他們就非常迅速地作出必要的結論并加入我們的队伍。我們的組織是完美无瑕的，它使我們的敌人感到欽佩而又絕望。它之所以成为完美无瑕的，那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很像你們的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此外，我們的軍事素养和紀律也有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們的竞选宣言和文件在一刻钟內就送到所有 24 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局甚至請求我們帮助他們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

“那末，您希望很快看到您那么想看見的执政的社会党政府嗎？”

“为什么不想呢？如果我們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們在 1900 年和 1910 年之間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我們無論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材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而你們到那个时候，恐怕将有那么一个政府，在那里悉尼·維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打算感染自由党。我們不相信能感染资产階級政党。我們在感染人民。”

載于 1893 年 7 月 1 日
“每日紀事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每日紀事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 1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0年2月20日帝国国会普选第一次投票中取得巨大胜利的直接影响下写的。第一次投票的结果，党得到了1 427 323张选票并在帝国国会里得到20个(根据最初的报道是21个)席位。3月1日举行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也是成功的第二次投票(在那些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得到绝对多数的选区进行重新投票)，恩格斯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才知道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两次投票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总共得到1 427 298张选票，并且在帝国国会中得到35个席位。

这篇文章不署名发表在1890年3月3日“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栏，同时加有这样的编者按语：“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德国社会党一位最有威望的成员寄来的。作者由于自己同该党有多年的联系，由于同卡尔·马克思和所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因而他有充分的权利来解释他们的观点，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有权利来解释。”

这篇文章在“新堡每日纪事报”上发表后，又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章”为题发表在1890年4月6日的“柏林人民报”上。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德译文时，编辑部把恩格斯的个别词句改得温和一些，并且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样做是考虑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所造成的条件。

“新堡每日纪事报”(«*Newcastle Daily Chronicle*»)是一家英国日报，从1858年(从1862年起用这个名称)至1922年出版。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是于1884年创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日报。根据在哈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

- 西被任为主編。恩格斯为該报撰稿并糾正該报編輯部的錯誤和动搖，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編輯部落入党的右翼手中。——第3頁。
- 2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在德国于1878年10月21日頒布，直到1890年10月1日，在大規模的工人运动压力之下被废除。——第3頁。
- 3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 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間，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在1879年至1880年間該报的編輯是格·福尔馬尔，从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爱·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該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該报編輯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綫，批評并糾正它的个别錯誤和动搖。——第3頁。
- 4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魯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滿足资产阶级的經濟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爭取政治統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統一于普魯士的領導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統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魯士議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議員的席位設在會議大厅的中央）的統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間立場，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間随风轉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侶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們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魯士的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場上，同时又投票贊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

478—479 頁) 和“今后怎样呢?” (見本卷第 7—11 頁) 兩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詳細的評价。

保守党 是普魯士容克地主、軍閥、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侶的政党。它是从 1848 年普魯士国民議會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的政策充滿好战的沙文主义和軍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它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魯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 1866 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 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 4 頁。

- 5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二世在 1890 年 2 月 4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頒布的两道詔令，它們被作为政府的竞选綱領。

在第一道給帝国首相的詔令中，皇帝命令他向欧洲許多国家的政府建議召开国际會議，討論有关制定統一的劳工保护法的問題。1890 年 3 月在柏林的确召开了这样的會議。参加會議的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會議通过了一系列決議：关于禁止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劳动的決議，关于縮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作日的決議等等。但是这些決議对于参加會議的国家并没有約束力。

在第二道給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詔令中，皇帝提出要修改現行的劳工保护法，說什么修改的目的是要改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的状况。

这两道詔令的頒布证明俾斯麦主要靠懲罰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的办法遭到了失败，并且說明德国統治階級企图通过加强社会蠱惑宣传和更灵活地运用傳統的“鞭子和糖餅”政策来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第 4 頁。

- 6 “今后怎样呢?”一文和“德国 1890 年的选举”一文一样，都是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写的，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是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举行的(見注 1)。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紧接着又轉載在 1890 年 3 月 14 日“工人报”第 11 号上。文章的最后一段以短評

的形式加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目前形勢”的標題轉載在1890年3月13日“柏林人民報”第61號上。

“工人報”(《*Arbeiter-Zeitung*》)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從1889年至1893年在維也納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兩次，從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該報的編輯是維·阿德勒。在九十年代弗·恩格斯的許多文章發表在這家報紙上。為該報撰稿的有奧·倍倍爾、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工人運動的其他活動家。——第7頁。

7 卡特勒 是兩個保守政黨(“保守黨”和“自由保守黨”)和民族自由黨在1887年1月俾斯麥解散帝國國會以後結成的聯盟，它支持俾斯麥政府。卡特勒在1887年2月的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在帝國國會中占了優勢(220個席位)。俾斯麥倚仗這個聯盟，施行了一系列對容克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有利的反動法律(制定了保護關稅稅率，增加了許多種稅收等等)。但是他沒有能夠在1890年延長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生效期限。加入卡特勒的各黨之間矛盾的尖銳化以及在1890年選舉中的失敗(一共得到132個席位)導致了卡特勒的瓦解。——第7頁。

8 指德國自由思想黨，該黨是1884年進步黨同民族自由黨左翼合併成立的。它的領導者之一是帝國國會的議員李希特爾；它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俾斯麥的政府。——第8頁。

9 韋耳夫派 是1866年漢諾威併入普魯士以後形成的一个漢諾威派(其名稱來自古代漢諾威大公韋耳夫家族)。這一派的目的是恢復漢諾威王室的權力和漢諾威在德意志帝國中的自治權。它追隨中央黨主要是出於分立主義的和反普魯士的動機。

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一些不大的民族黨團，其中包括亞爾薩斯派和波蘭派，代表德意志帝國中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不滿意政府所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帝國國會中它們支持大的反對黨，有時同中央黨結成聯盟。——第9頁。

10 恩格斯諷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俾斯麥政府在為世俗文化而鬥爭(因此資產階級自由派稱之為“文化鬥爭”)的幌子下實行的一些措施的最終

結果，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分立主义倾向和反普魯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同天主教会冲突开始时，俾斯麦于1872年5月在帝国国会上宣称：“我們决不去卡諾薩”，然而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同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扩大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因此几乎废除了冲突时所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令，并且迫使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俾斯麦在1878年到1887年間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是毫无結果。

“去卡諾薩”一詞的来源是：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諾薩城堡（意大利北部）去做了一次不体面的朝圣。——第9頁。

- 1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形势尖锐化和世界战争的危險增长的情况下写成的；这种局面是由两个軍事政治集团——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法俄同盟——的形成引起的；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法俄同盟已处于最后形成的阶段。这是文章尖锐地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首要原因。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他在报刊上和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书信中揭露欧洲列强的軍国主义、軍备竞赛和掠夺政策的言論的繼續。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維·查苏利奇（通过謝·克拉夫欽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以当时准备在伦敦出版的俄国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編輯部的名义約請恩格斯为该杂志撰稿。恩格斯为回答这一請求，給編輯部寄去了自己的文章，以使用俄文发表（由德文譯成俄文），同时决定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其他社会主义报刊上。

本文的第一章最初刊登在1890年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上（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的标题发表）。本文的其余两章載于1890年8月才出版的该杂志的第2册。在这一时期，前两章用原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4月号上，但是在发表时杂志編輯部未經恩格斯的同意对文章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緩和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魯士的統治集团、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等所作的評論。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大約在1890年4月1日），并将譯文和德

文本作了比較之后才得知“新时代”編輯部所作的这种修改。恩格斯在1890年4月1日給杂志的編輯考茨基和出版人狄茨的信中，表示坚决抗議对他的文章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并且要求根据原稿再次刊登前两章。这两章不加修改地和第三章一起发表在杂志的5月号上，同时編輯部还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新时代’4月号在刊載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由于理解不正确有一些脱离原文、严重影响文章性质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原样再次发表全文，而不是列出修改的个别地方，想必我們的讀者将会感謝我們。現在将它完整地发表在这一期上。”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著作完成的日期——“1890年2月底于伦敦”。

文章用英文載于“时代”杂志1890年4月号和5月号。恩格斯在給这家英文杂志准备文章的譯文的时候，对文章作了許多修改和补充。給“时代”杂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譯文，从其中所作的某些修改的內容来判断，是恩格斯在1890年2月以后，可能是在当年3月翻譯的。

在恩格斯生前，他的这一著作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1893年用波兰文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它还发表于1890年的羅馬尼亚杂志“現代人”第7期、1890年的法国杂志“新思想”（《Idée nouvelle》）（前两章）以及1891年2月21日—3月3日的保加利亚杂志“巴尔干曙光”（《Балканска зора》）。

文章最后闡述欧洲形势的部分，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下面两家报纸上：1890年7月13日“北方守卫者”（《Nord-Wacht》）第28号和1890年7月1日“选民报”（《Wähler》）第113号。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ь-демократ》）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維·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諾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了編輯工作。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編輯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庫諾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她的許多文章，并經常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編輯部，时常对杂志上背离馬克思主义的地方提出批評。从九

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載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时代”(《*Time*》)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13頁。

- 12 恩格斯指俄国1874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一事。根据自187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所有从二十一岁起至四十三岁止的男性居民,除中亚細亚、哈薩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民族地区的人以外,都必須在正規軍、后备部队或民团中服兵役。征召服役采用抽签的办法进行。这种制度旨在把俄国的軍队变为一支资产阶級类型的居民普遍服役的軍队。但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貴族制度的条件下,等級特权、仅仅給予有产阶級的許多优待、各居民阶层的服役条件不平等以及其他等等,都妨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原則的实现。——第19頁。
- 13 指反拿破侖法国的欧洲各国第六次(1813—1814)和第七次(1815)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在1813—1814年的战争中俄国軍队在联軍(俄国、奥地利、普魯士以及其他国家)中占三分之一以上,他們在从拿破侖的統治下解放德国,以及在歼灭法国領土上的拿破侖軍队从而导致第一帝国的崩潰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第19頁。
- 14 弗·恩格斯借用这个反映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統治集团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則的名詞來說明十八世紀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各大国的統治阶級普遍地利用这个所謂的“民族原則”来从思想上掩盖它們的侵略計劃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民族原則”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民族原則”的揭露,見卡·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頁)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級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頁)。——第21頁。

- 15 指十三世紀初建立的封建国家立陶宛大公国。从十三世紀中叶至十五世紀初，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領土淪于立陶宛諸王公的統治下。立陶宛的封建主利用它們由于韃靼蒙古人的入侵，由于封建割据和內訌而被削弱的机会，利用人民想联合起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愿望，占領了这些地方。

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嘗試是在 1385 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簽訂了所謂克列沃合并条約，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頓騎士团的侵略。合并条約規定立陶宛大公国并入波兰，并在立陶宛强制推行天主教。在十五世紀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漸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 年簽訂了卢布林合并条約，根据这个条約波兰和立陶宛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貴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第 21 頁。

- 16 东方礼天主教徒 是对属于正教教会和羅馬天主教教会合并成的所謂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徒的称呼。合并是按照波兰封建主和天主教僧侶（首先是耶穌会教徒）在 1596 年布列斯特宗教會議上提出的要求而宣告的。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約，波兰貴族共和国的正教居民应承认羅馬教皇为自己的首領和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条，虽然还保持正教教会的表面仪式。合并是波兰的大地主和貴族巩固他們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統治的一种手段。它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高級僧侶和封建上层人物的支持，却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为反对合并而斗争成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第 21 頁。

- 17 *Liberum veto*（字面意思是：“禁止的自由”）是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封建貴族的波兰所实行的国会决定任何問題必須一致通过的原則。根据这一原則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議員都能阻止議案的通过，尽管所有其他的議員都贊成这一議案。这个原則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貴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貴族“宪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結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 1648 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約，指的是两个和約：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諸侯和瑞典在鄂斯納布魯克

- 簽訂的和約,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閱斯德簽訂的和約(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里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和德意志諸侯的互相勾結,根据和約的条款,德国被割去一大片領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呂根島、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領地割让給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亚尔薩斯的过去的領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領土的权利的确认。一些德意志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領地。威斯特伐里亚和約加强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德意志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間締結同盟以及和外国締結同盟的权利。——第 22 頁。
- 18 古·居利希“关于現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第201—206頁(G.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2, S. 201—206, Jena, 1830)。——第 22 頁。
- 19 指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論家們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早在1797年,在西方就出現了有所謂“彼得大帝遺囑”的傳說;1812年,累居尔的“論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紀初叶的发展”(Lésur. «Des progrès de la puissance russ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 Paris. 1812)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遺囑的内容;1836,盖亚尔德的“勛章获得者德奧的回忆录”(Gail-lardet. «Mémoires du chevalier d'Éon»)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十九世紀西欧普遍都相信,这份“遺囑”或者真正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者是根据他的后裔的委托編写的。——第 22 頁。
- 20 卡·考茨基“托馬斯·莫尔及其烏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 Kautsky. «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 Mit einer historischen Einleitung». Stuttgart, 1888)。——第 24 頁。
- 21 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間的战争:一方是英

普, 另一方是法俄奧。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奧俄法)之間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除海战而外, 各交战国之間的軍事行动在欧洲以及它們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進行。1756—1757年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隊曾多次战胜奧軍和法軍, 但是, 俄国軍隊于1757—1760年在普魯士取得的胜利, 使普魯士的胜利果实化为烏有, 普魯士瀕于失敗。由于女皇伊麗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去世, 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魯士簽訂了和約, 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針突然改变, 使普魯士得以同奧地利結束了战争。七年战争以締結巴黎和約和胡貝尔茨堡和約告終。根据巴黎条約, 法国被迫将自己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領地等)割让給英国, 从而加强了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威力。胡貝尔茨堡和約恢复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战前疆界。——第25頁。

- 22** 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的彼得堡条約是俄国和普魯士簽訂的防御同盟条約, 有效期为八年, 代表俄国签字的是尼·伊·帕宁和副总理大臣亚·米·哥利岑, 代表普魯士签字的是普魯士駐彼得堡大使索尔姆斯。締約双方彼此保证領土不受侵犯, 一方受到进攻时他方給予軍事和財政援助, 以及保障彼此的貿易利益。在条約的秘密条款中俄国和普魯士承担了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的义务。一項專門的秘密条款規定, 普魯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条約反映了俄国和普魯士企图阻止奧地利和法国在波兰的势力的增长。——第25頁。
- 23** 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貴族共和国是在1772年進行的。根据1772年8月5日(7月25日)在彼得堡簽訂的瓜分协定, 奧地利和普魯士攫取了一部分烏克蘭西部的和波兰本土的領土: 奧地利分得了加里西亚, 普魯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濱海区、庫雅維亞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第25頁。
- 24** 所謂的“正統主义原則”(来自拉丁字«legitimus», 即“合法的”)是法国代表达米朗在維也納會議(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則的

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第 26 页。

- 25 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1778—1779)；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德意志各邦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帝侯逝世后无直接继承人，都企图得到巴伐利亚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 1779 年 5 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森缔结帖欣和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给与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帖欣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 (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起，至 1763 年的胡贝尔茨堡条约止)。俄国最初是以交战双方的调停人的姿态出现，后来在条约的一项专门的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预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第 26 页。

- 26 恩格斯指 1768—1774 年和 1787—1792 年俄国对土耳其进行的获得胜利的战争。——第 27 页。

- 27 在叶卡特林娜二世 1780 年 3 月 11 日 (2 月 28 日) 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篇宣言的矛头针对英国，当时英国正在进行镇压北美洲的起义的殖民地的战争 (1775—1783)；宣言成了俄国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一项协定的基础。在 1780—1783 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

武装中立的这些原则后来成了 1856 年 4 月 16 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所签订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基础。宣言附于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的参加国在 1856 年 3 月 30 日所签订的巴黎和约上。——第 27 页。

- 28 指 1793 年和 1795 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两次瓜分是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它们成了

鎮壓波蘭民族運動的手段。第二次瓜分波蘭時白俄羅斯的一部分地方和德涅泊河西岸烏克蘭地區劃歸了俄國；普魯士攫取了格但斯克、托倫和大波蘭區的一部分；奧地利未參加第二次瓜分。

第三次瓜分波蘭時立陶宛、庫爾蘭、白俄羅斯的西部地區和沃倫的一部分劃歸了俄國。奧地利攫取了包括盧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內的小波蘭區的一部分。包括華沙在內的波蘭的本土的大部分為普魯士所攫取。在第三次瓜分以後，波蘭貴族共和國已不再作為獨立國家而存在。——第 28 頁。

- 29 指歐洲各封建專制國家反對革命的法國的同盟。貴族資產階級的英國也積極參加了反革命同盟的建立。1792 年 2 月，在英國和沙皇俄國的支持下，開始對法國進行干涉的普魯士和奧地利締結了軍事同盟。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法國宣布共和和 1793 年 1 月處死路易十六之後，英國、荷蘭、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國與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於 1793 年公開地參加了反法同盟。法國和這一次（第一次）同盟的參加國的戰爭一直進行到 1797 年。——第 28 頁。
- 30 1783 年夏天根據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提議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芬蘭）舉行了他和葉卡特林娜二世的會見。古斯塔夫到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去的目的，是要探明葉卡特林娜二世對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圖，以及她對瑞典兼併挪威的計劃的態度。葉卡特林娜二世由於俄國準備對土耳其作戰，當時從自己方面也力圖密切和瑞典的關係。——第 28 頁。
- 31 呂內維爾和約 是在歐洲各國第二次反法同盟失敗之後奧地利與法國於 1801 年 2 月 9 日簽訂的。和約規定奧地利把在德國和意大利的一大部分領土割讓給法國，並且承認在荷蘭、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依附於法國的共和國。——第 29 頁。
- 32 根據 1803 年 2 月 25 日的 帝國代表會議決議（帝國代表會議是 1801 年 10 月經帝國議會選出的、由德意志帝國各邦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德國西部的許多小邦被取消。這些邦的領土合併於德國的較大的邦，作為對於根據呂內維爾條約割讓給法國的萊茵河左岸領土的賠償。結果

有总人口为 300 万的 112 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領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們的領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侖法国的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和巴登以及普魯士。帝国代表會議決議只不过是正式确认了 1801 年 10 月法国和俄国簽訂的秘密协定(規定根据拿破侖法国的利益解决德国萊茵河沿岸的領土問題)的条款。——第 30 頁。

- 33 1805 年 12 月 2 日(11 月 20 日)俄奧联軍和法軍进行的 奧斯特利茨(莫拉維亚)战役以拿破侖第一取得胜利告終。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了第三次同盟,和拿破侖簽訂了普勒斯堡和約。俄国和英国繼續进行斗争,在 1806 年組織了反拿破侖法国的新的第四次同盟。

萊茵联邦 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侖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潰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侖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軍事政治堡垒。萊茵联邦組成后,德意志民族的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最初有 16 个邦(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 5 个邦(薩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們实际上成了拿破侖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軍队参加了拿破侖的侵略,包括 1812 年的入侵俄国。由于拿破侖軍队战败,萊茵联邦在 1813 年瓦解。——第 31 頁。

- 34 这里列举了反对拿破侖法国的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于 1806 年 7 月同俄国簽訂了反对拿破侖的秘密同盟的普魯士、以及瑞典)战争中 1806—1807 年的一系列战役:

耶拿(紹林吉亚)战役是普魯士軍队和法国軍队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进行的,結果普軍被击潰。

在 1807 年 2 月 7—8 日(1 月 26—27 日)法国軍队和俄国軍队进行的 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魯士)战役中,拿破侖尽管牺牲大量的法軍也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1807 年 6 月 14 日(2 日)法国軍队和俄国軍队进行的 弗里德兰德(东普魯士)战役,以拿破侖軍队获胜而結束。

提尔西特和約 是拿破侖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魯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簽訂的和約。和約条件对普魯士极为苛刻,使普魯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

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任何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魯士割让給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后来,在1809年战争中拿破侖战胜奥地利以后,加里西亚东部的塔尔諾波尔地区也并入了俄国)。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須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領的地方和拿破侖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鎖(即所謂大陆封鎖)。俄国和拿破侖法国締結了针对英国的攻守同盟。作为报答,拿破侖答应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有行动自由。——第31頁。

35 指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間巴克萊-德-托利率領俄軍于1809年冬橫越波的尼亚湾的进军。俄軍踏上瑞典領土加速了瑞典貴族反对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阴謀的實現,这次阴謀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維護貴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古斯塔夫四世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簽訂了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約,将芬兰让給俄国。——第31頁。

36 1812年8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儲卡尔-約翰(貝尔納多特)在亚波(土尔庫)举行了会見。会見的結果是,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8月30日(18日)簽署了一項协定,两国实际上結成了反对拿破侖法国的軍事同盟。协定还規定在丹麦拒絕将挪威让与瑞典国王时,俄国有給予瑞典軍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的义务。瑞典方面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領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侖統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領土要求。——第31頁。

37 指拿破侖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5日)—10月14日(2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見。拿破侖对他的各个属国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同时,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希望在同奥地利交战时取得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同时他也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領土要求。虽然談判結果簽署了秘密协定,形式上規定了恢复1807年在提尔西特締結的法俄同盟,但是亚历山大在拿破侖和奥地利作战时并未积极支持

拿破侖。在 1809 年法奧戰爭期間俄国只限于占領了加里西亞，而沒有對奧地利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第 31 頁。

- 38** 俄土戰爭從 1806 年開始，一直進行到 1812 年（1807—1809 年曾中斷）。這次戰爭是由於拿破侖外交的陰謀詭計促使俄土關係尖銳化的結果。在戰爭中俄軍在歐洲戰場和高加索戰場曾多次給土軍以重創。戰爭以 1812 年 5 月 28 日（16 日）簽訂布加勒斯特和約而告終。根據條約，俄國獲得了直到普魯特河的貝薩拉比亞和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權，以及南高加索的一些地區。條約肯定了俄土過去達成的關於承認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享有一系列自治權的協議。

俄國在戰爭中的勝利客觀上幫助了巴爾干半島上的各民族擺脫土耳其的統治。俄軍在巴爾干的著有成效的行動是對 1804—1813 年塞爾維亞人民起義的重大支援，這次起義是許多世紀以來塞爾維亞人民反對土耳其封建主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塞爾維亞人在起義中趕走了土耳其侵略者，在 1805—1811 年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組織。根據 1812 年布加勒斯特條約，土耳其應允許塞爾維亞內政自治。但是，土耳其蘇丹利用拿破侖軍隊入侵俄國的機會，破壞條約，於 1813 年對塞爾維亞進行了征討，在那里一度恢復自己的統治。由於塞爾維亞人於 1815 年又勝利地舉行了起義，加上俄國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的枷鎖被粉碎了，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戰爭後，土耳其不得不通過 1830 年的蘇丹特別敕令承認塞爾維亞的自治（實際上的獨立）。——第 31 頁。

- 39** 大陸體系 即 1806 年拿破侖宣布的大陸封鎖政策，這個政策禁止歐洲大陸各國同英國進行貿易。1807 年的提爾西特條約決定了俄國加入大陸體系。——第 32 頁。

- 40**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4—7 日）的萊比錫會戰是參加歐洲各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聯軍同拿破侖法國軍隊的決戰。聯軍在這次會戰（史稱“民族之戰”）中的勝利決定了同盟國在戰爭中的最後勝利，導致了萊茵聯邦的瓦解和德國擺脫拿破侖的統治。——第 33 頁。

41 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約——見注38。

根据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所举行的維也納會議（这次會議在拿破侖法国被击败后在1814—1815年断断续續地举行）的决定，为了复辟各正統王朝，欧洲地图被违反着各国人民的国家統一和独立的利益加以重划。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所瓜分。在瓜分时，拿破侖第一在1807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約所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一大部分划归俄国，称作波兰王国。——第33頁。

42 會議桌上的波兰 是对根据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領土的称呼。——第34頁。

43 神圣同盟 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为了鎮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維護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35頁。

44 恩格斯指的是1821年春天发生的、并且很快具有群众性的希腊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議會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用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于是呼吁他的附庸、埃及的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給予援助；1825年穆罕默德-阿利的軍隊侵入了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野蛮地迫害希腊居民。在起义的初期，参加神圣同盟的几个大国，包括沙皇俄国在內，对起义都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鉴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利用这一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島南部的影响的可能性，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給予它軍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按照欧洲几个大国的統治集团的决定，希腊人民在1832年被强加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第36頁。

45 指在西班牙（1820—1823）、那不勒斯王国（1820—1821）和皮蒙特（1821）发生的資產階級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由于神圣同盟的干涉（它派遣法国軍隊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軍隊到意大利）都被鎮压

- 下去。——第 36 頁。
- 46 这里列举的神圣同盟的几次會議系 1818 年在 亚琛、1820 年在 特劳波(奥帕瓦)、1821 年在 莱巴赫(柳布梁納)和 1822 年在 維罗那 召开。所有这些會議的決定都是旨在鎮压欧洲各国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37 頁。
- 47 这段話看来恩格斯是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經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 年巴黎版第 52—53 頁(«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Paris, 1854, p. 52—53)。——第 38 頁。
- 48 納瓦林会战(納瓦林現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 1827 年 10 月 20 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軍上将爱·科德林頓指揮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調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間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領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絕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軍覆沒，并加速了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第 39 頁。
- 49 毛奇“1828 年和 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版第 390 頁(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 S. 390)。——第 39 頁。
- 50 指阿德里安堡和約；这个和約是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 1829 年 9 月締結的。根据条約，多瑙河口及附近諸島嶼，以及庫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认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賦予它們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納年貢)，遵守以前就塞尔維亚的自治問題所締結的一切条約，并用特別敕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 39 頁。

- 51 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第40頁。
- 52 指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17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結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撓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1831年2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結局是：波兰政府于1831年9月8日(8月26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第40頁。
- 53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締結的条約。在条約簽訂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魯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凱萊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調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締結了和約，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給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經过去，但沙皇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軍駐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締結防御同盟，并且在使这个同盟固定下来的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土耳其必須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軍艦通过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約和其他的俄土協議。条約的有效期定为八年。——第40頁。
- 54 指由于新的土埃战争(1839—1841)和英法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加剧而引起的东方問題的尖銳化。英国唯恐站在苏丹方面的俄国片面地干預冲突，坚持西欧列强集体向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魯士、奥地利和土耳其背着法国在伦敦簽訂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协定。当时出现了法国和欧洲几个大国同盟之間的战争的危險，但是法国没有下决心进行这

- 場战争，停止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軍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領地，并且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第 40 頁。
- 55 《*Règlement organique*》（“組織規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軍占領）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謝廖夫于 1831 年实施的。根据組織規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議會，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侶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終身国君。規程巩固了大貴族和上层僧侶的統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許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組織規程还規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壁垒，实行貿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馬克思对組織規程的評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249—250 頁）。——第 40 頁。
- 56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 年伦敦版），这个版本的章节的分法和德文版不同。——第 40 頁。
- 57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烏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簡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 1835—1837 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評論”（《*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 1843—1845 年出版的。——第 41 頁。
- 58 指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掀起了争取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的广大运动。革命遭到了国内反动势力、苏丹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联合鎮压。——第 41 頁。
- 59 普魯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为了調整两国的关系，曾在尼古拉一世的調停下于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談判。奥地利和普魯士爭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后尖锐化了。奥地利力图恢复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已实际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魯士希望建立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

領導地位。尼古拉一世皇帝不願意普魯士強大起來，企圖保持德國的封建割據狀態，他在華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爭吵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並表示堅決支持奧地利。——第 42 頁。

- 60 恩格斯指的是俄國、奧地利、英國、法國、普魯士、瑞典和丹麥的代表一起在 1852 年 5 月 8 日簽訂的關於保證丹麥君主國完整的倫敦條約。這個文件的基礎是上述幾個國家的代表於 1850 年 7 月 4 日在倫敦簽訂的議定書。議定書確定了丹麥國王的領地包括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公國在內不得分割的原則，從而為這兩個公國的德國居民想脫離丹麥，與德國合併的企圖製造了障礙。1852 年條約雖然承認了兩公國有自治權，但是仍然保留了丹麥國王對它們的最高權力。格呂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被指定為無嗣的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繼承人（後為國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第 42 頁。
- 61 指以法國、英國、奧地利、撒丁、普魯士、土耳其為一方，俄國為另一方的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戰爭結束時在 1856 年 3 月 30 日簽訂的巴黎和約。在戰爭中失敗的俄國不得不割讓多瑙河河口和貝薩拉比亞南部的一部分地方，放棄對多瑙河各公國和土耳其的信基督教的臣民的保護，同意意味著禁止外國軍艦通過海峽和禁止俄國、土耳其在黑海設置海軍軍需庫和駐紮艦隊的黑海中立化；俄國將卡爾斯歸還土耳其，以交換聯軍在克里木占領的塞瓦斯托波爾和其他城市。英國和奧地利在巴黎會議談判期間未能完全實現它們對俄國的侵略意圖。塞瓦斯托波爾的英勇保衛戰，土耳其軍隊在高加索戰區的失敗，聯軍在波羅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國外交對英法矛盾的巧妙利用都對談判的結果產生了影響。——第 44 頁。
- 62 這是亞·米·哥爾查科夫 1856 年 8 月 21 日給俄國駐國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話。他在 1856 年就任外交大臣時在這個通告中規定了俄國外交政策的方針。——第 45 頁。
- 63 恩格斯指附於巴黎和約的“海上國際法原則宣言”（見注 27）。

由於波拿巴法國和沙皇俄國在巴黎會議上的接近，兩國在拿破侖第三的倡議下於 1859 年 3 月 3 日締結了法俄秘密協定。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答應拿破侖第三在他準備從軍事上粉碎奧地利方面給予外交上

的援助，而一旦战争发生即将俄軍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軍隊。同时拿破侖根据协定的精神，繼續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島的政策。——第 46 頁。

- 64 1859 年，拿破侖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国和皮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領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朱·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侖第三的真正意图，馬克思在他的“馬志尼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06—412 頁)一文中詳細地摘引了这篇宣言。

意大利的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現在皮蒙特的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的意大利統一。奧軍在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失敗以后，拿破侖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进意大利的統一，于 1859 年 7 月 11 日同奥地利单独締結了維拉弗兰卡初步和約。战争結果，法国获得薩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蒙特。

但是违反着皮蒙特执政的上层人物的王朝政策和法国波拿巴分子的阴谋詭計，1860 年在意大利掀起了爭取国家統一的大規模的民族解放斗争。由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軍的英勇战斗，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南意大利和皮蒙特合組为統一的意大利王国。威尼斯省則直到 1866 年仍然处在奥地利人的統治下。意大利的最后統一到 1870 年意大利軍隊攻占了羅馬和教皇国后才告完成。——第 46 頁。

- 65 俾斯麦的普魯士政府在 1863—1864 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期間，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魯士所侵占的波兰領土，并且希望事先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魯士的領導下統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軍事援助以鎮压起义。1863 年 2 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議締結了俄国和普魯士的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 46 頁。
- 66 1864 年由于奥普同丹麦之間的战争(最后丹麦战敗)的結果，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魯士共管，1866 年普奧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魯士。——第 46 頁。
- 67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5—294 頁)。——第 47 頁。
- 68 由于法国在 1870—1871 年的普法戰爭中失敗，根据 1871 年 2 月 26 日在凡尔賽締結的初步和約，法国将亚尔薩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給 1871 年 1 月 18 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 年 5 月 1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簽訂的和約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約的条款。——第 48 頁。
- 69 圣斯蒂凡諾 初步和約是 1877—1878 年俄土戰爭結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 1878 年 3 月 3 日(2 月 19 日)在圣斯蒂凡諾(君士坦丁堡附近)簽訂的。这个条約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軍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条約交給 18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會議审查。出席这次国际會議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顛、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會議的結果，簽訂了柏林条約。根据柏林条約，圣斯蒂凡諾和約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島的斯拉夫民族了。圣斯蒂凡諾和約規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領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魯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轄；門的内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約承认圣斯蒂凡諾和約的規定，把 1856 年从俄国夺去的貝薩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的占領。在會議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會議的決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戰爭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地。——第 48 頁。
- 70 恩格斯指保加利亚領土上的四边形的要塞区：錫利斯特里亚、魯舒克、苏姆拉和瓦尔那。在 1877—1878 年俄土戰爭初期土耳其軍隊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第 48 頁。
- 71 1857—1859 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統治的大規模的人民起义。起义在 1857 年春天在所謂孟加拉軍西帕依部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組成)中爆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最大的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从事手工业的貧民。由当地封建主領導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別，以及殖民者在軍事技术上占优势而遭到了失敗。——第 50 頁。

- 72 奥連堡軍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將軍曾率領远征軍,于1839年11月开始侵略希瓦汗国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輜重的5000人的軍隊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没有准备。由于士兵大量患病,人員折損一半,彼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1840年返回奥連堡。——第50頁。
- 73 恩格斯指和布朗热將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6—1889年的法国沙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資产階級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滿,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实行君主复辟。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支持者的蠱惑性的复仇主义的口号。——第51頁。
- 74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間俄国和羅馬尼亚的联軍于1877年12月10日(11月28日)經過与土耳其軍隊的激战后攻占了普勒夫那(現名普累文,保加利亚北部一城市)。——第51頁。
- 75 1867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萊达河被确定为該国两部分的分界綫。一部分称息斯萊达尼亚,包括奥地利、捷克、莫拉維亚、西里西亚、施梯里亚、克伦地亚、提罗尔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斯萊达尼亚,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第51頁。
- 76 指美国記者乔治·謙楠的一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文章是他在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的,发表在1888—1890年在紐約出版的“現代插图月刊”(«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上。——第51頁。
- 77 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俄国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自治机关一事。而从1866年起,沙皇政府已經又开始有計劃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这种排挤在八十年代殘酷鎮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特別加强起来。——第53頁。
- 78 毛奇在1874年2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說(这里指的就是这篇演說)中,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到处都获得了尊敬,可是爱戴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得到”。——第54頁。

79 这封信是恩格斯給奥地利一个銀行職員埃伦夫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在1890年3月21日給恩格斯的信里說，在他所在的維也納銀行和信用机关官員俱乐部的成員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維也納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資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給埃伦夫罗伊恩德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反犹太主义”为題发表在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上。发表时附有編輯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們刊載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时沒有指出。

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轉載于1890年5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Das Recht auf Arbeit»)1890年5月28日第315号。——第58頁。

80 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年8—9月裁縫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年11月面包师的罢工和1890年3—4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業主滿足工人的要求而結束。裁縫、毛皮制品工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規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業主同意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60頁。

81 “凉亭”(«Die Gartenlaube»)是德国一家小資产階級文学插图周刊，1853年起在萊比錫出版。——第60頁。

82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經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的(“宣言”正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德文第四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于1890年5月在伦敦出版，这一版中也收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頁)以及恩格斯为“宣言”1883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2頁)。1890年8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在題为“‘共产主义宣言’的新版”的社論中摘載了恩格斯的这篇新的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論中也摘載了这篇序言。“共产党宣言”第四版是最后一个經作者同意的版本。“宣言”的以后各版通常是翻印这一版本。——第61頁。

83 恩格斯指他写的“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2頁)。——第61頁。

84 恩格斯在“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一文跋里(見本卷第503頁)曾說这个譯本是由普列汉諾夫翻譯的;普列汉諾夫自己在“宣言”1900年版本上也指明这个譯本是他譯出的。

恩格斯說已遺失的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宣言”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保存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里。本版发表的这篇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5—326頁)就是以原稿为基础的。本卷中恩格斯以从俄文反譯回德文的方式引用这篇序言的地方,都根据上述德文原稿校对过;恩格斯在根据俄文版翻譯时所作的一些細小的改动,都在正文和脚注中反映出来;由于俄文版不确切而造成的异文,已根据手稿改正。——第61頁。

85 “钟声”(«Колокол»)是一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办,1857年至1867年由赫尔岑創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該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以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譯本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1頁。

86 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害怕“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納。——第62頁。

87 K. Marx i Fr.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yczny 1847 r.» Genewa, 1883. ——第63頁。

88 K. Marx og F. Engels.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København, 1885. ——第63頁。

89 劳拉·拉法格翻譯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譯本发表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 «La France socialiste». Paris, 1886)把

它作为附录予以轉載。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于1885年在巴黎創办的。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从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到九十年代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63頁。

- 90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譯本发表在1886年7月至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了单行本:《*Manif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por C. Marx y F. Engels, Madrid, Administracion de 《*El Socialista*》, Hernán Cortés 8。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是一家周报,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85年起在馬德里出版。——第63頁。

- 91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1888, London, William Reeves, 185 Fleet St. E. C.

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62—369頁)在內容上有很多地方和“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相同。——第64頁。

- 92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頁)。——第64頁。

- 93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魯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的、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綱領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十一名成員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謀”。控告的证据是普魯士警探們假造的中央委员会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虛假证詞,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馬克思和恩格斯对

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見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頁）。——第64頁。

- 9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頁。——第64頁。
- 95 這句話恩格斯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1887年在該市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的报道，刊載于1887年9月17日“公益”报。——第67頁。
- 96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就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这个原理；它以这种表述方式包含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頁和第17卷第475頁）。——第68頁。
- 97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在1866年9月3—8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們分別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頁）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讀。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魯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們就議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綱領。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討論的大多数問題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軍）曾作为大会決議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于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以及他們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追隨者进行了頑强的斗争。机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表大会的領導地位，从而阻止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义和工人組

織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馬克思主义政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獄一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相对抗，他們也在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們之中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資格都純粹是假造的。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們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工人立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項要求的途徑。代表大会強調指出，必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組織，必須为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軍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決議是規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討論的一切問題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決議，打击了那些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68頁。

98 “伦敦的5月4日”一文，是恩格斯在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間，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組織根据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見注97）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利最有組織——根据代表大会的決議，在爭取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組織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們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1890年5月4日——举行的，他們的行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領袖們和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門，企图对示威进行領導，把示威活动置于妥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謂工人貴族的工人。絕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約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碼头的非熟练工人，他們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規定八小时

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保·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5月4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1890年5月29日“选民报”第85号刊登过。1890年5月31日“柏林人民报”第123号也发表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部分。——第69页。

- 99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者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70页。

- 100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71页。

- 101 指海德门在1887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

示威当中的行徑。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終，有几百人受伤（3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組織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門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71頁。

102 銀鎮罢工（銀鎮是东头的一个地方）——1889年9—12月，制造水底电纜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約有三千人。他們要求提高計时工資、計件工資、加班工資、节日工資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資。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組織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創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續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沒有給予支持，銀鎮工人遭到失敗。——第71頁。

103 恩格斯指的是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協議：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資，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會員等等。結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別是碼頭工人工会沒有給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1890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該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71頁。

104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組織，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組織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領導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門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爱·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湯·曼等人），与海德門的路綫相反，进行了爭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組織——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緒影响之下，联盟內部仍在繼續产生不滿机会主义領導的革命分子。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別，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魯斯、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別的領袖們反对革命的策略，他們宣布的原則是爭取“可能”（possible）爭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第72頁。

105 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

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第74页。

106 指恩格斯参加过的1849年5月至7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75页。

107 恩格斯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因为由反对派“青年派”的代表组成的该报编辑部企图宣布恩格斯支持它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路线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使该报编辑部在1890年8月底被撤换，编辑部在告别文章中试图蛊惑地说明它的下台似乎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肆地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被激怒了的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青年派”。

这一篇答复“萨克森工人报”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写完，它以草稿的形式保留下来。恩格斯写完的那篇答复文章（见本卷第80—82页）曾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上；它在揭露“青年派”的立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篇答复文章还发表在1890年9月19日“工人报”第38号上。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主要领导者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

布·維勒等人。“青年派”忽視在廢除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後黨的活動條件所發生的變化，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和利用議會的讲坛，蠱惑地指責黨及其執行委員會維護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奉行機會主義、破壞黨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反對派的一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

“薩克森工人報”(«*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是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日報，九十年代初是反對派“青年派”的機關報；從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頓出版。——第77頁。

- 108 恩格斯指的是社會民主黨黨團就慶祝1890年五一節而寫給德國工人的呼聲書，呼聲書發表在1890年4月15日“柏林人民報”上。在呼聲書中黨的領導答復了反對派“青年派”提出的關於在5月1日舉行總罷工的要求。呼聲書指出，在反社會黨人法還有效的條件下，以及在1890年2月20日選舉後形成的情況下接受這樣的要求是危險的，因為當時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統治集團已經準備利用任何借口來消滅社會民主黨，它們很可能進行挑釁。呼聲書要求德國工人不要為這種挑釁提供借口，並且用和平的示威遊行來慶祝5月1日。

1890年5—7月在漢堡發生了建築工人的罷工，他們要求規定九小時工作日和提高工資。工人在不利的時機發動的罷工失敗了，但是企業主也被迫放棄自己關於工人不得參加工會組織的要求。——第78頁。

- 109 第一國際的倫敦代表會議是於1871年9月17—23日舉行的。這次代表會議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第一國際的成員遭到殘酷鎮壓的情況下召開的，與會者的範圍比較狹窄：參加會議工作的有22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10名有發言權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會議的國家則由通訊書記代表。馬克思在代表會議上代表德國，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會議總共開了九次會議，都具有秘密的工作會議性質。有關代表會議的報告不得公布，代表會議的決議於1871年11—12月公布。

倫敦代表會議標誌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重要階段。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決議論述了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認為這是國際工人運動

的基本原則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决定，这项決議的基本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會議的一系列決議中闡述了无产階級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會議是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階級党性原則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78 頁。

- 110 1884 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輪船公司的年度津貼，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內部产生了意見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內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机会主义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貝格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虛伪借口下投票贊成航运津貼。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決議，決議宣称关于津貼的問題是一个非原則性的問題，党团的每个成員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表决；決議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議員准备投票贊成航运津貼。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場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譴責，該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辯論的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領導者不只一次企图把辯論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并企图迫使該报停止对他們的立場进行批評。在尖锐批評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 1885 年 3 月帝国国会討論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政府对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議作为投票贊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絕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員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 78 頁。

- 111 滤出蠅虫，吞下駱駝，是从聖經中借用来的一句英国諺語；意思是注意細枝末节，忽視了主要的东西。——第 81 頁。
- 112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文是恩格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 1890 年 9 月 9 日来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該文中制定了馬克思主义者在筹备第二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方面的策略路綫。沙·博尼埃告

訴恩格斯，有一些事实证明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具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动摇，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势有可能轉到法国可能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方面的危险。还在筹备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巴黎代表大会，見注 97）期間立場就不坚定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既接受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委托（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委托他們与瑞士社会主义者共同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又接受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关于可能派代表大会，見注 97）的委托来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可能派利用了这种情况，就通过比利时人进行活动，再一次企图攫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动权。

恩格斯在 1890 年 9 月 15 日給拉法格的信中和 1890 年 9 月 27 日給左尔格的信中也都闡述了給博尼埃复信中的基本思想。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复信是給各个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恩格斯的指示帮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爭取到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布魯塞尔举行了 1891 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 83 頁。

- 113** 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 1890 年 9 月 1 日至 6 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約 460 人，代表着 140 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領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決議，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第 83 頁。

- 114** 指两篇抨击性文章：“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前者于 1889 年 3 月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单行本，同时用德文載于 1889 年 3 月 30 日和 4 月 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和第 14 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521—532 頁）；后者于 1889 年 6 月在伦敦用英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538—555 頁），其摘录載于 1889 年 6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在这两篇根据恩格斯的授意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伯恩施坦

- 执笔并經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領袖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动。——第 83 頁。
- 115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會議于 1889 年 2 月 28 日在海牙举行。这次會議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議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訂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請，但拒絕参加會議，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項決議。代表會議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議程（关于代表會議的決議的詳情，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527—529 頁）。——第 84 頁。
- 116 在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資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階級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們的領導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 1879 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銳的思想斗争，結果于 1882 年党分裂成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見注 104）。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工人党的名称。——第 85 頁。
- 117 丹麦“革命派”是团結在“工人报”（«Arbeideren»）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階級政党而进行斗争。他們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 1889 年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但是由于領導人的宗派主义錯誤，这个組織沒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第 85 頁。
- 118 “給‘社会民主党人报’讀者的告別信”是恩格斯为該报停刊而写的。恩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 1890 年 9 月 30 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emokratische Monatsschrift»）第 9 期上。1890 年 10 月这封信被譯成意大利文刊登在“正义报”（«Giustizia»）上。1890 年 10 月 3 日該信刊登在

“柏林人民报”第 230 号上，信的头两段被删掉。

恩格斯的这封信于 1913 年 9 月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第 9 期上。——第 88 頁。

- 119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維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也参加了編輯部。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的“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决定該报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重要問題所持立場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当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 年 5 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被驅逐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編輯遭迫害，使該报停刊。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 301 号。該报編輯們在致工人的告別书中宣布：“無論何时何地，他們將始終坚持工人階級的解放！”——第 89 頁。

- 120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 1880 年 8 月 20 日至 23 日在維登（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56 名代表。这是在 1878 年頒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間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綫战胜了右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傾向。

代表大会討論了以下問題：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議員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場，党的綱領和組織，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譴責了以莫斯特和哈賽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論，他們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議會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賽尔曼被开除出

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 1875 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用的“合法”这个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 89 页。

- 121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党团的多数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 110）的态度上持有不同意见而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 1885 年 4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4 号上。在这个声明中党团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批评它的活动，认为对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做的原则性批评是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做出的决议，坚决抗議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讦。党团的多数被迫让了步。1885 年 4 月 23 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第 90 页。
- 122 1888 年 9 月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驱逐出瑞士，于是报纸迁到伦敦，从 1888 年 10 月 1 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第 90 页。
- 123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日报，从 1890 年至 1933 年在马格德堡出版。——第 93 页。
- 124 指海·巴尔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该文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28 日“自由论坛”杂志第 17 期上，旨在反对该杂志（1890 年 5 月 14 日

第 15 期)发表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妇女問題和社会問題”。

“自由論壇”(《*Freie Bühne*》)是一家文学杂志,从 1890 年至 1893 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从 1892 年起每月出版一次。从 1894 年 1 月起該杂志用“新德意志評論”(《*Neue Deutsche Rundschau*》)的名称出版。——第 94 頁。

- 125 恩格斯所批評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发表在 1890 年 8 月 9 日“柏林人民論壇”报上。

“柏林人民論壇”(《*Berliner Volks-Tribün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 1887 年至 1892 年出版。——第 97 頁。

- 126 恩格斯在这里諷刺地套用“活泼快乐的战争”(《*ein frischer fröhlicher Krieg*》)一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德国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論家利奧首先使用这个詞,后来在沙文主义者和軍国主义者中間流行起来。——第 99 頁。

- 127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为祝賀他七十寿辰而寄給他的賀信的复信。該賀信由保·拉法格署名,发表在 1890 年 12 月 25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4 号上,其中說:

“亲爱的公民:

我們祝您——同馬克思一起作为很快就要达到目的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論家的人,保持着火热的心和年輕人的热情的人健康长寿,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样,能够看到无产階級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

恩格斯的信除載于“社会主义者报”外,还用德文載于 1890 年 12 月 30 日“柏林人民报”第 303 号。——第 101 頁。

- 128 恩格斯指圣西門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写的两部著作:“关于欧洲社会的改組,或关于欧洲各民族联合成一个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的政治統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c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和

“关于反对 1815 年同盟所应采取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头一本在 1814 年 10 月问世，后一本在 1815 年问世。——第 101 页。

- 129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 1890 年 11 月 26 日寄给他的贺信的复信，编辑部的贺信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同时邀请他参加定于 1890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恩格斯的贺信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除载于上述两家报纸外，还载于小册子“1890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纪录”1891 年布达佩斯版（«Protokoll des Parteitage der Sozialdemokratie Ungarns in Budapest vom 7. und 8. Dezember». Budapest, 1891）和 1890 年 12 月 14 日“柏林人民报”第 292 号。

“工人纪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3 年至 1890 年以此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从 1891 年 1 月起至 1894 年以前改名为“工人新闻”（«Arbeiterpresse»）。

“人民言论”（«Népszava»）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3 年在布达佩斯创刊，1890 年起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第 103 页。

- 130 1890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它构成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 121 人（布达佩斯 87 人，外省组织 34 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匈牙利工人运动情况、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加因斐纲领（见注 228）的主要论点为基础的原则宣言（党纲）。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匈牙利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 103 页。

- 131 恩格斯为发表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1—35 页）写了这篇序言。“哥达纲领批判”是科

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献，同时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調和斗争的典范，恩格斯发表它，是为了給德国社会民主党里活跃起来的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击，这在党即将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討論并通过新的綱領来代替哥达綱領的时候是特別重要的。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綱領批判”时，不得不克服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方面的某种反对。他在发表时所做的一些小删节以及将某些尖銳的詞句改成別的说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編輯卡·考茨基的立場所引起的。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編輯部对它不表欢迎。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預見的，無論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了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做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綱領性文献。

“哥达綱領批判”和恩格斯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沒有再版。根据路易莎·考茨基的手抄副本譯出的“哥达綱領批判”的全文，于1932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第19卷所載这篇著作，是第一次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搜集到的馬克思亲笔手稿譯出发表的。——第105頁。

132 在1875年5月22—27日哥达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別——由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內西領導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德国工人階級队伍中的分裂是克服了。但是，向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綱領草案（主要起草人是威·李卜克內西，他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場）有严重的錯誤，在原則上对拉薩尔派作了让步。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統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贊許，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薩尔派妥协，他們尖銳地批評了綱領草案的錯誤論点，可是該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第105頁。

133 1890年10月12—18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威·李卜克內西的提議，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綱領草案，提交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屆党代表大会，并在下屆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內把新綱領草案公布，以

便在各地方黨組織里和在報刊上討論。——第 105 頁。

- 134 國際工人協會 海牙代表大會 是在 1872 年 9 月 2—7 日召開的。和過去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代表 15 個全國性組織的 65 名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領導了這次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們多年來為反對工人運動中的各種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勝利結束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分裂活動受到譴責，他們的領導者被開除出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決議為將來建立各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奠定了基礎。——第 106 頁。

- 135 恩格斯的“布倫坦諾 *contra* 馬克思”這一著作是直接針對講壇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路·布倫坦諾的小冊子“我和卡爾·馬克思的論戰”的出版而寫的。布倫坦諾在出版小冊子的同時，還在一家資產階級雜誌“德國週報”上發表了它的序言部分，接着該雜誌又發表了一篇短評，企圖從格萊斯頓給布倫坦諾的關於所謂馬克思捏造他的 1863 年 4 月 16 日演說的引文的信中摘錄一些話來證明布倫坦諾“正確”。

布倫坦諾發表這些東西，目的在於繼續他早在 1872 年就以匿名的方式開始、後來又得到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塞·泰勒支持的誹謗馬克思的運動。恩格斯為了徹底揭露這些企圖玷污馬克思的學者聲譽和破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任和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誹謗，決定再一次在報刊上駁斥布倫坦諾及其同伙，同時給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教條以打擊。

在“德國週報”發表了包含摘自格萊斯頓致布倫坦諾的信里的話的短評（見本卷第 211—212 頁）以後，恩格斯立即在 1890 年 12 月在“新時代”雜誌上刊登了答复的文章（收入恩格斯的小冊子的附錄中，載于本卷第 212—213 頁），後來在 1891 年 4 月發表了整個著作。

在“文件”部分，恩格斯發表了有關馬克思和布倫坦諾的論戰，愛琳娜·馬克思和泰勒的論戰的全部材料，以及他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載于這一部分的一些文件，已經收入本版的有關各卷。本卷根據恩格斯的小冊子的材料的編排重新發表了這些文件。

講壇社會主義 是十九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

流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 *Kathed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的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疾病和不幸事故的工人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 107 页。

- 136 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于 1890 年问世，恩格斯为这一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35—40 页。——第 109 页。
- 137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 1871 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 1876 年。——第 109 页。
- 138 L. Brentano. *«Meine Polemik mit Karl Marx.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s Fortschritts der Arbeiterklasse und seiner Ursachen»*. Berlin, 1890. ——第 109 页。
- 139 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69—587 页），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在 1881 年 5 月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的周刊“劳动旗帜报”（*«Labour Standard»*）写的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73—286 页）。——第 110 页。
- 140 成立宣言的本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14 页。——第 111 页。

- 14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頁，以及本卷第162—166頁。

“人民國家報”(《*Der Volksstaat*》)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起初每周出版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代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的觀點。這家報紙因為發表大膽的革命的言論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於編輯常被逮捕，該報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工作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同“人民國家報”編輯部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該報經常刊載他們的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民國家報”的活動評價很高，同時密切注視它的工作，批評它的某些缺點和錯誤，糾正報紙的路綫，該報因此成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最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第112頁。

- 142 指愛·斯·比斯利“國際工人協會”一文，這篇文章載於1870年11月1日“雙周評論”第47期。

“雙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是英國的一家歷史、哲學和文學問題雜誌，1865年由一批資產階級激進派創刊；後來奉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方針；該雜誌用此名稱在倫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112頁。

- 143 書的全名是：“兌換論。1844年銀行法。濫用金屬貨幣原則導致通貨貶值。從議事錄看議會，‘交易所和J.貝爾納德爵士法案的廢除’一書的附錄”1864年倫敦版(《*The Theory of Exchanges.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The Abuse of the met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 Parliament mirrored in Debate, supplemental to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Repeal of sir J. Barnard's Act»*》. London, 1864)。書是匿名出版的，作者為亨利·羅伊。——第112頁。

- 144 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發表的預算演說載於1863年4月

- 17 日“泰晤士报”第 24535 号。——第 112 頁。
- 145 見“汉薩德議会議事录”第 3 輯第 170 卷第 244 頁（《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CLXX, p. 244）。——第 112 頁。
- 146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1856 年至 1869 年在伦敦出版。——第 116 頁。
- 147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 年在伦敦創刊；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資產階級激进派的机关报。——第 116 頁。
- 148 見布伦坦諾的这本书第 21—23 頁。——第 116 頁。
- 149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报纸，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 年至 1937 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 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訊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 118 頁。
- 150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0 年至 1869 年在伦敦出版。——第 118 頁。
- 151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72 年至 1937 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紀中叶是聚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輝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 118 頁。
- 152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工业資產階級的机关报；从 1846 年至 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118 頁。
- 153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 年在伦敦創刊。——第 119 頁。
- 15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5—6 頁。——第 135 頁。
- 155 見注 133。——第 135 頁。
- 15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666 頁。——第 138 頁。

- 157 “童工調查委員會 (1862)。委員會報告書 (I—VI)”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Report (I—VI) of the Commissioners》)。——第 150 頁。
- 158 指“公共衛生。樞密院衛生視察員 1864 年度第七號報告書。附附錄” 1865 年倫敦版 (《Public Health, Seven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endix, 1864》). London, 1865)。——第 150 頁。
- 159 詹·愛·撒·羅杰斯“從牛津議會的召集 (1259) 起至大陸戰爭開始 (1793) 止的英國的農業史和價格史” 1866 年牛津版第 1 卷 (J. E. Th. 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 (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Vol. I. Oxford, 1866)。——第 150 頁。
- 160 指“礦山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委員會議事錄，證據記錄和附錄。根據 1866 年 7 月 23 日下院的命令出版”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July 1866》)。——第 150 頁。
- 161 J. Watts. 《The Facts of Cotton Famine》. London, 1866, p. 211. ——第 151 頁。
- 16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14 頁；恩格斯下面引用的引文見第 5 頁和第 7 頁。成立宣言第一次發表於 1864 年 11 月 5 日“蜂房”報第 160 號，後來在同月和章程一起載入小冊子：《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Price one penny. Printed at the 《Bee-Hive》Newspaper Office, 10, Bolt Court, Fleet Street, 1864. ——第 155 頁。

- 163 这个片断的文字和“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的文字是一致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頁),只有几个注释恩格斯在第四版中作了一些不同于第三版的修改。“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是1883年在汉堡出版的。——第157頁。
- 164 中央注册局局长 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戶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該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調查。——第157頁。
- 165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調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頁(«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3. V. III, p. 11)。——第157頁。
- 166 “联合王国的各种統計材料”1866年伦敦版第6部分第260—273頁。——第158頁。
- 167 这里引用的和后面提到的引文(見本卷第169、174、183、206、209頁)不是莫里哀的文句,而是他的同时代人尼·布瓦洛的文句(“諷刺詩集”第八首諷刺詩)。这段話的譯文是: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記;
既厌恶自己,也难討別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第159頁。
- 168 見注143。——第159頁。
- 169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經濟狀況”1865年劍桥和伦敦版第67、82頁(H. Fawcett.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Cambridge and London, 1865, p. 67, 82)。——第159頁。
- 170 馬克思的这篇答辯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頁)。——第162頁。
- 171 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頁碼(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頁)。——

第 164 頁。

- 172 “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較” 1833 年伦敦版第 1—2 卷 (《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Vol. I—II, London, 1833)。威克菲尔德的这本书出版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第 164 頁。
- 173 馬克思在談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 1871 年 11 月 8 日帝国国会會議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資產階級議員、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辯論中声明說，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員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們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們”。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話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記記錄中“用棍棒来打死他們”已被改为“使他們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諷刺性的譯名“小拉斯克尔”。——第 165 頁。
- 174 馬克思的这篇答辯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18—127 頁)。——第 172 頁。
- 175 亞·斯密“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76 年都柏林版第 3 卷第 136 頁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 III, Dublin, 1776, p. 136)。——第 173 頁。
- 176 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資本論”第一卷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666 頁和第 667 頁)。——第 173 頁。
- 177 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比斯利发表在 1870 年 11 月 1 日“双周評論”第 47 期上的文章。——第 175 頁。
- 178 指 187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評論”第 785 期上发表的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評論” (《Saturday Review》) 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

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的簡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75頁。

179 見注172。——第176頁。

180 与爱琳娜·馬克思的答辯(刊登在“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内,标题是:“英国”)同时发表的还有下面的短文,其中她指出塞·泰勒重新挑起了对馬克思的誹謗运动和資产階級報紙“泰晤士报”、“每日新聞”拒絕发表她給塞·泰勒的答辯: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問題这样多,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用这些篇幅来討論私人的問題。但是,既然我没有別的办法来駁斥对我父亲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讀者原諒我这样做。去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塞德萊·泰勒先生的信,信中重复了过去的誹謗,說什麼我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意地歪曲了他所摘引的格萊斯頓一篇演說中的話。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誹謗,但是这些誹謗者通常都是十分卑鄙,不值得給以答复。可是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給匿名控告者以答复,因为硬加在他身上的所謂歪曲是出現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讀了泰勒先生的只不过是燙剩飯的那封信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給‘泰晤士报’。我在英国報紙上經常讀到关于英国报刊如何‘公正’的說法,所以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辯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表。可是过了一些時間,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泰晤士报’也好,在私人問題上可能还是正直的,所以我又写了一封信給編者。但还是没有結果。接着我又写信給我一直认为是非常公正的報紙‘每日新聞’。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懲罰地去踢死的獅子,而自由主义的‘每日新聞’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表我的信的程度。因此我在这里公布了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辯:——”(見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2期第150—153頁)。

“今日”(《To-Day》)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83年4月

- 至 1889 年 6 月在伦敦出版; 在 1884 年 7 月以前, 在海德門任杂志編輯期間, 爱琳娜·馬克思主持該杂志的“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第 187 頁。
- 181 爱琳娜·馬克思的第二篇答辯和“塞·泰勒的反駁”, 都刊載于“今日”杂志“通訊”栏內, 标题是: “馬克思博士和格萊斯頓先生的 1863 年預算演說”(見 1884 年“今日”月刊第 1 卷第 3 期第 228—235 頁)。——第 192 頁。
- 18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35—40 頁。——第 197 頁。
- 183 指理·琼斯“国家政治經濟学教程”1852 年哈特福版 (R. Jones. «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Hertford, 1852),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引证了这本书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611—612 頁)。引文和注明的引文出处都是确切的。——第 197 頁。
- 184 路·布伦坦諾“現代工人公会”。第 2 卷。“英国工会批判”1872 年萊比錫版 (L. Brentano. «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 Zweiter Band. «Zur Kritik der englischen Gewerkvereine». Leipzig, 1872)。——第 203 頁。
- 185 指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論”1878 年不来梅版 (F. Mehring. «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 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Lehre». Bremen, 1878)。——第 205 頁。
- 186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 是 1888 年 3 月至 1900 年 9 月在柏林出版的資產階級杂志。——第 211 頁。
- 187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收到威·李卜克內西寄来的这一期“德国周报”后不久, 在 1890 年 12 月 4 日和 13 日之間写的。12 月 13 日恩格斯把这篇短評寄給考茨基, 請他把它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杂志上。——第 212 頁。

188 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1887年12月初工人和民主力量在巴黎举行了多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反对前总理茹尔·费里（绰号“东京佬费里”，因为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部署目的在于对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东京即越南北部实行殖民地侵占的远征）做候选人，费里是被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抬出来争总统职位的，并且得到保皇派的支持。在第一次投票中，费里得到的票数寥寥无几，他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在第二次投票前迫不得已放弃候选资格。恩格斯在1887年12月5日给拉法格的信里，把候选人费里的失败评价为人们对联合起来的保皇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胜利。

1891年2月27日和28日，德国帝国国会讨论关于所谓军士奖金的军事预算条款。首相卡普里维说明要求拨款的用途，他说必须巩固军队中的军士这一部分人，因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军队中加强了。帝国国会根据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票数，批准按政府申请总额的80%拨给此款。——第215页。

189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德文第三版（纪念版）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在纪念版中还收入了由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和285—294页）。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有恩格斯的导言。

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在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被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

保留了改換的字眼。本版恢复了原稿的文字。

恩格斯的导言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起用俄文发表，第一次是1893年在日内瓦。1905年“海燕”出版社(敖德萨)出版了按1891年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列宁在校订译文时，消除了1905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前一版中的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把“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中先前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文句恢复了。后来弗·伊·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引证导言时，又对其中的许多段落重新进行了翻译。列宁校订和翻译过的地方，在准备本版时得到了考虑。——第216页。

- 19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頁。——第216頁。
- 191 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統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216頁。
- 192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組織要求統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識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体操团体中得到了推广。他們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 蠢惑者。反动当局对“蠢惑者”进行了迫害。——第216頁。
- 193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頁)。——第217頁。
- 194 1870年9月1—2日 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是法軍完全被击潰。按照法軍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8万多名兵士、軍官和將軍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禁于威廉堡(在加塞尔附近，是普魯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潰，结果是1870年9月4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220頁。
- 195 指以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簽訂的法德初步和約。按照这个条約的条件，法国把亚尔

- 薩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給德国，并繳付 50 亿法郎的賠款；在賠款付清以前，德国軍隊繼續占領法国的部分領土。最后和約是 1871 年 5 月 1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簽訂的。——第 221 頁。
- 196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871 年 3 月 31 日第 90 号上。——第 222 頁。
- 197 恩格斯說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揚 1871 年 5 月 11 日命令的内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 年 5 月 12 日第 132 号上。——第 222 頁。
- 198 指蒲魯东的著作“十九世紀革命的总观念”，1851 年巴黎版（《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Paris, 1851）。馬克思 1851 年 8 月 8 日給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魯东的‘十九世紀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10 卷第 13—17 頁），对蒲魯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 226 頁。
- 199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答复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霍賽·梅薩在 1891 年 3 月 2 日的信里提出的請求而写的，梅薩請恩格斯答应让該党全国委员会出版由他翻譯的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的西班牙文譯本。早在 1872 年梅薩就开始翻譯这本书了。它的一些片断曾第一次用西班牙文发表在第一国际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Emancipacion》）1872 年 4 月 13 日第 44 号、10 月 5 日和 13 日第 68 号和第 69 号上。以后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梅薩繼續翻譯，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实际可能在西班牙出版这本书。
- 梅薩在 1891 年 4 月 8 日又写信給恩格斯，說已收到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貧困”西班牙文版的信，同时強調指出，馬克思的著作对反对蒲魯东思想的斗争，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蒲魯东的思想，其目的在于用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洞詞句来欺騙工人。恩格斯的信被作为 1891 年夏天在馬德里出版的馬克思“哲

学的贫困”一书西班牙文版序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888 年巴塞罗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作为附录载于该书。——第 230 页。

200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负责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它拟于 1891 年 4 月 12 日在米兰召开）的委员会的来信的答复。委员会是由米兰的各民主组织成立的，其成员包括意大利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委员会极力使计划中的群众大会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因而向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等）以及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或以书面表示自己对它的支持。委员会在给恩格斯发出这一正式邀请的同时，还于 1891 年 4 月 2 日给他寄去了一封专函，其中写道：“您是这场自由和压迫的搏斗中的最著名的战士之一。您是德国和英国——在社会主义领域内——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因此您的表示支持我们的群众大会的来信，将会对全体劳动人民发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您能参加 4 月 12 日的群众大会，并且能像我们所希望的为保卫工人的自由和独立而发表意见，那末，对您的同胞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同志就会起更大的影响。”——第 232 页。

201 恩格斯在 1871—1872 年间担任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意大利通讯书记，1873 年担任过总委员会意大利全权代表。——第 232 页。

202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 1891 年在柏林出版的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73—506 页）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把他为这一著作的 1884 年版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79 页）全部复述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

导言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布，它以独立的论文形式登载出来。在单行本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 1891 年 5 月 13 日“前进报”第 109 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 1891 年 5 月 30 日“自由”报第 22 号，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1891 年

7月10日第10期, 1891年7月2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4号, 1892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問題”(«Question Sociale»)的文集, 以及其他机关报刊。

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本譯成許多种外文出版, 所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导言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在1894年日内瓦出版的馬克思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上。——第234頁。

203 德意志工人协会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魯塞尔建立的, 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們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 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 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魯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 由于該会成員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驅逐出境, 协会在布魯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234頁。

204 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 以及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阶段)。德意志多数邦政府都拒絕承认宪法。——第234頁。

205 在馬克思的遺稿中后来发现一份手稿, 它是为关于雇佣劳动与資本問題的讲演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所准备的提綱, 标题为“工資”, 手稿封面上有“1847年12月于布魯塞尔”字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頁)。从內容看来, 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馬克思的未完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的补充。手稿于192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社会主义經濟”(«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杂志上, 1925年用原文发表在“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杂志上。但是在馬克思的手稿中没有发现“雇佣劳动与資本”一著已定稿的完成部分。——第234頁。

20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41頁和“馬克思恩格斯

- 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3—80頁。——第237頁。
- 207 恩格斯引“資本論”第一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47頁)。——第240頁。
- 20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7—187頁。——第240頁。
- 209 恩格斯指1891年五一慶祝活動。在某些國家(英國、德國)里,是在5月1日以後頭一個星期日慶祝五一節的,1891年,5月1日以後頭一個星期日是在5月3日。英國、奧地利、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許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紀念日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在俄國,儘管沙皇當局對五一運動的參加者進行瘋狂的迫害,1891年,人們還是第一次慶祝了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節日。——第243頁。
- 210 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為他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頁)德文第四版寫的,該版於1891年在柏林由“前進報”社出版。這部著作在1880年首先用法文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Revue socialiste»)雜誌上,德文第一版是由“社會民主黨人報”社於1883年3月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扉頁上標的日期是:1882年)。恩格斯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表示相信這部著作的內容對德國工人讀者來說困難是不多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6頁)。恩格斯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該報社於1883年出版。第四版是在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後一版。所有這四個德文版本,都以附錄形式刊載了恩格斯的“馬爾克”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頁)。——第244頁。
- 211 所舉的各種版本為:«Il socialismo utopico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Benevento, 1883; «Развитие науч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Женева, 1884; «Socialismens Udvikling fra Utopi til Videnskab», København, 1885; «Socialismo utópico y socialismo científico», Madrid, 1886; «De ontwikkeling van het socialisme van utopie tot wetenschap», Gravenhage, 1886。

——第 244 頁。

212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它以“反杜林論”中相应各章的文字为基础)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0 卷“‘反杜林論’的資料”部分。关于圣西門的补充見第 20 卷第 669—670 頁;关于托拉斯的补充見第 20 卷第 672—673 頁。——第 245 頁。

213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为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3—178 頁)一书第四版写的序言;在該版問世以前,經作者同意,这篇序言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題发表在 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41 期。

恩格斯的这本书的經過修訂补充的第四版于 1891 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此后再沒有改动过。恩格斯这本书后来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各种版本,都收有这篇序言。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 1894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俄文第一版里。——第 246 頁。

214 指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以下各种版本: «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dello Stato». Versione riveduta dell'autore, di Pasquale Martignetti. Benevento, 1885; «Origina familiei, proprietăței private și a statului», tradusă de Joan Nădejde, in: «Contemporanul» №№ 17, 18, 19, 20—21, 1885, №№ 22, 23—24, 1886; «Familjens, Privatejendommens og Statens Oprindelse». Dansk, af Fo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besøerget af Gerson Trier. København, 1888, «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État». Paris, 1893。——第 247 頁。

215 爱·伯·泰罗“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 年伦敦版(E. B. Tylor.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sation». London, 1865)。——第 248 頁。

216 約·雅·巴霍芬“母权論。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

- 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J. J.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ö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第248頁。
- 217 埃斯庫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第249頁。
- 218 恩格斯引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搶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年伦敦和紐約版第124—125頁(«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London and New-York, 1886, p. 124—125)。麦克伦南“原始婚姻”一著最先于1865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而“古代史研究”第一版(該版收有“原始婚姻”一著)于1876年在伦敦問世。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这一版本。——第252頁。
- 219 R. G. Latham. «Descriptive Ethnology». Vol. I—II. London, 1859.
馬嘉人 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第252頁。
- 220 指路·亨·摩尔根的十四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紐約的“美国評論”(«American Review»)杂志1847年2—12月第2—12期),以及他的“Ho-dé-no-sau-nee 或易洛魁联盟”一书1851年罗彻斯特版(«League of the Ho-dé-no-sau-nee or Iroquois». Rochester, 1851)。——第252頁。
- 221 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J.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London, 1870)。——第254頁。
- 222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頓版(L. H.

- Morgan.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Washington, 1871)。——第 254 頁。
- 223 阿·吉罗-特龙“家庭的起源”1874 年日内瓦、巴黎版(A. Giraud-Teulon. «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 Genève, Paris, 1874)。
J.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Fourth Ed. London, 1882)。——第 256 頁。
- 224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經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 年伦敦版(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第 256 頁。
- 225 恩格斯曾經同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萊馬在 1888 年 8—9 月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这次旅行的途中观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484—486 頁。——第 257 頁。
- 226 約·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 1876 年伦敦版第 333 頁(J. F.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London, 1876, p. 333)。——第 258 頁。
- 227 这封賀信是恩格斯为了回答由維克多·阿德勒在 1891 年 6 月 22 日来信中向他轉达的請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請而写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891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維也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93 名代表。代表大会討論了关于党的状况和活动、关于爭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运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党参加 1891 年在布魯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关于奥地利的社会改革等問題。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 1891 年 7 月 3 日的社論“在維也納举行的我党代表大会”中总结代

表大会工作时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它的代表大会是会满意的,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了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在策略问题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代表大会上的辩论是按照 1888 年在加因斐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的主要原则进行的。——第 260 页。

- 228 1888 年 12 月 30 日至 1889 年 1 月 1 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了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奥地利几乎所有各省的社会主义者的 73 名代表。代表大会在发展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并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为依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宣言中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发展奥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 260 页。

- 229 恩格斯指废除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反动政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而施行的非常法。

关于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2。

奥地利于 1884 年在“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名称下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根据这些法令,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工人组织及其机关报刊遭到警察当局的迫害和查封,它们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但是,在罢工运动增长和 1890 年 5 月 1 日奥地利工人群众性行动的影响下,塔菲政府于 1891 年 6 月被迫废除这些法令。——第 260 页。

- 230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是恩格斯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这篇著作是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18 日和 29 日之间写的。1891 年 6 月 18 日,理·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

直接促使他写了这一著作。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草案，曾經在执行委员会的許多次會議上討論过，其中的一次會議决定把草案寄給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从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29 日給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草案后对它进行了詳細的分析批判。他打算对緒論部分提出自己的更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提意見的日期的限制，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見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 279—280 頁）。恩格斯对草案中專門談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按照他的說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馴、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恩格斯的批评论見，以及在这以前由于他的坚持才发表的卡·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見注 131），对进一步討論并制定綱領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意見被考慮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意見后不久在 1891 年 7 月 4 日“前进报”上公布的綱領草案来判断。草案的文字表明，考虑到恩格斯的批評而对草案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在緒論部分及經濟要求那一部分。草案中專門談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尽管恩格斯作了批判，但并没有作什么有意义的修改。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关于民主共和国、关于改造德国国家制度和为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残余而斗争的必要性等原理，都没有写进这一部分去。

正式的綱領草案发表后，在各級党組織里和在“前进报”、“新时代”杂志上开始对它进行了討論；在討論中，不仅提出了个别的建議和修改，而且提出了新的綱領草案。“新时代”杂志編輯部就提出了它自己的由考茨基起草的綱領草案。从恩格斯 1891 年 9 月 28 日給考茨基的信和 9 月 29 日給倍倍尔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新时代”編輯部的草案提出一系列批判性意見，但整个說来，他认为它比正式的草案較令人滿意，并且对倍倍尔打算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个草案表示贊同。

为了审查提出来的各种草案和建議，成立了以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綱領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新时代”編輯部起草的草案制定出最后

的綱領草案；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最初的綱領草案所提的一些意見也得到考虑。

委员会草拟的綱領草案被提交到 1891 年 10 月 14 日至 21 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討論。威·李卜克内西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恩格斯在 1891 年 10 月 24 日給左尔格的信里，談到通过了基本上是馬克思主义的綱領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成果时写道：“使我們滿意的是，馬克思的批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爱尔福特綱領比哥达綱領前进了一大步；党的綱領清除了改良主义的拉薩尔派教条，更明确地表述了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綱領科学地論证了資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須夺取政权。

此外，爱尔福特綱領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沒有提到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理。綱領也沒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对最初的草案的批判意見可以认为是对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綱領的批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长期不发表恩格斯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直到 1901 年它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編輯部在发表这篇著作时所加的按語中指出，恩格斯的手稿是在威·李卜克内西遗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

弗·伊·列宁第一个把“1891 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一著中的若干地方譯成俄文，并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加以引用。在准备把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收进本版时，考虑了列宁翻譯的这些地方。这篇著作俄文第一次发表于 1930 年“波濤”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和策略”。——第 263 頁。

- 231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給恩格斯的并受到恩格斯的分析批判的綱領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下面引的是由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已經考虑过恩格斯的某些意見和建議的文本（1891 年 7 月 4 日“前进报”第 153 号）。为了便于同恩格斯的批判意見相对照，把緒論部分各段的号数用方括号标了出来。

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

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資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的分离和劳动資料轉归一部分社会成員个人占有，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階級：劳动者和有产者。

[第二段]社会的劳动資料，在其占据者手中，变成剝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經濟上受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貧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第三段]在这种剝削制度的統治下，被剝削者所創造的財富的积累在剝削者——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階級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过剩的工人的大軍越来越具有群众性，階級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軍事陣营并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階級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資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无計劃性，产生了那些使工人状况更加恶化的越来越拖长的危机和生产的間歇，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資本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間的鴻沟更加扩大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資料的所有者階級已經丧失担当經濟領導和政治領導的使命和能力。

[第五段]对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通过消除其原因而予以結束，并力爭工人階級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

[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資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轉变成公有财产，把資本主义生产轉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轉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資本主义社会本身創造出来，并且还将由它繼續創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轉变，工人階級的解放，从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謂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同那种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并从而把对工

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權力集中于一手之中的專為國庫着想的國有化制度，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第八段；在恩格斯使用過的文本上是第七段] 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因為所有其餘的階級和政黨都站在資本主義的土壤上，儘管它們之間存在利益的衝突，但卻有它們的共同目的——保持和鞏固現社會的基礎。

[第九段；在恩格斯使用過的文本上是第八段] 工人階級在一切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中有着相同的利益；隨着國際聯系和為世界市場的生產的擴大，每個國家的工人的狀況越來越同其他各國的工人的狀況相依存，因此，工人階級的解放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都要一致參加解決的社會問題。基於這個認識，德國社會民主黨感覺到並宣稱自己同所有其餘的國家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是一體的。

[第十段] 社會民主黨不是為了新的階級特權和優越地位而鬥爭，而是為了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本身、為了不分性別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而鬥爭。在這個解放鬥爭中，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僱傭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體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代表，它堅持能夠改善一般人民的狀況，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狀況的一切要求、辦法和設施。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目前提出如下要求：

1. 凡年滿二十歲的帝國公民，不分性別，在選舉和投票的所有階段，均可在秘密投票的情況下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權和投票權。

實行比例選舉制。規定選舉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舉行。對選出的代表支給薪金。

2. 人民根據提出法案和否決法案的權利直接參加立法。在帝國、各邦、各省和各市鎮實行人民自治。稅收每年提付表決，有拒絕納稅的權利。

3. 由選出的人民代表決定宣戰與媾和問題。成立國際仲裁法庭。

4. 廢除一切限制或取消自由發表意見和集會結社權利的法律。

5. 取消一切用於教會和宗教目的的國家經費的撥款。教會團體和宗教團體應視為私人的團體。

6. 学校的世俗性。公立国民学校实行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构中实行免費教育和免費供应教材教具。

7. 用时刻准备保卫国防的精神教育全体公民。用民兵代替常备軍。

8. 免費的訴訟程序和免費給以司法上的帮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

9. 医疗和医药免費。

10. 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稅收支付的国家开支，征收級差累进的所得稅、資本稅和遺產稅。取消一切間接稅、關稅以及使社会整体利益服从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的其他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階級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1. 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保护法：

(a) 規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八小时。

(b) 禁止使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业劳动。

(c) 禁止夜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等特点而需要夜工的工业部門不在此例。

(d) 向每个工人提供每周一次其长度最少为三十六小时的不間断的休息。

(e) 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資。

2. 由帝国劳动部門、各专区劳动局和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业企业进行监督，并調整城乡劳动关系。

3. 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同工业工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废除奴仆規約。

4. [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似乎是第二点] 确保結社权。

5. 在工人参加保险机关的管理并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情况下，把整个工人保险系統轉归帝国經營。——第 265 頁。

232 指 1875 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一著中，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給倍倍尔的信里，对这一綱領的草案(該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作了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10 頁和第 11—35 頁)。——第 265 頁。

233 恩格斯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75 頁)。——第 269 頁。

234 由于修改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完成反革命政变和驅散普魯士国民議會后于 1848 年 12 月 5 日欽定(恩賜)的宪法,在普魯士通过了 1850 年宪法。因为一心要消灭这部整个說来十分反民主的宪法中殘存的民主成果,国王在 1849 年 4 月解散了众議院,而在 1849 年 5 月 30 日頒布了新的选举法,規定以高額财产資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議員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級选举制。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新議院的奴顏婢膝的多数,按照国王的提議通过了使 1848 年欽定宪法的反动原則加强了的新宪法。在普魯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貴族議員組成的上院(“貴族院”),議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动議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且只对国王負責。宪法規定政府有权設立特別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 年宪法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魯士仍然有效。

所謂的 宪制冲突,是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魯士发生的普魯士政府和議会的资产階級自由派多数之間的冲突。1860 年 2 月,这个多数拒絕批准陸軍大臣馮·罗昂提出的改組軍隊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爭得资产階級首肯用于“維持軍隊战备”的撥款,就是說事实上开始了計劃中的改組。当 1862 年 3 月議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絕批准軍費开支并要求內閣向議會負責时,政府解散了議會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 年 9 月底,組成了反革命的俾斯麦內閣,它在同年 10 月又一次解散議會,并且开始实行軍事改革,不經議會批准就开支這項經費。只是到 1866 年,当普魯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魯士资产階級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

1871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是 1867 年 4 月 17 日批准的而后在 1870 年 11 月根据德国南部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加入联邦的条約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1871 年宪法巩固了普魯士在德国的統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 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組成來說是反动的联邦會議的贊同和經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帝国首相所拥有的不依賴于帝国国会的特权非常广。該

宪法保存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德国一些小邦的特权。——第 272 頁。

235 恩格斯在这里諷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用一个名称联起来，这两个在 1871 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国是：属于长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格萊茨和属于幼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盖拉-施萊茨-罗宾斯坦-艾貝斯道弗。——第 272 頁。

236 恩格斯指社会民主党議員凱泽尔所作的、得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的演說，凱泽尔在那次演說中为政府的 1879 年度保护关稅率草案作辯护。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斥責了在帝国国会里替为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利益而損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提案作辯护的凱泽尔的行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許多领导人對凱泽尔的姑息放纵。

曼彻斯特主义，見注 105。——第 274 頁。

237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在关于它們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約（1870 年 11 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 年 4 月）中被确定下来了。其中，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稅、独立管理邮电。此外，巴伐利亚还保留了管理它的軍隊和铁路方面的独立性。巴伐利亚、維尔騰堡以及薩克森在联邦會議中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問題方面的特別的委員會。——第 275 頁。

238 指由于完成了法国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过程的 1799 年霧月 18 日（11 月 9 日）政变而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侖·波拿巴的专政。这一制度取代了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国制度。1804 年，在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拿破侖被宣布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尽管制度交替更換，但第一帝国的許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繼續保存下来，連在 1870 年 9 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也是如此。——第 276 頁。

239 恩格斯指在 1880 年 11 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的綱領。1880 年 5 月，法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之一茹·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綱領草案。恩格斯在 1881 年 10 月 25 日給伯恩施坦的信里指出，綱領的理論性导言是馬克思口授給盖得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討論綱領的其他內容，在这

里我們提出了某些增減。”

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綱領导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64 頁，綱領的实践部分(最低綱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635—636 頁。——第 278 頁。

240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綱領是在 1888 年巴塞罗纳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 278 頁。

241 “关于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一文是 1891 年 9 月 2 日恩格斯写給拉法格的一封信，該信发表在 1891 年 9 月 12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51 号上，发表时略有删节，文字上也作了些修改。这篇文章被譯成德文刊登在 1891 年 9 月 16 日“前进报”第 216 号“政治評論”栏里。恩格斯在 1891 年 10 月 1 日給倍倍尔的信中曾对德譯文的质量表示不滿意。

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 1891 年 8 月 16—22 日在布魯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馬克思主义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間发生了尖銳的斗爭（見注 112）。由于領導馬克思主义派进行斗爭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次也未能分裂工人的国际联合。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有欧洲許多国家和美国的 337 名代表参加，就其組成來說基本上是一次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大会。在討論代表資格审查結果时，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項决定，不許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議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以及关于軍国主义等問題。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決議中，恩格斯在他的信里对关于劳工保护法的決議(他引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決議的引言部分和結尾部分)以及关于罢工和抵制的決議作了評价。前一項決議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資本家的統治，在工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地方，應該利用这些权利来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代表大会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決議中，建議工人采用这些斗爭手段。其中特別强調了工会組織对工人的絕對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問題是关于工人階級对軍国主义的态度問題。在李卜克內西和瓦揚就这个問題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內西提出的決議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論点: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鏟除軍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真正的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党。可是決議案中沒有明确規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決議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糊的号召結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軍事同盟,通过使无产階級国际組織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紐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內西的決議案。他提出了另一个決議案,根据这个決議案,一旦发生战争,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紐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談沒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絕大多数的代表投票贊成威·李卜克內西提出的決議案。

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結果評价为“馬克思主义者在原則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 281 頁。

242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見注 134。——第 281 頁。

243 恩格斯指 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47—52 期发表的格·瓦·普列汉諾夫的文章“一八九〇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普列汉諾夫的这篇文章有一部分还刊登在 1890 年 12 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3 册上。——第 282 頁。

244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 1891 年 10 月 13 日和 22 日之間写的,它的初稿是为“1892 年工人党年鉴”写的。1891 年 9 月 26 日“社会主义者报”刊登了有关該年鉴出版的广告,广告說,年鉴打算概要地評論 1891 年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羅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并說明恩格斯将写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1891 年 9 月 23 日劳拉·拉法格受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請恩格斯为年鉴写一篇文章,并且告訴他說,文章的題目已由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提出来。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說,这项請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社会

主义者对爆发战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把文章寄给劳拉·拉法格，同时在1891年10月22日的信中要求把文章转交给党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对文章的意见告诉他。从保·拉法格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文章受到称赞并且收入1891年12月初出版的年鉴。

文章在年鉴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把它译成了德文，并且为它写了简短的前言，还写了结束语。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刊物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1892年1月16日和2月1日的“社会评论”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从法文翻译的头两部分，编辑部给第一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给第二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和平”。1892年4月1日该杂志第7期转载了文章的结束语（译自德文，并稍加删节），标题是：“俄国的饥荒及其原因和意义”。同年出版了马尔提涅蒂译的该著作的意大利文单行本。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从德文译成波兰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杂志“黎明”1892年2月13日和20日第33和34期上；又用罗马尼亚文发表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892年1月和2月第2和3期上（删去前言）。同年，该著作还用英文在美国发表。

恩格斯这一著作的第一批俄译文于1892—1893年用胶版印刷出版；1906年该著作从德文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和基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是法国社会主义年鉴，于1892年至1894年和1896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285页。

245 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的）共和派就是依靠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其有联系的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阿尔芒·马拉斯特。

“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的名称，他在这本著作中叙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

- 該书第一版于 1840 年在巴黎出版。——第 288 頁。
- 246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該党是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納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的, 后来就以“爱森納赫派”这一名称聞名。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綱領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錯誤的观点, 但基本上是以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第 289 頁。
- 247 关于哥达的合并, 見注 132。——第 289 頁。
- 248 恩格斯指的是 1891 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菲·拉薩尔全集的決議。——第 290 頁。
- 249 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話: “合法性害死我們”, 这句话反映出 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 然后把它鎮压下去, 恢复君主制。——第 292 頁。
- 250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軍軍官在丰特努瓦戰場上 (1745 年 5 月 11 日) 說的話, 这个軍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6 年) 时期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贊。当与法軍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諾威联軍走近法軍的时候, 这个軍官高呼: “英国老爷們, 你們先开枪吧!” ——第 292 頁。
- 251 关于色当战役, 見注 194。——第 293 頁。
- 252 恩格斯引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90 頁)。——第 294 頁。
- 253 指十八世紀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軍队在 1793 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魯士、英国等)联軍的入侵。——第 297 頁。
- 254 指 1891 年 7 月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 这次接待成为公开表示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靠攏的場面。与此同时, 两国进行了外交談判, 1892 年 8 月談判結束, 簽訂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 法国和俄国必須就国际政策問題进行协商, 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

- 取共同的行动。这个协定是 1893 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 298 頁。
- 255 指 1891 年 9 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 12 500 万金卢布(5 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債。起初公債很受欢迎, 12 500 万的公債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 由于 1891 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 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 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債券。为了防止公債的彻底失败, 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債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 9 600 万卢布的公債。——第 299 頁。
- 256 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伴随着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掠夺), 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46—257 頁)。——第 300 頁。
- 2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55—759 頁。——第 301 頁。
- 258 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稅草案”(«Projet d'une Dixme Royale»)(1707 年出版)和比·布阿吉尔貝尔的著作“法国的零售商业”(«Le Détail de la France»)(1695—1707 年多次出版)。——第 302 頁。
- 259 “人民之友报”編輯部在 1891 年 11 月初給恩格斯的信中, 邀请他参加拟于 1891 年 11 月 22 日在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諾)举行的該报十周年庆祝大会。这次庆祝活动的組織者原打算使它成为一次反对反动的奥地利出版法的政治示威, 但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禁止, 未能举行。
-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是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1881 年在布隆创刊。——第 304 頁。
- 260 青年捷克派 是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党; 起初它加入民族党, 成为民族党内的自由派; 1874 年, 青年捷克派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党”, 这个党在九十年代成为捷克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捷克派提出了把奥匈帝国改为奥匈捷三位一体的君主

国的要求,力图使捷克资产阶级在这个君主国中居统治地位,用削弱德意志资产阶级阵地的办法来巩固捷克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青年捷克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抱敌视态度,力图破坏它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第305页。

- 261 指1891年11月17日“每日纪事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拉法格先生事件”的通讯。

“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1855年至1930年(1877年起用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第306页。

- 262 关于1871年8月法国当局在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几个女儿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疗养地巴涅尔-德-吕雄市时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事,见1871年8月25日马克思给“太阳报”(《Sun》)编辑德纳和1871年9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307页。

- 263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309页。

- 264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英国版而写的。这个版本是1887年在纽约第一次出版的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的第二

- 版。序言基本上由恩格斯 1886 年写的美国版附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60—266 頁）和該附录所包括的其所著“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同上，第 21 卷第 198—205 頁）构成，只是文字上略有修改，个别地方有删节。序言結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 1892 年英国版写的。——第 311 頁。
- 26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345—353 頁。——第 311 頁。
- 266 英国的 谷物法 規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稅，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輸入粮食。此項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斗争，結果在 1846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費用有所減低，但归根結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资产階級的利潤。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貴族，促进了英国資本主义的更迅速的发展。——第 312 頁。
- 267 关于实物工資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做了介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67—469 頁）。1831 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資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 1847 年 6 月 8 日英国議會通过的。——第 313 頁。
- 268 “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詳細描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42—343 頁）。
“七日規”（«Seven 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第 314 頁。
- 269 指 1885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階級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ngland and Wales». 1885）。——第 314 頁。

- 270 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給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資中扣除（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9—470頁）。——第315頁。
- 271 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工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滿足。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頁。——第315頁。
- 272 “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譯本是由賽·穆尔翻譯，由恩格斯校訂的，1887年出版。——第315頁。
- 273 “公益”(《*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年至1891年和1893年至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年至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317頁。
- 274 包括了宪章派各項要求的人民宪章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議會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滿二十一岁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选人的财产資格限制、发給議員薪金。1839年、1842年和1849年，議會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愿书。——第317頁。
- 275 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組織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議會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撓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結了大批軍警。宪章派的領導人(其中有許多人表現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說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318頁。
- 276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議會的大門。为实现改革

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318 页。

277 1867 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 1867 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1884 年 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 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是在 1872 年实行的。——第 319 页。

278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如“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62—465 页）中，有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 1848 年以后反而做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实现了革命所提出的要求，虽然是以面目全非、滑稽可笑的形式实现的。——第 319 页。

279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1883 年 9 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 年伦敦版第 608—609 页（《Report of the Fifty-Thi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 London, 1884, p. 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成立于 1831 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 322 页。

280 这篇文章是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卓·博维奥批评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前一部分的答复。恩格斯的文章的前一部分按照“1892 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文本译成了意大利文，载于 1892 年 1 月 16 日“社会评论”杂志第 2 期。1892 年 2 月 2 日，“社会评论”

編輯菲·屠拉梯把載于“論壇報”的博維奧的文章寄給恩格斯，并請恩格斯對它作答復。恩格斯用法文撰文作答，于1892年2月6日隨函寄給屠拉梯。屠拉梯把這篇文章譯成意大利文，并經恩格斯同意，發表于1892年2月16日“社會評論”第4期，標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萬尼·博維奧”，許多意大利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

“社會評論”(《*Critica Sociale*》)是一家意大利雙周雜誌，是社會黨的理論性機關報，從1891年至1924年以此名稱在米蘭出版；雜誌的編輯是菲·屠拉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該雜誌發表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傳布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顯著的作用。

“論壇報”(《*La Tribuna*》)是一家意大利資產階級自由派日報，從1883年起在羅馬出版。——第326頁。

- 281 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用德文為1892年在倫敦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波蘭文版寫的(“宣言”正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這個版本由波蘭流亡者翻譯定稿并由“黎明”雜誌社出版。這個版本被標為第二版，因為前一版(波蘭社會主義者彼卡爾斯基譯)由該報社于1883年在日內瓦刊行。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親自指出過，最初的波蘭文譯本早在1848年就在倫敦發表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頁)。恩格斯在把序言寄給“黎明”社後，在1892年2月11日寫給斯塔尼斯拉夫·門德爾森的信中說，他希望將來能掌握波蘭文，以便能深刻研究波蘭工人運動的發展；到那時他就可以為下一版的波蘭文“共產黨宣言”寫一篇更加充實的序言了。

“黎明”(《*Przedświt*》)是一家波蘭社會主義的雜誌，從1880年至1914年出版。從1891年起在倫敦發行，每周出一期。——第329頁。

- 282 會議桌上的波蘭——見注42。——第329頁。

- 283 1789年7月14日是巴黎的人民群众攻下巴士底獄的日子，這一天是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

1792年9月22日是國民公會在1792年9月21日宣布的蘭西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這一天被認為是國民公會在1793年批准的革

命新历的元旦。——第 331 頁。

- 284 1892 年出版的馬克思著“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德文第二版，是 1885 年德文第一版的翻版，只作了恩格斯在这篇按語中所說明的修改。1892 年版收有恩格斯为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80—194 頁），以及（在附录里）馬克思“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一著（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44—459 頁）和馬克思“論蒲魯东”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8—36 頁）。

按語中提到的地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10 頁。在 1847 年法文版中出現，后来又被 1885 年德文版重复的这两处无关紧要的疏忽，曾被奥地利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門格尔在他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討”一书（1886 年版）中利用来作为詆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实。在矛头指向門格尔的論战性著作“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中，也揭露了这些詆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513 頁）。——第 333 頁。

- 285 威·湯普遜“为人类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1824 年伦敦版（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London, 1824）。——第 333 頁。

- 286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01—247 頁）的英文版写的。英文版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譯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他在 1882 年写的“馬尔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51—369 頁）一文作为附录收在这一版中。

恩格斯在 1892 年 6 月把这篇导言譯成德文，在 7 月間寄給“新时代”杂志，发表于 1892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标题是：“論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編輯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并在脚注中說，这

几段文字的内容在德国是尽人皆知的,不会引起德国读者的兴趣。

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11和25日,1893年1月1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和120号。导言还曾用保加利亚文发表于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删去前面八段)。

这篇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于1926年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334页。

- 287** 关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见注132。——第334页。
- 288** 指以下这几部著作: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 Dühring. «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 欧·杜林“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 Dühring. «Cursus der National- 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2. Aufl., Leipzig, 1876),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 Dühring.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2. Aufl., Berlin, 1875)。——第337页。
- 289** 复本位制 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337页。
- 290** 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338页)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以及1877年7—12月和1878年5—7月的该报附刊。第一版单行本于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
-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1876年党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该报从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用以代替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zialdemokrat»);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337页。

- 291 F. Engels.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0. 这本小册子是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論”中“导言”的第一章和第三篇的第一、二两章,并对它們做了一系列增补和一些修改而編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1883年德文第一版所用的书名。——第337頁。
- 292 F. Engels. «Soc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Genève, Redakcyi «Przedświtu», 1882. 关于西班牙文版,見注211。——第337頁。
- 293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c și socialism științific». București, 1891. 关于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德文版、意大利文版、俄文版、丹麦文版和荷兰文版,見注210和注211。——第337頁。
- 294 恩格斯指的是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和“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Первобытное право, выпуск I, Род». М., 1886)。——第338頁。
- 295 关于“資本論”英文版,見注272。——第338頁。
- 296 唯名論者 代表中世紀哲学的一个派別,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維和語言的产物,它們只能用来表明現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紀的实在論者相反,唯名論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創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們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論是中世紀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現。——第339頁。
- 297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薩哥拉的学說,同素体 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規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薩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們的結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第339頁。
- 298 約·洛克“人类悟性論”(J.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一版于1690年在伦敦出版。——第341頁。

- 299 自然神論 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說，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預自然現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統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論往往站在唯理論的立場上批評中世紀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侶們的寄生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为。——第 341 頁。
- 30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引文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163—165 頁）。——第 341 頁。
- 301 指 1851 年 5—10 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屆世界工商业博覽会。——第 342 頁。
- 302 “救世軍”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組織，1865 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創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國家（1880 年按軍隊編制改組后才采用这个名称）。該組織利用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剝削者的斗争。救世軍的某些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蠱惑宣传，表面上譴責富人的利己主义。——第 343 頁。
- 303 指比·西·拉普拉斯的著作“論天体力学”（«Traité de mécanique céleste»），第一版于 1799—1825 年在巴黎出版，共五卷。——第 343 頁。
- 304 1522—1523 年的德国貴族起义和 1524—1525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作了闡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83—483 頁）。——第 348 頁。
- 305 英国資產階級历史著作都把 1688 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妥协基础上的、以奧伦治的威廉（从 1689 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 350 頁。
- 306 紅白薔薇战争（1455—1485 年）是两个爭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間即約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間的战争。約克族的紋章上飾有白色薔薇，郎卡斯特族的紋章上飾有鮮紅色薔薇。站在約克族方面的有經

- 济比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騎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族的是北部諸郡的封建貴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結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鐸王朝的統治，实行了专制政体。——第 350 頁。
- 307 語出霍布斯“論公民”（《De Cive》）一书序言，該书于 1642 年在巴黎写成，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1647 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第 352 頁。
- 308 笛卡儿学派的哲学是十七世紀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拉丁文为 *Cartesius*）的继承者的学說，他們从他的哲学中做出了唯物主义的結論。——第 352 頁。
- 309 恩格斯指的是 1789 年制宪議會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闡明了新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政治原則。1791 年的法国宪法中包括了这篇宣言；根据它起草的 1793 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置于 1793 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的第一个共和宪法的前面。——第 352 頁。
- 310 *Code civil*（民法典）是 1804—1810 年法国在拿破侖第一时代制訂的（因此民法典又通称为拿破侖法典）、系統地闡明資產階級法权的五部法典之一。恩格斯把 1804 年通过的民法典称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会的法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311 頁）。——第 353 頁。
- 311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小資產階級激进阶层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对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中的、主要是联合在伦敦通訊协会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訊协会中的法国革命拥护者（在协会的組織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訊协会都受到英国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的迫害。——第 354 頁。
- 312 見注 276。——第 355 頁。
- 313 1824 年英国議会在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废除禁止工人結社（工联）的法令。1825 年，議會通过了結社法亦称工人联合

法, 這項法律重申廢除禁止工聯的決定, 但是嚴格限制工聯的活動。例如僅僅宣傳工人結社和參加罷工就被看做“強制”和“暴力”, 而受到刑事處分。——第 355 頁。

314 人民憲章——見注 274。

反谷物法同盟 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組織, 於 1838 年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所創立。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 廢除谷物法 (見注 266), 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 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土地占有者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谷物法廢除以後, 同盟即不存在。——第 355 頁。

315 瓊生大哥 (Brother Jonathan) 是在英屬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時 (1775—1783 年) 英國人給北美人起的綽號。

基督復活派 是新教教會中的一個流派, 十八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英國, 流行於北美。它的信徒力圖通過宗教說教和組織新的信仰者的團體來鞏固和擴大基督教的影響。——第 356 頁。

316 指 1867 年得比—迪斯累里的保守黨政府實行的議會改革 (見注 277)。——第 357 頁。

317 關於英國實行秘密投票和 1884 年議會改革, 見注 277。——第 358 頁。

318 見注 135。——第 359 頁。

319 崇禮派 (更流行的名稱是皮由茲教派) 是產生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國教會中的一個流派。它的信徒號召在英國國教中恢復天主教的儀式(崇禮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義。——第 359 頁。

320 恩格斯指的是路·布倫坦諾論述英國工聯的著作和言論 (見注 184)。在這些著作和言論中, 布倫坦諾竭力稱贊英國的工聯主義, 說它是工人階級組織的典範, 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使工人階級狀況得到根本的改善, 並擺脫資本主義剝削。按照布倫坦諾和其他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說法, 組織得很好的工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政黨成為多餘

- 的。恩格斯在“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这部著作(本卷第 107—213 頁)中揭露了这种說法的虚伪性质和阶级內容。——第 360 頁。
- 321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原拟于 1892 年 4 月 17 日在林茨开幕。但在 4 月 2 日,当局禁止代表大会在这个城市举行。因此,代表大会改于 1892 年 6 月 5 日在維也納召开。虽然奥地利政府于 5 月底取消了它的禁令,可是代表大会还是于 1892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在維也納举行。代表大会研究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問題和組織問題,通过了章程并对党綱作了补充。——第 362 頁。
- 322 恩格斯为“前进报”写的悼文“卡尔·肖萊馬”于 1892 年 7 月 3 日发表在該报上,它还载于 1892 年 7 月 15 日“工人报”第 29 号和保加利亚杂志“日子”(«ДЕНЬ») 1892 年第 7 册。——第 363 頁。
- 323 欧文斯学院 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它是 1851 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約翰·欧文斯在遺囑中为它留下的資金創办的。——第 363 頁。
- 324 关于恩格斯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事,見注 225。——第 365 頁。
- 325 1890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恩格斯同肖萊馬到挪威和北角旅行。1891 年 7 月底至 8 月恩格斯同肖萊馬游威特島,他們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但肖萊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这次旅行;恩格斯同内姪女瑪·艾·罗舍、秘书路·考茨基夫人于 1891 年 9 月作了这次旅行。——第 365 頁。
- 326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69—587 頁)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該书 1892 年英国版序言(見本卷第 311—325 頁)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譯成的德譯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 1885 年“新时代”杂志第 6 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結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第 367 頁。
- 327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60—266 頁)。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

序言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闡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同上，第 345—353 頁)做序言。——第 367 頁。

- 328** 1876 年 5 月 10 日，为紀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覽会在費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覽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評判小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則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嘩然。“人民国家报”在 7 月至 9 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拿战役，是借普魯士軍隊在 1806 年 10 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侖法国击潰一事来作比喻。——第 368 頁。
- 329** 这两个片断大概是恩格斯在准备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文第二版时写的。——第 384 頁。
- 330** 恩格斯指的是 1889—1890 年在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造成了金融市場的恐慌、劇烈的通貨膨脹、大規模的破产，国債亦因之停止偿付。这次危机是 1890 年世界經濟危机的表現之一，它促进了世界經濟危机在其他国家特別是在英国的发展，因为英国在阿根廷是有巨額投資的。1889—1890 年的危机加紧了欧洲金融資本对阿根廷的經濟奴役。——第 385 頁。
- 331** 給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针对 1892 年 9 月 5 日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下列两个決議写的：一个決議是拒絕接受由負責筹备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組織委员会发出的要求参加該代表大会的邀請，另一个決議是召开討論八小时工作日問題的国际代表大会来代替上述代表大会。这两个決議是企图破坏馬克思主义者所筹备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分裂的又一次嘗試（这一次是由保守的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領導出面）。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領袖們的分裂行为；他給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寄去了內容相同的信件，建議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譴責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手法。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在 1892 年 10 月 2 日給恩格斯

的复信中說，它将抗議英国工联的行为，并确认自己贊同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第 386 頁。

- 332** 議會委员会 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顛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 1871 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閉幕期間是工联的領導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議員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屆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貴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 年，議會委员会被不列顛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 386 頁。
- 333** 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它于 1893 年 12 月在芝加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決議是：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和通过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在內的綱領。这一決議的通过证明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进步力量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增长了。——第 386 頁。
- 334** 1892 年 9 月 19—23 日在馬賽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別的問題(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討論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決議。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項決議：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討論八小时工作日問題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請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同年 9 月 24—28 日在馬賽举行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見注 503)，大会通过了类似的決議。——第 387 頁。
- 335**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是恩格斯在 1892 年 11 月 9 日和 15 日之間，就美国民主党上台一事而写的。民主党代表人物克利夫兰于 1892 年 11 月 8 日当选为总统，代替了共和党人哈里逊。恩格斯认为美国政府的这次更迭同要求废除 1890 年采取的麦金利保护关税率的愿望有关。这套为保证资本家首先是垄断組織获得高额利潤而实行的关税率，大大提高了进入美国的工业品的进口稅，結果促进了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在竞选期間攻击麦金利关税率的民主党人于 1894 年实行了新的关税率，新稅率比 1890 年規定的虽然是降低了，但

仍然带有明显的保护关税性质。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除在“前进报”上发表外，还转载于1892年11月21日“选民报”第270号和1892年11月25日“工人报”第48号。——第388頁。

33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72—389頁。——第388頁。

337 恩格斯指的是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发表的一篇短文：“美国紡織工业在中国市場”。——第390頁。

338 关于卡特尔，見注7。——第390頁。

339 这篇卡尔·馬克思的传记，恩格斯是应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而写的。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十周年，这篇传记还发表于1893年3月17日“工人报”第11号(标题是：“卡尔·馬克思生平”)，以及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1893年第3期。——第392頁。

340 卡·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7—98頁)。——第392頁。

341 指卡·馬克思的以下几篇文章：“第六届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一篇論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记录的辯論、“第六届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三篇論文)”。关于林木盜窃法的辯論和“摩塞尔記者的辯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135—181和210—243頁)。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1842年4月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萊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普魯士政府对“萊茵报”进行了特別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閉了。——第

392 頁。

- 342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简称;自1841年7月由阿·卢格主编,以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在此以前(1838—1841年)该杂志是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哈雷(普鲁士)出版的。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并决定在全德境内予以查禁。——第393頁。
- 343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論犹太人問題”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和“英国状况。評托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現在’”(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和626—635頁)。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393頁。
- 344 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頁。——第393頁。
- 345 “前进报”(《*Vorwärts!*》)是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该报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加该报的編輯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銳的批評。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內閣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驅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393頁。
- 346 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和444—459頁。——第394頁。
- 347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創办的;1847年1月創刊,1848年2月停刊。

起初，該報的方針是以它的編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調和激進和民主營壘的各種派別這種意圖決定的。但從1847年夏天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戰友在該報發表文章以後，該報就日益成了宣傳革命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報的經常撰稿人並對該報的方針開始發生直接影響，1847年最後幾個月，他們實際上已經掌握了該報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該報成了形成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馬克思在該報發表過以下的文章：“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7—222和322—356頁）等。“德意志—布魯塞爾報”還發表過恩格斯的文​​章“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1847年的運動”、“奧地利末日的開端”（同上，第223—275、297—315、505—515和516—523頁）等。——第394頁。

348 共產主義者同盟 是第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它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把正義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業者的秘密團體——改組之後於1847年6月初在倫敦成立的。1847年1月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建議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並參加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原則改組同盟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表示同意。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和組織原則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並在同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1847年6月初和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上得到批准。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委託，起草了於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到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所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

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頁)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当时，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領導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組并且繼續进行活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規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該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經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員还是繼續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鍛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394頁。

349 下面是恩格斯为写“卡尔·馬克思”一文而开列的馬克思著作书单的譯文(日期写錯的已改正):

馬克思著作

(1) 論伊壁鳩魯哲学的博士論文。

(2) 关于萊茵省議会就林木盜窃法进行的辯論的文章和关于摩塞尔流域农民的文章,1842年在“萊茵报”上发表。

(3) 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論犹太人問題”。

(4) 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出版。

(5) 1844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6) 1846—1847年[誤, 应为 1847—1848年]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

(7) “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1847年在布魯塞尔和巴黎出版。

(8)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1848年在布魯塞尔出版。

(9) 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譯本。

(10) 在“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論等等以及“雇佣劳动与資本”。

(11) 1849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中的辯护詞。

(12) 1850年在汉堡“新萊茵报。評論”上发表的文章“从 1848 到 1849 年”(关于法国的二月革命)以及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文章、每月述評。

(1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年在紐約出版(18 [85] 年在汉堡出第三版)。1891年出法文譯本。

(14)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3年在波士頓(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

(15) 1852—1861年在“紐約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关于帕麦斯顿的若干篇(1856—1857年在伦敦作为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和传播)。

(16) “十八世紀外交史内幕”, 1856年6月28日—1857年4月1日先后在“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和伦敦“自由新聞”上发表。

(17) 关于 1859 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間的外交談判的文章, 1859 年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表。

(18) “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年在柏林出版。

(19) “福格特先生”, 1860年在伦敦出版。

(20) 1864年的国际成立宣言以及总委员会的所有公告, 包括 1871 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几乎所有欧洲各国文字都有譯本。

(21) “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册, 1867年在汉堡出版, 1890年出第四版。有俄文、法文、英文譯本。

(22) (逝世后) “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册), 1885年由弗·恩格斯在

汉堡出版，1893 年第二版在排印中。

(23)(逝世后)“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册)，同前，将于 1893 年出版。——第 395 頁。

- 350 在 1849 年 2 月 7 日举行的对“新萊茵报”的审判中，該报总編輯馬克思、編輯恩格斯和发行負責人海·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該报 1848 年 7 月 5 日发表的一篇題为“逮捕”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0—193 頁)中侮辱和誹謗了普魯士当局和宪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中的发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262—278 和 279—285 頁。

在 1849 年 2 月 8 日的审判中，馬克思被控的罪名是，他作为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員，曾經煽动叛乱，因为他會同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一起签署了这个委员会 1848 年 11 月 18 日发表的号召拒絕納稅的呼吁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9 頁)。馬克思在这次审判中的辯护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286—306 頁。——第 397 頁。

- 351 1849 年 6 月 13 日小資产階級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議派遣法国軍队去鎮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該宪法禁止使用法国軍队去反对別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軍队驅散，它的失敗证实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的破产。6 月 13 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 397 頁。

- 352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 12 月創辦、1850 年 11 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新萊茵报”的繼續。該杂志从 1850 年 3 月到 11 月底总共出了 6 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 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編輯，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书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約·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法兰西階級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

- 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397页。
- 35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頁。——第397頁。
- 35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頁。——第397頁。
- 355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则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該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繼續了10年以上。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写的。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馬克思停止为該报撰稿，馬克思所以停止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主要的原因是編輯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該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97頁。
- 356 卡·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頁)。——第397頁。
- 35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頁。——第398頁。
- 35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頁。——第398頁。
- 359 恩格斯指的是1861—1863年馬克思的經濟学手稿。这一著作即后来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論”。——第398頁。
- 36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98頁。
- 361 恩格斯指的是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綱領性文件时的一場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成立大会(大会是1864年9月28日在圣馬丁堂召开的)所选出的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所任命的綱領性文件起草委员会里。1864年10月8日馬志尼企图通过他的追随者、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强迫起草委员会接受充滿资产阶级民主和密謀原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

程作为纲领性文件。10月18日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看到了马志尼的文件并批评了它；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这个文件以必须交给起草委员会做最后的审订为理由，实际上被拒绝了。10月20日起草委员会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在10月27日通过了他起草的两个全新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和15—18页）。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在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后来叫做总委员会）上一致通过。——第398页。

36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第398页。

363 见注134。——第399页。

364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是1875年至1879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第400页。

365 下面是恩格斯著作书单的译文。恩格斯最初写这个书单看来是在1889年，后来他大概在1892年底又加以补充（所以书单开始部分列有的某些著作的1889—1892年版本没有标出。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1）（同卡·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写，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英译本1887年在纽约出版。

（3）（同卡·马克思合写，无署名）。“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作为编辑代总编辑执笔（代马克思）在科伦“新莱茵报”上写的文章。

同前，1850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写的文章。

(6)“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在汉堡出版。

(7)“德国农民战争”,由萊比錫印刷公司根据“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重印出版,[1850年]出第一版,[1870年]出第二版,1875年出第三版。

(8)“論住宅問題”,三个分册。1872年由萊比錫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第一版,1887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9)“論俄国的社会問題”,1875年由萊比錫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10)“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魯士烧酒”,1876年由萊比錫印刷公司出版。

(11)“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記”,[1874年]由萊比錫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12)“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由萊比錫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重印,出第一版,1886年由苏黎世瑞士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1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三版均于1883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法文、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羅馬尼亚文、丹麦文、荷兰文譯本)。

(1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見解而作”,1884年由苏黎世沙貝利茨出版社出版,[1886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第二版,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意大利文、羅馬尼亚文、丹麦文和法文譯本在翻譯中)。

(15)“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888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根据“新时代”重印出版。

(4)“波河与萊茵河”,1859年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

(5)“薩瓦、尼斯与萊茵”,1860年由柏林貝伦茲出版社出版。

(16)“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关于所謂捏造引文問題”,1891年在汉堡出版。

下列著作的序言和导言:

(3)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德譯本,1885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

(序言, 駁洛貝尔图斯)。

(1)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1883年第三版和1890年第四版(駁路·布伦坦諾)。

(1)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序言(駁洛貝尔图斯), 1885年。

(4) 1849年发表的“卡·馬克思在科伦的陪审法庭上”, 1849年根据“新萊茵报”重印出版, 1885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

(5) 卡·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重印本, 1885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6) 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 1849年根据“新萊茵报”重印出版, [1886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 威·沃尔弗的传记和“关于普魯士农民的历史”)。

(7) 西·波克罕“紀念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1888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 西·波克罕的传记)。

(1) 卡·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 賽·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三版翻譯并由弗·恩格斯負責出版的譯本, 1887年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版(校訂譯文并写序言)。

(2) 1846年[誤, 应为1848年]卡·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发表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弗·凱·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譯本, 1888年在波士頓和伦敦出版(关于自由貿易的序言, 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

(3) 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階級狀況”, 弗·凱·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譯本, 1887年由紐約拉弗耳出版社出版(附录和序言)(序言还曾以“美国工人运动”为标题于1887年在紐約用英文和德文出版单行本。1887年由伦敦里夫斯出版社重印。并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1892年由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第二版(序言有一部分是新的)。

1890年5月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用俄文載于1890年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和第2册, 用英文載于1890年4月和5月“时代”杂志, 用法文載于“新思想”杂志, 用羅馬尼亞文載于1890年5—7月“現代人”杂志)。

(4) 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第401和402頁。

- 366 卡·馬克思曾計劃寫一部關於十八世紀英國和俄國的外交史的著作。這裡指的是他為此著作而寫但沒寫完的導言。這篇導言最初於1856年6月至1857年4月在“設菲爾德自由新聞報”和倫敦“自由新聞”上發表，標題是：“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1899年又由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艾威林在倫敦以單行本出版，標題是：“十八世紀外交幕後史”（《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1855年至1865年在倫敦出版）和“設菲爾德自由新聞報”（《The Sheffield Free Press》，1851年至1857年在設菲爾德出版）是烏爾卡爾特及其支持者出版的英國資產階級報紙。——第403頁。

- 367 恩格斯指的是1859年6—8月“人民報”上發表的馬克思的下列幾篇文章：“斯普累河與明喬河”、“一八五九年的愛爾福特精神”、《Quid pro quo》（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35—438、462—465和503—523頁）。

“人民報”（《Das Volk》）是一家週報，從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倫敦用德文出版。該報是作為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的正式機關報而創辦的。第1號由德國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埃拉爾特·比斯康普編輯出版。從第2號起，馬克思就積極地參加了該報的出版工作。從7月初起，馬克思實際上成了該報的編輯，該報也成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機關報。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問題的研究在“人民報”上得到了反映。該報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出發，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戰爭中的事件、德國統一問題和意大利統一問題，對波拿巴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該報總共出版了十六號就因缺乏資金而停辦了。——第403頁。

- 368 恩格斯寫這篇給“柏林人民論壇”報編輯部的聲明，是由於該報發表了一組題為“汝拉聯合會和米哈伊爾·巴枯寧”的文章。這組文章幾乎全以巴枯寧派的材料為根據，凭空捏造在瑞士的第一國際組織的歷史，為巴枯寧派、尤其是為無政府主義的汝拉聯合會的分裂主義破壞活動辯

护，汝拉联合会是1870年4月4—6日紹德封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語区国际各支部中引起分裂以后組成的。这組文章采用了对总委员会、对馬克思和他的战友們、尤其是对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許多誹謗性的杜撰。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十篇文章对历史事实歪曲得特別厉害。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駁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給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轉交給“柏林人民論壇”編輯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給倍倍尔的信里請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該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許这种謊言再瞎扯下去”。

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論壇”报上，而1892年12月24日，該报除了刊載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这組文章的作者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他对声明的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专门写給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詞，企图駁倒对他歪曲第一国际历史所作的譴責。恩格斯在1893年1月20日写复信給艾里提埃，揭穿他支吾其詞、企图推卸歪曲事实和偏袒巴枯宁派地闡述事实的責任，使对方知道，第一国际的历史是不容許捏造的。——第405頁。

- 369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議——見注109。——第405頁。
- 370 恩格斯把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和共同章程(1871年)的緒論部分对这一重要原理的表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頁和第17卷第475頁)同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魯东主义者托伦的章程法文譯本对这一原理的歪曲的表述加以对比。——第406頁。
- 371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見注97。——第406頁。
- 372 指1871年公布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頁)。——第406頁。
- 373 恩格斯叙述伦敦代表会議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分裂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2—465頁)的大意。——第407頁。
- 374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是巴枯宁在1868年在日内瓦創建的組織。同盟的盟員宣布階級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綱領。他們否认工人階級进行

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407页。

375 見注134。——第407页。

376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原是用法文出版的；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的校订工作。——第408页。

377 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的资料来源，是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第284号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果的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全部引用了这篇报道，亲自把它译成德文，为了想把若干地方搞得更准确、更清楚，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一家社会政治性的报纸，是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63年至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1863年至1867年每周出刊三次，1868年起改为日报。——第409页。

37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0页。——第409页。

379 吉里亚克人 是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

北部和中部的民族。——第 410 頁。

380 十二銅表法 是最古的羅馬法文獻，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叶編成，是平民反对貴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羅馬有效的习惯法；十二銅表法反映了羅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上（銅表）上。——第 411 頁。

381 “民族学評論”（*«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一家俄国杂志，1889 年至 1916 年由莫斯科大学附属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学部出版，每年出刊四期。

施特恩堡“庫頁島的吉里亚克人”一文載于該杂志 1893 年第 2 期。——第 413 頁。

382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于 1892 年 12 月底通过“工人新聞”編輯部向他发出的請他参加該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請而写的。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 1893 年 1 月 6—8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上，以全国工人患病殘废保險基金会的领导为首的党的机会主义派和以保·恩格耳曼为首的革命派之間展开了斗争。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对占党员多数的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的影响，使代表大会批准了他们事先（1892 年 12 月）就通过的关于开除恩格耳曼及其拥护者出党的決議，他們虛伪地指責恩格耳曼濫用党的經費和破坏民主。为了掩盖自己对党内革命派的迫害，机会主义者故意把全部斗争說成是个人的意見分歧，在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党向 1893 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談到了这一点。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的組織章程。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代表大会隱瞞了恩格斯主张平心靜气地解决意見分歧的賀信，也沒有把它在党的报刊上发表。——第 414 頁。

383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由于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以策划謀杀亚历山大三世的罪名遭到逮捕而写的。恩格斯从波兰社会主义者瑪丽亚·門德尔森那里得到这次逮捕的消息后，立刻起来維護波兰革命者，揭露法国警察

当局和沙皇政府警察当局的合伙阴谋。文章发表在 1893 年 1 月 13 日“前进报”第 11 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 415 页。

- 384** 巴拿馬丑聞 是巴拿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據工程師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創議、为了开凿經過巴拿馬地峽的运河而于 1879 年成立的。1888 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閉。后来，到 1892 年才发现，該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务状况和濫用所筹集的资金會广泛采用收买和賄賂手段，法国前內閣总理弗雷西訥、魯維埃、弗洛凱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員都接受过这种賄賂。巴拿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資產階級司法機關悄悄了結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其中包括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馬”一詞就成了表示大騙局的普通名詞。

恩格斯把法兰西共和国称做“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是指法国两个主要的資產階級执政党而言，一个是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所謂“机会主义派”)，它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个是激进派，它是从“机会主义派”当中分裂出来的議會党团，仍繼續坚持一些实际上已被資產階級共和派抛弃了的資產階級民主要求；1901 年，激进派組成成为主要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党。——第 415 页。

- 385** 恩格斯指 1891 年 7 月在海軍上将热尔韦指揮下的法国分舰队对喀琅施塔得的訪問(見注 254)。——第 417 页。

- 386**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馬”一文是恩格斯为了評論 1892 年 12 月—1893 年 1 月意大利議會关于羅馬銀行的舞弊問題进行的辯論而写的；辯論的起因是議員科拉揚尼的发言。在辯論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許多議員、律師、新聞記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 *panamino* (小巴拿馬)。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当时与他通信的意大利学者、社会党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奧拉寄来的材料(議會报告、报纸)。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們的书信往来，于是

- 匿名发表了这篇文章；因为正如他在 1893 年 1 月 29 日給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指出的，署名可能“使羅馬的坏蛋們找到我的意大利报告人的踪跡”。——第 418 頁。
- 387 韦耳夫基金 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賄买报刊的一种特別基金。——第 418 頁。
- 388 “那不勒斯信使报”（《Corriere di Napoli》）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88 年創刊。——第 422 頁。
- 389 “世紀报”（《Il Secolo》）是意大利激进派的日报；从 1866 年起在米兰出版。——第 423 頁。
- 390 “議會报”（《Il Parlamento》）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 1853 年起在都灵出版。——第 425 頁。
- 391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請求，用法文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单行本写的，这个版本由“社会評論”杂志社于 1893 年在米兰出版，譯者是龐·貝蒂尼（序言是屠拉梯翻譯的）。該书还收有恩格斯为“宣言”1890 年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請求在 1893 年 1 月寄給他的。——第 429 頁。
- 392 見注 278。——第 429 頁。
- 393 “欧洲能否裁軍？”一文是恩格斯于 1893 年 2 月間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討論政府提出的軍事法草案問題而写的。草案規定大大增加軍队和追加軍事开支的撥款，数量极大的撥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滿；这一点甚至使得一些資产階級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因此在 1893 年 5 月，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但是在 1893 年 7 月，在解散帝国国会和进行了新的选举之后，帝国国会批准了一个类似的軍事法草案。
-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倍倍尔請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这个問題上应采取的立場表示自己的意見。恩格斯在把手稿寄往柏林准备在“前进报”上发表时，在 1893 年 2 月 24 日給倍倍尔的信中建議以一組文章（分为八篇）的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它，这个建議被採納了。1893 年 3 月底，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恩格斯为

这本小册子写了專門的序言。

恩格斯的这組文章还轉載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选民报”1893年3月20、21、23、24、25、27、28和30日的第65、66和68号以及第69、70、71、72和74号的附刊上。在前面加的編者按語中指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具有普遍的意义。——第433頁。

- 394** 后备軍 是德国陆軍的一个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侖軍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魯士后备軍，包括年齡較大的在常备軍及其預备队中服役期滿的应征人員。在平时，后备軍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訓。在战时，后备軍用来补充作战部队，以及(年齡較大的后备軍兵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

在十九世紀下半叶，許多国家，其中包括奥匈帝国，都仿效普魯士后备軍的样子建立了預备队組織。——第437頁。

- 395** 法兰克福和約——見注195。

提尔西特和約——見注34。——第438頁。

- 396** 地方部队 从1872年起是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战时，建立这种部队是为了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在常备軍及其預备队中服役期滿的年齡較大的应征人員参加地方部队服役6年并参加其預备队服役6年。

民軍 是1813—1814年在普魯士出現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軍应由未曾在陆軍或海軍中服役的、年齡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員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438頁。

- 397** 維尔特(亚尔薩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以麦克馬洪指揮下的法国軍队失败而告終。

色当会战——見注194。

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魯士軍队击潰了弗罗薩尔將軍指揮下的法軍第二軍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做福尔巴赫会战。——第440頁。

- 398** 指1893年2月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关于未来国家的原則

的演說。

在普魯士軍隊、后来在德国軍隊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緩期服現役的适齡人員組成的那一部分預备兵員，叫做补充兵；补充兵的服役期在1874年規定为12年，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充軍隊。——第441頁。

399 指在1867年以普魯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斯塔德（这个公国的一部分領土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采用了普魯士的軍事制度。——第441頁。

400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普魯士近卫炮兵旅中服兵役。

庫弗尔格拉班 是柏林的一条运河，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近。——第444頁。

401 恩格斯指他在1860年3月底至4月初因父亲逝世而到巴門去了一趟。——第446頁。

402 恩格斯举的是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发表的編輯部文章“老一套的詭計”，內容是批評新的軍事法草案。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机关报，1885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报纸的領導人是李希特尔。——第451頁。

403 巴黎公債——見注255。——第458頁。

404 恩格斯的著作在“前进报”（1893年3月9日第58号）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編輯部代之以用括号括起来的下列按語：“恩格斯这里指出了从前因士兵受到痛苦不堪的虐待而經常引起的那些后果。不論这些材料是多么客观，我們都没有加以登載，因为我們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它常常把为了提出警告而对事实作客观的叙述看成是故意要引起这种事实的再度发生。”

“前进报”編輯部对文章所做的删节以及促使它这样做的情由都证明：报纸編輯部被恩格斯著作的革命調子吓倒了，因为这个地方直接号召起来反抗对士兵所施加的暴力和专橫。在单行本中，恢复了被删去

- 的这一段，而刪掉了編輯部的按語。——第 461 頁。
- 405 关于在耶拿的潰敗，見注 34。——第 462 頁。
- 406 三国同盟 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軍事政治联盟。同盟于 1882 年因意大利加入 1879 年締結的德奧軍事同盟而最終形成。三国同盟条約的期限訂为五年，但是在 1887 和 1891 年这个条約又重新訂立，后来在 1902 和 1912 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敌对陣营，这样终于导致了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 1915 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国家。——第 463 頁。
- 407 1866 年 8 月 23 日簽訂的 布拉格和約 結束了 1866 年的普奧战争。和約把在战争中遭到失敗的奥地利不得不放弃同普魯士爭夺德意志領導权的斗争并同意成立以普魯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固定下来。根据和約第五条，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一切权利让給了普魯士(从奥、普在 1864 年战争中战胜了丹麦以来，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一直处于奥普共同占領之下)，同时北什列斯維希必須重新同丹麦合并，如果当地居民通过全民投票同意这一点的话。但是普魯士沒有履行和約的这一条款，而把北什列斯維希据为已有。1878 年，布拉格和約第五条被宣告废除。——第 464 頁。
- 408 指普法战争时期在 1870 年 9 月至 1871 年 1 月巴黎被德軍围困期間巴黎居民粮食紧张的情况。——第 466 頁。
- 409 1892 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議會选举的結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組織进行得很成功，他們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凱·哈第，約·白恩士，約·哈·威尔逊——当选为議員。——第 469 頁。
- 410 恩格斯指的是关于議會議員支薪的法律草案和关于規定平等投票权的法律草案。平等投票权就是每个选民只能投一次票，而不是照当时实行的选举資格限制制度那样，一个选民能投几次票(按其住宅所在地、财产所在地等等)。靠 1892 年选举上台的格萊斯頓的自由党政府，在

- 人民群众要求废除资产阶级和贵族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特权的压力下，曾提出上述两个法律草案，但都被上院所否决。——第 469 頁。
- 411 給奥地利工人的賀信是恩格斯应奥地利 5 月 1 日的专刊“庆祝五一节”編輯米·沙赫尔的請求写的；米·沙赫尔在 1893 年 1 月 14 日就这个问题給恩格斯写了一封信。
- 賀信是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为題发表的。这个专刊还刊载了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以及保·拉法格、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格·瓦·普列汉諾夫和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为庆祝五一节給奥地利工人的賀信和关于无产阶级节日的文章。——第 470 頁。
- 412 在 1892 年的市鎮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取得了巨大胜利，获得了 10 万张以上的选票。——第 470 頁。
- 413 恩格斯指政府参事查普卡在 1893 年 1 月 17 日奥地利帝国議會會議上承认（在他回答社会民主党議員的质詢时）地方当局在奥地利的一些地区破坏結社和集会权利的行为是非法的。——第 470 頁。
- 414 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应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ální Demokrat»）編輯部的請求而写的；該报編輯部曾于 1893 年 3 月写信給恩格斯，請他为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筹办的五一专刊写一篇短文。这个专刊还刊登了保·拉法格、奧·倍倍尔和其他活动家給捷克工人的賀信。——第 472 頁。
- 415 馬克思曾于 1848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到維也納去了一趟，目的是加强同奥地利民主主义組織和工人組織的联系，促使它們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指望得到繼續出版“新萊茵报”的經費。——第 472 頁。
- 416 恩格斯指 1890—1893 年在比利时开展的爭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議院于 1893 年 4 月 18 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 月 29 日由參議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統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滿

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滿 1 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該法律还規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們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給一两张选票。——第 473 頁。

- 417 法国的众議院設在巴黎的 波旁王宮。——第 474 頁。
- 418 給西班牙工人的五一賀信是恩格斯应西班牙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帕·伊格列西亚斯的請求写的。伊格列西亚斯曾在 1893 年 4 月写信給恩格斯，請他为“社会主义者报”五一号写一篇文章。——第 475 頁。
- 419 1808 年 5 月 2 日，馬德里爆发人民起义，反对占領西班牙的拿破侖軍隊。起义遭到法国軍隊的殘酷鎮压。但是起义为西班牙人民爭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西班牙人民怀念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每年都要紀念 5 月 2 日这一天。——第 475 頁。
- 420 居住在日內瓦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斯托揚·諾科夫把 1892 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2 期寄給恩格斯，恩格斯写了这封复信。恩格斯通过諾科夫把信寄給編輯部，編輯部把信譯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 1893 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3 期上，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編輯部在恩格斯的信后边写了一篇不长的后記，簡要介紹社会主义运动的領袖們、首先是恩格斯的活動，举出对保加利亚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的几篇著作。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是一家保加利亚的社会、文学季刊，1892 年至 1893 年在塞夫利厄伏市出版。該刊編輯是日內瓦大学学生斯·巴拉巴諾夫（赫利斯托夫）和克·拉柯夫斯基，他們在瑞士准备好材料，再寄給保加利亚的出版者去发排。該杂志刊載过几篇譯成保加利亚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第 3 期上，除了上述恩格斯的信以外，还刊載了恩格斯写的馬克思傳記，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的一部分，以及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第三节。該杂志还发表过格·瓦·普列汉諾夫、保·拉法格以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文章。

“社会民主党人”編輯部試圖把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方法传入保

加利亚。但是,杂志的出版者们的理论观点不明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上带来了混乱。编辑部的缺陷是脱离保加利亚的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人”曾反对为在保加利亚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斗争的季·尼·布拉哥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第477页。

421 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刊载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第478页。

422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在1893年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演说。恩格斯在欧洲旅行并预先访问了德国之后,来到苏黎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恩格斯以名誉主席的身分宣布代表大会闭幕。

恩格斯的演说当时被广泛地发表在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报刊上。它的记录发表在1893年8月15日“前进报”第190号附刊和1893年9月1日“工人报”第35号上(略有删节),同时还发表在1893年9月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55号和其他机关报刊上。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

的立場。

在討論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問題时，代表們批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場。代表大会认为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关于這個問題的決議是正确的。关于第二個問題，通过了一項決議，认为議會斗争形式和非議會斗争形式必須結合起来。但是，过分地強調爭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对議會活动的作用的估計是过高了，改良主义情緒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問題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個問題的报告人是格·瓦·普列汉諾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紐文胡斯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并且确认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关于這個問題的決議的基本原则，但作了一点补充：号召工人为爭取裁軍而进行斗争，責成社会主义者議員在議會中投票反对軍事撥款。——第479頁。

423 恩格斯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見注134)。——第479頁。

424 見注97和注241。——第479頁。

425 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維也納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1893年9月11日組織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1893年9月15日“工人报”的报道，大約有六百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1893年9月14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閉幕的大会，大約有二千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維·阿德勒、奧·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話，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說。

恩格斯的演說的报道，除載于“工人报”和“新自由报”外，还載于1893年9月17日“前进报”第219号。——第481頁。

426 恩格斯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于1893年7月9日組織的維也納工人爭取普选权大示威。共有四万多人参加了示威。在示威的时候举行了許多工人大会，在維也納市政厅大厦里也举行了工人大会。——第482頁。

427 恩格斯从瑞士回去时，在造訪維也納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日至28日他都在柏林。他在这里，也同在維也納一样，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恩格斯自己在1893年10月7日給左尔格的信里曾經提到这件事。在此期間警察当局也密切注視着恩格斯的行踪，保存下来的維也納警察局和柏林警察局的密探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

恩格斯的演說是在柏林为欢迎他而在1893年9月22日举行的大会上作的。参加大会的达四千人。9月26日恩格斯出席了同志宴会，威·李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用。——第483頁。

428 恩格斯指自己于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兵役。——第483頁。

429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很大胜利的1893年6月的帝国国会选举。恩格斯在同英国報紙“每日紀事报”記者的談話（見本卷第631—636頁）中对这次选举的結果作了評价。——第484頁。

430 恩格斯在1893年到德国去之前，曾經在1876年6月下半月到德国去过，当时他是去海得尔堡处理家庭事务。——第484頁。

431 这封賀信是恩格斯为答謝邀請他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国际代表大会而写的，发表在“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一同发表的还有格·瓦·普列汉諾夫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賀信）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志“日子”（«ДЕНЬ»）1894年第4—5册上。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組的倡議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1893年12月22日至25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阿尔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羅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組織的代表共26人。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脑力劳动工作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反犹太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等問題。代表大会的決議貫徹了第二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決議的精神。大会还建議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設立旨在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的国际書記处。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是一家社会主义的双周报，从1891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起初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93年年底起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书记处的机关报。——第487頁。

- 432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了重印他在1871—1875年写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而写的，这些著作和文章集成单行本文集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 (1871—75)》）。这篇序言的俄譯文最先发表于“知識”丛书：弗·恩格斯“1871—1875年論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5頁。——第488頁。
- 433 卡·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頁；弗·恩格斯的文 章“再論‘福格特先生’”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頁。——第488頁。
- 434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載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記”[1874年]萊比錫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 [1874]）（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頁）。——第488頁。
- 435 指“流亡者文献”一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1874年6月至1875年4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載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文章的标题“波兰宣言”是作者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1—578頁）。——第488頁。
- 436 指“流亡者文献”一組文章中的第二篇，載于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9—587

- 頁)。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 1894 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第 488 頁。
- 437 在 1893 年 8 月 20 日和 9 月 3 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选出了 5 名布朗基主义者：瓦扬、博丹、肖维埃尔、馬·桑巴、瓦尔特。——第 489 頁。
- 438 法国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在 1880 年通过了一项赦免公社社员的法律(7 月 11 日颁布)；这使公社的许多被流放的人和流亡者得以返回祖国。——第 489 頁。
- 439 恩格斯说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见注 384)。——第 489 頁。
- 440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 socialiste. Organ du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是布朗基派的一家周刊；1890 年至 1898 年在巴黎出版。——第 489 頁。
- 441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这篇文章刊载在 1875 年 4 月 16、18 和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3、44 和 45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10—623 頁)，接着便印成单行本：《*Sociales aus Rußland*》，Leipzig, 1875，恩格斯还为单行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导言(同上，第 641—644 頁)。恩格斯把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并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 442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见注 434)是恩格斯在 1894 年 1 月初把“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见注 432)时写的。恩格斯在准备重印“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时，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并删掉旧的副标题：“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换上新的副标题：“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

在“前言”中，事件的日期有个别小小的疏忽。西班牙宣布共和的日期是 1873 年 2 月 11 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日期是 1873 年 5 月

10 日。——第 492 頁。

- 443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跋(見注 441)是恩格斯在把“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时写的。恩格斯在論文集的序(見本卷第 490—491 頁)里說到促使他重印這篇文章并为它写了詳細的跋的原因。

这篇跋的俄譯文(連同恩格斯的“論俄国的社会問題”的譯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1894 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俄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譯文是維拉·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譯出的,格·瓦·普列汉諾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連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各种名称在俄国一再出版。——第 494 頁。

- 444 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 1874 年‘人民国家报’第 117 和 118 号所載‘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 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lings-Literatur» in Nr. 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 Jahrgang 1874. Zürich, Typographie der Tagwacht. 1874)。这封信的俄譯文載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經濟問題論文集”1933 年版第 3 卷第 88—98 頁。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99—609 頁和第 610—623 頁)。——第 494 頁。

- 445 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設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諾威—柏林版第 1—3 册(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Th. I—III. Hannover—Berlin, 1847—1852)。——第 494 頁。

- 446 亚·伊·赫尔岑給“英格兰共和国”(«The English Republic»)杂志編輯威·林頓的信是他在 1854 年 1—2 月写的,并且第一次用英文发

表在林頓的杂志 1854 年第 3 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給林頓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 1885 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一书第 9 頁轉引来的,因此在本版中赫尔岑这封信的文字是照普列汉諾夫书中的那个样子。

赫尔岑給林頓的信的全文,見亞·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第 497 頁。

447 这里所引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評文章“杂志短評”,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5 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奧·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內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設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7 期。两篇文章都收在 1879 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 5 卷,以“論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 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 16—17 頁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 15 頁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諾夫的书上引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該书一样。——第 498 頁。

44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26 頁。恩格斯在这里引“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时是从格·瓦·普列汉諾夫的俄譯文翻譯回去的,因此原文中的引文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的德文稍有出入。——第 503 頁。

44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13—116 頁。——第 504 頁。

450 指載于 1877 年“欧洲通报”杂志第 9 册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 1877 年“祖国紀事”杂志第 10 期上发表的“卡尔·馬克思在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

“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資产階級自由派的一家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从 1866 年至 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該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 年以前該杂志的編輯兼出版者是

米·馬·斯塔修列維奇。

“祖國紀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一家文學政治雜誌，1820年在彼得堡開始出版；1839年起成為當時最好的進步雜誌之一。維·格·別林斯基參加雜誌編輯部，亞·伊·赫爾岑等人為它撰稿。從1846年別林斯基退出編輯部後，“祖國紀事”的作用開始下降。從1863年雜誌轉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薩爾梯柯夫-謝德林手裡以後，“祖國紀事”又走上新的繁榮時期；在這段時間，雜誌把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圍。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後，民粹派對該雜誌取得了占優勢的影響。

“祖國紀事”不斷受到書報檢查的迫害並於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封閉。——第504頁。

- 451 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頁），是馬克思在該雜誌登載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後不久寫的。這封信沒寄出，是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從他的文件中發現的。恩格斯複製了這封信，並將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給了在日內瓦的“勞動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蘇利奇。這封信曾在日內瓦1886年“民意導報”雜誌第5期上發表。在俄國，馬克思的這封信於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報”雜誌上發表。——第504頁。
- 452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I, Hamburg, 1867, S. 763.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及其後各版裡刪去了這個附注。——第505頁。
- 453 以下是引自馬克思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的幾段引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29和130頁）。——第505頁。
- 45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18頁。——第505頁。
- 455 顯然是指民粹派組織“土地和自由黨”（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黨”（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領導機關；後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為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第506頁。

456 这篇短文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一文一样，是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由他整理付印的“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目的是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三卷于1894年秋出版；1894年10月4日恩格斯为它写了序言。看校样花的时间比恩格斯预料的稍微多些。恩格斯在看校样的过程中把副本寄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以便尽快出版第三卷的俄文版，该版于1896年在彼得堡出版。

随着“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5卷第1、2分册）的问世，出版马克思这部天才著作的所有理论性各卷的工作宣告完成，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所有部分也宣告完成，同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获得坚实的科学基础。

短文除载于“前进报”外，还载于1894年1月14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第16期上。——第511页。

457 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加以出版，但这种意图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实现。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对作者的手稿作了许多随意的改动、挪动和删节。直到1954—1961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完成了符合于马克思的计划和作者手稿的材料排列次序的新版“剩余价值理论”。见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1分册（1954年莫斯科版）、第2分册（1957年莫斯科版）、第3分册（1961年莫斯科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第511页。

458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

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7月12日第24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

收在本版的恩格斯这封信，是根据用法文写的并发表在由費耳特里內利学院在米兰出版的1958年“年鉴”上的手稿譯的。除了誊清稿以外，草稿也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在它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草稿。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 是一家德国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第514頁。

- 459 恩格斯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9頁)。——第514頁。
- 460 “改宗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領袖是費·卡瓦洛蒂。他們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場上，在許多場合都同社会主义者趨于一致。——第515頁。
- 46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頁和第502頁。——第515頁。
- 46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9—130頁。——第516頁。
- 463 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賴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們”(更不用說“民主主义者部长們”了)只是資產階級政府可憐的裝飾品而已。
- “改革报”(«La Réforme») 是一家法国的日报，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該报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517頁。
- 464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3月25日至31日在維也納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議程是关于爭取普选权的問題。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項決議，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內的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爭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定繼續

每年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第 520 頁。

- 465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邀请他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写的。这一邀请是“工人新闻”編輯賴施在 1894 年 4 月 30 日的信中向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的复信来晚了，因此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信才在报纸上发表。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于 1894 年 5 月 13—15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党在代表大会上实行了统一；社会主义工党是由 1893 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見注 382）上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该党革命派于 1894 年 1 月成立的。统一是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机会主义者（以前在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的全国工人患病和残废保险基金会的官吏）被排除出领导地位。但是在统一起来的党的执行委员会里，旧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占了一半，这些人虽然不是保险基金会的官吏，但仍然持温和的立场。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提出把争取普选权作为最近的政治任务，并强调了工会在工人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党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但是没有注意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第 521 頁。

- 466 恩格斯指的是 1894 年 4 月 22 日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事件。在这个城市和临近地区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处于极其艰难条件下并长期遭受失业痛苦的农业工人和贫农中间进行了争取保护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积极宣传。在这个城市里组织了一个计有两千会员的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1894 年 4 月 21 日，警察当局没收了联合会的宣传品，4 月 22 日又逮捕了工人领导人亚·散托-科瓦奇。同一天，警察和军队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开枪射击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散托-科瓦奇的工人。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被解散，散托-科瓦奇及其许多拥护者被判处徒刑。——第 521 頁。

- 467 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

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質問題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說，从1841年起他就对这个問題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頁）和“启示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7—13頁）两篇文章里，已經部分地論述了他在这些問題上的見解。

本文是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发表在該杂志1894年第1期和第2期上。这一著作当恩格斯在世时还用法文在1895年4月和5月“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刊登过，是由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譯的。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是在1906年。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是一家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5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523頁。

468 安·門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討”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頁（A. Menger.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Stuttgart, 1886, S. 108）。对該书的批判，見“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516頁）。——第525頁。

469 恩格斯指的是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領袖是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为“馬赫迪”，即“救世主”。起义于1881年开始，1883—1884年获得卓越的胜利，几乎全部国土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軍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統一的馬赫迪国家。只是到了1899年，英国殖民軍队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紛爭而造成的內部削弱，同时依靠武器的絕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第526頁。

470 塔博尔派 是十五世紀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克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們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們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博尔派中間，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他們并曾试图

在消費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則。建立起自己的軍事組織的塔博尔派，是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軍征討的胡斯派軍隊的核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貴族和市民階級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反对塔博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們，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敗，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鎮压下去。——第526頁。

- 471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E. Renan.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Vol. 1—8, Paris, 1863—1883)。——第527頁。
- 472 恩格斯从琉善的諷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話，并不符合于肖特的譯文，而是符合于奧·鮑利譯的这篇作品的德譯文[見“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頁(«Lucian's Werke». Bd. 13, Stuttgart, 1831, S. 1618—1620 und 1622)]。——第527頁。
- 473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第528頁。
- 474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魏特林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組織——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14—232頁)。——第529頁。
- 475 格·庫尔曼“新世界或人間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第VIII、IX頁(G. Kuhlmann. «Die Neue Welt oder das Reich des Geistes auf Erden. Verkündigung». Genf, 1845, S. VIII und IX)。
-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揭穿了庫尔曼的“預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29—640頁)。——第529頁。
- 476 “自由公理會”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教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誠主义的宗教派別。在十九世

紀四十年代，这个宗教派別是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滿的一种表现形式。——第 530 頁。

477. 杜宾根神学学派 是十九世紀上半叶創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聖經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約諸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謬誤，但又力图把聖經里的某些說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聖經的威信受到破坏。——第 531 頁。
- 478 对新約的批判，見布·鮑威尔的下列著作：“約翰福音史批判”1840 年不来梅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 Bremen, 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 年萊比錫版第 1—2 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I—II, Leipzig, 1841)；此书第 3 卷用“复类福音作者和約翰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的名称于 1842 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 531 頁。
- 479 斯多葛派哲学 是公元前四世紀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世紀。这个哲学派別搖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在羅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說。斯多葛派特別注意道德方面的問題，对这方面的問題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論加以解释。他們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說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 532 頁。
- 480 指康莫迪安的著作“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Carmen apologeticum adversus Judaeos et gentes》)。——第 533 頁。
- 481 喀巴拉(希伯来語，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經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詞和数碼賦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間，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第 533 頁。

- 482 諾斯替教派——諾斯替教的信徒。諾斯替教是公元一至二世紀時產生的一種宗教哲學學說，由基督教的、猶太教的、各種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義的希臘—羅馬哲學的某些成分結合而成。諾斯替教的基礎是關於“諾斯”(古希臘語，意為“真知”)的神秘學說——通過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啟示而獲得真知。諾斯替教派的特點在於強調物質是罪惡的，宣傳禁欲主義，不承認舊約的神聖性和神話中基督教創始者耶穌基督的“神人”雙重性。正統的基督教界斥諾斯替教為異端，對諾斯替教派進行了殘酷鬥爭，把他們的著作幾乎全部銷毀。——第 534 頁。
- 483 塔西佗“編年史”第 12 篇第 52 章和“歷史”第 2 篇第 62 章。——第 534 頁。
- 484 西維拉占語集——據傳為古代一游方“女預言家”(庫馬城的西維拉)所作，在古羅馬的宗教生活中起過很大作用。——第 534 頁。
- 485 尼西亞宗教會議——第一次所謂羅馬帝國基督教會世界主教會議。這次會議是 325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城召開的。在尼西亞宗教會議上通過了一切基督徒必須遵守的信條(正統基督教會教義的基本原則)；不承認信條以叛國罪論。從這次會議的決議中可以看出，教會和國家緊密聯合了起來，基督教變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第 535 頁。
- 486 E. Renan. «Saint Paul». Paris, 1869. 此書為勒南關於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見注 471)的第四卷。——第 538 頁。
- 487 伊里奈烏斯“反異端五書”第 5 卷第 28—30 章。——第 547 頁。
- 488 E. Renan. «L'Antechrist». Paris, 1873. 此書為勒南關於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見注 471)的第四卷。——第 549 頁。
- 489 曾德—阿維斯陀 是十八至十九世紀時對阿維斯陀使用的不正確的名稱。阿維斯陀是流行於古波斯、阿捷爾拜疆、中亞細亞的瑣羅亞斯德教的聖書。瑣羅亞斯德教的主要教義是善與惡在世界上的鬥爭這種二元論觀念。阿維斯陀的寫作時間大約是從公元前九世紀直到公元三至四世紀。——第 550 頁。

- 490 指公元前六世紀的所謂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做“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 597 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 586 年最終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貴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六世紀三十年代,波斯皇帝居魯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許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第 550 頁。
- 491 雅·菲·法耳梅賴耶尔“摩里亚半島中世紀史”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 1 册出版于 1830 年,第 2 册出版于 1836 年(J. Ph.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Erster Theil—1830, Zweiter Theil—1836)。——第 550 頁。
- 492 艾达 是一部斯堪的那維亞各民族的神話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紀时的手稿,1643 年为冰島主教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謂“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紀初詩人和編年史家斯諾里·斯土魯森所編的古北欧歌唱詩人詩歌論集(即所謂“小艾达”)。“艾达”中关于多神教諸神和英雄的詩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維亞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間創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 552 頁。
- 493 給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組織的信是恩格斯根据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在 1894 年 7 月 27 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出的請求而写的。恩格斯还把內容相同的信寄給了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 1894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在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組織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 年)的代表的报告,討論了关于党的报刊問題和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許多賀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 553 頁。
- 494 1893 年 9 月 4—9 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了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屆年度代

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決議，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緒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資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則，和要求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第 553 頁。

- 495 爭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是由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 1890 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 1890 年在英国組織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見本卷第 69—76 頁)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建立的。同盟的宗旨是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決議等。1893 年,同盟的代表参加了独立工党。

社会民主联盟——見注 104。

独立工党 是 1893 年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爭取实行英国工人階級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資产階級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員和受到費边社影响的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階級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領袖是凱尔·哈第。党把爭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資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險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綱領中。弗·恩格斯曾祝賀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錯誤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的立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議會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結。后来列宁在評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終依附資产階級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則非常依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450 頁，第 18 卷第 354 頁)。1900 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費边社 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組織，由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在 1884 年建立；它的主要首領是悉尼·維伯和比阿特里薩·維伯(費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紀的羅馬統帥費边·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統帥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決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緩进者)的綽号)。費边社的成員主要是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反对馬克思关于无产階級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說，并断言什么通过細微的改良、逐漸的改造社会，用所謂“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費边社过去和現在都起着資产階級影响在工

人階級中的傳導者和英國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思想的發源地中的作用。列寧說費邊社“最完整地體現了機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頁)。1900年,費邊社併入工黨。“費邊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思想根源之一。

工聯代表大會議會委員會——見注332。

煤氣工人和雜工工會——見注99。——第554頁。

- 496 這封賀信是恩格斯為了答復意大利勞動社會黨活動家之一卡洛·德拉瓦勒於1894年8月30日寫信邀請他參加該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寫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原定於1894年9月7—9日在伊莫拉舉行,由於警察當局的禁止而未開成。

恩格斯的賀信以及代表大會收到的其他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保·拉法格、帕·伊格列西亞斯等)的賀信,曾經在1894年9月10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宣讀過,後來又載於1894年9月22—23日“階級鬥爭”週報第38號。

意大利勞動社會黨是1892年在熱那亞代表大會上成立的(1893年採用這個名稱,1895年起稱做“意大利社會黨”)。意大利勞動社會黨堅決地和無政府主義者劃清了界綫,而在九十年代,雖然犯了一些改良主義性質的錯誤,還是積極地領導了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

“階級鬥爭”(«*Lotta di classe*»)是一家意大利週報,意大利勞動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1892年至1898年在米蘭出版。——第555頁。

- 497 恩格斯指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議會通過的關於維護社會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這個法令是作為似乎只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措施而頒布的,但反動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來反對工人運動和社會黨人日益增長的影響。根據這一法令,意大利勞動社會黨被禁止活動,工人組織被解散,工人報紙和雜誌被禁止出版;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搜查和審訊。但是,意大利社會黨人不顧殘酷的鎮壓,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鬥爭,他們於1895年1月在帕爾馬秘密舉行了意大利勞動社會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第555頁。

- 498 這封賀信是恩格斯為了答復西西里島社會黨活動家之一科耳納哥在

1894年9月18日的信中向他提出的请求而写的。科耳纳哥在信里告诉恩格斯说，西西里岛社会党将不顾残酷迫害而进行改组，1894年10月初将恢复出版它的报纸“社会正义”(«Giustizia sociale»),他写道：“您，我们著名的导师，能不能给我们寄来几句表示赞同和同情的话。您能不能给西西里岛社会党寄来一封贺信，供我们在我们报纸的第1号上发表。您的支持将使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具有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的贺信看来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只是到1895年6月30日才在作为“社会正义”报后继者的“解放”周报上发表。这封贺信还从“解放”周报被译成德文(略有删节)发表在1895年8月1日“工人报”第208号上。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这封信被再次用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8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16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对意大利的最后的”，同时(略有删节)用德文以“恩格斯对工人的最后一封贺信”为题载于1895年8月13日“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s Volksblatt»)第95号。

“解放”(«La Riscossa»)是一家周报，西西里岛社会党的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巴勒摩出版。——第557页。

499 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的请求(由屠拉梯在1894年10月24日的信中提出)写的。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请求恩格斯在“社会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为了替政府镇压意大利社会党人辩护而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活动散播的造谣中伤。

恩格斯的信载于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把全世界所有社会党的元老寄给我们的这封信奉献给已经卖身投靠或者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的鄙陋诡计。”恩格斯的信在“社会评论”发表之后，还从意大利文译成德文以“可怜的诡计和谎言”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6日“工人报”第89号，以“意大利”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第559页。

500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議程——土地問題——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領袖福尔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綱領中去。福尔馬尔虽然也遭到了許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來說，他的机会主义立場在代表大会上沒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專門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綱領草案，作为对党綱的补充。除土地問題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資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 1895 年五一节等問題。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 1894 年 9 月 14—16 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見分歧尖銳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党人的 1893—1894 年的所謂“恶毒法”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給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綱領的緒論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論点有一些是同馬克思主义在农民問題上的立場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綱領的批判見本卷刊載的“法德农民問題”。——第 561 頁。

- 501 恩格斯指 1894 年 11 月 10 日“前进报”第 263 号发表的“再論党代表大会”一文。这篇文章对利用福尔馬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問題的机会主义言論来誣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伦人民报”（«Kölnische Volkszeitung»）进行了回击。——第 561 頁。
- 502 “法德农民問題”是馬克思主义在土地問題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格斯在 1894 年 11 月 15 日和 22 日之間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馬尔在土地問題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論，首先是他在 1894 年 10 月 25 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綱領的补充报告（見注 500）。福尔馬尔在說明他所建議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綱領，仿佛那个綱領真是得到恩格斯贊同的。恩格斯对这种說法先已駁斥（見本卷第 561—562 頁），但他认为有必要專門写篇文章来闡述在农民問題上革命无

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馬賽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綱領中背离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地方加以批判。

恩格斯的文章不仅是对德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的打击，而且是对国际机会主义的打击。在恩格斯的批評的影响下，在1895年举行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之前的辯論中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的立場，其中包括在土地問題上的立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受到了譴責。但是，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各党机会主义傾向增长，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問題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土地問題上的各种庸俗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念所偷換。弗·伊·列宁坚决反对了这些观念，他捍卫了馬克思主义学說的純洁性和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学說。

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問題”一文曾轉載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年第12期，标题是：“农民問題”。

1903年2月，弗·伊·列宁为了准备在巴黎社会科学俄文高等学校作土地問題的讲演，曾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見本卷第565—569頁）譯成俄文（保存在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館的手稿已公布，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册第295—300頁）。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和某些个别的段落，本版基本上采用了列宁的譯文。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俄文单行版本由格·瓦·普列汉諾夫校訂并写序言，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第563頁。

503 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馬賽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議會选举等問題。

代表大会議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項是关于农村工作問題，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議會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綱領，其中提出了許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綱領也包含了許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則的地

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更加深了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的错误。——第 569 页。

504 恩格斯提到的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发表在 1894 年 10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第 38 号附刊上。——第 583 页。

505 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答复“前进报”编辑部于 1894 年 11 月 14 日该报第 266 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

关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著手稿的命运,见注 457。——第 588 页。

5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4 卷第 4 页和第 7 页。——第 588 页。

507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祝贺“工人报”从 1895 年 1 月 1 日起改为日报(在这以前它每星期出两次)而写的。恩格斯寄给阿德勒的这封贺信载于 1895 年 1 月 1 日“工人报”第 1 号的“每日出版的‘工人报’”这篇通讯里。同时在贺信前面加有一段编辑部的如下按语:“我们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要求我们向奥地利工人转达他对奥地利工人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贺,接着他说”(接下去就是贺信原文)。——第 590 页。

508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125 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 1895 年 2 月 14 日和 3 月 6 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 1895 年 3 月 6 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 1894 年 12 月

間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間进行了討論；同年5月該草案被否決）。

恩格斯在給費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費舍給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內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場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評。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見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結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損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領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說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徑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題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論，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感到非常憤懣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坚决抗議，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強調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給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訴了他。

在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載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頒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險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

可是，即使經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像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們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讀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們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們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誹謗性的断言，說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們把导言說成是恩格

斯的“政治遺囑”)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場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虛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語来掩盖自己对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則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經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載在1895年“社会評論”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ѣло»)杂志第1册上。

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中发表。——第591頁。

509 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馬克思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杂志第1、2和3期发表的馬克思的“从1848到1849年”一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馬克思和恩格斯为該杂志5、6两期合刊編写的“国际述評(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頁)中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話取自述評中收入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頁)。——第593頁。

51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頁。——第593頁。

51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7頁。——第594頁。

512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贈給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薩克森森林。——第594頁。

513 指十九世紀上半叶法国資产階級的两个保皇党——正統派和奥尔良派。

正統派 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該王朝第二次被顛覆以后,正統派就結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 是金融貴族和大資产階級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 (1848—1851), 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 598 頁。

- 514 关于“民族原则”, 見注 14。——第 599 頁。
- 515 指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 1871 年法兰克福和約 (見注 195) 的条款付給德意志帝国的 50 亿法郎賠款。——第 600 頁。
- 516 普选权在西班牙从 1868 年 (1868—1874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开始实施, 并經 1869 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 1873 年宣布成立, 到 1874 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 601 頁。
- 517 恩格斯援引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綱領的理論部分导言; 这个綱領是 1880 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64 頁)。——第 602 頁。
- 518 1870 年 9 月 4 日, 在得到关于法軍在色当潰敗 (見注 194) 的消息后, 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 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 1870 年 10 月 31 日, 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魯士人进行談判的消息后, 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軍举行起义, 占領市政厅后, 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 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 11 月 1 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組織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間的意見分歧, 借助于国民自卫軍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 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諾言, 占据了市政厅, 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 对这两个事件的評述并見本卷第 220 頁。——第 606 頁。
- 519 1809 年法奥战争期間, 拿破侖第一指揮下的法国軍队在 1809 年 7 月 5—6 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軍队。
- 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 滑铁卢 (比利时) 会战中, 拿破侖的軍队被威灵頓指揮下的英荷联軍和布呂歇尔指揮下的普魯士軍队击潰。滑铁卢

- 会战在 1815 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侖同盟的最終胜利和拿破侖第一帝国的垮台。——第 607 頁。
- 520 見注 416。——第 608 頁。
- 521 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貴族階級之間的长期斗争，以 1755 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告終。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貴族获得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稅，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級議會及其常設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 608 頁。
- 522 見注 249。——第 610 頁。
- 523 暗指 1866 年普魯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諾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騷大公国在 1866 年归并于普魯士。——第 610 頁。
- 524 独立工党(見注 495) 执行委员会曾于 1895 年 4 月 16 日发信邀請恩格斯参加社会主义者五一联欢会。——第 614 頁。
- 525 恩格斯于 1892 年 4 月 1 日对法国“閃电报”記者艾·馬薩尔发表了談話。4 月 3 日，恩格斯审阅記者的记录，差不多完全把它改写了。1892 年 4 月 4 日，恩格斯在給劳拉·拉法格的信里提到这次談話，他說，如果該报任意改动經他审阅后的文字，他将反对記者的做法。談話在 4 月 16 日轉載于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由此可見，恩格斯显然认为发表出来的文字是符合他答記者問的內容的。談話发表在“閃电报”上的标题是：“无政府主义。同德国社会党人恩格斯的談話”；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标题是：“饥荒造成的和平”(最后两段被删掉)。
- 本版所載的談話，删去了記者加在前边的按語和后边的評論。
- “閃电报”(«L'Éclair») 是一家法国資產階級日报，从 1888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第 617 頁。
- 526 指 1892 年 2 月 25—27 日柏林失业工人的发动。——第 617 頁。
- 527 見注 254。——第 618 頁。

- 528 見注 258。——第 620 頁。
- 529 恩格斯用圣西門关于英、法、德三国人民合作的思想(見注 128) 来对比作为軍事政治集团的三国同盟(見注 406)。——第 622 頁。
- 530 恩格斯于 1893 年 5 月 11 日对法国“費加罗报”記者发表談話。5 月 17 日恩格斯告訴左尔格可以在“費加罗报”发表的談話里看到他对德国局势的看法, 恩格斯把剪报随函邮去, 但附带說明, 他答記者問的这份記錄, “像任何的訪問記一样, 一些說法轉述得有些走样, 一般的叙述有缺陷, 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
- 訪問記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談話”为題发表在“費加罗报”。它还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 1893 年 5 月 20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40 号。
- “費加罗报”(«*Le Figaro*»)是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 从 1854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624 頁。
- 531 指 1893 年 5 月 6 日帝国国会对軍事法草案(并見注 393)的否决, 該草案規定在 1893—1899 年期間把和平时期的軍隊兵員人数扩充 8 万人以上并追加軍費撥款。当天政府解散了国会, 随后决定在 1893 年 6 月举行改选。——第 624 頁。
- 532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見注 8)中反对軍事法的一部分人。——第 624 頁。
- 533 意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魯士发生的所謂宪制冲突(見注 234)。——第 625 頁。
- 534 見注 416。——第 626 頁。
- 535 見注 74。——第 627 頁。
- 536 恩格斯就 6 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 对英国“每日紀事报”記者发表了談話。談話除发表在上述英国报纸外, 还以删节的形式发表在 1893 年 7 月 15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48 号, 全文发表在 1893 年 7 月 16 日“社会評論”杂志第 14 期。載于“每日紀事报”的談話, 标题是: “德国选举。恩格斯先生的談話”; “社会主义者报”的标题是: “弗·恩格斯和德国选举”; “社会評論”的标

- 題是：“同弗·恩格斯交談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結果”。——第 631 頁。
- 537** 指自由思想人民党，該党于 1893 年 5 月由于德国自由思想党分裂而組成。后者由于党内在对軍事法草案的評價上有分歧，于 1893 年 5 月 6 日帝国国会解散的当日发生分裂。該党議會党团中，以李凱尔特和巴尔特为首的一部分支持政府，組成一个叫自由思想同盟的党；議會党团中以李希特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反对增加軍費开支并反映了該党激进分子的情緒，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第 631 頁。
- 538** 关于社会民主联盟，見注 104。——第 633 頁。
- 539** 关于費边社，見注 495。——第 633 頁。
- 540** 1893 年 5 月被否決的軍事法草案，稍經修改后，又由政府提交帝国国会批准，并于 1893 年 7 月 15 日为新的帝国国会所通过。
新的軍事法使政府能够增加軍事撥款并且使政府不再是要隔七年（如 1874 年、1880 年、1887 年的七年期限法），而是只要隔五年就可以增加軍事預算；因此世称“五年期限法”。——第 633 頁。
- 541** 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5—294 頁）。宣言是馬克思写的，但是其中包括有恩格斯的材料，这些材料駁斥了普魯士容克和德国資產階級对亚尔薩斯—洛林的貪求，以及为此提出的軍事战略上的論据。——第 634 頁。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90年1月—1895年8月)

1890

1—12月

恩格斯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继续从事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这项工作他早在1885年就已开始，一直继续到1894年春天。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某些篇章进行了修改加工，把个别的章节重新写过，还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做了许多补充，对文字作了总的校订。

1—3月

由于法德之间矛盾尖锐化，法俄有相互接近的迹象，以及爆发全欧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恩格斯从事研究欧洲的国际局势。他结束了在1889年12月开始撰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该文是为起初在伦敦出版而后在日内瓦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该文的俄译文于1890年发表在这家杂志的第1册（2月）和第2册（8月）上；德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作者还把它译成英文，于4月和5月发表在社会主义者贝·巴克斯主编的伦敦“时代”杂志上。

1月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非熟练工人的政治积极性的高涨，以及那些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新工联的活动；他直接帮助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

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給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海·施留特尔和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这些工联同那些代表工人貴族利益的旧工联完全不同，它們是按无产阶级团结精神进行活动的，它們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使工联代表大会摆脱改良主义者的领导。

1月11日—2月8日

恩格斯在給施留特尔、給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阿·左尔格，以及給倍倍尔的信中，贊同 1889 年秋天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开除它原先的一批领导人——那些执行宗派主义政策的德国流亡拉薩尔主义者。他把这件事看做是美国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

1月28日左右—5月2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資本論”的俄譯者之一、民粹派經濟学家尼·弗·丹尼尔逊的好几封信，信中报道了俄国的經濟情况。

1月底—2月8日

恩格斯閱讀英国費边社的創建人之一悉·維伯寄給他的一本书“費边社的社会主义研究”，认为这本书企图根据庸俗的經濟学理論推翻馬克思的学說，并且企图证明能够通过改良主义道路、通过同资产阶级妥协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

1月底—2月中

恩格斯根据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信件研究德国在 2 月 20 日举行国会选举前夕的国内局势。

2月17日

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分析 2 月 17 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众議院复选的结果；他指出，同保皇党和軍界相勾結的布朗热主义者的当选，是沙文主义思想在巴黎工人中传播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同这种沙文主义情緒进行斗争，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2月21日—4月12日**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重大胜利，恩格斯在为报纸写的两篇文章中，以及在给左尔格的信中，给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保·拉法格的信中，给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和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选举标志着俾斯麦统治完结的开端，并将加强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恩格斯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的意义。
- 恩格斯关于选举结果的文章，一篇于3月3日不署名发表在英国“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栏，另一篇于3月8日用“今后怎样呢？”的标题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3月20日和31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载于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第十三版第六卷上的一篇他的传记，并为该辞典的第十四版补充和修改了这篇传记。
- 3月底—4月初** 恩格斯阅读小册子“论社会主义”和“论历史哲学”，这是小册子的作者意大利社会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寄给他的；他在给拉布里奥拉的信中给予第一本小册子以好评，对第二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恩格斯也把自己的著作“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寄给了他。
- 3月30日** 由于在意大利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上就政府关于在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建立巨型的资本主义庄园的提案展开了辩论，恩格斯写信给翻译过他的许多著作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金融巨头和大股份公司对殖民地的奴役。这封信的一段于4月16日发表在

社会主义杂志“激情和批評”(«Cuore e critica»)上。

4月1日

恩格斯得悉“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約·狄茨和該杂志的一个編輯、机会主义者威·布洛克斯在4月份的“新时代”上发表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第一章时作了很大的歪曲,他向狄茨提出坚决的抗議;恩格斯的文章按手稿重新发表在該杂志的下一期即5月号上。

4月3日

恩格斯写信給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成員維·伊·查苏利奇,感謝她寄来載有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他就此強調說,揭露沙皇政府的外交,对俄国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4月9日

恩格斯在收到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紐文胡斯关于荷兰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之后,写信給他,对荷兰社会主义者的成就表示滿意,并且告訴他关于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工作的进展情况。

4月17日

恩格斯會收到查苏利奇的信,信中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4月5日发表的俄国民粹主义者Г.別克的一篇文章表示不滿,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議查苏利奇和她的同道者在該报駁斥別克。恩格斯建議查苏利奇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积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稿,以便加强俄国社会主义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查苏利奇根据恩格斯的建議写的一篇答別克的文章,发表在4月26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4月19日

奥地利的一个職員伊·埃伦夫罗伊恩德要求恩格斯表示他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写信給他,揭露了反犹太主义的反动本质。这封信于5月9日发表在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上。

4月底—5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根据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伦敦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游行和大会的口号是争取在国际范围内以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他把准备工作的情况告诉左尔格，同时还向他报道了在工人群众当中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成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伦敦示威游行准备工作的那部分，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派机关报“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和“工人辩护士报”（《Workmen's Advocate》）上。

5月1日

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序言，序言简单地回顾了 1848 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序言刊载在 5 月于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

5月4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他后来在给倍倍尔和劳·拉法格的信中，以及在“伦敦的 5 月 4 日”一文中叙述了自己的感想。恩格斯把首次举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看做是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检阅；他指出奥地利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成功；他认为伦敦的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文章发表在 5 月 23 日的“工人报”上。

**1890年5月底—
1891年6月上半月**

恩格斯从事（断续地）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准备工作；为此他阅读了新的书籍，其中有俄国社会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法文本）和“俄国现今的风俗和古代的法律”（英文本）；他对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对家庭那一章，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改正了一些不确切的地方；第四版于 1891 年 10 月底—11 月初

- 出版。
- 6月5日** 恩格斯在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的領導者之一保·恩斯特的复信中,坚决反对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 6月10日** 恩格斯写信給丹尼尔逊,对于伟大的俄国学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吊唁。
- 6月25日** 恩格斯給“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写序言。
- 7月1—26日** 恩格斯同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肖萊馬一起在挪威旅行。
- 約7月9日—9月22日** 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波兰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將領瓦·符卢勃列夫斯基通信,并給予他物质帮助。
- 8月—10月初** 恩格斯十分重視預定于10月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屆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給李卜克內西和党的其他領導人的信中指出,必須同“青年派”作斗争,因为它对党的領導进行了蠱惑性的批評。恩格斯还閱讀了党的章程草案,批評了它的个别論点,強調指出,国会党团实际上凌駕于党的执行委员会之上,是不能容許的。
- 8月5日、9月21—22日和10月27日** 恩格斯写信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和經濟学家康·施米特和德国大学生約·布洛赫,他們二人會請求他闡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原理;恩格斯在信中批評那些把馬克思主义理論庸俗化的人,这些人硬說馬克思主义理論认为經濟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唯一动力;恩格斯解釋說,經濟基础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上层建筑也影响历史的进程和經濟本身的发展。

- 8月14日左右—9月12日** 恩格斯在福克斯頓(英格兰的南海岸)休养。
- 9月初** 恩格斯注意9月1日到6日在利物浦召开的英国工联的应届代表大会的进程。大会违反工联领导者們的心愿,通过了一项決議,要求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恩格斯认为这是新工联的影响显著增长的一个证明。
- 9月7日** 恩格斯答复“青年派”机关报“薩克森工人报”上的一篇編輯部文章,这篇文章說什么“青年派”对党的领导路綫的評价是同恩格斯的观点相符合的。恩格斯坚决駁斥这种說法,认为“青年派”的观点是对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答复发表在9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9月9日左右—10月中** 恩格斯积极参加定于1891年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家广泛地通信。恩格斯认为有可能召开一次有可能派参加的統一的代表大会,他表示深信,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条件下,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恩格斯的提議被各国社会主义者會議全部接受,这个會議是根据他的建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0月中在哈雷举行代表大会期間召开的。
- 9月12日和18日之間**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机关报)停刊,恩格斯給該报讀者写了一封告別信,信中提到該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这封信发表在9月2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10月1日** 恩格斯写“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文章严厉斥責“青年派”又企图假借恩格斯的威望来反对党的领导。文章于10月5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报”上。

- 10月11—19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 10 月 11 日和 12 日在利尔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进程,以及 10 月 13 日至 18 日在加来举行的法国工团(工会)代表大会的进程。这两个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中有关于庆祝五一节的決議,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代表大会是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标志。恩格斯把两个代表大会的情况通知左尔格,并且告訴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集团——可能派——已經分裂为两派,一派由让·阿列曼领导,一派由保·布魯斯领导。恩格斯指出,这两派都处于瓦解状态。
- 10月12日和19日之間** 恩格斯整理 1836 年至 1864 年馬克思的通信。
- 10月中** 恩格斯根据报纸的报道和李卜克内西、爱·馬克思-艾威林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員理·費舍等人的来信,密切注意从 10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哈雷举行的这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恩格斯在給左尔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对代表大会的結果表示滿意,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并且通过決議,要在 1891 年党的下届代表大会以前拟定新的党綱。
- 10月2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波兰社会主义者路·克尔日維茨基寄来的“資本論”第一卷的波兰文譯本。
- 11月5日** 恩格斯告訴左尔格关于自己的朋友和馬克思家的亲密朋友海伦·德穆特逝世的消息。
- 11月27日—12月初**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保·辛格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們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伦敦来祝賀他的七十寿辰的。根据恩格斯的倡議,他們会見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爱·馬克思-艾威林、約·白恩士、威·梭恩和罗·肯宁安-格萊安。
- 11月28日** 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政党和組織庆祝恩格斯的七

- 十寿辰。他收到这些党和組織以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某些活动家寄来的大量賀信。
- 1890年12月—1891年2月** 由于出版了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路·布伦坦諾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恩格斯从事撰写“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这部著作，在其中彻底揭穿了布伦坦諾誹謗馬克思对科学采取不誠实态度的謊言，这本小册子于1891年4月出版。
- 1890年12月—1891年1月6日** 由于拟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綱領，以及就这个問題在党的刊物上展开了辯論，恩格斯整理发表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綱領批判”的手稿。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給拉薩尔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最完备地闡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階級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发表这个綱領性的文件是自己的义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制定一个真正革命的、有科学根据的馬克思主义綱領，帮助党同党内猖狂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一著作連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1891年1月底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 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回答法国社会主义者、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譯者福尔坦的請求，同意在法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著作；該报从1891年1月至11月发表了这一著作。与此同时，恩格斯坚决反对想在可能派貝·馬隆主編的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評論”上轉載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貧困”的企图。
- 12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給“柏林人民报”、匈牙利社会主义报纸“工人紀事周报”和“人民言論”的編輯部以及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和个别的人，信中对他們在他七十岁誕辰时的祝賀表示感謝，同时指出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些信发表在12月5日的“柏

林人民报”、12月14日的“工人紀事周报”和“人民言論”、12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12月25日

恩格斯写信給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列·弗兰克尔，說明法国工人党和可能派之間斗争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只有使可能派的领导者們孤立，才能消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同时告訴弗兰克尔，正在准备召开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1

1月

恩格斯从左尔格那里和其他方面得悉，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者們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之間发生了冲突，后者宣称，党作为一个政治組織不得加入劳联，并建議党员以个人資格通过工会参加劳联；恩格斯收到劳联的领导者、改良主义者賽·龔帕斯一封关于这个問題的信。恩格斯在給施留特尔的信中批評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者們的态度，他們拒絕劳联的建議并且企图把党同美国工人的这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組織对立起来，恩格斯认为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它将在客观上加强改良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1月10日左右—2月1日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会見被逐出巴黎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斯塔尼斯拉夫·門德尔森和他的妻子瑪丽亚。根据恩格斯的建議，門德尔森写信給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提請英国社会主义者警惕沙皇暗探局在伦敦的两个暗探可能进行挑撥离間。这封信經恩格斯校閱过，发表在1月24日的“正义报”上。

1月底—4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法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地通信。

-
- 1月31日和4月22日之間** 恩格斯不断收到拉法格夫妇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詳細报告。他在給拉法格夫妇的信中贊成工人党对可能派所采取的策略：不为表面上的統一作任何原則性的让步，但是也不拒絕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实际的合作。
- 2—10月** 恩格斯系統地閱讀“前进报”，該报从1月1日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給倍倍尔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信中，他批評編輯部的动摇和机会主义性质的錯誤。
- 2—4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經常不断地帮助爱·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等英国社会主义者为建立工人階級政党而斗争。
- 2月5日—4月8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几个領導者、特別是該党国会党团的大多数不贊成在“新时代”上发表馬克思的著作“哥达綱領批判”，而在該党内引起了辯論，恩格斯就这一辯論同“新时代”杂志的編輯考茨基，同左尔格、施留特尔、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恩格斯在信中說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 2月20—27日** 恩格斯和費舍通信，因为后者建議再版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和“法兰西內战”；恩格斯认为这些著作的传播对于宣传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同意把这些著作再版。
- 2月20日和3月6日之間** 恩格斯閱讀拉法格关于在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剩余价值理論的文章手稿，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
- 3—11月** 恩格斯很想帮助在已經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意大利传播馬克思主义，因此他和馬尔提涅蒂通信，商談有关在意大利出版自己的著作的問題。

- 3月4日—10月2日** 恩格斯校訂由法国社会主义者昂·腊韦譯的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譯本的一部分譯稿，恩格斯还审閱由劳·拉法格校訂过的那部分譯稿。
- 3月7日** 恩格斯写信給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菲·屠拉梯，同意把自己的某些著作譯成意大利文，并且編入計劃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該信于3月10日发表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評論”上。
- 3月17日** 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賀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他表示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賀信发表在3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 3月18日** 恩格斯完成了为他所准备出版的馬克思著作“法兰西內战”德文第三版写导言的工作，預定用这篇导言来紀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在这篇旨在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导言中，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把资产阶级国家与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嘗試的巴黎公社相对比。导言发表在3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和5月出版的“法兰西內战”一书中。
- 3月21日** 恩格斯写信給施留特尔，感謝他报告关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恩格斯批評該党的领导繼續对“劳动騎士团”和美国的其他的群众性工人組織采取宗派主义路綫。
恩格斯把2月底至3月初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寄給左尔格。
- 3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給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领导人霍·梅薩，回答他关于用西班牙文出版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的請求；恩格斯在信中表示同意，而且指出同西班牙的也是以蒲魯东主义形式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 的影响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年夏天出版的馬克思“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以这封信作为序言。
- 3月25日和5月15日之間** 恩格斯和拉布里奥拉通信，拉布里奥拉告诉他一些关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其中包括在羅馬庆祝五一节时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
- 4月初** 肖萊馬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 4月9日** 恩格斯在回答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邀请他出席定于4月12日在米兰举行的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信时，写了一封贺信，信中指出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 4月10日和15日之間** 恩格斯把自己的小册子“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寄給左尔格、費舍、紐文胡斯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 4月30日** 恩格斯为由他准备付印的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单行本写导言。导言发表在5月13日的“前进报”附刊上和6月底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中。
- 5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指出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会委員在发表馬克思的著作“哥达綱領批判”这个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同时指出倍倍尔本人也很不了解发表这一著作的重要性。恩格斯強調指出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于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論水平的意义；他建議更多地注意掌握革命理論，注意革命理論的发展，开展科学討論，等等。
- 5月3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游行和集会。
- 5月6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費舍关于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成功地举行五一节群众游行的詳細报告。
- 5月12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四版，即由他修改和补充的版本写简短的序言。序言刊印在该书中，该书于当年下半年出版。

5月下半月

根据比利时工人党的一位领导者爱·安塞尔的请求，恩格斯组织英国新工联对正在罢工的比利时码头工人进行援助，为此他同这些工联的领导者约·白恩士和E. 克累姆通信。

5月20日左右

恩格斯从施留特尔那里得知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矿工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美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发行情况。

5月21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经济学教授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把自己的履历和自己的著作目录告诉他，以供在德国出版“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之用；恩格斯寄去的材料刊印在1892年在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的第三卷中。

6月

恩格斯阅读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巴尔特“黑格尔和直到马克思和哈特曼为止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并且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严厉批评这本书企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批评它错误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本质。

6月16日

恩格斯结束了为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写序言的工作，他在序言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评论家庭史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重要派别，特别强调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所进行的研究的意义。序言于6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标题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并刊印在年底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6月18日和29日之间

恩格斯研究主要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受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恩格斯指出

草案大体上消除了哥达纲领的最严重的错误，同时也批评草案的许多论点。他指出草案中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国家制度民主化的要求和建立单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并且强调说，这些缺点带有向机会主义让步的性质。恩格斯把自己的意见寄给党的执行委员会；草案接受了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意见，发表在7月4日的“前进报”上，后来又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上，供预先讨论用。

- 6月26日** 恩格斯写信祝贺6月28—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赞扬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增长。贺信发表在7月3日的“工人报”上。
- 6月26日—8月24日左右** 恩格斯(断续地)在赖德(威特岛)休养，肖莱马和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乔·哈尼到他那里作客。
- 6月29日**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尖锐批评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领导者、机会主义者格·福尔马尔6月1日在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的沙文主义演说。恩格斯要求党取消福尔马尔用党的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
- 8月初** 恩格斯收到屠拉梯寄来的在意大利出版的宣传小册子，小册子是根据恩格斯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所写的导言编写的。
- 8月3日和18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关于意大利的局势、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详细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对五一节游行参加者的审判和其他政治审判案的情况，以及8月2—5日在米兰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情况。
- 8月下半月—9月初** 恩格斯通过报刊上的报道和爱·马克思-艾威林的信、德国和英国工人运动老战士弗·列斯纳和8月16日

至 22 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其他參加者的信，密切注意這次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作；他在給左爾格、拉法格等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的信中對代表大會的工作結果做了良好的評價。給拉法格的信摘要發表在 9 月 12 日的“社會主義者報”上。

- 約 8 月 25—27 日** 倍倍爾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一位領導者維·阿德勒在恩格斯家裏作客；恩格斯同他們談論布魯塞爾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的結果。
- 9 月 3 日左右** 恩格斯接見布魯塞爾國際代表大會的美國代表、社會主義者馬克·維伊和阿·卡甘，後者是一家紐約猶太工人報紙的編輯。
- 9 月 8 日—23 日左右** 恩格斯同他的內侄女瑪·艾·羅舍和秘書路·考茨基一起在愛爾蘭和蘇格蘭旅行。
- 9 月 14 日和 30 日** 恩格斯把 9 月初在新堡舉行的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的情況通知左爾格，他認為代表大會的決議是“新工聯”的重大勝利，因為工聯的改良主義領導者想取消上次代表大會關於八小時工作日的決議的企圖在代表大會上遭到了失敗。
- 9 月 24 日和 28 日之間** 恩格斯閱讀由“新時代”編輯部擬定的並於 9 月 14 日刊登在該雜誌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他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考茨基。恩格斯指出，這個草案比黨的執行委員會所擬定的那個草案更可取。
- 9 月 29 日左右** 恩格斯在一個時期的間斷之後，又開始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0 月—11 月 14 日** 恩格斯密切注視與眾議院議員的補充選舉相聯系的法國政治事件，在這次補充選舉中拉法格被提名為眾議院的候選人；在給拉法格夫婦、倍倍爾和左爾格的信中，恩格斯對於拉法格當選表示滿意，認為這是工人黨

- 的重大胜利，这证明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是正确的。
- 10月3日左右—12月1日** 恩格斯同伦敦的斯万·容涅先出版社商谈关于出版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的事，为此他同译者、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通信。
- 10月13日和22日之間** 恩格斯写“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在其中就欧洲战争的威胁拟定了社会主义者的策略；他强调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坚决拥护和平。该文于12月初用法文发表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
- 10月14日** 由于在“前进报”上转载“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坚决抗议把这个草案原先没有的一个拉萨尔论点加进去，这个论点认为，其他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都是反动的一帮。
- 10月中—11月初** 恩格斯密切注意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写信给代表大会；在给左尔格、倍倍尔等德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把“青年派”的领导者开除出党的决议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言论的谴责；恩格斯由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而表示满意。
- 10月24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恩格斯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关于美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的信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之所以有些落在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后面，原因之一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 11—12月** 恩格斯紧张地从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1月** 恩格斯閱讀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普列汉諾夫的几篇紀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文章，认为这几篇文章写得很好。
- 11月1日** 恩格斯应施米特的請求，帮助他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个問題上向他提出許多建議；恩格斯一方面強調正确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強調馬克思的辯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证法之間的原則区别。
- 11月12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原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新萊茵报”編輯恩·德朗克去世的消息。
- 11月13日** 恩格斯写給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諾）一家奥地利社会主义报纸“人民之友报”編輯部一封賀信，以回答該編輯部邀請他参加該报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信。賀信于11月25日发表在該报上。
- 11月17日** 恩格斯寄給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紀事报”編輯部一篇声明，揭露該报刊登的关于馬克思家庭的誹謗性报道。声明于11月26日发表在該报上，标题是：“关于已故的馬克思夫人”。
- 11月28日** 恩格斯写信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歌詠团，回答它关于在他生日那天举行庆祝会的建議，信中強調說，他和馬克思一样，原則上反对为个别人举行公开的庆祝活动；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活动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时，才容許这样做。
- 12月3日** 恩格斯告訴考茨基，他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工作已进行到最后几篇。
- 12月中** 恩格斯到賴德去旅行。

1892

- 1—3月** 恩格斯几次拜訪住在里士滿的哈尼,和他通信,并且給他物质上的帮助。
- 1月** 恩格斯閱讀德国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尤·沃尔弗的文章“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率的謎”,該文发表在1891年德国杂志“国民經濟和統計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恩格斯在稍后为“資本論”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尖銳地批評了这篇文章。
恩格斯把自己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翻譯成德文,并为它写了前言和結束語,在結束語中分析了俄国在1891年饥荒时的国内情况。文章于2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 1月6日** 恩格斯写信給左尔格,信中分析了在美国由于試图建立一个农民和小資產者的政党而引起的政治局勢,同时指出,在美国資產階級两党制的情况下,要在最近期間建立起农民和小資產者的巩固的第三党,是行不通的。
- 1月11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的英国版写序言;序言刊印在3月底伦敦出版的該书英国版上。
- 2月6日** 在意大利資產階級自由主义报纸“論壇报”上刊登了資產階級政論家和哲学家卓·博維奥的文章,文章的作者硬說德国的社会党人不重視无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形式。为此恩格斯写文章答复博維奥,指出他的說法是毫无根据的。該文发表在2月16日的“社会評論”杂志上。
- 2月10日** 恩格斯应在伦敦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的請求,为“共

- 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序言；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争得波兰的真正独立。序言刊印在伦敦出版的该书波兰文版上，并于2月27日发表在波兰社会主义杂志“黎明”上。
- 2月中** 恩格斯校订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译本；译者是艾威林。
- 2月19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阿德勒，他决定把狄茨出版社给他的全部稿费交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党的经费。
-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请求，为倍倍尔从事议会活动二十五年写祝词。
- 3—4月** 由于临近庆祝五一节，恩格斯帮助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制定策略路线，以期同英国的其他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恩格斯把在伦敦进行五一节准备工作的情况通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
- 3月初** 恩格斯接见一个由于政府迫害而从德国流亡出来的德国矿工、民主主义者奥·济格尔；恩格斯帮他找到工作，并且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手稿的开头部分，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寄给作者。
- 3月5日和16日之間** 恩格斯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弗·梅林的许多著作；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给予这些著作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梅林的“莱辛传奇”一书，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普鲁士的历史。
- 3月5日—4月19日** 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几封信中，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众议院中同一批以厄·格朗热为首的带沙文主义情绪的布朗基主义者(原先是布朗热主义者)结成同盟的行动，进行了批评；恩格斯表示反对这样的同盟，

- 他建議採取同以愛·瓦揚為首的所謂老派布朗基主義者接近的策略。
- 3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從拉布里奧拉那里得到根據米蘭代表大會的決議制定的意大利勞動黨綱領和關於羅馬失業工人運動的材料；恩格斯以後還從拉布里奧拉那里得到關於意大利的政治情況和工人階級鬥爭的詳細報道。
- 3月15日—9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和丹尼爾遜通信，從他那里得到關於俄國經濟情況的材料以及俄國的經濟學雜誌和書籍，其中有“地方自治機關統計經濟研究總結”第一卷；恩格斯在給他的信中指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迅速發展必然引起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因此，必然引起農民公社的解體和大批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 3月17日** 恩格斯寫信向法國工人祝賀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賀信發表在3月26日的“社會主義者報”上。
- 3月20日左右—26日** 恩格斯在賴德休養。
- 3月29日** 恩格斯為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二版寫一個按語；該版於189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 3月30日** 恩格斯在給施留特爾的信中揭示了阻礙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原因，他指出，美國資產階級分化工人階級，收買美國本地工人，唆使他們去反對各國僑民工人，同時挑撥後者自相傾軋。
- 4月1日** 恩格斯同法國資產階級報紙“閃電報”的記者艾·馬薩爾談話，談話的內容是關於社會主義者對歐洲一系列國家的內外政策的最重要問題的態度；在談到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製造的爆炸事件時，恩格斯認為這是巴黎警察當局的挑釁行動。談話的全文經恩格斯審閱和修改後發表在4月6日的“閃電報”上。

- 4月中** 恩格斯接見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謝·魯薩諾夫，和他談論俄國的經濟情況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幾個問題；恩格斯指出，民粹派的幻想必定要破產，因為他們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历史必然性。
- 4月20日** 恩格斯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英文版寫完了導言，他在導言中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述了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幾個最重要的階段，為此分析了幾個歷史問題和唯物主義哲學問題，並且說明了不可知論和在資本主義開始衰落時期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特點。該版於1892年在倫敦出版。
- 5月** 恩格斯從門德爾森那里得到在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印的波蘭文五一節傳單。
- 5月1日** 恩格斯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五一節示威遊行和群眾大會；在以後幾天，他寫信給勞·拉法格和倍倍爾，認為五一節的慶祝活動是工人運動的巨大成就。
- 5月2日和10日之間** 恩格斯非常注意從5月1日至8日舉行的法國市鎮選舉的進展情況，贊揚社會主義者在選舉運動中的成就。
- 5月5日左右** 恩格斯從拉布里奧拉那里得知在意大利各城市舉行五一節示威遊行的情況。
- 5月14日左右—6月1日** 倍倍爾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們兩人一起多次同當時也在倫敦的辛格爾會面；他們討論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
- 5月17日—6月** 由於肖萊馬患重病，恩格斯同肖萊馬的兄弟以及給他治病的醫生通信，並且到曼徹斯特去看望他。
- 5月31日** 恩格斯寫信祝賀奧地利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賀信發表在6月10日的“工人報”上。
- 約6月初** 恩格斯把自己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

英文版写的导言翻譯成德文。譯文于9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标题是:“論历史唯物主义”。

- 6月9日和17日之間** 恩格斯多次接見到伦敦来参加国际矿工代表大会的德国矿工代表团;恩格斯同代表团的成員交談德国矿工的情况和他們爭取自己权利的斗争。
- 6月中—7月25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选举运动和从7月7日至24日举行的英国下院选举的进展情况;在給倍倍尔、劳·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贊揚哈第、白恩士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的巨大成就,并且指出,这将促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
- 6月29日—7月2日** 由于肖萊馬逝世,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在那里参加他的葬礼;恩格斯写紀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学者的悼文。悼文用“卡尔·肖萊馬”为标题发表在7月3日的“前进报”上。
- 7月21日** 恩格斯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該版于8月中出版。
- 7月23日** 由于福尔馬尔又发表了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辯护和为社会民主党同德意志帝国合作辯护的言論,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信中強調必須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且拟定同他們斗争的策略。
- 7月27日—9月6日** 恩格斯在賴德休养。
- 8月** 恩格斯繼續进行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研究,閱讀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勒南的著作。
- 8月2日左右** 恩格斯从丹麦社会民主主义者格·特利尔那里收到关于丹麦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

- 8月4日和9月3日之間** 恩格斯从拉布里奧拉那里收到关于8月14—15日在热那亚举行的意大利劳动党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进程的报道。
- 8月12日和9月4日** 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两封信中,对于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艾威林夫妇关于英国选举結果的文章时删掉其中批評社会民主联盟领导和費边社的段落表示不滿意;恩格斯认为費边社是对未来无产階級革命感到恐惧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的集团,他們企图使工人階級从属于自由資產階級,而不容許在英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
- 8月19—23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左尔格和阿德勒,告訴他們英国社会主义者在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績;他指出郎卡郡的紡織工人的情緒有了轉变,他們絕大多数都贊成参加斗争,爭取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时工作日。
- 9—10月** 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會員、德国医生路·庫格曼通信,从他那里得到馬克思的几本久未再版的著作。
- 9月5—26日** 恩格斯注意9月5日至9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做了評价。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拒絕参加将于1893年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另外召开一个討論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決議,恩格斯认为这个決議的目的是企图阻碍新工联同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此,恩格斯劝告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要接受这个計劃,并且建議某些工联派自己的代表到苏黎世去;恩格斯还审閱倍倍尔根据他的建議就这个問題为“新时代”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恩格斯还就这个問題写信給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

- 員会；恩格斯号召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給工联分子的企图以反击。
- 9月12日** 恩格斯从施米特那里得悉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青年派”领导者又在进行新的分裂活动之后，在給施米特的信中譴責他們的行动，并且指出，既然他們是脱离工人群众的，他們在德国就找不到任何的支持。
- 9月下半月** 恩格斯注意分別于9月19日至23日和24日至28日在馬賽举行的法国工团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根据恩格斯的建議，两个代表大会都通过決議不参加英国工联将要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再次邀請它們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贊同李卜克内西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这篇演說強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
- 恩格斯多次接見柯瓦列夫斯基。
- 9月22日和11月17日** 恩格斯接見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謝·米·克拉夫欽斯基(斯捷普尼亚克)。
- 10—12月** 恩格斯在半年多的間断之后，又开始进行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的工作，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用在这項工作上。
- 10月上半月** 恩格斯閱讀“青年派”的领导者之一汉·弥勒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建議他揭露这个小册子对党的恶毒的蠱惑性攻击，并且建議他同时批評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活动家的机会主义錯誤。
- 10月6日和15日之間**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請求，帮助他准备在众議院的演說，演說的目的是揭露法国沙文主义者和闡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立場；恩格斯把从倍倍尔那里得到的

关于普法战争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材料寄给拉法格。

10月中

恩格斯阅读法国律师、布朗基主义者和布朗热主义者欧·普罗托的小册子“沙文主义者和反动派”，这本小册子也是反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在给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的信中，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本欺骗性的和诽谤性的小册子，是按照热衷于使资产阶级法国和沙皇俄国结成侵略同盟的警察机关和沙文主义集团指派的任務写成的。

11月6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目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就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言论而展开的讨论，显得空洞、抽象；恩格斯建议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追究福尔马尔向威廉二世和德国政府献媚的责任。

11月9日和15日之間

恩格斯写“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文章发表在11月16日的“前进报”上。

11月9日和25日之間

恩格斯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写马克思的传略，传略发表在1892年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第四卷上。

11月14—21日

恩格斯注意11月14日至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水平比以往各次低。代表大会违反它在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承担的义务，拒绝在5月1日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而把它移到星期日举行，恩格斯指出，代表大会的这种做法将被其他党看做是不遵守共同通过的决议。同时，恩格斯称赞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决议。

11月15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给同“青年派”接近的一家德国社

- 会政治报纸“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揭露在该报上不署名发表的瑞士社会主义者艾里提埃的一组文章以无政府主义精神伪造第一国际的历史；恩格斯的这封信发表在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
- 11月19日—12月22日** 恩格斯在同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中，讨论1893年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他说明，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不遵守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所有国家同时举行庆祝活动的决议。
- 11月底—12月4日** 恩格斯利用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关于他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的社会制度和家庭风俗的研究报告，写“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文章发表在12月的“新时代”杂志上。
- 1892年12月—1893年7月** 恩格斯在从事其他工作的同时，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德文第二版。
- 12月** 恩格斯注意由于揭发和公布了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与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有牵连的舞弊行为而尖锐化的法国政治局势；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他建议法国社会主义者利用当前出现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鼓动。
- 12月3—4日**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计划把“新时代”变成通俗的政治和文艺杂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样的杂志以外，必须创办一种理论刊物，以便在那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
- 12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请他归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恩格斯曾委托他辨认其中笔迹不清楚的地方。1893年1月初，恩格斯通过倍倍尔收到了这份手稿。

1893

- 1—5月** 恩格斯繼續进行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月初**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邀請恩格斯出席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复信該党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表示祝賀。
- 1月3日左右—10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 1月10日** 恩格斯从瑪·門德尔森那里得知巴黎警察当局逮捕了五位波兰革命流亡者的消息后，为此写了一篇題为“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徑”的文章，发表在1月13日“前进报”上。
- 1月中** 英国社会主义組織和社会主义小組于1月13—14日在布萊得弗德举行代表會議，通过了建立独立工党的決議，恩格斯密切注視會議进行情况；在給左尔格的信里，他把这一事件当作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实来評价，并且表示贊同艾威林参加新党的执行委员会。
- 1月23日** 恩格斯出席紀念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五十三周年的晚会。
- 1月26日和29日之間** 恩格斯根据拉布里奧拉提供的文件和資料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馬”，揭露意大利几家同許多著名政治活动家有密切联系的大銀行在金融上的鬼蜮伎俩。文章发表在2月1、2和3日的“前进报”上。
- 2—3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独立工党的发展并把这种情况告知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恩格斯在給他們的信里指出該党領導者哈第的一系列有

-
- 利于保守党人的政治錯誤；同时，恩格斯注意到新党成員中有健康的无产階級成分，指示他們必須奉行真正的独立政策，这样做既能使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又能迫使自由党政府让步。
- 2月** 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討論新的軍事法草案，恩格斯应倍倍尔的請求写了一組題为“欧洲能否裁軍？”的文章。恩格斯指出，軍备竞赛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負担，而且孕育着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他提出在国际協議的基础上裁軍和逐步地以民兵制度代替常备軍的建議。这組文章发表在3月1日至10日的“前进报”上，并于3月底出版单行本。
- 2月1日** 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該版于1898年在米兰出版。
- 2月2日左右** 恩格斯应伦敦俄国犹太人流亡者社会主义小組“进步社”的請求，寄給它許多有关社会主义理論和历史的书籍。
- 2月4日** 恩格斯认为引导工人階級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他劝哈尼撰写宪章运动史。
- 2月6日左右** 恩格斯讀到倍倍尔2月3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提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綱領的演說，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議員就这个問題所作的发言；他把帝国国会被迫花五天时间来討論这个問題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恩格斯对倍倍尔的演說給予很高的评价，并贊同为广泛传播这一演說而采取的措施。
- 2月7日** 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 B. 施穆伊洛夫請恩格斯帮助他写馬克思传略，以便在俄国出版；恩格斯应此請求給他提了許多意見和指示，并把第一国际活动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

- 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寄給他。
- 2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給丹尼尔逊，說明后者試图证明俄国在沿着非資本主义道路发展，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俄国的农民公社只有在較发达的国家推翻了資本主义之后，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基层单位；在現存条件下，資本主义道路对俄国是不可避免的。
- 2月底—3月** 由于法国已經开始議会选举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密切注意工人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組織的活动；他在給拉拉格夫妇的几封信里，建議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小組結成选举联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行动的自由和执行独立的政策。
- 3月1日左右—17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格兰南海岸)休养。
- 3月13日** 恩格斯为德国工人写一篇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文章；在文章中簡略地評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文章于5月1日刊登在“前进报”出版的专刊“五一节”(«Mai-Feier»)上。
- 3月14日** 恩格斯回答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 F. 維森提出的問題——在資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者能不能对由选举产生的职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恩格斯指出，这在原則上是許可的，并指出工人階級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
-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日内瓦举行的紀念馬克思逝世十周年的會議拍来的电报，上有普列汉諾夫等人的签名。
- 3月15日** 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領導为紀念馬克思逝世十周年拍来的电报。
- 3月中** 恩格斯讀发表在3月1日“新时代”上的列斯納回忆馬克思的文章，并給予好評。

- 3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复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組織委员会秘书亨·德·劳埃德，說明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启程赴会。这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9月，趁举行世界博覽会之便在芝加哥召开，組織会邀請恩格斯参加代表大会。恩格斯随函寄給劳埃德“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英文版。
- 3月21日** 恩格斯在給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奥·拉迪姆斯基的信里，对后者告訴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譯成捷克文一事表示欣慰。
- 3月28日左右—4月4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除了其他一些問題之外，他們討論了辛格尔提出的以单行本分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建議。出版文集一事并未实现。
拉法格夫妇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們同他討論了法国工人运动問題。
- 3月31日**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議員——倍倍尔、拉法格和白恩士在恩格斯家里会晤；恩格斯把这次会晤本身看做国际工人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
- 4月—7月初** 恩格斯数度接見持普列汉諾夫的介紹信来訪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米·沃登；恩格斯同他交談了俄国的經濟状况，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以及許多哲学和經濟学問題。談話当中，恩格斯指出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研究土地問題的特殊重要性，他还表示，相信在最近时期俄国国内将出现一批新的坚强的工人运动領袖。
- 4月** 恩格斯給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写五一节賀信；他強調指出庆祝这一节日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这些信刊載在：4月23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报”上，标题是：“尽管如此”；奥地利“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庆祝1893年五一节”（《Zum 1. Mai 1893》）上和5

月 1 日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报”上。

4月初

恩格斯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伊格列西亚斯那里收到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情况以及关于社会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斗争情况的报道；以后，恩格斯继续从他那里收到这种报道。

4月8日

恩格斯应捷克社会主义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约·克拉普卡的请求写一篇短文“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1848年回忆片断”，文中强调不同民族的工人、其中包括德国和捷克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性，短文刊载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1893年五一节”（《První Maj 1893》）上。

4月24日

恩格斯动身到曼彻斯特去参加他的朋友 E. 龔佩尔特医生的葬礼。

5月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伊格列西亚斯的信，伊格列西亚斯在信中报道了西班牙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并且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请恩格斯在 5 月 7 日伦敦举行示威游行时代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5月6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为即将举行的五一节集会写给英国工人的贺信；同时，普列汉诺夫还告诉他日内瓦五一节示威游行情况。

5月7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

5月11日

恩格斯同法国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对国际形势和德国状况作了评述；谈话于 5 月 13 日刊登在该报上。

5月17日

恩格斯把他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最后几节的工作情况和关于写作国际工人协会史的意图告诉左尔格。

- 5月25日左右** 恩格斯从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彼·拉·拉甫罗夫那里收到一本在日内瓦出版的书“理論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其中載有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格·亚·洛帕廷的一封关于他在1883年9月同恩格斯談話的信。
- 5月27日** 侨居美国的俄国經濟学家伊·阿·古尔維奇曾把自己的著作“俄国农村的經濟状况”一书寄給恩格斯，恩格斯在讀完之后給作者回信，对这部著作給予好評。
- 6月9日** 恩格斯写信給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編輯部，对寄給他一册杂志表示感謝，并对东南欧各国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成长表示欣慰。这封信刊登在杂志第3期上。
- 6月12日左右** 恩格斯从屠拉梯那里收到“資本論”第一卷意大利文譯本。
- 6月13日** 恩格斯打电报給拉甫罗夫，祝賀他七十岁生日。
- 6月中** 恩格斯注意德国选举的进行情况；他在給拉法格夫妇的信中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并強調指出党的影响，尤其是在农业区的影响不断增长。
- 6月20日左右—27日** 恩格斯讀6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題发表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国内沙文主义情緒增长而写給法国劳动群众的呼吁书；恩格斯在給拉法格的信中，整个說来贊同这份呼吁书，但是指出，其中不合法地提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际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主张，这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間的国际相互关系的原則受到破坏；他还指出，呼吁书中把法兰西共和国同其他国家的君主政体无条件对立起来的提法将会掩盖资产階級共和国的階級实质。

- 6月底 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問題对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紀事报”記者发表談話。談話刊載在7月1日的报上。
- 7月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尼·彼得逊关于丹麦經濟状况的报道。
- 7月14日 恩格斯写信給梅林，对寄給他“萊辛传奇”一书单行本表示感謝，說他对这部著作評价很高，并举出德国和法国历史上的例子闡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他告訴梅林，他打算为“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版做些修改。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一意图。
- 7月15日 恩格斯为“資本論”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写簡短的序言。
- 7月19日 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魯·迈耶尔来信对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的某些原理提出批評，恩格斯在复信中指出，迈耶尔关于不可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論断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強調，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資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資料归社会公有。
- 7月21—28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7月29日 恩格斯立遺囑，他把一部分財產和藏书遺贈給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大部分財產留給馬克思的几个女儿和外孙。
- 8月1日—9月29日 恩格斯去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造訪科伦，后偕倍倍尔經美因茲和斯特拉斯堡到苏黎世，离开那里几天去格劳宾登会他的弟弟海尔曼，后回苏黎世并在瑞士逗留了两星期，然后經慕尼黑和薩尔茨堡赴維也納，离維也納經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維发利）到柏林，再取道鹿特丹回伦敦。

- 8月中** 恩格斯在苏黎世时几次拜訪“劳动解放社”成員查苏利奇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 8月12日** 恩格斯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閉幕會議，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了簡短的演說，并受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宣布會議閉幕；恩格斯在演說中指出了馬克思对工人階級的功績，說明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 8月31日—10月13日** 鉴于8月20日法国众議院选举，恩格斯在給拉法格夫妇的信里对以盖得为首的工人党議員能否把其他社会主义組織的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表示担心；他建議执行有助于这一团结的策略。
- 9月11日** 恩格斯出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而在維也納举行的晚会。
- 9月14日** 恩格斯出席維也納社会民主党人为庆祝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胜利閉幕而举行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話，指出社会主义者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显著增长；講話刊載在9月22日的“工人报”上。
- 9月22日** 恩格斯出席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到德国而組織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話，指出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巨大作用，并贊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講話刊載在9月26日“前进报”附刊上。
- 10月11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寄来的关于10月7日至9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道。
- 10月11—21日** 鉴于爱·塔菲保守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提出奥地利选举改革草案，規定扩大选举权，恩格斯在給阿德勒、倍倍尔和劳·拉法格的信里分析了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并建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利用由于多数資產

階級政黨反對改革草案而引起的國內政治危機，加強社會主義鼓動。

10月中

恩格斯密切注意從7月底開始並持續下來的英國中部礦工反對礦主們宣布同盟歇業的鬥爭；他在給倍倍爾的幾封信里談到這次鬥爭的詳細情況，還談到一部分礦主被迫拒絕同盟歇業。

10月14—27日

恩格斯获悉福爾坦打算把馬克思的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反杜林論”里的“暴力論”三章譯成法文在社會主義雜誌“新紀元”（《L'Ere nouvelle》）上發表，他為這事同福爾坦和勞·拉法格通信；他指出，馬克思的著作只能由哲學專家來翻譯，他只同意翻譯“暴力論”。

10月17日

恩格斯在讀了作者丹尼爾遜本人寄給他的“我國改革後的社会經濟概況”一書以及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彼·別·司徒盧威就這本寫作的批評文章之後，寫信給丹尼爾遜。他指出，丹尼爾遜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步性的民粹主義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同時，恩格斯批評司徒盧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想化，他證明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地同廣大群眾的貧困化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在像俄國這樣經濟落后的國家里更是如此。

10月22日和31日之間

恩格斯幾次接見持拉甫羅夫的介紹信前來拜訪他的俄國民粹主義者 X. 拉波波特；恩格斯同他談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若干問題、俄國革命運動情況和其他問題。

約10月24日—12月23日

恩格斯繼續從拉布里奧拉那里經常收到關於意大利政治狀況以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情況，其中包括關於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所支持的西西里勞動群眾運動（“同盟”運動）情況的報道。

- 11月6日和12日之間 恩格斯讀迈耶尔的“世紀末的資本主义”一书。
- 11月2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以及其他的組織和个人給他祝寿的賀信、賀电。
- 12月 恩格斯申閱由劳·拉法格翻譯的“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上半部的法譯文，并把他的意見寄給她。
- 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得到斐·沃尔弗病重的消息，到牛津去看望他。
- 12月1日 恩格斯写信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对祝賀他的寿辰表示感謝。
- 12月2日 恩格斯在給左尔格的信里分析了在美国阻碍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因，他提到的原因有：两党制使握有統治权的政党能广泛欺騙群众，由本地美国人和移民組成的工人阶级成分駁杂，而且他們又分散成各个民族小集团，存在对黑人居民的种族歧視，以及无产阶级上层的生活水平比較高。恩格斯在那封信里还告訴左尔格，他已經把“資本論”第三卷的頗大部分准备好付印。
- 12月19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邀請恩格斯蒞临指导，恩格斯复信祝賀大会；恩格斯強調，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知識分子在国民經济和国家管理的各部門都将起重要作用。这封信刊載在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

1894

- 1月—5月11日 恩格斯繼續进行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3月 恩格斯注意在奥地利展开的爭取普选权的斗争；他在

給阿德勒、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強調指出，扩大选举权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的意义。

1—2月

恩格斯同哈尼通信并給他以物质帮助。

1月上半月

恩格斯为他发表在 1871—1875 年“人民国家报”上的关于国际問題的論文集写序。在专门为本論文集写的“論俄国的社会問題”跋里，恩格斯闡述他对資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俄国农民公社的命运的观点。論文集于 1 月底出版。

恩格斯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三卷的工作已完成很大一部分，他給汉堡奥·迈斯納出版社寄去头四篇，共 20 章(手稿的三分之一)。

1月3日

恩格斯讀載于法国布朗基社会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上的裁軍方案，这个方案是瓦揚为提交众議院而提出的。恩格斯在給拉法格的信里，在贊同方案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提了許多实践上的意見，并建議以他在“欧洲能否裁軍？”一文中所述的建議作为方案的基础。恩格斯劝法国社会主义者就他們建議召开国际裁軍會議的問題事先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商量一下。

1月6日和10日之間

恩格斯讀十七世紀初英国作家罗·伯頓“忧郁症的解剖”一书，这本书是他的朋友、著名的英国地质学家 G. W. 兰普魯寄給他的。

1月9日左右

恩格斯分別为“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写短文，簡略地評介“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两篇短文分別发表在 1 月 12 日的“前进报”上和 1 月的“新时代”上。

1月25日

恩格斯应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德国大学生 W. 博尔吉烏斯的請求給他写复信，信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其中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态上层建筑对

- 經濟基础（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反作用問題，历史上必然性和偶然性辯证地相互作用的問題等等。这封信由“社会主义大学生”（《Der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杂志撰稿人海·施塔尔根堡于1895年10月发表在該杂志上。
- 1月26日** 屠拉梯和他的妻子、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安·庫利紹娃曾請求恩格斯就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正在展开的劳动人民群众性运动的条件下应采取什么策略的問題談談他的意見，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回答，他在文章中強調指出酝酿中的意大利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者應該执行的策略是，保证无产階級积极参加这一革命并保持它的階級独立性。文章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2月1日的“社会評論”杂志上，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 1月底** 保·拉法格在恩格斯家里作客，并在那里会见白恩士。
- 2月9日左右—3月1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2月23日—5月21日** 由于英国議會选举即将举行，恩格斯在给左尔格、阿德勒、普列汉諾夫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分析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間的斗争；他指出，自由党力图保持执政地位，因此将被迫对工人階級做些让步。在談到英国沒有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这是工人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組織的宗派性质所引起的；恩格斯提出制定自己独立的政策作为英国无产階級的主要任务。
- 2月底—5月** 恩格斯讀丹尼尔逊寄給他的两卷关于俄国的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統計資料。
- 3月6日** 恩格斯讀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改良派首領之一让·饒勒

- 斯在众議院所作的建議規定谷物进口由国家垄断的发言之后，写信給拉法格，批評这一建議。恩格斯指出，在資產階級共和国的条件下，任何国家垄断将只对資本家階級有利；他还指出，只要政权在資產階級手里，实行任何社会主义措施都不可能。
- 3月18日** 恩格斯为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紀念給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写賀信。賀信刊載在3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 3月20日** 恩格斯把“資本論”第三卷的第一批校样寄給丹尼尔逊，以便譯成俄文；以后，他陸續把从印刷所收到的校样寄一份給后者。
- 恩格斯在給羅馬尼亚社会主义者 P. 穆索伊的信里，感謝他寄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的羅馬尼亚文版。
- 3月21日** 恩格斯告訴左尔格，他已完成“資本論”第三卷手稿基本部分(約三分之二)的工作。
- 3月22日** 恩格斯接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邀請他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請帖后，給代表大会写賀信；他指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是为爭取普选权而斗争；賀信載于4月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記錄”(«Verhandlungen des vierten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ess»)。
- 3月26日** 恩格斯在給伊格列西亚斯的复信里对社会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的发展表示欣慰。
- 3月27日** 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发来的賀信。
- 4月24日** 恩格斯給巴門社会民主联合会主席艾伯勒写信，感謝这个組織寄給他一本貼有他的故乡巴門城的风景照片

- 的紀念册。
- 5月6日和7日 恩格斯接見法国工人党活动家阿·德尔克律茲。
- 5月11日 恩格斯把“資本論”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給出版社。
- 5月15日 恩格斯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写信給該党执行委员会,这封信載于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新聞”和用匈牙利文載于5月18日的“人民言論”上。
- 5月23日 恩格斯为“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写序,該书于7月出版。
- 6月1日 恩格斯在給丹尼尔逊的信里感謝他寄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俄文第一版,认为譯文质量总的来說 是好的。
- 6月中 恩格斯收到左尔格寄来的关于美国矿工罢工运动的报道。
- 6月18日左右 恩格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者 M. 德亚克那里获知准备把“共产党宣言”譯成匈牙利文的消息。
- 6月19日左右—7月2日 恩格斯多次接見到英国来的李卜克內西。
- 6月19日和7月16日之間 恩格斯写“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这是他先前就这个題目所做的研究的总结;文章刊載在9月底—10月初的“新时代”杂志上。
- 6月27日 恩格斯认为广泛宣传“資本論”第三卷的内容有很大意义,他把这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寄給“新时代”杂志編者发表;这两章載于7月的杂志上。
- 7月19日—8月2日 由于苏格兰发生矿工罢工以及罢工委员会向恩格斯呼吁,恩格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通信,談到給罢工者以物质

- 帮助；他本人也对罢工者提供帮助。
- 7月26日左右** 恩格斯把“反杜林論”第三版寄給拉布里奧拉。
- 7月30日和8月6日之間** 恩格斯应伊格列西亚斯的請求，通知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以及英国的許多社会主义和工人組織：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在8月底召开。恩格斯建議它們向代表大会致函祝賀。
- 8月7日左右—22日** 恩格斯了解了8月5—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大会的結果后，批評联盟领导者的宗派主义政策，其中包括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决定：一个是决定在将于1896年在伦敦举行的有工联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前夕另行召开特殊的“純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另一个是决定把独立工党当作“非社会主义”組織而拒絕同它合作。恩格斯在給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建議他們在报刊上反对这一意图的實現。
- 8月14日—9月18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8月15日和30日之間** 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奧拉寄来的关于意大利状况的报道，以及关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經濟学家阿·洛里亚及其追隨者企图批判馬克思的經濟学說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資料；在以后数月中恩格斯繼續收到类似的报道。
- 9—11月** 恩格斯注視中日战争的战况发展；他在給劳·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指出，不管战争結局如何，这场战争将推动資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 9月6日**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邀請恩格斯参加它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恩格斯致函該党一位活动家卡·德拉瓦勒祝賀代表大会；賀信于9月22—23日刊載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阶级斗争”上。

- 9月9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馬尔提涅蒂的信，說他已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恩格斯的其他作品譯成意大利文，并談到发表这些譯文的困难。
- 9月26日** 恩格斯应西西里島社会党人打算在巴勒摩出版的报纸“社会正义”(«Giustizia sociale»)編輯部的請求，給西西里島的社会党人写賀信；由于該报被禁止出版，賀信于1895年6月30日刊載在西西里島社会主义报纸“解放”上。
- 10—11月** 恩格斯多次接見从瑞士被驅逐出境后暫住伦敦的普列汉諾夫。
- 10月** 恩格斯根据报纸和伊格列西亚斯的来信注意馬拉加的西班牙紡織工人罢工的进行情况；他贊賞他們英勇頑强。
- 10月4日** 恩格斯写成“資本論”第三卷序言。
- 10月下半月** 恩格斯注意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下院选举情况，选举結果社会主义者赢得三十二席；恩格斯在給比利时工人党的領導者之一艾·王德威尔得的信里指出，这一事件对比利时无产阶级、对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意义。
- 10月27日** 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請求給“社会評論”杂志編輯部写信，駁斥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企图把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議會活动对立起来，并以此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这封信于11月1日刊載在該杂志上。
- 10月底—11月** 鉴于福尔馬尔在10月21日至27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綱領問題的机会主义的发言，恩格斯在給左尔格、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內西等人的信里对这个发言作了最严厉的

- 批評。他把福尔馬尔提出的維護农民、包括大农的私有利益的要求評定为背弃社会主义原則。
- 11月初** 恩格斯讀刊載在“新紀元”杂志上的“共产党宣言”法譯文,并提出自己的意見。
- 11月10日** 恩格斯在給左尔格的信里評述英国工人运动情况;他指出建立同自由党、保守党相对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他提到,社会民主联盟的領導者們仍然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場,把馬克思主义理論变成僵死的教条,而独立工党的領導則搖擺不定,并且放弃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勾結。
- 11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給“前进报”編輯部,严厉駁斥福尔馬尔企图歪曲他在土地問題上的立場;这封信于11月16日刊載在該报上。
- 11月15日和22日之間** 为了答复福尔馬尔的发言,并且鉴于法国工人党于9月在南特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綱領的緒論部分和补充中包含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錯誤,恩格斯撰写“法德农民問題”。恩格斯批評这些发言和錯誤,并制定馬克思主义的土地綱領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于11月底刊載在“新时代”杂志上。
- 11月下半月—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关于土地問題的辯論。在反对福尔馬尔的斗争中,他給倍倍尔出了許多主意,并批評李卜克內西的調和立場;恩格斯证明,为了党的真正統一,必須坚决反击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他认为这次辯論的結果是对机会主义的胜利。
- 11月22日** 由于“前进报”刊登消息說“資本論”第四卷将不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短文駁斥这种說法。短文未署名于11月刊載在“新时代”杂志上。
- 11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給阿尔明尼亚社会主义者 И. 阿塔貝强

- 茨，感谢他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译成阿尔明尼亚文，还感谢他告知阿尔明尼亚的状况；恩格斯指出，只有在俄国开展革命运动，推翻俄国沙皇制度，阿尔明尼亚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 12月11日** 恩格斯把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友好地题赠给普列汉诺夫。
- 12月12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左尔格和施留特尔。
- 12月27日** 由于“工人报”从1895年1月1日起改为每日出版，恩格斯给奥地利工人写贺信。贺信刊载在1895年1月1日的“工人报”上。

1895

- 1—3月**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洛里亚及其追随者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报道，这些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并反驳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提出的原理；恩格斯还从他那里收到刊载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评论”（《La Rassegna》）上的这一序言的译文。
- 1月** 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他着手搜集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五十年代刊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并为此同库格曼通信。
- 1月上半月** 恩格斯获悉符卢勃列夫斯基生活异常困难，在分别写给瓦扬和拉法格的信里，他坚持要法国社会主义者向符卢勃列夫斯基提供经常的物质帮助。
- 1月1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拉甫罗夫和阿德勒。

- 1月3日** 恩格斯繼續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內的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他在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施土姆普弗的信里指出，党内机会主义傾向趋于活跃的原因之一，补充党的队伍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小资产阶級分子；恩格斯強調同这些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并表示相信革命派必将胜利。
- 1月9—28日** 恩格斯在同阿德勒的通信中，討論“工人报”改为日报后的领导問題；他为編輯部筹划物质援助和組織稿源等。
- 1月底—2月初** 恩格斯认为恢复馬克思对拉薩尔的态度真面貌有很大意义，他准备出版馬克思同拉薩尔的通信。这一出版计划在恩格斯生前未实现。
- 2月** 恩格斯讀普列汉諾夫“論一元史观的发展問題”一书，这书是作者寄給他的。
- 2月1日和26日之間** 恩格斯应普列汉諾夫的請求为查苏利奇延医治病。
- 2月上半月** 鉴于“前进报”社拟将馬克思于1850年在“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上專門为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后一些事件写的文章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为此同費舍通信；他建議把小册子的书名定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級斗争”，他还确定了书的内容、各章标题以及印数。
- 2月2日** 英国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定于1896年在伦敦召开的应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定名問題征詢恩格斯的意見，恩格斯复信作答；他在給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維·約德科的信里，表示同意把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例外，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他解釋必須这样定名的理由是，英国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都拥护工联。

- 2月14日—3月6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详细分析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策略基础，他指出从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已经变化，其中包括由于军事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担心这篇导言会给恢复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不必要的借口，由于他们的坚持，恩格斯在校样中删去了几个地方，但这篇著作的革命实质还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导言于3月底—4月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并收在4月中出版的书里。
- 2月下半月** 恩格斯读劳·拉法格译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法译文手稿，并在译稿上做了一些修改。
-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从他亡妻的一个居住在美国的侄儿威·白恩士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消息，其中包括勃鲁克林电车工人罢工的消息。
恩格斯收到倍倍尔的报道，说德国政府打算要帝国国会通过矛头针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防止政变法及其他反动法案。
- 3月5日** 恩格斯读了瓦扬寄给他的几件法国社会主义者打算提到众议院去的法案(关于农业公有地产、关于国营企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关于成立劳动部等等)，写信给瓦扬，对这些法案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
- 3月11日和4月6日** 由于施米特和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发表的“资本论”第三卷书评里，对价值规律、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作了错误的解释，恩格斯写信给他们，批判这些错误观点，并阐明对这些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实质。
- 3月12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劳·拉法格关于法国准备庆祝五一节的情况的报道。

- 3月16日** 恩格斯写信給阿德勒，对他提了些关于研讀“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見和指示。
- 3月18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希尔施的請求，讀他发表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的、論证由于劳动强化而必須为縮短工作時間而斗争的几篇文章，并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希尔施。
- 3月底—4月初** 恩格斯讀拉法格“财产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并写信給他，对該书总的給以好評，同时也对作者的个别見解提出批評。
- 4—5月** 恩格斯写“資本論”第三卷增补，共两篇文章：“价值規律和利潤率”和“交易所”。恩格斯在第一篇文章里剖析了許多对“資本論”第三卷的书評；在第二篇以草稿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章里，恩格斯分析交易所已經变化了的作用和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展，他把这点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新特征。这两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未刊印。
- 4月** 恩格斯繼續准备出版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为此同倍倍尔、費舍、梅林通信。
- 4月1日** 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信里，坚决抗議事先未經他同意而在3月30日“前进报”上以任意挑选的摘录形式发表他为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写的导言，因为这給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是无论如何要采取和平策略的拥护者。
- 4月初** 恩格斯由于打算整理出版“資本論”第四卷，閱讀瑞士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斯·鮑威尔寄給他的专题著作“論重农学派学說的发生。根据魁奈的未发表著作”。
- 4月15日左右** 恩格斯把剛出版的由他校訂并写导言的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寄給列斯

- 納、查苏利奇、拉布里奧拉、瓦揚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 4月15日—5月29日** 恩格斯就出版在1842年“萊茵报”上发表的馬克思早期論文集子的問題同費舍和梅林通信。出版計劃未實現。
- 4月19日左右** 恩格斯从馬尔提涅蒂那里得知，他为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写的导言已譯成意大利文。譯文以节譯的形式发表在5月1日的“社会評論”杂志上。
- 5月** 恩格斯讀考茨基的“現代社会主义的先驅”一书；他在給考茨基的信里指出該书的缺点，其中包括对构成无产階級先驅的中世紀城市的最无权分子的作用以及对十五、十六世紀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經濟状况的問題研究得不够。
恩格斯身上出現后来使他死亡的病症食道癌的初步可觉征候。
- 5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捷克社会主义者格累尔寄給他的、維也納出版的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捷克文譯本。
- 5月21日** 恩格斯得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瞞着他准备出版一套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书，他在給考茨基的信里对这事表示憤慨；他說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行为是力图在实际上不让他參預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 6月—7月2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治病，爱·馬克思-艾威林、劳·拉法格、爱·艾威林和阿德勒等人去那里看望他。
- 6月17日左右** 恩格斯从阿德勒那里收到关于奥地利政治状况的报道。

-
- 7月24日** 身患重病的恩格斯从伊斯特勃恩回伦敦。
- 7月28日** 恩格斯不顾病情严重,仍同爱·馬克思-艾威林談論英国独立工党内的状况。
- 8月5日(晚10点30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
- 8月6日和10日之間** 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許多活动家在唁电和唁信里对恩格斯逝世深表哀痛。
- 8月10日** 恩格斯的遗体在伦敦附近的沃金火葬場火葬。追悼大会在滑铁卢車站大楼举行,恩格斯的亲友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团体的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摯友賽·穆尔、保·拉法格、李卜克內西、倍倍尔、艾威林、安塞尔及其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在会上讲话。查苏利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恩格斯的灵柩献花圈。
- 8月27日** 遵照恩格斯的遺囑,骨灰罐由他最亲近的朋友——爱·馬克思-艾威林、列斯納等人在伊斯特勃恩海濱的岩壁附近投入海中。
- 約9—11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弗·伊·列宁写悼念文章,全面評述恩格斯在理論上和实践上的革命活动。文章发表在1896年“工人”文集第1—2期上。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德比尔特 (Vanderbilt) —— 美国最大的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 第 314、370 頁。

四 画

邓斯·司各脱, 约翰 (Duns Scotus, John 1265 左右—1308) —— 中世紀經院哲学家, 唯名論 (唯物主义在中世紀的最初表現) 的代表人物, “牛津文集” 这一巨著的作者。—— 第 339 頁。

丰唐, 馬利烏斯 (Fontane, Marius 1838—1914) —— 法国作家, 巴拿馬运河公司負責人之一, 在巴拿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 于 1893 年被判处二年徒刑, 但后来被宣告无罪。—— 第 423 頁。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1800—1891) —— 普魯士將軍, 1871 年起为元帅, 反动的軍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魯士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1835—1839 年在土耳其軍隊中任职; 曾任普魯士总參謀长 (1857—1871) 和帝国总參謀长 (1871—1888)。—— 第 5、6、9、39、54 頁。

太斯特勒尔, 海尔曼 (Teistler, Hermann)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青年派” 領袖之一, 1890 年为“薩克森工人

报”編輯。—— 第 99 頁。

韦斯明斯特公爵 —— 見格委弗諾。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jski, Wladyslaw) —— 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鎮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 第 41 頁。

巴尔, 海尔曼 (Bahr, Hermann 1863—1934) —— 奥地利資產階級批評家, 小說家和剧作家。—— 第 94、97 頁。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 法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8 年 2 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領; 1848 年 12 月至 1849 年 10 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內閣。—— 第 292、610 頁。

巴霍芬, 約翰·雅科布 (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 —— 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母权論” 一书作者。—— 第 246、248—250、252、253、255、257 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 俄国革命家和政論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第一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 第 61、64、78、106、399、405—407、492、493、494、537 頁。
- 巴克兰德，威廉 (Buckland, William 1784—1856) ——英国地质学家和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地质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第 342 頁。
- 巴斯特利卡，安得列 (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 ——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406 頁。
- 比万 (Bevan) ——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1887 年为在该市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主席。——第 67 頁。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 ——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70—1871 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第 112、113、116、163、164、168、174、175、182 頁。
- 比亚季尼 (Biagini) ——意大利财政官员，1889 年曾检查罗马银行。——第 418、419、423 頁。
- 孔斯坦，让·安都昂·厄内斯特 (Constans, Jean-Antoine-Ernest 1833—1913)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内政部长 (1880—1881、1889—1892)，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第 296、297 頁。
- 孔西利奥 (Consiglio) ——那不勒斯银行总经理，参议员。——第 418 頁。
- 尤尔，安得鲁 (Ure, Andrew 1778—1857) ——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 197 頁。
-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 60—140)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 610 頁。

五 画

- 本格尔，约翰·阿尔勃莱希特 (Bengel, Johann Albrecht 1687—1752) ——德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经文的注释者和出版者。——第 549 頁。
- 卢格，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393、400 頁。
- 皮-伊-马尔加耳，弗朗西斯科 (Pi y Margall, Francisco 1824—1901)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的领袖；职业是律师和文学家；资产阶级革命 (1854—1856 和 1868—1874) 的参加者，曾任内务部长 (1873 年 2 月 13 日—6 月 11 日)，共和国政府的临时总统 (1873 年 6 月 11 日—7 月 18 日)。——第 492 頁。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 ——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17、22、24—29、31、33、46 頁。
- 白尔尼，路德维希 (Börne, Ludwig 1786—1837) ——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 60 頁。
- 白拉克，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

- 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倫瑞克的社会主义书籍出版者,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創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薩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彻底。——第105、400、408頁。
- 白恩士,約翰(Burns, John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年代为新工联的首領之一,倫敦碼頭工人罢工(1889)的領導者;九十年代轉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場,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議會議員(1892年起),曾任自由党政府中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貿易大臣(1914)。——第382、469、633頁。
- 布阿吉尔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經濟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驅,法国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鼻祖。——第301、620頁。
- 布萊特,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工厂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領袖;历任自由党内閣大臣。——第274、317、357、374頁。
- 布朗基,路易·奧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許多秘密团体和密謀活动的組織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領導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組織者;杰出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85、223、225、226、489、494、537、600頁。
-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瑪丽(Boulanger, 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將軍,陸軍部长(1886—1887);企图通过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軍事专政。——第51、85頁。
- 布雷梅尔,尤利烏斯(Bremer, Julius)——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雪茄烟工人,馬格德堡工人运动領導人之一。——第97頁。
- 布倫坦諾,路約(Brentano, Lujó 1844—1931)——德国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107、109—118、120—149、154、160—162、166—174、177、181—186、188—190、192—195、197—213、360、377頁。
-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工联領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工,后为工会官僚,工联代表大会議会委员会書記(1875—1890),自由党議會議員,內政副大臣(1886)。——第382頁。
- 弗拉維王朝(Flavian)——羅馬皇朝(69—96)。——第532頁。
- 弗雷西訥,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Freycinet, Charles-Louis de Saulses de 1828—1923)——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部长,內閣总理(1879—1880、1882、1886、1890—1892);1892年由于巴拿馬舞弊案件的揭发名誉扫地而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423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魯士国王(1740—1786)。

- 第6、22、25、27、445、587、607頁。
 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 1831—1888)——普魯士國王和德國皇帝(1888年3月9日—6月15日)。——第8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魯士國王(1786—1797)。——第27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國王(1797—1840)。——第33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國王(1840—1861)。——第41頁。
- 弗洛凱,沙爾·托馬(Floquet, Charles-Thomas 1828—1896)——法國國家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派;眾議院議員(1876—1893),曾多次當選為眾議院議長,內閣總理(1888—1889);1892年作為巴拿馬舞弊案件的參加者被揭發後被迫脫離積極的政治活動。——第423頁。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改革報”編輯之一,1848年為臨時政府成員。——第517頁。
- 古利耶,保爾·路易(Courier, Paul-Louis 1772—1825)——法國語文學家和政論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反對法國貴族和教權派的反動勢力。——第133頁。
-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 1746—1792)——瑞典國王(1771—1792)。——第28頁。
- 漢特,亨利·朱利安(Hunter, Henry Julian)——英國醫生,寫有許多關於工人困苦生活條件方面的報告。——第150頁。
- 漢澤曼,大衛(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國大資本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實行同反動派妥協的叛賣政策。——第392頁。
- 加爾巴(塞爾維烏斯·蘇耳皮齊烏斯·加爾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公元前5—公元69)——羅馬國家活動家,六十年代為西班牙塔塔納省總督(執政者);尼祿死後,在68年6月被推為皇帝;69年1月奧托趁軍隊和人民起來暴動反對加爾巴統治的時機,策動禁衛兵把他殺死。——第546、548頁。
- 加爾文,讓(Calvin, Jean 1509—1564)——宗教改革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新教宗派之一——加爾文教創始人,這一宗派反映了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資產階級利益。——第349頁。
- 加里波第,梅諾蒂(Garibaldi, Menotti 1840—1903)——朱澤培·加里波第之子,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參加者;曾在法國方面參加普法戰爭;七十年代初為企業家,意大利議會議員(1876—1900)。——第421頁。
- 加瓦齊(Gavazzi)——意大利政治活動家,九十年代初為議會議員。——第420頁。
- 卡貝,埃蒂耶納(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國政論家,空想的和平共產主義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亞旅行記”一書的作者。——第68頁。
-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羅馬皇帝(37—41)。——第546頁。
- 卡尼茨,漢斯·威廉·亞力山大(Kanitz, Hans Wilhelm Alexander 1841—

- 1913)——伯爵,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之一,普鲁士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维护大地主的利益。——第 575 頁。
- 卡諾,薩迪(Carnot, Sadi 1837—1894)——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部长;共和国总统(1887—1894)。——第 489 頁。
- 卡普里維,列奧(Caprivi, Leo 1831—1899)——伯爵,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將軍,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第 215、277、296、482 頁。
- 卡特賴特,艾德蒙(Cartwright, Edmund 1743—1823)——著名的英国发明家。——第 354 頁。
- 卡瓦洛蒂,費利切(Cavallotti, Felice 1842—1898)——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1873年起为议会议员。——第 515 頁。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 38、42—44、299、429、507、618 頁。
-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俄国皇帝(1894—1917)。——第 608 頁。
-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公元前 625 左右—562)——巴比伦王(公元前 604—562)。——第 534 頁。
- 尼祿(Nero 37—68)——羅馬皇帝(54—68)。——第 546—548 頁。
- 圣保罗,威廉(Saint-Paul, Wilhelm 1815 左右—1852)——普鲁士内务部官员,1843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查官。——第 393 頁。
- 圣西門,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01、244、539、621 頁。
- 瓦茨,約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論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 151 頁。
-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汽机的设计者。——第 354 頁。
- 瓦揚,愛德華·瑪麗(Vaillant, É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始人(1901)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225、489 頁。

六 画

- 多德威尔,亨利(Dodwell, Henry 死于 1784 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341 頁。
- 伏尔泰,弗朗斯瓦·瑪麗(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魯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諷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133、527 頁。
- 迈斯納,奧托·卡尔(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資本論”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其他著作。——第 593 頁。
- 托洛尼亞,朱利奧(Torlonia, Giulio 1847—1914)——公爵,意大利貴族,羅馬銀行監事長。——第 420—422 頁。

- 西吉达(馬拉克西安諾),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夫娜(Сигида (Малаксиано),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2—1889)——俄国女革命家, “民意党”党员, 因不能忍受监牢里的体刑而自杀。——第 52 頁。
- 艾里提埃, 路易(Héritier, Louis 1863—1898)——瑞士社会主义者, 写有許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著作。——第 405—407 頁。
- 艾瓦德, 格奥尔格·亨利希(Evald, Georg Heinrich 1803—1875)——德国东方学家, 聖經的研究家和批判家。——第 545 頁。
- 艾威林, 爱德华(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主义者, 作家, 政論家, “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譯者之一; 1884 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員, 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創建人之一,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組織者之一; 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 70、73 頁。
- 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 86—161)——羅馬皇帝(138—161)。——第 532 頁。
- 安条克四世(名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 175—164)。——第 534 頁。
- 达尔布瓦, 若尔日(Darbois, 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 1863 年起为巴黎大主教, 1871 年 5 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第 223 頁。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 256 頁。
- 达来朗-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1814—1815)的代表, 駐伦敦大使(1830—1834)。——第 35 頁。
- 吉芬, 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 財政問題专家, 貿易部統計局局长(1876—1897)。——第 321、377、577 頁。
- 吉比奇, 伊万·伊万諾維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 俄国元帅,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的俄軍总司令; 鎮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軍总司令。——第 39 頁。
- 吉霍米罗夫, 列甫·亚历山大羅維奇(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俄国政論家, 著名的“民意党”党员; 八十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叛徒, 保皇派。——第 18 頁。
- 吉尔斯, 尼古拉·卡尔洛維奇(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俄国外交家, 駐德黑兰(1863 年起)、伯尔尼(1869 年起)、斯德哥尔摩(1872 年起)公使; 外交副大臣(1875—1882), 外交大臣(1882—1895)。——第 17 頁。
- 吉罗-特龙, 阿列克西斯(Giraud-Teulon, Alexis 生于 1839 年)——在日内瓦任历史教授, 写有許多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第 255、258 頁。
- 吉約姆, 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 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拥护者, 第一国际會員,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組織者之一, 由于进行分

- 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407 頁。
- 考尔德，威廉 (Coward, William 1656 左右—1725) ——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341 頁。
-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論家，“新时代”杂志編輯(1883—1917)，八十年代接受馬克思主义；写有許多馬克思主义理論問題的著作，虽然著作中有錯誤，但在宣传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完全轉到机会主义立場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派的思想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公开反对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政权。——第 24 頁。
- 考茨基夫人，路易莎 (Kautsky, Louise)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1890 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第 309 頁。
- 列奧波特二世 (Leopold II 1747—1792) ——所謂的神圣羅馬帝国皇帝(1790—1792)。——第 27 頁。
- 列斯納，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英国独立工党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09 頁。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俄国社会学家、政論家和文学批評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維護者；“祖国紀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編輯之一。——第 504 頁。
- 米凱尔，約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 ——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九十年代为普魯士财政大臣。——第 274 頁。
-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 (Miklosish, František 1813—1891) ——著名的学者，斯拉夫語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拉夫語比較語法的奠基人；斯洛文尼亚人。——第 21 頁。
- 米切利，雷伊治 (Miceli, Luigi 1824—1906)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61 年起为議會議員，属于所謂資产階級“左翼”；农业大臣 (1879—1881、1888—1891)。——第 419、420 頁。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 29、31—35、37、38、49 頁。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44、46、47、497、619 頁。
-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 ——俄国皇帝 (1881—1894)。——第 55、56、62、282、294—298、415—417、458、622 頁。
- 亞馬多 (Amadeo 1845—1890) ——意大利国王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之子，西班牙国王 (1870—1873)。——第 492 頁。
- 伊壁鳩魯 (Epikouros 約公元前 341—

270) ——杰出的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第 392 頁。

伊格列西亞斯, 帕布洛 (Iglesias, Pablo 1850—1925) ——西班牙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職業是印刷工人, 無產階級政論家, 第一國際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委員 (1871—1872), 新馬德里聯合會委員 (1872—1873), 曾與無政府主義影響進行鬥爭; 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 (1879) 創建人之一, 後來成為該黨改良派首領之一; 1889、1891 和 1893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第 554 頁。

伊里奈烏斯 (Irenaeus 約 130—202) ——基督教神學家, 小亞細亞希臘人, 177 年起為里昂主教; 曾著書反對異教和闡明基督教教義。——第 547、548 頁。

七 画

車爾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 ——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 學者, 作家和文學批評家; 傑出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先驅之一。——第 497—499、505、508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430、431 頁。

杜林, 歐根·卡爾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 ——德國折衷主義哲學家 and 庸俗經濟學家, 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 在哲學上把唯心主義、庸俗的唯物主義 and 實證主義結合在一起, 是個形而上學者, 1863—1877 年為柏林大學副教授。——第 97、98、334、337 頁。

君士坦丁 (Konstantin 274 左右—337)

——羅馬皇帝 (306—337)。——第 532、535、612 頁。

里維, 萊昂 (Levi, Leone 1821—1888)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統計學家和法學家。——第 321、377 頁。

利文, 赫里斯托弗爾·安得列也維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 ——公爵, 俄國外交家, 駐柏林公使 (1810—1812), 駐倫敦大使 (1812—1834)。——第 17、37、38 頁。

呂克, 哥特弗利德·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Lücke, Gottfried Christian Friedrich 1791—1855) ——德國新教神學家, 曾先後在波恩和哥丁根任教授, 福音書注釋者。——第 545 頁。

沙多勃利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 ——著名的法國作家, 反動的国家活動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22—1824), 法國出席維羅那會議 (1822) 的代表。——第 37 頁。

蘇格拉底 (Sokrates 約公元前 469—399) ——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奴隸主義貴族思想家。——第 528 頁。

忒俄克里托斯 (Theokritos) ——公元前三世紀古希臘詩人。——第 557 頁。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爾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法國元帥, 軍事工程師, 曾批評過法國的稅收制度。——第 301、620 頁。

希普頓, 喬治 (Shipton, George) ——英國工聯主義運動活動家, 改良主義者, 彩畫匠工聯書記, 1871—1896 年為工聯倫敦理事會書記。——第 73 頁。

肖萊馬, 卡爾 (Schorlemmer, Karl 1834—1892) ——德國大有機化學家, 辯證唯物主義者, 曼徹斯特的教授; 德國社

- 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63—366 頁。
- 辛格尔, 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87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90 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1884 年起为国会議員, 1885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 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 60、77 頁。
- 伯恩斯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政論家,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1881—1890); 1889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恩格斯逝世后, 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从改良主义立場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領之一。——第 60 頁。
- 伯麦, 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手工业者, 神秘主义哲学家。——第 340 頁。
- 貝克尔, 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論家, 瑞士正义者同盟盟員, 魏特林的拥护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 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 529 頁。
- 貝納里, 弗兰茨·斐迪南(Benary, Franz Ferdinand 1805—1880)——德国东方学家、語文学家和聖經研究者, 在柏林任教授。——第 545、547、549 頁。
- 貝尔納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0 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 成为王位继承人和瑞典摄政王; 1813 年参加了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 瑞典和挪威的国王, 称查理十四·約翰(1818—1844)。——第 31 頁。
- 狄茨, 約翰·亨利希·威廉(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创办人, 1881 年起为国会議員。——第 246 頁。
-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179 頁。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 416 頁。
-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第 350 頁。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第 350 頁。
- 克勒尔, 恩斯特·馬提阿斯(Köller, Ernst Matthias 1841—1928)——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属保守党, 国会議員(1881—1888), 1894—1895 年为普魯士内务大臣, 奉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 612 頁。
- 克雷兹(Kroisos)——呂底亚王(公元前 560—546)。——第 10 頁。
- 克里斯比, 弗兰契斯科(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六十年代末起拥护君主立宪, 所謂资产阶级“左翼”領袖之一, 曾任首相(1887—1891 和 1893—1896); 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农运动的政策。——第 418—420、426、556、560 頁。

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公爵(Christian, Herzog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1852年起為丹麥王位繼承人, 1863—1906年為丹麥國王, 稱克里斯提安九世。——第42頁。

克列孟梭, 若爾日·本扎曼(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法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八十年代起為激進黨領袖, 內閣總理(1906—1909和1917—1920), 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第297頁。

克虜伯, 弗里德里希·阿爾弗勒德(Krupp, Friedrich Alfred 1854—1902)——德國最大的鋼鐵和軍事工業巨頭。——第586頁。

克倫威爾, 奧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領袖; 1653年起為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護國公。——第349頁。

克勞狄烏斯(Claudius 公元前10—公元54)——羅馬皇帝(41—54)。——第534, 546頁。

李比希, 尤斯圖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國學者, 農業化學的創始人之一。——第363頁。

李卜克內西, 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第一國際會員, 曾在德國工人運動中進行反對拉薩爾主義, 捍衛國際的原則的鬥爭, 1867年起為國會議員; 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人民國家報”編輯(1869—1876)和“前進報”編輯(1890—1900); 普法戰爭時期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 支持巴黎公社; 在某些

問題上對待機會主義採取調和主義立場; 1889、1891和1893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和戰友。——第77、105、135、272、289、290、632頁。

李嘉圖, 大衛(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236、239頁。

李希特爾, 歐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國政治活動家, 自由思想黨領袖, 國會議員。——第451頁。

麥金利, 威廉(McKinley, William 1843—1901)——美國國家活動家, 共和黨領袖之一; 1877年起曾多次當選為國會議員, 1890年提出有利於壟斷資本家的提高關稅的法案; 曾任美國總統(1897—1901), 對外實行侵略政策。——第389頁。

麥克馬洪, 瑪麗·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法國反動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家, 元帥, 波拿巴主義者; 克里木戰爭、意大利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參加者; 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凡爾賽軍隊總司令, 第三共和國總統(1873—1879)。——第556、600頁。

麥克倫南, 約翰·弗格森(McLennan, John Ferguson 1827—1881)——蘇格蘭資產階級法學家和歷史學家, 寫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第246、251—258頁。

八 画

法耳梅賴耶爾, 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

- 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 550 頁。
- 居利希, 古斯塔夫(Gulich, Gustav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許多关于国民經济史方面的著作。——第 22 頁。
- 林頓, 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詩人和政論家, 共和主义者, “英格兰共和国”杂志出版者, 該杂志刊登过赫尔岑的文章; 1866 年侨居美国。——第 497 頁。
- 門格尔, 安东(Menger, Anton 1841—1906)——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 維也納大学教授。——第 333、525 頁。
- 舍夫茨別利伯爵, 安东尼(Shaftesbury, Anthony, Earl of 1671—1713)——英国道德論哲学家, 自然神論的卓越的代表人物; 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第 352 頁。
- 味吉尔(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165 頁。
- 易卜生, 亨利克(Ibsen, Henrik 1828—1906)——卓越的挪威剧作家。——第 96 頁。
- 阿德勒, 維克多(Adler, 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889—1895 年曾与恩格斯通信; 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工人报”編輯, 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領之一。——第 60、590 頁。
- 阿德里安(普卜利烏斯·艾利烏斯·阿德里安)(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羅馬皇帝(117—138)。——第 532 頁。
- 阿尔比布, 爱德华多(Arbib, Edoardo 1840—190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新聞工作者, 属资产阶级右翼, 議會議員(1879—1895)。——第 421 頁。
- 阿尔勃萊希特, 卡尔(Albrecht, Karl 1788—1844)——德国商人; 曾因参加“蠢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1841 年移居瑞士, 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鼓吹近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第 529 頁。
- 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es)——十二至十三世紀統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封建王朝。——第 526 頁。
- 阿尔摩拉維德王朝(Almoravides)——十一至十二世紀統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封建王朝。——第 526 頁。
- 阿耳維西(Alvisi)——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參議員, 1889 年曾检查羅馬銀行。——第 418—421 頁。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左右—212)——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 439 頁。
- 阿克萊, 理查(Arkwright, Richard 1732—1792)——英国企业家; 占有他在英国的許多发明专利权。——第 354 頁。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維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詩人, 长詩“瘋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201 頁。
- 阿那克薩哥拉(小亞細亞克拉左門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 500 左右—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339 頁。

-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 21、22、26 頁。
- 彼得三世(Петр III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第 25 頁。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奥西波維奇(Пот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 俄国外交家, 原系科西嘉人, 1814—1821年是駐巴黎公使, 1821—1835年为大使, 后来是駐伦敦大使(1835—1839)。——第 17、38 頁。
- 波旁王朝(Bourbon)——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和西班牙王朝(1700—1868 和 1874—1931)。——第 33、39、475 頁。
- 拉伯克, 約翰(Lubbock, John 1834—1913)——英国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 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 金融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写有許多关于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第 254、256 頁。
- 拉法格, 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論家,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法国工人党的創始人之一(1879); 1889 和 1891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卡尔·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第 281、307、337、561、583 頁。
- 拉法格, 劳拉(Lafargue, Laura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卡尔·馬克思的女儿, 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第 307 頁。
- 拉弗勒, 艾米尔·路易·維克多·德(Laveleye, Émile-Louis-Victor de 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經濟学家。——第 128、186 頁。
- 拉梅耐, 費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甫, 政論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529 頁。
- 拉普拉斯, 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他的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說有力地动摇了宗教上的創世說。——第 343 頁。
- 拉薩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律师, 1848—1849 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 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創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 60、64、67、77、80、105、106、135、265、288—290、334、363、490、602 頁。
- 拉斯克尔, 爱德华(Lasker, Eduard 1829—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 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 1867年起为国会議員。——第 165、199 頁。
- 拉扎罗尼, 米凱萊(Lazzaroni, Michele)——男爵, 意大利貴族, 切扎雷·拉扎罗尼的侄子。——第 423 頁。
- 拉扎罗尼, 切扎雷(Lazzaroni, Cesare 生于 1825 年)——男爵, 羅馬銀行总出納員。——第 421—423、425 頁。
- 罗班, 保尔(Robin, Paul 生于 1837 年)——法国教师,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 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1),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倫敦代表會議(1871)代表。

——第406頁。

罗杰斯，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 (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許多英国国民經济史方面的著作。——第150頁。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 (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許多化学教科书。——第363頁。

罗伊，亨利 (Roy, Henry)——英国医生和經济学家。——第112、113、116、135、137—139、143、159、163、164、168、169、171—174、182、183、204—207、209、210頁。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輝格党領袖之一，依靠該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和1859—1865)。——第40、43、397、403頁。

帕涅尔，威廉 (Parnell, William)——英国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細木工，紅木工会領袖；八十至九十年代贊成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386頁。

九 画

柏拉图 (Platon 約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532頁。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 (1796—1801)。——第17、29、

38頁。

迪斯累里，本杰明，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領袖之一，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曾任首相 (1868和1874—1880)。——第358頁。

济金根，弗兰茨·馮 (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騎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1523年騎士起义的領袖。——第348頁。

奎尔奇，哈利 (Quelch, Harry 1858—1913)——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領袖之一，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进行过斗争，支持第二国际各党的左派；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386頁。

律斯勒，康斯坦丁 (Röbber, 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論家和官員；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 (1877—1892) 的身分替俾斯麦政策作辯护。——第610頁。

品得 (Pindaros 約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詩人，曾写了許多瑰丽的頌詩。——第158頁。

契普里昂尼，阿米耳卡雷 (Cipriani, Amilcare 1845—1918)——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六十年代为加里波第派，巴黎公社参加者，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第617頁。

約瑟夫二世 (Joseph II 1741—1790)——瑪麗-泰莉莎女皇的共同执政者 (1765—1780)，所謂的神圣羅馬帝国皇帝 (1780—1790)。——第23、25、27頁。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年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資產階級妥协的立場; 1848年8月流亡英国, 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288、517頁。
- 勃魯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記者, 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中的左派; 1848年10月参加維也納保卫战, 反革命軍隊占領維也納后被枪杀。——第75頁。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国国王(1625—1649), 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349頁。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 ——法国国王(1824—1830)。——第37頁。
- 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82—1718) ——瑞典国王 (1697—1718)。——第19頁。
- 查普卡男爵 (Czapka) ——奥地利政府參事。——第470頁。
- 查苏利奇, 維拉·伊万諾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 ——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劳动解放社”創始人之一; 后来轉到孟什維克立場。——第61頁。
- 哈第, 詹姆斯·凱尔 (Hardie, James Keir 1856—1915)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职业是矿工, 后为政論家, 苏格兰工党 (1888年起) 和独立工党 (1893年起) 的創始人和領袖, 工党的积极活动家。——第382、469頁。
- 哈克斯特豪森, 奧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 ——普魯士官員和作家, 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殘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 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494、505頁。
- 哈特萊, 大卫 (Hartley, David 1705—1757) ——英国医生, 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41頁。
- 柯林斯, 安东尼 (Collins, Anthony 1676—1729)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41頁。
- 柯瓦列夫斯基, 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 ——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 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 写有許多原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338頁。
-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英国工厂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議會議員。——第274、357頁。
- 科柯斯基, 賽米尔 (Kokosky, Samuel 1838—1899) ——德国政論家, 187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 好几家社会民主党報紙的編輯。——第408頁。
- 科拉揚尼, 拿破侖涅 (Colajanni, Napoleone 1847—1921)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共和党人; 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八十至九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者; 1890年起为議會議員。——第419—422頁。
- 洛克, 約翰 (Locke, John 1632—1704) ——杰出的英国二元論哲学家, 感觉論者; 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第341頁。
- 洛伊特納, 卡尔 (Leuthner, Karl 生于1869年)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工人报”編委; 1911年起为議會議員。

- 第 482 頁。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67、244、342、380、501 頁。
- 欧文斯, 約翰 (Owens, John 1790—1846) ——英国商人, 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創建人。——第 363、365 頁。
- 施杜姆, 卡尔 (Stumm, Karl 1836—1901) ——德国大工业家, 保守党人, 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 586 頁。
- 施特恩堡, 列甫·雅柯夫列維奇 (Штернберг, Лев Яковлевич 1861—1927) ——俄国民族学家, 由于参加民意党組織而被流放到庫頁島 (1889—1897), 在那里对当地居民进行民族学的研究; 1918 年起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 1924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第 410、411、413 頁。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耶穌传”一书的作者;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531 頁。
- 施瓦尔岑堡, 費里克斯 (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 ——公爵, 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1848 年 10 月維也納起义被鎮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第 42 頁。
- 威尔逊, 約瑟夫·哈弗洛克 (Wilson, Joseph Havelock 1858—1929) ——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 海員和司炉工全国工会的組織者和主席 (1887 年起); 1892 年起曾多次当选为議會議員, 主张和资产階級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382、469 頁。
- 威克菲尔德, 爱德华·吉本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 ——英国国家活动家, 經濟学家, 曾制定资产階級的殖民理論。——第 164、176、183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魯士国王 (1861—1888) 和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5、9、47、599 頁。
-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 ——普魯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1888—1918)。——第 4—6、9、10、54、608、618、625—628 頁。
- 威廉四世 (Wilhelm IV 1765—1837) ——英国国王 (1830—1837)。——第 41 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 ——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指揮英軍, 历任軍械总长 (1818—1827), 英軍总司令 (1827—1828、1842—1852), 首相 (1828—1830), 外交大臣 (1834—1835)。——第 33 頁。
- 威斯特华倫, 燕妮 (Westphalen, Jenny) ——見馬克思, 燕妮。

十 画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鏟工; 1867 年起領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第一国际會員; 1867 年起为国會議員, 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薩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場, 支持巴黎公社; 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

- 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錯誤，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 77、105、135、165、199、289、290、441、602、625、632 頁。
- 俾斯麦，奥托 (Bismark, Otto 1815—1898) ——公爵，普魯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魯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駐巴黎大使 (1862)；普魯士首相 (1862—1872 和 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1867—1871) 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統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 年他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4—7、9—11、46、47、49、54、57、91、215—217、220、283、290、293、296、319、330、376、416、426、464、465、555、560、595、599、602、610、611、625、636 頁。
-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駐維也納大使 (1854—1856)，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17、45 頁。
- 庫尔曼，格奥尔格 (Kuhlmann, Georg 生于 1812 年) ——奥地利政府的密探；自命是“預言者”，四十年代用宗教的詞句对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第 529、530 頁。
- 納杰日杰，若昂 (Nădejde, Joan 1854—1928) ——羅馬尼亚政論家，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將恩格斯的著作譯成羅馬尼亚文；九十年代轉到机会主义立場，1899 年加入資产階級民族自由党，反对工人运动。——第 247 頁。
- 涅謝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总理大臣，外交大臣 (1816—1856)。——第 17、38、40 頁。
- 紐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 ——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創始人之一，1888 年起为議會議員；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九十年代轉到无政府主义立場。——第 281 頁。
- 热尔韦，阿尔弗勒德·阿尔伯 (Gervais, Alfred-Albert 1837—1921) ——法国海軍上将，曾参加克里木战争、普法战争和侵华远征 (1860)；1891 年率法国分舰队訪問喀琅施塔得。——第 417 頁。
-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提昂諾維奇 (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 ——俄国庸俗的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和政論家；国家銀行行长，他在“卡尔·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一书”一文中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第 504、506 頁。
- 桑基，艾拉·戴維 (Sankey, Ira David 1840—1908) ——美国新教传教士。——第 356 頁。
- 翁伯托一世 (Umberto I 1844—1900) ——意大利国王 (1878—1900)。——第 422 頁。
- 烏尔卡尔特，戴維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反动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

- 1852年为議會議員,托利党人。——第15、16、41頁。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165頁。
- 埃德, 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 (Eudes, Émil-Désiré-François 1843—1888) ——法国革命家, 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軍的將軍和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瑞士, 后迁英国; 回法国 (1880年大赦) 后为布朗基主义者中央革命委員會組織者之一。——第223、489頁。
- 埃倫夫罗伊恩德, 伊西多尔 (Ehrenfreund, Isidor) ——奥地利銀行職員, 維也納銀行和信用机关官員俱樂部會員。——第58頁。
- 埃斯庫羅斯 (Aischylos 公元前525—456) ——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家。——第248、250頁。
- 恩格耳曼, 保尔 (Engelmann, Paul 1854—1916) ——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白铁工人; “工人紀事周报”編輯; 以左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創始人 (1890) 和領導成員之一, 1892年被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黨組織者和領導人 (1892—1894), 1894年起为“工人报”通訊員。——第414頁。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15、25、34、40、58—61、63、64、68、70、77、78、80、81、83、84、88、89、92—106、109—111、113、116、119、122、130、131、133、137、197、198、203、206、207、212、213、215—217、229—233、235、243—247、257、259—261、266、269—272、276—278、282、283、287、298、304—311、314—317、322—328、330、332、333、337—341、346、347、361、362、364—367、371—373、380、381、383、387—389、393、394、397、400、405—409、414、430、431、435—437、439、441—448、461、468—470、472—474、477—487、489—491、494、503、504、510、514、515、518—522、527—529、533、548、553—556、558、560—562、575、579、583、585、588—591、593、612—614、617、618、620—623、624—626、628—635頁。
- 恩斯特, 保尔 (Ernst, Paul 1866—1933) ——德国政論家, 批評家和剧作家; 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 “青年派”領袖之一; 1891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后来为法西斯主义者。——第93—99頁。
- 格拉古 (凱尤斯·賽姆普罗尼烏斯·格拉古) (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121) ——古羅馬的护民官 (公元前123—122),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爭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 提比利烏斯·賽姆普罗尼烏斯·格拉古之弟。——第610頁。
- 格拉古 (提比利烏斯·賽姆普罗尼烏斯·格拉古)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3—133) ——古羅馬的护民官 (公元前133),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爭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610頁。
- 格萊斯頓,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十九世紀下半叶是自由党領袖; 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

- 1892—1894)。——第 26、52、110—120、122—126、128、129、131、132、134、135、138—150、154、156—165、167—184、186—196、198—207、210—213、383、466 頁。
- 格雷維, 茹尔(Grévy, Jules 1807—1891) ——法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共和国总统(1879—1887)。——第 489 頁。
- 格里馬耳迪, 貝爾納丁諾(Grimaldi, Bernardino 1841—1897)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1876 年起为議會議員, 属于所謂資產階級“左翼”, 財政大臣(1879、1888—1889、1890—1891), 國庫大臣(1892—1893)。——第 421—424 頁。
- 格麥弗諾, 休·魯普斯, 韦斯明斯特公爵(Grosvenor, Hugh Lupus, Duke of Westminster 1825—1899)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大地主。——第 59 頁。
- 海德門, 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 ——英国社会主义者; 民主联盟的創始人(1881) 和領袖, 該联盟于 1884 年改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 后为英国社会党領袖之一, 1916 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第 71、72 頁。
- 海涅, 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 ——伟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60、424、468、540 頁。
- 馬爾提尼, 斐迪南多(Martini, Ferdinando 1841—1928) ——意大利劇作家, 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所謂資產階級“左翼”, 曾任教育大臣(1892—1893)。——第 421 頁。
- 馬爾提涅蒂, 帕斯夸勒(Martignetti, Pasquale)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曾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譯成意大利文。——第 244、247 頁。
- 馬赫迪——見穆罕默德-阿罕默德。
- 馬可·奧里略·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121—180) ——羅馬皇帝(161—180), 斯多葛派哲学家。——第 532 頁。
- 馬克思, 亨利希(Marx, Heinrich 1782—1838) ——卡尔·馬克思的父亲; 律師, 后为特利尔司法參事。——第 392 頁。
- 馬克思, 卡尔(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 15、40、47、60、61、63、64、67、68、81、90、94、96、97、98、100、103、105、106、107—149、154—213、216、217、226、230、234—236、239、240、256、258、288、289、293、294、301、307、309、315、319、327、333、334、337、338、341、342、353、364、365、372、376、392—394、397—404、406、429、472、477、479、481、483、488、490、498、499、503—506、510—514、516、560、585、588、591—594、597、598、600、602、634 頁。
- 馬克思, 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为馮·威斯特華倫 geb. von Westphalen) ——卡尔·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307、393、400 頁。
- 馬克思, 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卡尔·馬克思的大女儿, 1872 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 307、400 頁。
- 馬克思-艾威林, 爱琳娜(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 ——八十至九十

- 年代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政論家，卡尔·馬克思的女儿，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曾在弗·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宣传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組織工作和罢工斗争；曾参加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代表。——第70、71、73、110、129、130、133、186—189、192—197、201、202、205、307頁。
- 馬拉斯特，阿尔芒 (Marrast, Armond 1801—1852)——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領袖之一，“国民报”編輯，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員和巴黎市长，制宪議會議长 (1848—1849)。——第288頁。
- 馬其頓的非力浦二世 (Philip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382左右—336)——馬其頓王 (公元前359—336)。——第541頁。
- 馬其頓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541頁。
- 馬特金，威廉 (Matkin, William)——英国工联活动家，木工和細木工工会领导人；九十年代反对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386頁。
- 馬志尼，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之一，1849年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46、398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29—33、35、38、94、222、226、296、343、453、475、566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iu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侖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統 (1848—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第43、46、47、216、219、220、319、330、355、376、397、403、437、593、599、627頁。
- 泰勒，塞德萊 (Taylor, Sedley 十九世紀下半叶—二十世紀初)——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家分紅的制度。——第109、110、127—131、137、145、147、186—196、200—203、205頁。
- 泰罗，爱德华·伯納特 (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著名的英国民族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学进化論学派的創始人。——第248頁。
-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提奇 (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革命家，政論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第494、497頁。
- 特利尔，格尔桑 (Trier, Gerson 生于1851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丹麦社会民主党革命少数派領袖之一，职业是教师；进行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改良主义政策的斗争；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譯成丹麦文。——第247頁。

十一画

盖布，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

- 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1869年爱森納赫代表大會的參加者和社会民主工黨的創始人之一，黨的財務委員（1872—1878）。德意志帝國國會議員（1874—1877）。——第105頁。
- 荷馬（Homerus）——半傳說中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204頁。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實際上操縱了法國的內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394頁。
- 勒南，厄內斯特·約瑟夫（Renan, Ernest-Joseph 1823—1892）——法國宗教史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因寫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526、527、531、533、538、545、549頁。
- 琉善（Lucianus 約120—180）——杰出的古希臘諷刺作家，無神論者。——第527、528頁。
- 培根，弗蘭西斯，維魯拉姆男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國哲學家，英國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自然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第339—342頁。
- 莎士比亞，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國作家。——第196、201頁。
- 梯也爾，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奧爾良黨人，首相（1836、1840），政府首腦（內閣總理）（1871），共和國總統（1871—1873），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214、221、223、296、556、599頁。
- 康德，伊曼努爾（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唯心主義者，德國資產階級思想家；同時，因寫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345頁。
- 康莫迪安（Commodian 三世紀上半葉）——拉丁詩人和早期基督教時期的宗教活動家。——第533頁。
- 康普豪森，盧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國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魯士首相，奉行與反動派妥協的叛賣政策。——第392頁。
- 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國大公，1814年起任波蘭軍總司令，實際上是波蘭總督（1814—1831）。——第40頁。
- 累瑟姆，羅伯特·戈登（Latham, Robert Gordon 1812—1888）——英國語文學家和民族學家，倫敦大學教授。——第252頁。
- 累塞普斯子爵，斐迪南·瑪麗（Lesseps, Ferdinand-Marie, vicomte de 1805—1894）——法國工程師和實業家；開闢蘇伊士運河（1859—1869）的國際公司組織者；巴拿馬運河公司負責人；在巴拿馬舞弊案件被揭發以後，於1893年被判處五年徒刑。——第423頁。
- 累塞普斯，沙爾·艾梅·瑪麗（Lesseps, Charles-Aimée-Marie 1849—1923）——法國實業家，斐迪南·累塞普斯之子，巴拿馬運河公司負責人之一；在巴拿馬舞弊案件被揭發以後，於1893年被判處一年徒刑。——第423、424頁。
- 曼納斯，約翰·詹姆斯·羅伯特（Man-

- ners, John James Robert 1818—19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四十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 議會議員, 历任保守党政府各部大臣。——第 358 頁。
- 曼特耳, 吉迪恩·阿尔杰农 (Mantell, Gideon Algernon 1790—1852) ——英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科学材料同聖經傳說調和起来。——第 342 頁。
- 曼托伊費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貴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內务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 和首相 (1850—1858)。——第 57 頁。
-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1846—1919) ——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政論家; 八十年代成为馬克思主义者; 写有許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 卡·馬克思传的作者; “新时代”杂志編輯之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領袖和理論家之一; 在創建德国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用。——第 205 頁。
- 梅薩-伊-列奧姆帕特, 霍賽 (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 ——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組織者之一,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和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 (1872—1873), 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西班牙的第一批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創始人之一 (1879), 曾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譯成西班牙文。——第 230 頁。
-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41 頁。
- 莫尔, 托馬斯 (More, Thomas 1478—1535) ——英国政治活动家, 曾任大法官; 人道主义作家, 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烏托邦”一书的作者。——第 24 頁。
-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 (眞姓为波克兰 Poquelin) ——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159、169、174、183、207、209 頁。
- 莫斯赫 (Moschos) ——公元前二世紀中叶古希腊詩人。——第 557 頁。
- 梭恩, 威廉·詹姆斯 (Thorne, William James 1857—1946)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民主联盟盟員,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組織者之一,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書記; 1906 年起为議會議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386 頁。
- 梭倫 (Solon 約公元前 638—558) ——聞名的雅典立法家,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許多反对世襲貴族的法律。——第 504 頁。

十二画

- 費里, 茹尔·弗朗斯瓦·卡米尔 (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 ——法国律师, 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 国防政府成員, 巴黎市长 (1870—1871); 积极鎮压革命运动; 內閣总理 (1880—1881 和 1883—1885); 奉行积极的殖民

- 主义政策。——第 215、489 頁。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67、244、258、540 頁。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345、364 頁。
- 焦利蒂, 卓万尼 (Giolitti, Giovanni 1842—1928)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 1889—1890 年为国库大臣, 1892—1893 年为首相; 由于罗马银行舞弊行为的揭露被迫辞职, 并暂时脱离政治活动。——第 419、420、423、425 頁。
- 腊韦, 昂利 (Ravé, Henri) ——法国新闻记者, 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文。——第 247 頁。
- 琼斯, 理查 (Jones, Richard 1790—1855)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 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第 197 頁。
- 提比利乌斯 (Tiberius 公元前 42—公元 37) ——罗马皇帝 (14—37)。——第 546 頁。
- 博林布罗克, 亨利 (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 ——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第 352 頁。
- 博马舍, 比埃尔·奥古斯丹 (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1732—1799)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 133 頁。
- 博维奥, 卓万尼 (Bovio, Giovanni 1841—1903) ——意大利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共和党人和反教权主义者, 1876 年起为议会议员, 那不勒斯的大学教授。——第 326—328 頁。
-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1817—1899)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退伍,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任教育学教授。——第 447 頁。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 ——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 475 頁。
- 斐洛 (亚历山大里亚的) (Philo of Alexandria 约公元前 20—公元 54)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 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第 532、535、542 頁。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弗洛伦斯 (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 ——美国社会主义者, 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 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第 311、367 頁。
- 凯撒 (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Caius Julius Cæ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著名的罗马统帅, 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著有“高卢战纪”一书。——第 255 頁。
- 普利斯特列, 约瑟夫 (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 ——著名的英国化学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产业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第 341 頁。
-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杰出的俄国和国际工

- 人运动活动家，哲学家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创始人；1889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八十至九十年代曾与民粹派进行斗争，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后为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82、477、498、503页。
-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伟大的俄国诗人。——第32页。
- 斯蒂凡，亨利希(Stephan, Heinrich 1831—1897)——德国国家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邮电部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第89页。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32、173页。
- 斯密斯，罗伯特·安格斯(Smith, Robert Angus 1817—1884)——英国化学家。——第363页。
- 斯图亚特王朝(Stuart)——1371年起统治苏格兰和英格兰(1603—1649、1660—1714)的王朝。——第352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197页。
- 汤隆古，贝尔纳多(Tanlongo, Bernardo 约生于1820年)——意大利大企业家，1882年起为罗马银行经理。——第420—422、424、425页。
- 汤普逊，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333页。

十三画

- 蒙德拉，安东尼·约翰(Mundella, Anthony John 1825—189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工厂主，1868年起为议会议员，历任各部大臣。——第166、181页。
- 瑞日卡，扬(Zižka, Jan 1360左右—1424)——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526页。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者。——第255、534、547、552页。
- 奥艾尔，伊格纳茨(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转到改良主义立场。——第77、105页。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50页。
-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伯爵，1856年后为公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第46页。
-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第546页。

- 奥托(馬可·薩耳維·奧托)(Marcus Selsius Otho 32—69)——羅馬国家活动家,卢济塔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島西南部)总督(执政者);69年1月他趁軍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統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兵推翻加尔巴,加尔巴被杀后被推为皇帝;69年4月在綿延不絕的内战中战败后自杀。——第546、548頁。
- 福尔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領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會議員和巴伐利亚議會議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561、562頁。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階級革命家进行誣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作了揭露。——第398、403、488頁。
-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資产階級庸俗經濟学家,1865年起为議會議員,自由党人。——第159頁。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議員,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殘酷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356—357頁。
- 福提斯,亚历山大罗(Fortis, Alessandro 1842—1909)——意大利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80年起为議會議員,所謂資产階級“左翼”領袖之一。——第422頁。
- 路德,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創始人,德国市民階級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貧民。——第348、349頁。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許多国家設有銀行。——第59、314、370、620、621頁。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22、301頁。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222頁。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218、219、274、350、356頁。
- 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拿破侖(Louis-Napoléon)——見拿破侖第三。
- 塞琉古王朝(Seleucus)——統治亚洲最大的希腊化王国的王朝(公元前312—64)。——第545頁。
- 塞涅卡(魯齐烏斯·安涅烏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公元前4左右—公元65)——羅馬哲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所謂新斯多葛学派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伦理学学說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影响。——第532頁。

楊楚克, 尼古拉·安得列也維奇 (Янчук,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9—1921) ——俄国民族学家, 民歌搜集家; 八十年至九十年代为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学部书记。——第 410 頁。

楊格, 阿瑟 (Young, Arthur 1741—1820) ——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十八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 150 頁。

十四画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201、344 頁。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论家和作家; 1847 年侨居国外, 在国外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第 494、497、505 頁。

瑪丽-泰莉莎 (Maria Theresia 1717—1780) ——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女皇 (1745—1780)。——第 25 頁。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创始人之一。——第 64、225、226、230、394、403、406、537、600 頁。

維伯, 悉尼·詹姆斯 (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 ——英国政治活动家, 费边社创建人之一; 曾和自己的妻子比阿特里薩·維伯合写了許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

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来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第 636 頁。

維勒, 布魯諾 (Wille, Bruno 1860—1928) ——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 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 “青年派”领袖之一。——第 99 頁。

維特利烏斯 (奧魯斯·維特利烏斯) (Aulus Vitellius 15—69) ——罗马国家活动家; 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 (执政者), 69 年 1 月被推为皇帝, 但是到年底在綿延不絕的内战中战败被杀。——第 534、546 頁。

十五画

德拉瓦勒, 卡洛 (Dell'Avalle, Carlo) ——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1894 年为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成员。——第 555 頁。

德留蒙, 爱德华·阿道夫 (Drumont, Édouard-Adolphe 1844—1917) ——法国反动政论家, 写有許多反犹太人主义的书籍和文章。——第 58 頁。

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約公元前 460—370) ——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原子論的創始人之一。——第 339 頁。

魯迪尼侯爵, 安东尼奥·斯塔腊巴 (Rudini, Antonio Starrabba, marchese di 1839—1908)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大地主, 温和的自由党人; 首相 (1891—1892 和 1896—1898); 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第 419、420、426 頁。

魯維埃, 莫里斯 (Rouvier, Maurice 1842—1911) ——法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历任各部部长和

內閣總理；1892年作為巴拿馬舞弊案件的參加者被揭發後被迫辭職並暫時脫離積極的政治活動。——第297、423、425—426頁。

摩爾根 (Morgan) ——美國上校，路·亨·摩爾根的兄弟。——第259頁。

摩爾根，路易斯·亨利 (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 ——傑出的美國學者，民族學家，考古學家和原始社會史學家，自發的唯物主義者。——第246、252、254—259頁。

十六 回

鮑格雷夫，羅伯特·哈利·英格利斯 (Palgrave, Robert Harry Inglis 1827—1919) ——英國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經濟學家”雜誌的出版者 (1877—1883)。——第322、379頁。

鮑古斯拉夫斯基，阿爾伯特 (Boguslawski, Albert 1834—1905) ——德國將軍和軍事著作家，曾參加鎮壓波蘭起義 (1863—1864)；九十年代起積極為德國民族主義報刊撰稿。——第608、610—611頁。

鮑洛施，阿路易斯 (Borrosch, Alois 1797—1869) ——德國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布拉格的书商，奧地利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第472頁。

鮑威爾，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 ——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名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之一，資產階級激進派；1866年後成為民族自由黨人；寫有許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392、393、400、531、532、552頁。

霍布斯，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傑出的英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社會政治觀

點具有鮮明的反民主的傾向。——第340—342、352頁。

霍夫曼·馮·法勒斯累本，奧古斯特·亨利希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1798—1874) ——德國資產階級詩人和語文學家。——第465頁。

霍吉斯金，托馬斯 (Hodgskin, Thomas 1787—1869) ——英國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他從空想社會主義的立場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批判資本主義，他利用李嘉圖的理論來論證社會主義。——第333頁。

霍普金斯，托馬斯 (Hopkins, Thomas) ——十九世紀初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333頁。

賴德律-洛蘭，亞歷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 ——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領袖之一，“改革報”編輯；1848年是臨時政府成員，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在議會中領導山岳黨；1849年6月13日示威遊行後流亡英國。——第489、517頁。

賴納克男爵，雅克 (Reinach, Jacques, baron de 死於1892年) ——法國銀行家，經營巴拿馬運河公司財務，在巴拿馬舞弊案件被揭發以後自殺。——第424頁。

穆爾，賽米爾 (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 ——英國法學家，第一國際會員，曾與愛·艾威林一起將“資本論”第一卷和“共產黨宣言”譯成英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4頁。

穆迪，德懷特·萊曼 (Moody, Dwight Lyman 1837—1899) ——美國新教教

会活动家和传教士。——第 356 頁。
 穆罕默德-阿罕默德 (Mohammed Ahmed 1843—1885) ——伊斯兰教传教士, 1881 年开始的反对苏丹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第 526 頁。

穆罕默德-阿利 (Mohammed Ali 1769—1849) ——埃及执政者 (1805—1849), 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 1831—1833 年和 1839—1840 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丹的战争, 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 40 頁。

十七画

戴克里先 (Diocletianus 245 左右—313) ——罗马皇帝 (284—305)。——第 611 頁。

謙楠, 乔治 (Kennan, George 1845—

1924) ——美国记者和旅行家; 1885—1886 年游历了西伯利亚, 后来他在一组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文章里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第 51 頁。

十八画

薩耳梅朗-伊-阿隆索, 尼古拉斯 (Salmerón y Alonso, Nicolás 1838—1908)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 马德里大学历史学和哲学教授; 西班牙共和国临时总统 (1873 年 7 月 18 日—9 月 7 日)。——第 492 頁。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 ——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 68、288、326、327、526、529、537 頁。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画

巴兰——据圣经传说, 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 巴勒召他来咒诅以色列人。——第 536、538 頁。

巴勒——据圣经传说, 是摩押王。——第 536 頁。

巴录——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巴录书的作者。——第 534 頁。

以诺——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的作者。——第 534、543 頁。

以赛亚——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第 535、545、549 頁。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中以斯拉记的

作者。——第 534 頁。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第 543 頁。

五画

尼哥拉——据圣经传说, 是耶路撒冷的祭司, 异教教派之一的创始人。——第 538 頁。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神, 雷神, 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 527、550 頁。

圣乔治——传说中的基督教“圣徒”, 降龙者。——第 193、201 頁。

叶甫盖尼·奥涅金——亚·谢·普希金

的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第32頁。

六 画

米迦勒——据聖經傳說，为天使长之一。
——第545頁。

西維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預言家”之一；她的占語被編成所謂的“西維拉占語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羅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第534頁。

亚格斯都士——古希腊神話中克丽达妮斯特拉的情夫，他同她一起杀害了亚加米农；埃斯庫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和“祭酒的报信人”（“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和第二部）中的人物。——第249頁。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話中特洛伊战争时古希腊軍队的領袖，被自己的妻子克丽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庫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部）中的人物。——第249頁。

七 画

但以理——聖經中的先知，据傳說是聖經中但以理书的作者。——第533、534、543、545頁。

克丽达妮斯特拉——古希腊神話中亚加米农的妻子，杀害了从特洛伊战争回来的丈夫；埃斯庫罗斯的“奥列斯特”中的人物。——第249頁。

八 画

阿波罗——古希腊神話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249、250頁。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話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馬“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傳說阿基里斯是由于箭鏃射中了他的脚跟那个

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去的。——第323頁。

佩雷格林——琉善諷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中的人物，奸徒和罪犯，在传教士的外衣下进行活动。——第527—530頁。

使徒犹大——据傳說是新約中犹大书的作者。——第534頁。

依理逆司神——古希腊神話中的三个复仇女神，埃斯庫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第249、250頁。

九 画

保罗——据聖經傳說，是基督教使徒之一。——第527、531、538頁。

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第549頁。

耶洗别——据旧約傳說，是暴虐殘忍的以色列王后，废古犹太教，改奉阿斯塔尔塔女神（腓尼基神話中的农神和爱神）；耶洗别这个名字在新約启示录中作为淫乱和瀆神的化身。——第538頁。

約翰——据基督教傳說，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按习惯說法是启示录、約翰福音和約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好多人写成的。——第533—535、541、543、544、549頁。

十 画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紀傳說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象。——第99頁。

唐达魯士——古希腊神話中呂底亚王，因侮辱諸神被罰沉淪地獄，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

子就消失不見。——第 527 頁。

十一画

基督(耶穌基督)——傳說中的基督教創始人。——第 527、528、532、535、543—545、548—551 頁。

十二画

雅典娜·帕拉斯——古希臘神話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第 249、250 頁。

十三画

奧列斯特——古希臘神話中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埃斯庫罗斯的悲劇“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德”(“奧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第 248、249 頁。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劇“无事煩惱”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身。——第 196 頁。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們”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諧謔者，酒徒。——第 201 頁。

塞米拉米达——傳說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宮庭华丽和艳行著称。——第 24 頁。

瑟息替斯——荷馬“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臘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駝背瘸子。——第 204 頁。

十五画

摩西——据聖經傳說，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帶領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給他們立下了約法。——第 247、535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Das Volk》）——伦敦出版。
——第 403 頁。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萊比錫出版。——第 112、114、116、131、160、162、167、170、172、173、176、177、181、183—185、188、196、198、199、204、488 頁。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馬格德堡出版。——第 93、97 頁。

“人民論壇”（《Volks-Tribüne》）——見“柏林人民論壇”。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不伦瑞克出版。——第 400 頁。

“人民言論”（《Népszava》）——布达佩斯出版。——第 103、104、522 頁。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布隆出版。——第 304、305 頁。

三 画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維也納出版。——第 11、60、76、261、362、471、482、485、513、590 頁。

“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利尔出版。——第 285、287 頁。

“工人紀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布达佩斯出版。——第 103、

104、522 頁。

“工人新聞”（《Arbeiterpresse》）——布达佩斯出版。——見“工人紀事周报”。

四 画

“公文集”（《Portfolio》）——伦敦出版。
——第 41 頁。

“公益”（《The Commonweal》）——伦敦出版。——第 317、373 頁。

“今日”（《To-Day》）——伦敦出版。——第 187、189、192、193、201、202、205 頁。

“双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伦敦出版。——第 112、162、168、174、182 頁。

五 画

“民意导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日內瓦出版。——第 504 頁。

“民族学評論”（《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莫斯科出版。——第 413 頁。

“世紀报”（《Il Secolo》）——米兰出版。
——第 423 頁。

六 画

“階級斗争”（《Lotta di classes》）——米兰出版。——第 556 頁。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第 118、119、144、210

- 頁。
- “协和。工人問題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柏林出版。——第 109、111、112、116、125、127、131、132、134、136、137、160、162、163、166、167、170—172、174—177、181、184、188、192—194、198—201、204、205 頁。
- “自由論壇”(《*Freie Bühne*》)——柏林出版。——第 94、96 頁。
-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451 頁。
-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倫敦出版。——第 403 頁。

七 画

-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 517 頁。
-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倫敦出版。——第 118、119、144、211 頁。
- “每日紀事报”(《*Daily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 306—308、631、636 頁。
-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 118、119、144、187、211 頁。
- “那不勒斯信使报”(《*Corriere di Napoli*》)——第 422、423 頁。
-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巴黎出版。——第 552 頁。
-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 562、583 頁。
-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ь-демократ*》)——倫敦、日內瓦出版。——第 13 頁。
-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ь-демократ*》)——塞夫利厄伏出版。——第 477、478、635 頁。

-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倫敦出版。——第 3、11、60、78、80、82、83、88—90、92 頁。
- “社会評論”(《*Critica Sociale*》)——米兰出版。——第 326、328、518、558—560 頁。
- “社会政治科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耶拿出版。——第 404 頁。
-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 socialiste. Organ du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巴黎出版。——第 489 頁。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巴黎出版。——第 63、102、215、283、332、474、519、623、630 頁。
-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馬德里出版。——第 63 頁。
-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布魯塞爾出版。——第 487 頁。
- “时代”(《*Time*》)——倫敦出版。——第 13 頁。

八 画

-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 288 頁。

九 画

-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見“前进。柏林人民报”。
- “柏林人民論壇”(《*Berliner Volks-Tribüne*》)——第 97、405、408 頁。
- “俄罗斯新聞”(《*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莫斯科出版。——第 409—413 頁。
- “美国評論”(《*American Review*》)——紐約出版。——第 252 頁。

- “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彼得堡出版。——第504頁。
- “前进报”(«Vorwärts»)——巴黎出版。——第393、400頁。
- “前进报”(«Vorwärts»)——萊比錫出版。——第337頁。
- “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柏林出版。——第6、82、99、100、243、366、391、417、426、433、435、469、485、511、512、561、562、588頁。
-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伦敦出版。——第175頁。
- “钟声”(«Колокол»)——伦敦、日内瓦出版。——第61頁。
- “祖国紀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彼得堡出版。——第504頁。

十 画

- “凉亭”(«Die Gartenlaube»)——萊比錫出版。——第60頁。
-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397、403頁。
- “閃电报”(«L'Éclair»)——巴黎出版。——第617、623頁。
-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109、112—119、121、122、124、127、128、130、134、135、137、139、144、164、165、170、176—180、183、184、186—188、190、191、193—195、198—202、205、207、208、210頁。

十一 画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116—119、128、144、

- 180、184、188、199頁。
-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伦敦出版。——第116—119、128、137—139、144—146、180、184、188、199、205、207—210頁。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第118、119、144、210頁。
- “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Sheffield Free Press»)——第403頁。
- “現代人”(«Contemporanul»)——雅西出版。——第247、635頁。

十二 画

- “費加罗报”(«Le Figaro»)——巴黎出版。——第624、630頁。
-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392、400頁。

十三 画

- “蜂房”(«Bee-Hive»)——伦敦出版。——第155頁。
- “解放”(«La Riscossa»)——巴勒摩出版。——第558頁。
- “新堡每日紀事报”(«Newcastle Daily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6頁。
-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89、234、394、403、591頁。
-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伦敦、汉堡出版。——第397、403、593頁。
- “新时代”(«Die Neue Zeit»)——斯图加

特出版。——第 13、106、212、229、259、
263、282、285、361、373、388、389、413、
457、513、523、562、563、588、612 頁。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維
也納出版。——第 481、482 頁。

十 四 画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
版。——第 119、144、211 頁。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
bücher*》)——巴黎出版。——第 393、
400、479 頁。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
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萊比錫出版。——第 393 頁。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
——柏林出版。——第 211、212 頁。
“德意志—布魯塞爾报”(《*Deutsche-Brüs-
seler-Zeitung*》)——第 394、400 頁。
“黎明”(《*Przedświt*》)——伦敦出版。——
第 330 頁。
“論壇报”(《*La Tribuna*》)——羅馬出版。
——第 326 頁。

十 八 画

“薩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
Zeitung*》)——德勒斯頓出版。——第
77、80、98 頁。

二 十 画

“議會报”(《*Il Parlamento*》)——都灵出
版。——第 425 頁。

地名索引*

二 画

七日規——伦敦街区。——第 314、371 頁。

三 画

大西洋——第 311 頁。
 凡尔賽——第 221、331 頁。
 士每拿(伊斯密尔)——第 536、538 頁。
 土尔克斯坦——第 50 頁。
 下薩克森——第 567 頁。
 小爱尔兰——第 314、371 頁。
 小俄罗斯——見乌克兰。
 小亚細亞——第 20、533、548、549 頁。

四 画

巴登——第 234 頁。
 巴尔干半島——第 20、21、39、41、48、51、300、458 頁。
 巴伐利亚——第 23、275、567、625 頁。
 巴勒斯坦——第 527、532 頁。
 巴黎——第 27、33、38、46、49、58、68、69、71、197、214、215、217、218、220—227、229、282、331、332、354、355、386、393、394、397、399、400、403、415、416、458、462、479、484、489、538、565、594、596、

598、599、600、604—606、609、617、618 頁。

木兰-薩克多面堡——第 224 頁。

旺夫堡垒——第 224 頁。

伊西堡垒——第 224 頁。

巴納特——第 51 頁。

巴涅尔-德-呂雄——第 307 頁。

巴塞尔——第 403 頁。

巴塞罗纳——第 86 頁。

比利牛斯山脉——第 307 頁。

不来梅——第 632 頁。

不伦瑞克——第 400、408 頁。

木尔西亚省——西班牙的一个省。——第 492 頁。

日内瓦——第 61、63、68、244、407、498、504、529 頁。

什列斯維希——第 294、295、464 頁。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第 42、46、567 頁。

太平洋——第 410 頁。

以弗所——小亚細亞的一个古城。——第 538 頁。

以色列——第 534、536、545 頁。

中国——第 312、357、389、390 頁。

中維柳伊斯克——第 498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編者注

五 画

白俄罗斯——第 21、28 頁。
 北角——第 365 頁。
 北明翰——第 151、322、379 頁。
 布达佩斯——第 103 頁。
 布加勒斯特——第 33 頁。
 布格河——第 27 頁。
 布哈拉汗国——第 50 頁。
 布拉格——第 464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186 頁。
 布列塔尼省——第 397 頁。
 布隆(布尔诺)——第 304 頁。
 布魯塞爾——第 86、234、281、386、394、400、403 頁。
 东普魯士省——第 25 頁。
 东头——伦敦东区。——第 70、71、73、321、324、325、361、377、380、381 頁。
 东魯美利亚省——第 48 頁。
 弗拉基米尔——第 329 頁。
 弗拉基米尔省——第 507 頁。
 弗兰德——历史区。——第 465 頁。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 31 頁。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第 28 頁。
 汉堡——第 78、311、312、368、397、398、403、404、408、593、636 頁。
 加迪斯——第 492 頁。
 加拿大——第 276 頁。
 加利福尼亚——第 67、312、368、481 頁。
 加利利——历史区。——第 532 頁。
 加利斯河(基齐尔河)——第 10 頁。
 加斯梯里亚——第 96 頁。
 加特契納——第 62 頁。
 加因斐(海因菲耳德)——第 260 頁。
 卡諾薩——第 9 頁。
 卡麦涅茨(卡麦涅茨一波多尔斯克)——

第 454 頁。

卡塔黑納——第 492、493 頁。
 卢卑克——第 632 頁。
 尼古拉也夫斯克(阿穆尔河岸尼古拉也夫斯克)——第 412 頁。
 尼科美迪亚(伊兹米特)——第 612 頁。
 圣斯蒂凡諾(耶希耳克伊)——第 48 頁。
 瓦得(窩州)——瑞士的州。——第 530 頁。
 瓦格拉姆——第 607 頁。
 瓦拉几亚——第 31、38—41、43 頁。
 瓦伦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 492 頁。
 印度——第 50、52、299、300、312、368、390、397、410、494、501、566 頁。
 幼发拉底河——第 548 頁。

六 画

艾契(阿迪杰)河——第 465 頁。
 安达魯西亚——第 492、565 頁。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第 40 頁。
 达达尼尔海峡——第 49、56 頁。
 达姆斯塔德——第 363、365、366 頁。
 多瑙河——第 17、39、42、43、48 頁。
 多瑙河各公国——見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亞。
 伏尔加河——第 17 頁。
 刚果——第 322、379 頁。
 华沙——第 40、42 頁。
 华盛頓——第 259 頁。
 吉森——第 363 頁。
 伦敦——第 37、38、60、68—71、78、82、99、100、102、106、119、149、155、162、163、166—169、172、176、189、203、204、206、214、229、230、233、243、245、259、260、304、307、309、325、330、331、333、362、365—367、383、397、398、403—

405、408、431、436、470、472、474、477、
482、486、487、491、519—521、555、558、
560、562、573、589、590、592、612、613
頁。
迈納——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
第 550 頁。
米海洛夫斯科耶——里海东海岸的一个
居民点。——第 50 頁。
米兰——第 232、429、594 頁。
汝拉——地区。——第 405、407 頁。
色当——第 220、223、293、440、634 頁。
西伯利亚——第 67、481 頁。
西西里島——第 541、557、565 頁。
兴都庫什山脉——第 50 頁。
匈牙利——第 41、42、46、234、319、330、
355、376、430、521、597 頁。
亚波(土尔庫)——第 31 頁。
亚得利亚海——第 21 頁。
阿尔科——第 492 頁。
阿尔薩斯省——第 7、47—49、53、217、
293—295、437、464、600、622、634 頁。
亚該亚——羅馬行省。——第 548 頁。
亚克薩尔特河(錫尔河)——第 17、50
頁。
亚历山大里亚——第 532 頁。
亚琛——第 37 頁。
亚細亚——羅馬行省。——第 548、611
頁。
伊塞隆——第 234 頁。
伊斯特勃恩——第 555 頁。

七 画

貝耳特海峽——大貝耳特海峽和小貝耳
特海峽。——第 20 頁。
貝內万托——第 244、247 頁。
貝薩拉比亚——第 33、34、48、51 頁。
別迦摩——小亚細亚的一个古国。——

第 538 頁。
伯利維尔——巴黎的一个区。——第
217、224 頁。
伯罗奔尼撒半島——第 550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16、20、
28、31、35、39、40、42、48—54、56、300
頁。
克拉科夫——第 42 頁。
克勒伏——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23 頁。
克里木——第 27、42、43、299、397、503、
507 頁。
克里特島——第 51 頁。
克罗茨納赫(克罗茨納赫浴場)——第
393 頁。
里海——第 50 頁。
利尔——第 307、337 頁。
利物浦——第 83 頁。
呂內維尔——第 29 頁。
麦尔夫(馬里)——第 50 頁。
麦尼尔蒙坦——巴黎的一个区。——第
224 頁。
麦茨——第 220、223 頁。
沙皇格勒——見君士坦丁堡。
苏格兰——第 349、494 頁。
苏黎世——第 234、337、365、386、387、
397、403、479、480、483 頁。
沃尔肖伐——第 42 頁。
希腊——第 533 頁。
希瓦汗国——第 50 頁。
犹太——第 532、545 頁。
芝加哥——第 386 頁。

八 画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納)——第 39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220、232、559 頁。
阿尔卡迪亚——希腊的一个地区。——

第 550 頁。
 阿尔明尼亚——第 48、51、527 頁。
 阿富汗——第 50 頁。
 阿穆尔边区——第 412 頁。
 阿速夫海——第 27、329 頁。
 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20、25、28、282、416 頁。
 波恩——第 392 頁。
 波兰——第 21—23、25—29、31—34、40、41、43、55、294、329、330、430、455、597、599 頁。
 波罗的海——第 29、31 頁。
 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第 507 頁。
 波斯(伊朗)——第 22、50、526、549 頁。
 波斯尼亚——第 48 頁。
 波士頓——第 388、397、403 頁。
 波希米亚——見捷克。
 非拉铁非——埃及的古城。——第 536、538、543 頁。
 芬兰——第 28、29、31、34 頁。
 芬兰湾——第 329 頁。
 拉芒什海峡——第 166 頁。
 羅馬——第 422、525、532—534、539、542、545—548、560、565 頁。
 羅馬尼亚——第 48 頁。
 罗彻斯特——第 259 頁。
 門的内哥罗——第 48 頁。
 帕里——小亚細亚的古城。——第 527、528 頁。
 佩特莫斯島——在爱琴海。——第 548 頁。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 20、51 頁。
 帖欣(策欣)——第 26、29、30 頁。
 易北河——第 460 頁。
 泽姆林(泽蒙)——南斯拉夫城市。——第 42 頁。

九 画

柏林——第 41、49、57、97、109、162、204、212、215、282、312、334、368、392、393、398、403、404、429、483、484、540、547、594、604—606、617、628、631、632 頁。
 拜尔法斯特——第 553 頁。
 保加利亚——第 42—43、48、565、608、635 頁。
 查尔朱伊(查尔朱)——第 50 頁。
 哈雷——第 105、204 頁。
 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匈牙利城市。——第 521 頁。
 科伦——第 392、394、397、403、461、628 頁。
 柯夫諾(考納斯)——第 454 頁。
 洛林省——第 7、47、49、53、217、293—295、437、464、600、622、634 頁。
 洛桑——第 530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341、393、400、437、561 頁。
 南港——第 322、379 頁。
 南特——第 561、571、583 頁。
 施皮歇恩——第 440 頁。
 威尔士——第 152 頁。
 威廉堡——第 220 頁。
 威斯特伐里亚——第 22 頁。
 香檳省——第 438、461 頁。
 叙利亚——第 528、533 頁。
 耶路撒冷——第 532、535、543、545、549 頁。
 耶拿——第 31、368、462 頁。

十 画

埃及——第 533 頁。
 埃劳——見普略西什-埃劳。

爱北斐特(烏培河谷)——第 234 頁。
 爱尔福特——第 31 頁。
 爱尔兰——第 317、318、374、375、494、
 565、636 頁。
 爱琴海——第 55、477、548 頁。
 高加索——第 17、20、40、622 頁。
 高卢——历史区。——第 548、611 頁。
 哥本哈根——第 63、244、247、581 頁。
 哥达——第 105 頁。
 哥多瓦——第 492 頁。
 格奧克-帖彼——第 50 頁。
 格尔伯多夫——第 94 頁。
 格拉納达——第 492 頁。
 格拉斯哥——第 365、382、386、387 頁。
 海得尔堡——第 363 頁。
 海牙——第 84、106、244、281、399、407、
 408 頁。
 浩罕——第 50 頁。
 庫弗尔格拉班——第 444 頁。
 庫頁島——第 409、410、412 頁。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 312、368、
 389 頁。
 馬德里——第 63、244、403、475、554 頁。
 馬尔納河——第 298 頁。
 馬拉加——第 492 頁。
 馬賽——第 387、569 頁。
 納瓦林(皮洛斯)——第 39 頁。
 索尔福——曼彻斯特郊区。——第 382
 頁。
 索利曼(苏来曼)山脉——第 50 頁。
 紐約——第 259、311、367、397、399 頁。
 特尔米亚——見基特諾斯。
 特劳波(奧帕瓦)——第 37 頁。
 特利尔——第 392 頁。
 烏克蘭——第 21、28 頁。
 夏威夷群島——第 254、411 頁。

十 一 画

曼彻斯特——第 322、363、365、368、379
 頁。
 梅克伦堡——第 567、608 頁。
 密德尔斯布罗——第 382 頁。
 莫尔达維亚(莫尔多瓦)——第 31、38—
 41、43 頁。
 莫斯科——第 20、33、329、410 頁。
 莫斯科省——第 507 頁。
 基特諾斯(特尔米亚)島——在爱琴海。
 ——第 548 頁。
 捷克——第 472 頁。
 康乃尔斯威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区。——第 315、371 頁。
 紹林吉亞——第 275 頁。
 設菲尔德——第 403 頁。
 推雅推喇——小亚細亚的古城。——第
 538 頁。

十 二 画

博斯普魯斯海峽——第 20、40、48—50、
 54、56 頁。
 費拉得尔菲亞——美国的城市。——第
 368 頁。
 黑海——第 17、20、29、50、55、329、477
 頁。
 喀尔巴阡山脉——第 55 頁。
 喀琅施塔得——第 298、618 頁。
 喀土穆——第 526 頁。
 萊巴赫(柳布梁納)——第 37 頁。
 萊比錫——第 33 頁。
 萊茵河——第 10、29、37、39、59、220、
 295、400、446、484、546、568 頁。
 普法尔茨——第 234 頁。
 普勒夫那(普累文)——第 51、627 頁。
 普略西什-埃劳(巴格腊提奧諾夫斯克)

——第 31 頁。

普魯特河——第 17、39、43 頁。

普魯士——第 22、23、25—27、30、33、42、
43、46、47、49、58、217、272、275、276、
295、416、437、438、441、450、455、565、
586、587、599、625、626 頁。

散得維齒群島——見夏威夷群島。

斯巴达——第 560 頁。

斯德哥尔摩——第 31 頁。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 322、379
頁。

斯特拉斯堡——第 186 頁。

斯图加特——第 388、403、504、632 頁。

斯温西——第 67 頁。

提尔西特(苏維埃斯克)——第 31、32、
296、437—438 頁。

雅典——第 504、560 頁。

十三画

奥克斯斯河(阿姆河)——第 17、50 頁。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30、
31 頁。

奥滕曾——阿尔托納的区(今为汉堡的
区)。——第 632 頁。

頓河——第 17 頁。

滑铁卢——第 607 頁。

蒙馬特尔——巴黎的区。——第 332 頁。

塞爾維亞——第 48 頁。

塞米格腊迪埃(特兰西瓦尼亚)——羅馬
尼亚的历史区。——第 51 頁。

塞納河——第 223、298 頁。

塞納河岸訥伊(訥伊)——第 223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43 頁。

塞維尔——第 492 頁。

塔干罗格——第 38 頁。

塔什干——第 50 頁。

新拉納克——第 501 頁。

十四画

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第 527 頁。

赫希斯特——第 366 頁。

維尔特——第 440 頁。

維尔騰堡——第 275 頁。

維罗那——第 37 頁。

維斯拉河——第 17、295、455 頁。

維也納——第 33、41、56、58、69、70、472、
481—483、594、604 頁。

銀鎮——伦敦东头的一个区。——第 71
頁。

十五画

德勒斯頓——第 80、234、604、632 頁。

德涅泊河——第 17、33、455 頁。

德涅斯特尔河——第 27 頁。

德維納(西德維納)河——第 17、33、455
頁。

劍桥——第 109、187、191、193、201、205
頁。

摩里亚——見伯罗奔尼撒。

摩塞尔河——第 392、400、499 頁。

撒馬尔汗——第 50 頁。

十六画

澳洲——第 254 頁。

澳大利亞——第 276、312、368、481 頁。

霍尔施坦——第 529 頁。

默麦尔河(尼門河)——第 465 頁。

十八画

薩克森——第 612 頁。

薩莫薩特(薩姆薩特)——叙利亞的城市。
——第 527 頁。

譯 后 記

本卷包括恩格斯在 1890 年 1 月到 1895 年 8 月，即在他晚年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1962 年出版）翻譯或校訂的。有些著作在譯校过程中参考了作者的原著所用文字和旧有的中譯文。其中“卡·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法德农民問題”、“卡·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导言”等文章，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訂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 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是在 196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本局譯校）譯文的基础上校訂的。“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二文，是在 196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张仲实譯）譯文的基础上校訂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一文在譯校时参考了麦园的譯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是根据 1958 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版第二卷譯校的，同时参考了俄譯文和德譯文。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杜章智、张启荣、楊启潏、周裕昶、吳惕

安、楊冠森、馮世熹、齊淑文、宋書聲、顧錦屏等同志。參加資料工作的有馮世熹、馮如馥、王錦文、陳家英等同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